

马列著作选读

一九七五年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列著作选读

一九七五年



東方朔
王羲之

王羲之

出 版 说 明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指示，为逐步实现党的十大提出的“经过持久的努力，‘使我们广大干部同人民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的伟大号召，我们选编了这本《马列著作选读》。希望广大基层干部、工人理论小组的同志和广大工人同志，通过学习这些著作，能够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有个大概的了解，逐步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和处理问题，更好地进行三大革命斗争。学习马列著作要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结合起来，从中了解毛主席是怎样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一月

为满足初学马列著作的青年同志的需求，现把 1975 年版的《马列著作选读》制成电子版，供初学者入门。

毛泽东博览网站

2023 年 7 月



目 录

马克思和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1
1872 年德文版序言	1
1882 年俄文版序言	4
1883 年德文版序言	6
1888 年英文版序言	8
1890 年德文版序言	14
1892 年波兰文版序言	21
1893 年意大利文版序言	23
共产党宣言	26
一、资产者和无产者	26
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	41
三、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	52
1. 反动的社会主义	52

(甲) 封建的社会主义	52
(乙) 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54
(丙) 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	56
2. 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59
3.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61
四、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	64
注释	67
马克思 雇佣劳动与资本	75
恩格斯写的 1891 年单行本导言	75
雇佣劳动与资	86
一	86
二	93
三	99
四	106
五	112
注释	122
马克思 哥达纲领批判(节录)	124

恩格斯写的序言	124
给威·白拉克的信	126
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	129
一	129
二	142
三	144
四	145
注释	153
马克思 工资、价格和利润	158
几点说明	158
1. 生产和工资	159
2. 生产、工资、利润	161
3. 工资和货币	172
4. 供给和需求	176
5. 工资和价格	178
6. 价值和劳动	181
7. 劳动力	191
8. 剩余价值的生产	194

9.	劳动的价值	196
10.	利润是按照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时获得的	198
11.	剩余价值分解成的各个部分	199
12.	利润、工资和价格间的一般关系	203
13.	争取提高工资或反对降低工资的一些 最重要场合	205
14.	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及其结果	212
	注释	220
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224
一	224
二	238
三	247
	注释	270
恩格斯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277
1888 年单行本序言	277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280	
一	280

二	290
三	301
四	310
注释.....	331
列宁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337
一	338
二	339
三	341
列宁 谈谈辩证法问题	344
列宁 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 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 (节录)	350
第一章 阶级社会和国家	350
1.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350
2. 特殊的武装队伍、监狱	353
3. 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	357
4. 国家“自行消亡”和暴力革命	360

第二章 国家与革命 1848–1851 年的经验	367
3. 1852 年马克思对问题的提法	367
第五章 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	370
1. 马克思如何提出问题	370
2. 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373
3. 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	378
4. 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	382
注释	390
列宁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通俗的论述	
(节录)	394
序言	394
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	396
(一)	396
(二)	398
(三)	398
(四)	399
(五)	400
一 生产集中和垄断	404

七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	420
八	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	431
九	对帝国主义的批评	442
十	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	457
	注释	464

马克思和恩格斯 共产宣言¹

1872年德文版序言²

共产主义者同盟³这个在当时条件下自然只能是秘密团体的国际工人组织，1847年11月在伦敦代表大会上委托我们两人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结果就产生了这个《宣言》，《宣言》原稿在二月革命前几星期寄到伦敦付印。《宣言》最初用德文出版，后来又用德文在德国、英国和美国至少翻印过十二次。第一个英译本是由海伦·麦克法林女士翻译的，于1850年在伦敦《红色共和党人》⁴杂志上发表，后来在1871年至少又有三种不同的英译本在美国出版。法译本于1848年六月起义前不久第一次在巴黎印行，最近又在纽约《社会主义者报》⁵上刊载；现在又有人在准备新译本。波兰文译本在德文本初版问世后不久就在伦敦出现。俄译本是于六十年代在日内瓦出版的。丹麦文译本也是在原书问世后不久就出版了。

不管最近二十五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

《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个别地方本来可以作某些修改。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殊的意义。现在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应该有不同的写法了。由于最近二十五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见《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德文版第 19 页^①，那里把这个思想发挥得更加完备。）其次，很明显，对于社会主义文献所作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因为这一批判只包括到 1847 年为止；同样也很明显，关于共产党人对待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问题所提出的意见（第四章）虽然大体上至今还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而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进程彻底扫除，所以这些意见在实践方面毕竟是过时了。

但是《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下次再版时也许能加上一篇包括从 1847 年到现在这段时期的导言。这次再版太仓卒了，以致我们竟来不及做这件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72 页——编者注

工作。

卡尔·马克思 费里德里希·恩格斯

1872年6月24日于伦敦

载于1872年在莱比锡出版的
《共产党宣言。附有作者序言
的新版》一书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8卷第104—105页

1882 年俄文版序言⁶

巴枯宁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一版，在六十年代初⁷，由《钟声》⁸印刷所刊印问世。当时，西方认为这件事（《宣言》译成俄文出版）是文坛的一件奇闻。这种看法今天是不可能有了。

当时（1847 年 12 月），卷入无产阶级运动的地区是多么狭小，这从《宣言》最后一章《共产党人对各国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这一章里，正好没有说到俄国和美国。那时，俄国是欧洲全部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支庞大后备军；美国正通过移民吸收欧洲无产阶级的过剩力量。这两个国家，都向欧洲供给原料，同时又都是欧洲工业品的销售市场。所以，这两个国家不管怎样当时都是欧洲现存秩序的支柱。

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正是欧洲移民，使北美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这种农业生产的竞争震撼着欧洲大小土地所有制的根基。此外，这种移民还使美国能够以巨大的力量和规模开发其丰富的工业资源，以至于很快就会摧毁西欧特别是英国迄今为止的工业垄断地位。这两种情况，对美国本身也起着革命作用。作为整个政治制度基础的农场主的中小型地产，正逐渐被大农场的竞争所征服；同时，在各工业区，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和神话般的资本积聚开始发展起

来。

现在来看看俄国吧！在 1848—1849 年革命期间，不仅欧洲的君主，而且连欧洲的资产者，都把俄国的干涉看作是帮助他们对付刚刚开始觉醒的无产阶级的唯一救星。沙皇曾被宣布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现在，沙皇已经成了革命的俘虏，被禁锢在加特契纳⁹，而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队伍了。

《共产主义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所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卡尔·马克思 费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2 年 1 月 21 日于伦敦

载于 1882 年在日内瓦出版的

原文是德文

俄文版《共产党宣言》一书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9 卷第 325—326 页

1883 年德文版序言¹⁰

本版序言，不幸只能由我一个人署名了。马克思——这位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应受到欧美整个工人阶级感谢的人物——已经长眠于海格特公墓，他的墓上已经初次长出了青草。在他逝世以后，就更谈不上对《宣言》作什么修改或补充了。因此，我认为更有必要在这里再一次明确地申述下面这一点。

《宣言》中始终贯彻的基本思想，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①

① 我在英译本序言中说过：“这一思想在我看来应该对历史学做出象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那样的贡献，我们两人早在 1845 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至于当时我个人独自在这方面达到了什么样的进展，从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可以看出。但是到 1845 年春我在布鲁塞尔重新会见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整理出来，并且用几乎象我在上面的叙述中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句向我说明了。”（恩格斯在 1890 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这一点我已经屡次说过，但正是现在必须在《宣言》本身的前面也写明这一点。

弗·恩格斯

1883年6月28日于伦敦

载于1883年在霍廷根—苏黎世
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一书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1卷第3——4页

1888 年英文版序言¹¹

《宣言》是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一起初纯粹是德国工人团体，后来成为国际工人团体，而在 1848 年以前欧洲大陆的政治条件下必然是秘密的团体的工人组织的纲领发表的。1847 年 11 月在伦敦举行的同盟代表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完备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手稿于 1848 年 1 月用德文写成，并在 2 月 24 日的法国革命前几星期送到伦敦付印。法译本于 1848 年六月起义前不久在巴黎出版。第一个英译本是由艾琳·麦克法林女士翻译的，于 1850 年刊载在乔治·朱利安·哈尼的伦敦《红色共和党人》杂志上。还出版了丹麦文译本和波兰文译本。

1848 年巴黎六月起义这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第一次大搏斗的失败，又把欧洲工人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要求暂时推到后面去了。从那时起，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又像二月革命以前那样只是在有产阶级的各个集团之间进行了；工人阶级被迫局限于争取一些政治上的活动自由，并采取中等阶级激进派极左翼的立场。凡是继续显露出生机的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都遭到无情的镇压。例如，普鲁士警察发觉了当时设在科隆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一些成员被逮捕，并且在经过十八个月监禁之后于 1852 年 10 月被交付法庭审判。这次有名的“科隆共产党人案件”¹² 从 10 月 4 日

一直继续到 11 月 12 日；被告中有七个人被判处了三至六年的要塞监禁。宣判之后，同盟即由剩下的成员正式解散。至于《宣言》，似乎注定从此要被人遗忘了。

当欧洲工人阶级重新聚集了足以对统治阶级发动另一次进攻的力量的时候，便产生了国际工人协会¹³。但是这个协会成立的明确目的是要把欧美正在进行战斗的整个无产阶级团结为一个整体，因此，它不能立刻宣布《宣言》中所申述的那些原则。国际应该有一个充分广泛的纲领，使英国工联，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①都能接受。马克思起草了这个能使一切党派都满意的纲领，当时是把希望完全寄托于共同行动和共同讨论必然要产生的工人阶级的精神发展。反资本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迁——而且失败比胜利更甚——不能不使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各种心爱的万应灵丹毫不中用，并使他们更透彻地了解工人阶级解放的真实条件。马克思是正确的。当 1874 年国际解散时，工人已经全然不是 1864 年国际成立时的那个样子了。法国的蒲鲁东主义和德国的拉萨尔主义已经是奄奄一息，甚至那些很久以前大多数已同国际决裂的保守的英国工联也渐有进步，以致它们去年举行的斯温西代表大会的主席能够它们的名义声明说：“大陆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再不可怕

① 拉萨尔本人在和我们接触时总是自认为是马克思的学生，而他作为马克思的学生是站在《宣言》的立场上的。但是他在 1862—1864 年间进行的公开鼓动中，却始终没有超出靠国家贷款建立生产合作社的要求。

了。”¹⁴ 确实，《宣言》的原则在世界各国工人中间都已传播得很广了。

这样一来，《宣言》本身就重新提到前台上来了。从 1850 年起，德文原本在瑞士、英国和美国重版过数次。1872 年，有人在纽约把它译成英文，并在那里的《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¹⁵ 上发表。接着又有人根据这个英文本把它译成法文，刊载在纽约的《社会主义者报》上。以后在美国又至少出现过两种多少有些曲解的英文译本，其中一种还在英国重版过。由巴枯宁翻译的第一个俄文本约于 1863 年在日内瓦由赫乐岑办的《钟声》印刷所刊印；由英勇的维拉·查苏利奇翻译的第二个俄文本¹⁶，则于 1882 年同样在日内瓦出版。新的丹麦文译本¹⁷ 于 1885 年在哥本哈根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的一种出版，新的法文译本于 1886 年刊载在巴黎的《社会主义者报》上¹⁸。有人根据这个译本译成西班牙文，并于 1886 年在马德里出版¹⁹。至于德文的翻印版本，则为数极多，总共至少有十二个。亚美尼亚文译本原应于几个月前在君士坦丁堡印出，但是没有问世，有人告诉我，这是因为出版人害怕在书上标明马克思的姓名，而译者又拒绝把《宣言》当作自己的作品出版。关于后来用其他文字出版的其他译本，我虽然听说过，但是没有亲眼看到。因此，《宣言》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现代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

可是，当我们写这个《宣言》时，我们不能把它叫作社

会主义宣言。在1847年，所谓社会主义者，一方面是指那些信奉各种空想学说的分子，即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这两个流派都已经变成纯粹的宗派，并在逐渐走向灭亡；另一方面是指各种各样的社会庸医，他们都答应要用各种补缀办法来消除一切社会弊病而毫不伤及资本和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阶级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至于当时工人阶级中那些确信单纯政治变革全然不够而认为必须根本改造全部社会的分子，他们把自己叫作共产主义者。这种共产主义还是颇为粗糙的、尚欠修琢的、纯粹出于本能的共产主义；但它却接触到了最主要之点，并已在工人阶级当中强大到足以形成法国卡贝的和德国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可见，在1847年，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方面，是“有身份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自始就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²⁰，所以我们也丝毫没有毫无疑义究竟应该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定哪一个名称，而且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

虽然《宣言》是我们两人共同的作品，但我终究认为必须指出，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这个原理就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

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这一思想在我看来应该对历史学作出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那样的贡献，我们两人早在 1845 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至于当时我个人独自在这方面达到了什么样的进展，从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①一书中可以明白看出。但是到 1845 年春我在布鲁塞尔再次见到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整理出来，并且用几乎象我在上面所的叙述中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句向我说明了。

现在我从我们共同为 1872 年德文版写的序言中引录如下一段话：

“不管最近二十五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个别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现在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应该有不同的

①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 By Frederick Engels. Translated by Florence K. Wischne wetzky, New York. Loveli--London. W. Reeves , 1888.

写法了。由于从 1848 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组织也跟着有了改进和增长，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见《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1871 年伦敦特鲁洛夫版第 15 页，那里把这个思想发挥得更加完备） 其次，很明显，对于社会主义文献所做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因为这一批判只包括到 1847 年为止；同样也很明显，关于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问题所提出的意见（第四章）虽然大体上至今还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而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进程所彻底扫除，所以这些意见在实践方面毕竟是过时了。

但是《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

本版译文是由译过马克思“资本论”一书大部分的赛米尔·穆尔先生翻译的。我同他一起把译文校阅过一遍，并且我还加进了一些历史备考性的附注。

弗·恩格斯

1888 年 1 月 30 日于伦敦

载于 1888 年在伦敦出版的

原文是德文

《共产党宣言》一书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1 卷第 403—410 页

1890 年德文版序言²¹

自从我写了上面那篇序言²²以来，已经又有必要刊印《宣言》的新的德文版了，同时《宣言》本身也有种种遭遇，应该在这里提一提。

1882 年在日内瓦出版了由维拉·查苏利奇翻译的第二个俄译本，马克思和我曾为这个译本写过一篇序言。可惜我把这篇序言的德文原稿遗失了²³，所以现在我只好再从俄文译过来，这样做当然不会使原稿增色。⁸⁴下面就是这篇序言：

“巴枯宁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一版，在六十年代初，由《钟声》印刷所刊印问世。当时，西方认为《宣言》译成俄文出版不过是文坛上的一件奇闻。这种看法今天是不可能有了。在《宣言》最初发表时期（1848 年 1 月）卷入无产阶级运动的地区是多么狭小，这从《宣言》最后一章《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这一章里，正好没有说到俄国和美国。那时，俄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支庞大后备军，向美国境内移民吸收着欧洲无产阶级的过剩力量。这两个国家，都向欧洲提供原料，同时又都充当欧洲工业品的销售市场。所以，这两个国家不管怎样当时都是欧洲社会秩序的支柱。

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正是欧洲移民，使北美的农业

生产能够大大发展，这种农业生产的竞争震撼着欧洲大小土地所有制的根基。此外，这种移民还使美国能够以巨大的力量和规模开发其丰富的工业资源，以至于很快就会摧毁西欧的工业垄断地位。这两种情况，对美国本身也起着革命作用。作为美国整个政治制度基础的农场主（使用自己劳动的农场主）的中小型地产，正逐渐被大农场的竞争所征服；同时，在各工业区，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同神话般的资本积聚一起开始发展起来。

现在来看看俄国吧！在 1848—1849 年革命期间，不仅欧洲的君主，而且连欧洲的资产者，都把俄国的干涉看做是帮助他们对付当时刚刚开始意识到自己力量的无产阶级的唯一救星。他们把沙皇宣布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现在，沙皇已成了革命的俘虏，被禁锢在加特契纳，而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队伍了。

《共产主义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狂热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刚开始形成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

那末试问：俄国农民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是能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呢？或者，它还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过的那个解体过程呢？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工人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

点。

卡·马克思 弗·恩格斯

1882年1月21日于伦敦”

大约在同一时候，在日内瓦出版了新的波兰文译本：
《Manifest Komunistyczny》〔《共产主义宣言》〕。

随后又于1885年在哥本哈根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的一种出版了新的丹麦文译本。可惜这一译本不够完备；有几个重要的地方大概是因为译者感到难译而被删掉了，并且在不少地方可以看到草率从事的痕迹，尤其令人遗憾的是，从译文中可以看出，要是译者较为细心一点，他是能够把它译得很好的。

1886年在巴黎《社会主义者报》上刊载了新的法译文；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译文。

同年又有人根据这个法文本译成西班牙文，起初刊登在马德里的《社会主义者报》上，接着又印成单行本：《共产党宣言》，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著，马德里，社会主义者报社，艾尔南·科尔特斯街8号。

这里我还要提到一件可笑的事。在1887年，君士坦丁堡的一位出版商收到了阿尔明尼亚文的《宣言》译稿；但是这位好心人却没有勇气把这本署有马克思的名字的作品刊印出来，竟认为最好是由译者本人冒充作者，可是译者拒绝这样做。

在英国多次刊印过好几种美国译本，但都不大确切。到1888年终于出版了一种可靠的译本。这个译本是由我的友人赛米尔·穆尔翻译的，并且在付印以前还由我们两人一起重

新校阅过一遍。封面印的是：《共产党宣言》，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经作者同意的英译本，由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校订并加上注释，1888年伦敦，威廉·里夫斯，东中央区弗利特街185号。这个版本中的某些注释，我已把它们收入本版。

《宣言》有它本身的经历。它出现的时候曾受到过当时人数尚少的科学社会主义先锋队的热烈欢迎（第一篇序言里提到的那些译本便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不久以后它就被那随着1848年6月巴黎工人失败而抬起头来的反动势力排挤到后面去，而在1852年11月科伦共产党人被判刑之后，它更被“依法”宣布为非法了。随着与二月革命相联系的工人运动退出公开舞台，《宣言》也退到后面去了。

当欧洲工人阶级又强大到足以重新对统治阶级政权发动进攻的时候，产生了国际工人协会。它的目的是要把欧美整个战斗的工人阶级联合成一支大军。因此，它不能从《宣言》中所申述的那些原则出发。它应该有一个不致把英国工联，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①据之于门外的纲领。这样一个纲领即国际章程绪论部分，是马克思起草的，其行文之巧妙是连巴枯宁和无政府派

① 拉萨尔本人在和我们接触时总是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学生”，而他作为马克思的“学生”当然是站在《宣言》的立场上的。但是他的那些信徒却不是如此，他们始终没有超出他所主张的靠国家贷款建立生产合作社的要求，并且把整个工人阶级划分为主张靠国家帮助的人和主张自我帮助的人。

也不能不承认的。至于说到《宣言》中所提出的那些原则的最终胜利，马克思在这里是把希望完全寄托于共同行动和共同讨论必然要产生的工人阶级的精神的发展。反资本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迁，——而且失败比胜利更甚，——不能不使进行斗争的人们明白自己一向所崇奉的那些万应灵丹毫不中用，并使他们的头脑更善于透彻了解工人解放的真实条件。马克思是正确的。1874年，当国际解散的时候，工人阶级已经全然不是1864年国际成立时的那个样子了。罗曼语各国的蒲鲁东主义和德国的道地拉萨尔主义已经奄奄一息，甚至当时极端保守的英国工联也渐有进展，以致它们1887年举行的斯温西代表大会的主席能够用它们的名义声明说：“大陆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再不可怕了。”而在1887年，大陆社会主义已经差不多完全是《宣言》中所宣布的那个理论了。由此可见，《宣言》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1848年以来现代工人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布最广和最带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起到加利福尼亚止的世界各国千百万工人共同的纲领。

可是，当《宣言》出版的时候，我们不能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宣言**。在1847年，所谓社会主义者是指两种人。一方面是那些信奉各种空想学说的分子，特别是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这两个流派当时都已经变成逐渐走向灭亡的纯粹的宗派。另一方面是各种各样的社会庸医，他们想用各种万应灵丹和各种补缀办法来消除社会弊病而毫不伤及资本和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至于当时确信单纯政治变革全然不够

而要求根本改造社会的那一部分工人，他们把自己叫做共产主义者。这种共产主义是一种还没有很好加工的、只是出于本能的、颇为粗糙的共产主义；但它已经强大到足以形成两种空想的共产主义体系：在法国有卡贝的“伊加利亚”共产主义，在德国有魏特林的共产主义。在 1847 年，社会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运动，共产主义则意味着工人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方面，是可以进出沙龙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当时已经十分坚决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就丝毫没有怀疑究竟应该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定哪一个名称。而且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四十二年前我们在巴黎革命即无产阶级带着本身要求参加的第一次革命的前夜向世界上发出这个号召时，响应者还是寥寥无几。可是，1864 年 9 月 28 日，大多数西欧国家中的无产者已经联合成为流芳百世的国际工人协会了。固然，国际本身只存在了九年，但它所创立的全世界无产者永久的联合依然存在，并且比先前任何时候更加强固，而今天这个日子就是最好的证明。因为今天我写这个序言的时候，欧美无产阶级正在检阅自己的战斗力量，它们第一次在一个旗帜下动员成为一个军队，以求达到一个最近的目的，即早已由国际 1866 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宣布、后来又由 1889 年巴黎工人代表大会再度宣布的在法律上确立八小时标准工作日。²⁴今天的情景定会使全世界的资本家和地主知道：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已经真正联合起来了。

如果马克思今天还能同我站在一起亲眼看见这种情景，
那该多好啊！

弗·恩格斯

1890年5月1日于伦敦

载于1890年在伦敦出版的
德文版《共产党宣言》一书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2卷第61—68页

1892 年波兰文版序言²⁵

从目前已有必要出版《共产主义宣言》波兰文新版本这一事实，可以引起许多联想。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宣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测量欧洲大陆大工业发展的一种尺度。某一国家的大工业愈发展，该国工人想要弄清他们作为工人阶级在有产阶级面前所处地位的愿望也就愈强烈，工人中间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就愈扩大，对《宣言》的需求也就愈增长。这样，根据《宣言》用某国文字销行的份数，不仅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工人运动的状况，而且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大工业发展的程度。

因此，《宣言》波兰文新版本的刊行，标志着波兰工业的重大发展。而且从十年前刊印上一版以来确实已有这种进步，这是丝毫不容置疑的。波兰王国，即会议桌上的波兰²⁶，已成为俄罗斯帝国的巨大的工业区。俄国大工业分散于各处，一部分在芬兰湾沿岸，一部分在中央区（莫斯科和弗拉基米尔），一部分在黑海和阿速夫海沿岸，还有一些分散在其他地方；波兰工业则集中于一个比较狭小的地区，由这种集中所产生的益处和害处，它都感受到了。这种益处是从事竞争的俄国工厂主所承认的，因为他们虽然拚命想把波兰人变成俄罗斯人，同时却要求实行抵制波兰的保护关税。至于这种害处，则表现为社会主义思想

在波兰工人中间的迅速传播和对《宣言》的需求的日益增长。

但是，波兰工业的迅速发展（波兰工业已经超过了俄国工业），又是波兰人民拥有无穷生命力的新的证明，是波兰人民即将达到民族复兴的新的保证。而一个独立强盛的波兰的复兴是一件不仅关系到波兰人而且关系到我们大家的事情。欧洲各民族的诚恳的国际合作，只有当其中每个民族都在自己内部完全自主的时候才能实现。1848年革命打着无产阶级的旗帜，使无产阶级战士归根到底只是做了资产阶级的工作，然而这次革命毕竟通过自己的遗嘱执行人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实现了意大利、德国和匈牙利的独立。至于波兰，虽然它从1792年以来对革命所做的贡献比这三个国家所做的全部贡献还要大，可是它于1863年在十倍于自己的俄国优势下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却被抛弃不管了。波兰贵族既没有能够保持住波兰独立，也没有能够重新争得波兰独立；在资产阶级看来，波兰独立在今天至少是一件无关痛痒的事情。然而这种独立却是实现欧洲各民族和谐的合作所必需的。这种独立只有年轻的波兰无产阶级才能争得，而当波兰无产阶级把它争到手的时候，它就会完全有保障了。因为欧洲所有其余各国工人都像波兰工人本身一样需要波兰的独立。

弗·恩格斯

1892年2月10日于伦敦

载于1892年2月27日《黎明》杂志第35期和1892年在伦敦出版的波兰文版《共产党宣言》一书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2卷第329—330页

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²⁷

致意大利读者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可以说正好碰上了1848年3月18日这个日子,在这一天米兰和柏林发生了革命,即发生了两个民族——其中一个处于欧洲大陆中心,另一个处于地中海中心——举行的武装起义;这两个民族在此以前都由于割据和内讧而被削弱并因而遭到外族的统治。意大利曾受奥皇支配,而德国则受到俄国沙皇那种虽然不那么直接、但是同样可以感觉得到的压迫。1848年3月18日的结果使意大利和德国免除了这种耻辱;如果说,这两个伟大民族在1843—1871年期间得到复兴并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重新获得独立,那末,这是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那些镇压1848年革命的人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这次革命的遗嘱执行人²⁸。

这次革命到处都是由工人阶级干的:构筑街垒和流血牺牲的都是工人阶级。只有巴黎工人在实行推翻政府的同时也抱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明确意图。但是,虽然他们已经认识到他们这个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对抗,然而无论法国经济的进展或法国工人群众的智慧的发展,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因此,革命的果实归根到底是由资本家阶级拿去了。在其他国家,在意大利、德

国、奥地利，工人从一开始就只限于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但是在任何一个国家，资产阶级的统治离开民族独立是不行的。因此，1848年革命也就不能不使直到当时还没有统一和独立的那些民族——意大利、德国、匈牙利——获得统一和独立。现在轮到波兰了。

由此可见，1848年革命虽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毕竟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了道路，为这个革命准备了基础。最近四十五年以来，资产阶级制度由于在世界各国引起了大工业的高涨，到处造成了人数众多的、集中的、强大的无产阶级；这样它就产生了——正如《宣言》所说——它自身的掘墓人。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试想想看，在1848年以前存在的政治条件下，能有什么意大利工人、匈牙利工人、德意志工人、波兰工人、俄罗斯工人的共同的国际行动！

可见，1848年的战斗并不是白白进行的。从这次革命时期起直到今日的这四十五年，也不是白白过去的。这次革命时期的果实已开始成熟，而我的唯一愿望是这个意大利文译本的出版能成为意大利无产阶级胜利的良好预兆，如同《宣言》原文的出版成了国际革命的预兆一样。

《宣言》十分公正地承认了资本主义在先前所起过的革命作用。意大利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现在也如1300年间那样，新

的历史纪元正在到来。意大利是否会给我们一个新的但丁来宣告这个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呢？

弗·恩格斯

1893年2月1日于伦敦

载于1893年在米兰出版的意大利文版《共产党宣言》一书

文是法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2卷第429——431页

共产党宣言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

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它的当政的敌人骂为共产党呢？又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呢？

从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

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对抗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

为了这个目的，各国共产党人集会于伦敦，拟定了如下的宣言，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佛来米文和丹麦文公布于世。

一、资产者和无产者^①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②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① 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③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第。

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

-
- ② 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可记载的历史。在 1847 年，关于社会的史前状态，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后来，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的公社土地公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所有制是一切条顿族的历史发展所由起始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逐渐发现，土地公有的村社是从印度起到爱尔兰止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最后，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的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抗的阶级。关于这个解体过程，我试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6 年斯图加特第 2 版)中加以探讨。(恩格斯在 1888 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在 1890 年德文版中删去了这个注的最后一句话。)
- ③ 行会师傅就是在行会中享有全权的会员，他是行会内部的工匠，而不是行会的首长。(恩格斯在 1888 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行会师傅被工业的中间等级排挤掉了；各种行业组合之间的分工随着各个作坊内部的分工的出现而消失了。

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化大工业化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整批整批产业军的统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愈是扩展，资产阶级也愈是发展，愈是增加自己的资本，愈是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都排挤到后面去。

由此可见，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

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①伴随着。它在封建领主统治下是被压迫的等级，在公社^②里是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在一些地方组成独立的城市共和国^③，在另一些地方组成君主国中的纳税的第三等级^④，后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制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甚至是大君主的主要基础；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

① “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这个阶级的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编者注

② 法国的新兴城市，甚至在它们从封建领主手里争得地方自治和“第三等级”的政治权利以前，就已经称为“公社”了。一般说来，这里是把英国当做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典型国家，而把法国当做资产阶级政治发展的典型国家。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意大利和法国的市民，从他们的封建领主手中买得或争得最初的自治权以后，就将自己的城市共同体称为“公社”。(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③ 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例如在意大利和德国)”。——编者注

④ 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例如在法国)”一编者注

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资产阶级揭示了，在中世纪深受反动派称许的好勇斗狠，是以懒散怠惰作为它的相应的补充的。它第一次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移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

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①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老古董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

① “过去”在1890年德文版中是“其他”。——编者注

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①。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

① 这句话中的“文学”（Literatur）一词是指科学、艺术、哲学等等方面
的书面著作。——编者注

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象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了。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

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①。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打破，而且果然被打破了。

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

现在，我们眼前又进行着类似的运动。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象一个巫师那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要证明这一点，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循环中愈来愈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象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吞噬了社会的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

① 在 1888 年英文版中没有这句话。——编者注

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①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

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愈来愈少的办法。

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

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资产阶级即资本愈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跟着发展；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这些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象其他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所以他们同样地受到竞争方面的一切变化的影响，受到市场方面的一切波动的影响。

由于机器的推广和分工的发展，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也失去了对工人的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

① 在 1872、1883 和 1890 年德文版中删去了：“资产阶级文明和”。——编者注

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因此，花在工人身上的费用，几乎只限于维持工人生活和延续工人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商品的价格，从而劳动的价格²⁹，是同它的生产费用相等的。因此，劳动愈使人感到厌恶，工资也就愈减少。不仅如此，机器愈推广，分工愈细致，劳动量也就愈增加，这或者是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或者是由于在一定时间内所要求的劳动量的增加，机器运转的加速，等等。

现代工业已经把家长式的师傅的小作坊变成了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象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他们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并且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厂主资产者本人的奴役。这种专制制度愈是公开地把发财致富宣布为自己的最终^①目的，它就愈是可鄙、可恨和可恶。

手的操作所要求的技巧和气力愈少，换句话说，现代工业愈发达，男工也就愈受到女工的排挤^②。对工人阶级来说，性别和年龄的差别再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了。他们都只是劳动工具，不过因为年龄和性别的不同而需要不同的费用罢了。

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店主、当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

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

① 在 1890 年德文版中去了：“最终”。——编注

② “受到女工的排挤”在 1848 年第一个德文版（2 月出版的二十三页本）中是：“受到女工和童工的排挤”。——编者注

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业，经不起较大资本家的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一钱不值了。无产阶级的队伍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

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

最初是个别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个别资产者作斗争。他们不仅仅攻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他们攻击生产工具本身^①；他们毁坏寻些来竞争的外国商品，捣毁机器，烧毁工厂，力图恢复已经失去的中世纪工人的地位。

在这个阶段上，工人们还是分散在全国各地并为竞争所分裂的群众。广大工人群众的团结，还不是他们自己联合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联合的结果，当时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必须而且暂还能够把整个无产阶级发动起来。因此，在这个阶段上，无产者不是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而是同自己的敌人的敌人作斗争，即同君主专制的残余、地主、非工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者作斗争。因此，整个历史运动都集中在资产阶级手里；在这种条件下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

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愈来愈感觉

① 这句话在 1888 年英文版中是：“他们不是攻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而是攻击生产工具本身”。——编者注

到自己的力量。机器使劳动的差别愈来愈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生活状况也愈来愈趋于一致。资产者彼此间日益加剧的竞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商业危机，使工人的工资愈来愈不稳定；机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愈来愈没有保障；个别工人和个别资产者之间的冲突愈来愈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①；他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工资。他们甚至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以便一旦发生冲突在生活上有所保障。有些地方，斗争转变为起义。

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愈来愈扩大的团结。这种团结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团结，现代的无产者利用铁路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了。

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它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迫使他们用法律形式承认工人的个别利益。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³⁰就是一个例

① 在 1888 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工联）”——编者注

子。

一般说来，旧社会内部的冲突在许多方面都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发展。资产阶级处于不断的斗争中：最初是反对贵族，后来又反对其利益同工业进步相矛盾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并且经常反对一切外国的资产阶级。在这一切斗争中，资产阶级都不得不向无产阶级呼吁，要求无产阶级援助，这样就把无产阶级卷进了政治运动。于是，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自己的教育因素^①即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予了无产阶级。

其次，我们已经看到，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中的整个整个的阶层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教育因素^②。

最后，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所以，正象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

① “教育因素”在 1888 年英文版中是：“政治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因素”。
——编者注

② “大量的教育因素”在 1888 年英文版中是：“启蒙和进步的新因 2 素”。
——编者注

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有时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

旧社会的生活条件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已经被消灭了。无产者是没有财产的；他们和妻子儿女的关系同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再没有共同之处了；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年来全都是掩盖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偏见。

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者只有消灭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消灭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

的^①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

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转变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

我们已经看到，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的。但是，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农奴曾经在农奴制度下挣扎到公社社员的地位，小资产者曾经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下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愈来愈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做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了。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社会再不能在它统治下生活下去了，就是说，它的存在不再同社会相容了。

① 在 1888 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自觉的”——编者注

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①；资本的生存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联合而达到的革命团结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

共产党人同一般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② 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中最坚决

① 这句话在 1888 年英文版中是：“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编者注

② “特殊的”在 1888 年英文版中是：“宗派的”。——编者注

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①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

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在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消灭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并不是共产主义所独具的特征。

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变更。

例如，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的所有制，代之以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筑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②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

① “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在 1888 年英文版中是：“最先进的和最坚决的”。——编者注

② “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在 1888 年英文版中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编者注

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有人责备我们共产党人，说我们要消灭个人挣得的、自己劳动得来的财产，要消灭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

好一个劳动得来的、自己挣得的、自己赚来的财产！你们说的是资产阶级所有制以前的那种小资产者的、小农的财产吗？那种财产用不着我们去消灭，工业的发展已经把它消灭了，而且每天都在消灭它。

或者，你们说的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吧？

但是，难道雇佣劳动，无产者的劳动，会给无产者创造出财产来吗？没有的事。这种劳动所创造的是资本，即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只有在不断产生出新的雇佣劳动来重新加以剥削的条件下才能增加起来的财产。现今的这种财产是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中运动的。让我们来看看这种对立的两个方面吧。

做一个资本家，这就是说，他在生产中不仅占有一种纯粹个人的地位，而且占有一种社会的地位。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被运用起来。

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

因此，把资本变为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时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

现在，我们来看看雇佣劳动。

雇佣劳动的平均价格是最低限度的工资，即工人为维持

其工人的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额。因此，雇佣工人靠自己的劳动所占有的东西，只够勉强维持他的生命的再生产。我们决不打算消灭这种供直接生命再生产用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这种占有并不会留下任何剩余的东西使人们有可能支配别人的劳动。我们要消灭的只是这种占有的可怜的性质，在这种占有下，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生活，并且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生活的时候才能生活。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

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

而资产阶级却把消灭这种关系说成是消灭个性和自由！它说对了。的确，正是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

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贸易自由，买卖自由。

但是，买卖一消失，自由的买卖也就会消失。我们的资产者关于自由买卖的空谈，也象他们的其他一切关于自由的大话一样，仅仅对于不自由的买卖来说，对于中世纪被奴役的市民来说，才是有意义的，而对于共产主义要消灭买卖、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本身这一点来说，却是毫无意义的。

你们一听到我们要消灭私有制，就惊慌起来。但是，在

你们的现存社会里，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被消灭了；这种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不存在。可见，你们责备我们，原来是说我们要消灭那种以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条件的所有制。

总而言之，你们责备我们，原来是说我们要消灭你们的那种所有制。的确，我们是要这样做的。

你们说，从劳动不再能变为资本、货币、地租，一句话，不再能变为可以垄断的社会力量的时候起，就是说，从个人财产不再能变为资产阶级财产^①的时候起，个性就被消灭了。

由此可见，你们是承认，你们所理解的个性，不外是资产者、资产阶级私有者。这样的个性确实应当被消灭。

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

有人反驳说，私有制一消灭，一切活动就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兴起。

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早就应该因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是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所有这些顾虑，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同义反复：一旦没有资本，也就不再有雇佣劳动了。

所有这些对共产主义的物质产品的占有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责备，都同样被推广到精神产品的占有和生产方面。正如

① 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变为资本”。——编者注

消灭阶级的所有制在资产者看来是消灭生产本身一样，消灭阶级的教育在他们看来就等于消灭一切教育。

资产者唯恐其灭亡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把人训练成机器罢了。

但是，你们既然用你们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教育、法等等的观念来衡量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主张，那就请你们不要同我们争论了。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象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

你们的偏私观念使你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这种偏私观念是你们和一切灭亡了的统治阶级所共有的。你们谈到古代所有制的时候所能理解的，你们谈到封建所有制的时候所能理解的，一谈到资产阶级所有制你们就再也不能理解了。

消灭家庭！连极端的激进党人也对共产党人的这种可耻的意图表示愤慨。

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筑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是建筑在资本上面，建筑在私人发财上面的。这种家庭的充分发展的形式，只是在资产阶级中才存在，而它的补充现象是无产者的被迫独居和公开的卖淫。

资产者的家庭自然会随着它的这种补充现象的消失而消失，两者都要随着资本的消失而消失。

也许你们是责备我们，说我们要消灭父母对子女的剥削

吧？我们承认这种罪状。

但是，你们说，我们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要消灭人们最亲密的关系。

而你们的教育不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也是由你们借以进行教育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也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影响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

无产者的一切家庭联系愈是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破坏，他们的子女愈是由于这种发展而被变成单纯的买卖对象和劳动工具，资产阶级关于家庭和教育、关于父母和子女的亲密关系的空话就愈是令人作呕。

但是，你们共产党人是要实行公妻制的啊，——整个资产阶级异口同声地这样叫喊。

资产者原来是把自己的妻子看做单纯的生产工具的。他们听说生产工具将要公共使用，自然就不能不想到妇女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他们想也没有想到，问题正在于消灭妇女被当做单纯生产工具看待的地位。

其实，我们的资产者装得道貌岸然，对所谓的共产党人的正式公妻制表示惊讶，那是再可笑不过了。公妻制无需共产党人来实行，它差不多是一向就有的。

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和女儿受他们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娼妓更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

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人们至多只能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掩蔽着的公妻制。其实，不言而喻，随着现在的生产关系的消灭，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公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卖淫，也就消失了。

还有人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要取消祖国，取消民族。

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①，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虽然这里所说的“民族的”一词和资产阶级所理解的完全不同。

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了。

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

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从宗教的、哲学的和一般意识形态的观点对共产主义提出的种种责难，都不值得详细讨论了。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名话，人们的意识，随着

① “民族的阶级”在 1888 年英文版中是：“民族的领导阶级”——编者注

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

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

当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古代的各种宗教就被基督教战胜了。当基督教思想在十八世纪被启蒙思想击败的时候，封建社会正在同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殊死的斗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的领域里^①占统治地位罢了。

“诚然”，——有人会说，——“宗教的、道德的、哲学的、政治的、法的以及其他的观点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是不断改变的。但是，宗教、道德、哲学、政治和法本身在这种变化中却始终保存着。

此外，还存在着永恒的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这些真理是社会发展的一切阶段所共有的。但是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的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史发展进程相矛盾的。”

这种责难有什么意思呢？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

① “在信仰的领域里”在 1872/1883 和 1890 年德文版中是“在知识的领域里”。——编者注

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而这种对立在各个不同的时代是各不相同的。

但是，不管这种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因此，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种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①，这些意识形态，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不过，我们还是把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种种责难撇开吧。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采取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和没有力量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超出本身^②，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① 在1890年德文版中删去了：“这些形式”。——编者注

② 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使进一步向旧的社会制度进攻成为必要”。
——编者注

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

但是，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

1. 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
2. 征收高额累进税。
3. 废除继承权。
4. 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5. 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6. 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7. 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按照总的计划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8. 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9. 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①逐步消灭^②。
10. 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在发展进程中，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

① “对立”在1872、1883和1890年德文版中是：“差别”。——编者注

② 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一条是：“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通过把人口更平均地分布于全国的办法逐步消灭城乡之间的差别”。——编者注

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末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①，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三、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

1. 反动的社会主义

（甲）封建的社会主义

法国和英国的贵族，按照他们的历史地位所负的使命，就是写一些抨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作品。在法国的 1830 年七月革命和英国的改革运动³¹中，他们再一次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从此就再谈不上严重的政治斗争了。他们还能进行的只是文字斗争。但是，即使在文字方面也不可能重弹复辟时期^②的老调了。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做样，

① “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在 1872—1883 和 1890 年德文版中是：“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编者注

② 这里所指的不是 1660—1689 年英国的复辟时期而是 1814—1830 年法国的复辟时期。（恩格斯在 1888 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似乎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声讨资产阶级。他们用来泄愤的手段是：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并向他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

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其中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一部分法国正统派³²和“青年英国”³³，都表演过这出戏。

封建主说，他们的剥削方式和资产阶级的剥削不同，那他们只是忘记了，他们是在完全不同的、目前已经过时的情况和条件下进行剥削的。他们说，在他们的统治下并没有出现过现代的无产阶级，那他们只是忘记了，现代的资产阶级正是他们的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

不过，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批评的反动性质，他们控告资产阶级的主要罪状正是在于：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有一个将把整个旧社会制度炸毁的阶级发展起来。

他们责备资产阶级，与其说是因为它产生了一般的无产阶级，不如说是因为它产生了革命的无产阶级。

因此，在政治实践中，他们参与对工人阶级采取的一切暴力措施，而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违背自己的那一套冠冕堂

皇的言词，屈身拾取金苹果^①，不顾信义、仁爱和名誉去做羊毛、甜菜和烧酒的买卖。

正如僧侣总是同封建主携手同行一样，僧侣的社会主义也总是同封建的社会主义携手同行的。

要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色彩，是再容易不过了。基督教不是也激烈反对私有制，反对婚姻，反对国家吗？它不是提倡用行善和求乞、独身和禁欲、修道和礼拜来代替这一切吗？基督教的^②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愤神圣化的圣水罢了。

（乙）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封建贵族并不是被资产阶级所推翻的、其生活条件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里日益恶化和消失的唯一阶级。中世纪的城市市民等级和小农等级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前身。在工商业不很发达的国家里，这个阶级至今还在新兴的资产阶级身旁苟延残喘。

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

① “金苹果”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工业树上掉下来的金苹果”——编者注

② 这里主要是指德国，那里的土地贵族和容克地主通过管事自行经营自己的很大一部分土地，他们还开设大规模的甜菜糖厂和土豆酒厂较富有的英国贵族还没有落到这种地步，但是，他们也知道怎样让人家用他们的名义创办颇为可疑的股份公司，以补偿地租的下降（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③ 在1848年德文版中是：“神圣的和今天的”，在1872、1883和1890年德文版中是：“基督教的”。——编者注

阶级，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但是，这一阶级的成员经常被竞争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而且，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他们甚至觉察到，他们很快就会完全失去他们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在商业、工业和农业中很快就会被监工和雇员所代替。

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例如在法国，那些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替工人说话的。这样就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西斯蒙第就是这个学派的首领，对法国来说是这样，对英国来说也是这样。

这种社会主义非常精辟地分析了现代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它揭穿了经济学家的虚伪的粉饰。它确凿地证明了机器和分工的破坏作用、资本和地产的积聚、生产过剩、危机、小资产者和小农的必然没落、无产阶级的贫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财富分配的极不平均、各民族之间的毁灭性的工业战争，以及旧风尚、旧家庭关系和旧民族性的解体。

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按其积极的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

工业中的行会制度，农业中的宗法经济，——这就是它的最后结论。

这一思潮在它以后的发展中变成了一种怯懦的悲叹^①。

(丙) 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

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是在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压迫下产生的，并且是同这种统治作斗争的文字表现，这种文献被搬到德国的时候，那里的资产阶级才刚刚开始进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

德国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才子们，贪婪地抓住了这种文献，不过他们忘记了：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它必然表现为关于真正的社会^②、关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③。这样，第一次法国革命的要求，在十八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看来，不过是一般“实践理性”的要求，而革命的法国资产阶级的意志的表现，在他们心目中就是纯粹意志、本来面目的意志、真正人的意志的规律。

德国著作家的唯一工作，就是把新的法国的思想同他们的旧的哲学良心调和起来，或者毋宁说，就是从他们的哲学观点出发去掌握法国的思想。

这种掌握，就象掌握外国语一样，是通过翻译的。

大家知道，天主教僧侣曾经在古代异教经典的手抄本上

① 在 1888 年英文版中这一句是：“最后，当顽强的历史事实把自我欺骗的一切醉梦驱散的时候，这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就化为一种可怜的哀愁”。——编者注

② 在 1872、1883 和 1890 年德文版中删去了：“关于真正的社会”——编者注

③ 在 1888 年英文版中没有这句话。——编者注

面写上荒诞的天主教圣徒传。德国著作家用相反的态度对待世俗的法国文献。他们在法国的原著下面写上自己的哲学胡说。例如，他们在批判货币关系的法国原著下面写上“人的本质的外化[Entäußерung]”，在批判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国原著下面写上所谓“抽象普遍物的统治的废除”，等等。

这种把自己的哲学词句硬塞进法国理论的作法，他们称之为“行动的哲学”、“真正的社会主义”、“德国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论证”，等等。

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就这样被完全阉割了。既然这种文献在德国人手里已不再表现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于是德国人就认为：他们克服了“法国人的片面性”，他们不代表真实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

现在，这种曾经郑重其事地看待自己那一套拙劣的小学生作业并且大言不惭地加以吹嘘的德国社会主义，渐渐失去了它那种自炫博学的天真。

德国的特别是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和君主专制的斗争，一句话，自由主义运动，愈来愈严重了。

于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就得到了一个好机会，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

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德国的社会主义恰好忘记了，法国的批判（德国的社会主义是这种批判的可怜的回声）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而这一切前提当时在德国正是尚待争取的。

这种社会主义成了德意志各邦专制政府及其随从——僧侣、教员、容克地主和官僚求之不得的、吓唬来势汹汹的资产阶级的稻草人。

这种社会主义是这些政府用来镇压德国工人起义的毒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

既然“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这样成了这些政府对付德国资产阶级的武器，那末它也就直接代表了一种反动的利益，即德国小市民的利益。在德国，十六世纪遗留下来的、从那时起经常以不同形式重新出现的小资产阶级，是现存制度的真实的社会基础。

保存这个小资产阶级，就是保存德国的现存制度。这个阶级胆战心惊地从资产阶级的工业统治和政治统治那里等候着无可幸免的灭亡，这一方面是由于资本的积聚，另一方面是由于革命无产阶级的兴起。在它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能起一箭双雕的作用。“真正的”社会主义象瘟疫一样流行起来了。

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给自己的那几条干瘪的“永恒真理”披上一件用思辨的蛛丝织成的、绣满华丽辞藻的花朵和浸透甜情蜜意的甘露的外衣，这件光彩夺目的外衣只是使他们的货物在这些顾客中间增加销路罢了。

同时，德国的社会主义也愈来愈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就是充当这种小市民的堂堂代表。

它宣布德意志民族是模范的民族，德国小市民是模范的人。它给这些小市民的每一种丑行都加上奥秘的、高尚的、社会主义的意义，使之变成完全相反的东西。它贯彻到底，直接反对共产主义的“野蛮破坏的”倾向，并且宣布自己是不偏不倚的超乎任何阶级斗争之上的。现今在德国流行的一切所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属于这一类卑鄙龌龊的、令人委靡的文献。^①

2. 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

这一部分人包括：经济学家、博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劳动阶级状况改善派、慈善事业组织者、动物保护协会会员、戒酒运动协会发起人以及形形式色色的小改良家。这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甚至被制成一些完整的体系。

我们可以举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作为例子。

社会主义的资产者愿意要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是不

① 1848 年的革命风暴已经把这个可恶的流派一扫而光，并且使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再也没有兴趣拿社会主义来投机了。这一流派的主要代表和典型人物是卡尔·格律恩先生。（恩格斯在 1890 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要由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愿意要现存的社会，但是不要那些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解体的因素。他们愿意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看来，它所统治的世界自然是最美好的世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把这种安慰人心的观念制成半套或整套的体系。它要求无产阶级实现它的体系，走进新的耶路撒冷，其实它不过是要求无产阶级停留在现今的社会里，但是要抛弃他们关于这个社会的可恶的观念。

这种社会主义的另一种不够系统、但是比较实际的形式，力图使工人阶级厌弃一切革命运动，硬说能给工人阶级带来好处的并不是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改革，而仅仅是物质生活条件即经济关系的改变。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所理解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绝对不是只有通过革命的途径才能实现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消灭，而是一些行政上的改良，这些改良是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实行的，因而丝毫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至多只能减少资产阶级的统治费用和简化它的国家行政事务。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只有在它变成纯粹的演说辞令的时候，才获得自己的适当的表现。

自由贸易！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保护关税！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单身牢房！

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才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唯一认真说出的最后的话。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归结起来就是这样一个论断：资产者之为资产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3.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在这里，我们不谈在现代一切大革命中表达过无产阶级要求的文献（巴贝夫等人的著作）。

无产阶级在普遍激动的时代、在推翻封建社会的时期直接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最初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这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够发展，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随着这些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

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体系，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体系，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关于这个时期，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了（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诚然，这些体系的发明家看到了阶级的对立，看到了统治着的社会本身中的破坏因素的作用。但是，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

由于阶级对立的发展是同工业的发展步调一致的，所以这些发明家也不可能看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于是他们就去探求某种社会科学、社会规律，以便创造这些条件。

这样，社会的活动就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来代替，解放的历史条件就要由幻想的条件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逐步组

织成为阶级就要由他们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在他们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划的历史。

诚然，他们也意识到，他们的计划主要是代表工人阶级这一受苦最深的阶级的利益。在他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受苦最深的阶级。

但是，由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由于他们本身的生活地位，他们就以为自己是高超乎这种阶级对立之上的。他们要改善社会一切成员的生活状况，甚至生活最优裕的成员也包括在内。因此，他们总是不加区别地向整个社会呼吁，而且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他们以为，人们只要理解他们的体系，就会承认这种体系是最美好的社会的最美好的计划。

因此，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一切革命行动；他们想通过和平的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企图通过一些小型的、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通过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

这种对未来社会的幻想的描绘，是在无产阶级还很不发展、因而对本身的地位的认识还基于幻想的时候，同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相适应的^①。

但是，这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也含有批判的成分。这些著作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因此，它们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

① “同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相适应的”在1872、1883和1890年德文版中是“从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中产生的”。——编者注

的主张^①，例如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对立^②，消灭家庭，消灭私人经营，消灭雇佣劳动，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所有这些主张都只是表明要消灭阶级对立，而这种阶级对立在当时刚刚开始发展，它们所知道的只是这种对立的早期的、不明显的、不确定的形式。因此，这些主张本身还带有纯粹空想的性质。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阶级斗争愈发展和愈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愈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所以，虽然这些体系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信徒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这些信徒无视无产阶级的历史进展，还是死守着老师们的旧观点。因此，他们一贯地企图削弱阶级斗争，调和对立。他们还总是梦想用试验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空想，创办单个的法伦斯泰尔，建立国内移民区，创立小伊加利亚^③，即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而为了建造这一切空中

① “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在 1888 年英文版中是“它们所提出 的实际措施”。——编者注

② “城市和乡村的对立”在 1888 年英文版中是：“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注别”。——编者

③ 法伦斯泰尔是沙尔·傅立叶所设计的社会主义移民区，伊加利亚是卡贝给自己的理想国和后来他在美洲创立的共产主义移民区所起的名称。（恩格斯在 1888 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国内移民区是欧文给他的示范性的共产主义社会所起的名称法伦斯泰尔是傅立叶所设计的社会宫的名称。伊加利亚是具有卡贝所描绘的那种共产主义制度的乌托邦幻想国。（恩格斯在 1890 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楼阁，他们就不得不求助于资产阶级的善心和钱袋。他们逐渐地堕落到上述反动的或保守的社会主义者的一伙中去了，所不同的只是他们更加系统地卖弄学问，狂热地迷信自己那一套社会科学的奇功异效。

因此，他们激烈地反对工人的一切政治运动，认为这种运动只是由于盲目地不相信新福音才发生的。

在英国，有欧文主义者反对宪章派³⁴，在法国，有傅立叶主义者反对改革派³⁵。

四、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

看过第二章之后，就可以了解共产党人对已经形成的工人政党的态度，因而也就可以了解他们对英国宪章派和北美土地改革派³⁶的态度。

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在法国，共产党人同社会主义民主党联合起来反对保守的和激进的资产阶级，但是并不因此放弃对那些从革命的传统中产生出来的空谈和幻想采取批判态度的权利。

① 当时这个党在议会中的代表是赖德律-洛兰，在著作界的代表是路易·勃朗，在报纸方面的代表是《改革报》。“社会主义民主党”这个名称在它的发明者那里是指民主党或共和党中或多或少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一部分人。(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注)当时在法国以社会主义民主党自称的政党，在政治方面的代表是赖德律-洛兰，在著作界的代表是路易·勃朗因此，它同现今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有天壤之别的。(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在瑞士，共产党人支持激进党人，但是并不忽略这个政党是由互相矛盾的分子组成的，其中一部分是法国式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一部分是激进的资产者。

在波兰人中间，共产党人支持那个把土地革命当做民族解放的条件的政党，即发动过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³⁷的政党。

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

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

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

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

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当时的发展程度怎样。

最后，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议。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

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
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写于 1847 年 12 月—1848 年 1 月

原文是德文

1848 年 2 月第一次以单行本形式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在伦敦出版

第 4 卷第 461——504 页

注 释

1 《共产党宣言》是科学共产主义的最伟大的纲领性文件。列宁说：“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理论。”

《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写于1847年12月—1848年1月。1848年2月在伦敦第一次以单行本形式发表，共23页。1848年3月至7月《宣言》又在德国流亡者的民主派机关报《德意志伦敦报》上连载。1848年在伦敦重印了《宣言》的德文本共30页。这个版本是后来经马克思和恩格斯赞同的各种版本的基础。《宣言》在1848年译成许多种欧洲文字(法文、波兰文意大利文丹麦文佛来米文和瑞典文)。在1848年的各种版本中未提作者的名字。1850年英国宪章派的机关刊物《红色共和党人》在登载《宣言》的第一个英译文时，该杂志的编辑乔·哈尼在序言中第一次指出作者的名字。

2 1872年《宣言》出了新的德文版，这是由《人民国家报》编辑部倡议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该版合写了一篇序言，并在正文中做了某些修改。1872年的版本以及后来1883年和1890年的德文本，书名都改为《共产主义宣言》。

3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它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于1847年6月初在伦敦成立的。同盟的纲领和组织原则也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参与之下制定的。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847年11月29日—12月8日)一致通过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大会委托起草了一个纲领性文件，即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

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48年2月底把同

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到巴黎以后，巴黎于 3 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驻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员。

1848 年 3 月下半月到 4 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和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3 月底所写成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5 卷第 3—5 页）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当时，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领导和指导中心。

虽然革命的失败打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但它于 1849—1850 年进行了改组并且继续进行活动。1850 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很尖锐的程度。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所提出的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它无视客观规律和德国及欧洲其他各国的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1850 年 9 月中，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终于导致了同盟与该集团的分裂。1851 年 5 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经停顿。1852 年 11 月 17 日，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但是它的盟员还是继续工作，为未来的革命斗争锻炼干部。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相当大量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都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工作。

4 《红色共和党人》(《The Red Republican》)是 1850 年 6—11 月由乔哈尼出版的宪章派周刊。该刊在 1850 年 11 月(第 2124 期)曾以《德国共产党宣言》为题登载过《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英译文。

5 《社会主义者报》(《Le Socialiste》)是 1871 年 10 月至 1873 年 5 月在纽约出版的法文周报，国际法国人支部的机关报；它支持国际北美联合会里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海牙代表大会以后与国际断绝了关系。1872 年 1—2 月该报曾发表了《共产党宣言》。

- 6 这是《宣言》的第二个俄文本，1882 年在日内瓦出版。恩格斯在为《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写的跋中曾说这个译本是由普列汉诺夫翻译的。普列汉诺夫自己在《宣言》1900 年版上也指明这个译本是他译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这个新的译本写了序言。该序言用俄文发表在 1882 年 2 月 5 日俄国民意党人的《民意》杂志上。1882 年 4 月 13 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6 号上用德文发表了这篇序言。恩格斯在《宣言》1890 年德文版中收进了这篇序言。
- 7 这个译本是在 1869 年出版的。
- 8 《钟声》(《Колоколы》)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报纸，由亚·伊·赫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在 1857 年至 1867 年用俄文出版，1868 年至 1869 年该报改用法文出版，并附有俄文附刊。1865 年前在伦敦出版，以后在日内瓦出版。
- 9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 1881 年 3 月 13 日民意党人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后的情况，当时亚历山大三世害怕“民意党”的秘密执行委员会可能采取新的恐怖行动，躲在加特契纳。
- 10 1883 年出版了《宣言》的第三个德文本。这是在马克思逝世后经恩格斯校阅过的一个版本。
- 11 1888 年出版了由赛·穆尔翻译的《宣言》的英文本。恩格斯亲自校订了译文，写了序言，并加上了一些附注。
- 12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 年 10 月 4 日—11 月 12 日)是普鲁士政府策动的一次挑衅性的案件。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以《共产党宣言》作为纲领的第一个无产阶级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1852 年)的十一名成员被送交法庭审讯，罪名是“进行叛国性密谋”。控告的证据是普鲁士警探们假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原本记录》和其他一些伪造文件，以及警察局从已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集团那里偷来的一些文件。法庭根据伪造文件和假证词，判处七名被告三年至六年的徒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案件的策动者

的挑衅行为和普鲁士警察国家对付国际工人运动的卑鄙手段进行了彻底的揭露，见恩格斯《最近的科伦案件》一文和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 卷第 449—456、457—536 页）。

- 13 国际工人协会 即第一国际，1864 年秋由马克思创立。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持的第一国际，领导了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同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了激烈斗争，巩固了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第一国际在 1872 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已停止活动，1876 年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见《列宁全集》第 29 卷第 274 页）。
- 14 这句话引自斯温西市工联理事会主席比万于 1887 年在该城举行的工联年度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这篇发言的报道刊载在 1887 年 9 月 17 日《公益》周刊上。
- 15 《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Woodhull and Claflin's Weekly》）是一家美国周刊，于 1870 年至 1876 年在纽约由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维·伍德赫尔和田·克拉夫林出版。《共产党宣言》于 1871 年 12 月 30 日在该周刊上发表（有删节）。
- 16 关于《宣言》的第二个俄文本的译者问题，见注 6。
- 17 这里提到的丹麦文译本——K. Marx og F. Engels. 《Det. Kommunistiske Manifest》，København，1885——有一些删节和不确切的地方。恩格斯在《宣言》1890 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了这一点。
- 18 劳拉·拉法格翻译的法文译本是在 1885 年 8 月 29 日至 11 月 7 日的《社会主义者报》上发表的，以后又作为附录转载于 1886 年巴黎出版的梅尔麦著的《社会主义法国》（Mermeix,《La France socialiste》, Paris, 1886）。
- 《社会主义者报》（《Le Socialiste》）是法国的一家周报，1885 年

由茹·盖得在巴黎创办。1902 年以前是工人党机关报，1902 年至 1905 年是法兰西社会党机关报，从 1905 年起是法国社会党机关报，八十年代恩格斯、保·拉法格和格·瓦·普列汉诺夫曾为该报撰稿。

- 19 西班牙文译本发表在 1886 年 7 月至 8 月的《社会主义者报》上，并出版过单行本。

《社会主义者报》(《El Socialista》) 是西班牙的一家周报，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的中央机关报，从 1885 年起在马德里出版。

- 20 这一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的一系列著作中都表述过；这里的提法参看国际工人协会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15 页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36 页）。

- 21 1890 年 5 月在伦敦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的一种出版了《宣言》的第四个德文本，这是经作者校阅过的最后一个版本。这一版中收入了 1872 年和 1883 年德文版的序言。恩格斯还给这个版本写了新的序言。1890 年 8 月 16 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33 号，在题为《〈共产党宣言〉的新版》的社论中摘要刊载了恩格斯的这篇序言；1890 年 11 月 28 日《工人报》第 48 号，在庆祝恩格斯七十寿辰的社论中又摘要刊载了这篇序言。

- 22 恩格斯在这里指的是他为 1883 年德文版所写的序言。

- 23 恩格斯所说的这篇遗失了的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宣言》俄文版序言的德文原稿，后来找到了。恩格斯在从俄文译成德文时对这篇序言做了个别的修改。

- 24 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代表大会于 1866 年 9 月 3—8 日举行。出席大会的共有六十名代表，他们分别代表总委员会和各支部，以及英国、法国、德国和瑞士的工人团体。大会主席是海·荣克。马克思所写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213—223 页）作为总委员会的正式报告在大会上宣读。掌握大会三

分之一票数的蒲鲁东主义者反对这个《指示》他们就议程的各点提出了自己的广泛纲领。但是总委员会的拥护者在讨论的大多数问题上获得了胜利。《指示》共有九点，其中有六点（关于国际联合行动、关于通过立法手续把工作日限制为八小时、关于儿童劳动与妇女劳动、关于合作劳动、关于工会、关于常备军）曾作为大会决议通过。日内瓦代表大会还批准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和条例。

1889年7月14-20日在巴黎举行了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实际上是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在大会举行之前，马克思主义者在恩格斯的直接领导下，同法国的机会主义者（可能派 以及他们在英国社会民主党人联盟中的追随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机会主义者企图把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抓在自己手里，其目的是夺取代表大会的领导地位，从而阻止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各个社会主义组织和工人组织的新的国际联合。但是，代表大会是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占优势的情况下召开的。大会在1889年7月14日，即攻克巴底狱一百周年那天开幕了。出席大会的有来自欧洲和美洲二十个国家的三百九十三名代表。可能派的企图遭到了失败，为了同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大会相对抗，他们也在1889年7月14日在巴黎举行了一个代表大会。只有少数外国代表出席了可能派的代表大会，而且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的代表资格都是假造的。

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听取了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关于他们本国工人运动的报告，制定了国际工人立法的基本原则，接受了通过立法手续制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指出了实现工人的各项要求的途径。代表大会强调指出，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必须为实现工人的政治要求而斗争，主张废除常备军并代之以人民的普遍武装。代表大会最重要的决议是规定5月1日为国际无产阶级的节日。

25 1892年由波兰社会党人在伦敦办的《黎明》杂志出版社出版了《宣言》的新的波兰文译本。恩格斯为这个译本写了序言。恩格斯在把序言寄给《黎明》出版社后，在1892年2月11日写给斯塔尼斯拉夫·门德尔森的信中说，他希望将来能掌握波兰文，以便能深入地研究波兰工人运动的发展，到那时并可为下一版波兰文《宣言》写一篇比较充实的序言。

- 26 会议桌上的波兰是对根据 1814—1815 年维也纳会议的决定以波兰王国的名称割给俄国的那一部分波兰领土的称呼。
- 27 1893 年恩格斯给意大利文版的《宣言》写了一篇序言，题为《致意大利读者》。这篇序言是应意大利社会党领袖菲·屠拉梯的请求写的。意大利文《宣言》由贝蒂尼翻译，序言由屠拉梯翻译。该单行本于 1893 年在米兰由社会党的理论刊物《社会评论》杂志社出版。
- 28 马克思曾在许多著作里，特别是在《一八五九年的爱尔福特精神》（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第 462—465 页）一文中述过这样的思想：反动派在 1848 年以后扮演了特殊的革命遗嘱执行人的角色，不可避免地实现了革命的要求，尽管这是在一种滑稽可笑的歪曲的方式下进行的。
- 29 在比较后期的各种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格”等等比较确切的概念（这是由马克思开始采用的）分别代替了“劳动的价值”和“劳动的价格”等等概念。
- 30 1847 年 6 月 8 日英国议会通过了只适用于童工和女工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但是实际上许多厂主并没有遵守这项法律。
- 31 指选举法的改革。选举法改革法案于 1831 年为英国下院所通过，1832 年 6 月为上院最后批准。这次改革旨在反对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为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打开了进入议会的大门。为实现改革而斗争的主力军——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受了自由资产阶级的欺骗而没有获得选举权。
- 32 正统派 是法国 1792 年被推翻的、代表世袭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朝长系的拥护者。1830 年该王朝第二次被推翻后，正统派就结成了政党。在反对以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为支柱的当政的奥尔良王朝时，一部分正统派常常抓住社会问题进行蛊惑宣传，说自己维护劳动者，使他们不受资产者的剥削。
- 33 “青年英国”是英国托利党中的一些政治活动家和著作家的集团，成立

半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青年英国”的活动家们反映了土地贵族对安徒生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的增强心怀不满，他们采取蛊惑手段，企图把工人阶级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并利用工人阶级来反对资产阶级。

- 34 宪章派是宪章运动的参加者。宪章运动是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行包括要求普选权和一系列为工人保证此项权利的许多条件的人民宪章。按照列宁的定义，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全集》第 29 卷第 276 页）。宪章运动的衰落，是由于英国工商业垄断的加强以及英国资产阶级用超额利润收买英国工人阶级上层（“工人贵族”），这造成了英国工人阶级中机会主义倾向的增长，其表现就是工人领袖放弃对宪章运动的支持。
- 35 指《改革报》见注 148) 的支持者。《改革报》派联合了以赖德律-洛兰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主义者，附和该派的有以路易·勃朗为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他们主张建立共和国并实行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
- 36 “青年美国”是美国手工业者和工人的组织。该组织是 1845 年创立的群众性的全国改革协会的核心，该协会的参加者又称作“民族改良派”或“北美土地改革派”。协会宣称它的宗旨是无偿地分给每一个劳动者一块土地。四十年代后半期协会宣传土地改革，反对种植园奴隶主及土地投机分子，并提出了许多其他民主要求(实行十小时工作日、废除农奴制、取消常备军等等)。许多德国手工业侨民参加了这一土地改革运动，但是曾经一度参加过全国改革协会的克利盖和他的集团却鼓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反动的空想，引诱德国侨民脱离争取民主的斗争。
- 37 波兰人民为了民族解放曾准备在 1846 年 2 月举行起义。起义的主要发起人是波兰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邓波夫斯基等人)。但是，由于波兰小贵族的背叛行为和普鲁士警察逮捕了起义的领袖，总起义没有成功，只是个别地方发出了革命的火花。只有在从 1815 年起由奥、俄、普共管的克拉科夫，起义者在 2 月 22 日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国民政府，发表了废除封建义务的宣言。克拉科夫起义在 1846 年 3 月初被镇压下去了。在 1846 年 11 月，奥、普、俄签订了关于把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帝国的条约。

马克思

雇佣劳动与资本¹

恩格斯写的 1891 年单行本导言²

这部著作最初问世是在 1849 年，从 4 月 4 日起以社论的形式陆续发表在“新莱茵报”上。它的基础是 1847 年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³做的几次讲演。这部著作在报纸上没有载完；虽然在第 269 号上的文章末尾曾刊有“待续”字样，但这个诺言并未执行，因为当时爆发的事变——俄国人开进了匈牙利，德勒斯顿、伊塞隆、爱北斐特、普法尔茨、巴登等地发生起义⁴，——使报纸本身被查封了（1849 年 5 月 19 日）。这部著作的续稿，在马克思的遗稿中始终没有发现。

《雇佣劳动与资本》印成小册子已出版过好几次，最后一次于 1884 年在霍廷根—苏黎世由“瑞士印书馆”出版。所有以前发行的版本都是准确地按最初的原文印行的。可是，现在刊印的新版是宣传性质的小册子，销数至少应当是一万册，因此在我面前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本人是否会同意不加任何修改地重版呢？

在四十年代，马克思还没有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这个工作只是到五十年代末才告完成。因此，他在《政

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1859年）以前发表的那些著作中，有个别地方与他在1859年以后写的著作中的论点不同，并且从较晚的著作来看，有些用语和整个语句是不妥当的，甚至是不正确的。当然，在供一般读者阅读的普通版本中，作者的这种比较早期的，即代表着他的思想发展中一个阶段的观点，也应该得到反映，并且作者和读者都有无可争议的权利要求不加任何修改地重版这些比较早期的著作。在刊印这种版本时，我连想也不会想到要更改这些著作中的任何一个字。

但是，当新刊行的版本可以说是专为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工作用的时候，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在这种场合，马克思一定会使这个发表于1849年的旧的论述同他的较晚的观点一致起来。所以我相信，我在这个版本中为了在一切重要点上达到这种一致而做的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补充，是完全符合他的心愿的。因此，我要预先告诉读者：这本小册子现在已经不是像马克思在1849年写成的那个样子，而大致有些像在1891年写成的。况且原本已经大量发行，在我将来有机会把它不加修改地编入全集再版以前，这已经够了。

我所做的全部修改，都归结于一点。在原稿上是，工人为取得工资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在现在这一版上则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关于这点修改，我应当作一个解释。向工人们解释，是为了使他们知道，这里并不是纯粹的咬文嚼字，而是牵涉到全部政治经济学中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向资产者们解释，是为了使他们确信，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要比我们那些高傲的“有教养的”人高明得多，因为前者对最难

的经济结论也很容易理解，而后者对这种复杂的问题却终身也解决不了。

古典政治经济学从工业实践方面因袭了工厂主的流行的看法，仿佛工厂主所购买和偿付的是自己工人的劳动。这一看法对于工厂主进行营业、记账和计算价格来说，是完全够用了。可是，把这个看法天真地搬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就在那里造成了十分明显的谬误和混乱。

政治经济学碰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切商品的价格，包括被它称作“劳动”的那个商品的价格在内，不断地发生变动；它们由于那些往往与商品本身的生产毫不相关的各种极端复杂的情况的影响，忽而上涨，忽而下降，因而使人觉得价格通常是由纯粹的偶然情况来决定的。当政治经济学作为科学出现的时候，它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找出隐藏在这种表面支配着商品价格的偶然情况后面，而实际上却自己支配着这种偶然情况的规律。在商品价格不断变动及其时涨时落的摇摆中，它要找出这种变动和摇摆所围绕的稳定的轴心。一句话，它要从商品价格出发，找出作为调节价格的规律的商品价值，价格的一切变动都可以根据价值来加以说明，而且归根到底都以价值为依归。

结果古典政治经济学就发现了，商品的价值是由商品所包含的、为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来决定的。作出这样的解释，古典政治经济学就认为满足了。我们也可以暂且到此为止。不过为了避免误会起见，我认为需要提醒一下，这种解释在今天已经完全不够了。马克思曾经第一个彻底研究了劳动所具有的创造价值的特性，并且发现，并非任何仿佛是

或者甚至真正是生产某一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都会在任何条件下使该商品具有与所消耗的劳动量相当的数量的价值。因此，如果我们现在还是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们一起简单地说，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决定的，那末我们在这里总是以马克思所作的那些附带条件为当然前提的。这里指出这一点就够了。其余的可以在马克思 1859 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和“资本论”第一卷里找到^①。

可是只要经济学家将价值由劳动来决定这个观点应用到“劳动”这个商品上去的时候，他们马上就陷进一连串的矛盾之中。“劳动”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它所包含的必要劳动来决定的。但是，在一个工人一天、一星期、一个月、一年所做的劳动里面，包含有多少劳动呢？包含有一天、一星期、一个月、一年的劳动。假如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尺度，那末我们只能用劳动来表现“劳动的价值”。但是假如我们只知道一小时劳动的价值等于一小时劳动，那末我们就绝对不能知道一小时劳动的价值。这样，我们丝毫也没有接近我们的目的，总是在一个圈子里打转。

于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就企图另找出路，它说：商品的价值等于它的生产费用。但是劳动的生产费用又是什么呢？为了答复这个问题，经济学家们不得不对逻辑施加一些暴行。他们不去考察劳动本身的生产费用（遗憾得很，这是不能确定的），而去考察什么是工人的生产费用。而这种生产费用是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第 15—41 页和《资本论》第 1 卷第 1 章。

——编者注

可以确定的。它是随着时间和社会状况而改变的，可是在一定的社会状况下，在一定的地方，在一定的生产部门中，它同样是个特定的量，至少在相当狭小的范围内是个特定的量。我们现在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的条件下，在这里，一个人数众多并且不断增长的阶级，只有为生产资料（工具、机器、原料）和生活资料占有者工作以挣得工资，才能生存。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工人的生产费用就是为了使工人具有劳动能力，保持其劳动能力以及在他因年老、疾病或死亡而脱离生产时用新的工人来代替他，也就是为了使工人阶级能够以必要的数量保持和繁殖起来所平均必需的生活资料数量，或者是这些生活资料的货币价格。现在我们假定，这些生活资料的货币价格是平均每天 3 马克。

这样，我们这个工人从雇他的资本家那里得到一天 3 马克的工资。资本家就借此迫使他一天工作——譬如说——12 小时。在这当中，资本家大致是这样打算盘的：

假定我们所说的这个工人是一个钳工，他应当做出他在一天里所能做成的一个机器零件。假定原料——加工制成必要样式的铁和铜——值 20 马克。又假定蒸汽机的耗煤量，以及这蒸汽机、旋床和这个工人所使用的一切其他工具的损耗，按一天时间和按一个工人计算，值 1 马克。一天的工资，照我们的假定是 3 马克。总共算起来，我们所说的这个机器零件要耗费 24 马克。但是资本家却打算平均从零件购买者手上取得 27 马克的价格，即要比他所消耗的生产费用多 3 马克。

资本家装到自己腰包里去的这 3 马克是从哪里得来的

呢？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说法，商品是平均按照它的价值出卖的，也就是按照相当于这商品中所包含的必要劳动量的价格出卖的。于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机器零件的平均价格——27 马克——就一定和它的价值相等，即和它里面所包含的劳动量相等。但是，在这 27 马克当中，有 21 马克是在我们所说的这个钳工开始工作以前就已经存在的价值；20 马克包含在原料中，1 马克包含在工作期间所燃去的煤中，或是包含在当时所使用，因而被相应地减少了工作效能的机器和工具中。剩下的六马克被加到原料的价值上去了。但是按照我们那些经济学家自己的假定，这六马克只能是从我们所说的这个工人加到原料上去的那个劳动中产生的。这样一来，他 12 小时的劳动创造了 6 马克的新价值。因此，他的 12 小时劳动的价值就等于 6 马克，这样我们就会终于发现什么是“劳动的价值”了。

“等一等！”——我们所说的这个钳工说，“6 马克吗？但是我只拿到 3 马克呀！我的资本家向天发誓说，我的十二小时劳动的价值只等于 3 马克，假使我向他要 6 马克，就要被他嗤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说前面在谈到劳动价值问题的时候，我们曾经陷在一个圈子里走不出去，那末现在我们又完全陷进一个不能解决的矛盾之中。我们寻找劳动的价值，而我们所找到的却多于我们所需要的。对于工人说来，12 小时劳动的价值是 3 马克；对于资本家说来却是 6 马克，资本家从这 6 马克中拿出 3 马克作为工资付给工人，而其余 3 马克则装进了自己的腰包。这样看来，劳动不是有一个价值，而是有两个价值，并

且是两个极不相同的价值！

假使我们把货币所表现的价值归结为劳动时间，那末这个矛盾就显得更加荒谬了。在 12 小时劳动时间内创造了 6 马克的新价值。这就是说，在 6 小时内创造的是 3 马克，即工人劳动 12 小时所得到的那个数目。工人劳动了 12 小时，而他当作等价物得到的却是 6 小时劳动的产品。总之：或者是劳动有两个价值，其中一个比另一个大一倍；或者是 12 等于 6！两种情况都是极端荒谬的。

不管我们怎样挣扎，只要我们还是讲劳动的买卖和劳动的价值，我们就不能够摆脱这种矛盾。经济学家的情况就是这样。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后一个代表——李嘉图学派，多半是由于不能解决这个矛盾而遭到了破产。古典政治经济学走入了绝境。从这种绝境中找到出路的那个人就是卡尔·马克思。

经济学家所看作“劳动”生产费用的，并不是劳动的生产费用，而是活的工人本身的生产费用。而这个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也不是他的劳动。马克思说：“当工人的劳动实际上开始的时候，它就不再属于工人了，因而也就不能被工人出卖了。”^① 因此，他最多只能出卖他自己的未来的劳动，也就是说，他只能承担在一定时间内完成一定工作的义务。但是，这样他就不是出卖劳动（这劳动还待去完成），而是为了获得一定的报酬让资本家在一定的时间内（在计日工资下）或为完成一定的工作（在计件工资下）支配自己的劳动

① 见《资本论》第 1 卷第 17 章。——编者注

力：他出租或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可是，这个劳动力是同工人本身长在一起而不可分割的。所以它的生产费用是和工人本身的生产费用一致的；那些被经济学家称为劳动生产费用的，恰恰就是工人的生产费用，因而也就是劳动力的生产费用。这样一来，我们就能从劳动力的生产费用进而谈到劳动力的价值，并确定为生产一定质量的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马克思在论劳动力买卖的那一节里也就是这样做的（《资本论》第1卷第4章第3节）。

那末，在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之后，就是说为了获得预先讲定的工资——计日或计件的——而把自己的劳动力交给资本家去支配之后，情形又怎样了呢？资本家把这工人带到自己的工场或工厂里去，在那里已经有了工作上所必需的各种东西：原料，辅助材料（煤、染料等等），工具，机器。于是工人就在这里开始工作起来。假定他的日工资跟前面所假定的一样是3马克，——至于他是计日还是计件获得这笔工资，那没有什么关系。这里我们还是照前面那样假定，工人在12小时内用自己的劳动在被使用的原料上增加了六马克的新价值，这个新价值是资本家在出卖成品的时候实现的。从这6马克中，他付给工人3马克，剩下的3马克则留给自己。但是，假定工人在12小时里生产3马克的价值，那末在6小时里他所创造的就是3马克的价值。这样，工人在替资本家工作了6小时之后，就已经把包含在工资中的3马克等量价值偿还给资本家了。在6小时劳动以后双方两讫，谁也不欠谁一文钱。

“等一等！”——现在是资本家叫起来了，——“我雇

工人是雇的一整天，是 12 小时。6 小时只有半天。快去把剩下的 6 小时做完，只有到那时我们才算是两讫！”于是这个工人实际上只得去履行他自己“自愿”签订的合同，根据那个合同，他为了值 6 小时的劳动产品，应该去工作整整 12 小时。

计件工资的情形也是如此。假定我们所说的这个工人在 12 小时内制成了 12 件商品。每件商品所用去的原料和机器的损耗共计 2 马克，而每件商品却卖 2.5 马克。这样，在上面所假设的同样条件下，资本家只付给工人每件商品 25 分尼。12 件就是 3 马克；要得到这 3 马克，工人必须工作 12 小时。资本家从 12 件商品上得到 30 马克。扣除原料和机器损耗共 24 马克外，还剩下 6 马克，从这 6 马克中，他拿出 3 马克作为工资付给工人，而把其余 3 马克放进了自己的腰包。全部情形完全和上面一样。这里工人为自己工作 6 小时，即为偿还自己的工资而工作 6 小时（在 12 小时中，每小时为自己工作半小时），而为资本家工作 6 小时。

那些优秀的经济学家从“劳动”价值出发而无法解决的困难，一到我们用“**劳动力**”价值来作出发点，就消失不见了。在我们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力是商品，是跟任何其他的商品一样的商品，但却是一种完全特殊的商品。问题是，这个商品具有一种独特的特性：它是一种创造价值的力量，是一种产生价值的源泉，并且——在适当使用的时候——是一种能产生比自己具有的价值更多的价值的源泉。在现代生产状况下，人的劳动力不仅仅在一天里能生产超过它本身具有的和消耗的价值；而且随着每一个新的科学发现，随着每一项新的技术发明，劳动力的一天产品超出其一天费

用的那个余额也在不断增长，因而工作日中工人为偿还自己一天工资而工作的那一部分时间就在缩短；另一方面，工人不得不为资本家**白白工作而不取分文报酬**的那部分时间却在延长。

这就是全部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工人阶级是生产全部价值的唯一的阶级。因为价值只是劳动的另一种表现，是我们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用以表示包含在一定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的一种表现。但是，这些由工人所生产的价值不属于自己工人，而是属于那些占有原料、机器、工具和预付资金，因而有可能去购买工人阶级的劳动力的那些所有者。所以，工人阶级从他们所生产的全部产品中只取回一部分。另一部分，即资本家阶级保留在自己手里并至多也只须和土地所有者阶级瓜分的那一部分，如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随着每一项新的发明和发现而日益增大，而落到工人阶级手中的那一部分（按人口计算）或者增加得很慢和很少，或者是一点也不增加，并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会缩减。

但是，这些日益加速互相排挤的发明和发现，这种每天空前大量增长的人类劳动的生产率，终于造成一种定会使现代资本主义经济陷于灭亡的冲突。一方面是不可计量的财富和购买者无法对付的产品过剩，另一方面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口无产阶级化，变成雇佣工人，因而无力获得这些过剩的产品。社会分裂为人数不多的过分富有的阶级和人数众多的无产的雇佣工人阶级，这就使得这个社会被自己的富有所窒息，而同时它的绝大多数成员却几乎得不到或完全得不到保障去免除极度的贫困。社会的这种状况一天比一天显得愈加

荒谬和愈加不需要了。它应当被消除，而且能够被消除。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是可能实现的，在这个制度之下，现代的阶级差别将消失；而且在这个制度之下——也许在经过一个短暂的，有些艰苦的，但无论如何在道义上很有益的过渡时期以后，——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都将同等地位、愈益充分地交归社会全体成员支配。至于工人们正日益充满决心地争取这个新的社会制度，那在大洋两岸都将由明天的 5 月 1 日和 5 月 3 日的星期日⁵来证明。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1 年 4 月 30 日于伦敦

载于 1891 年 5 月 13 日《前进报》

原文是德文

第 109 号附刊和 1891 年在柏林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出版《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

第 22 卷第 234—243 页

雇 佣 劳 动 与 资 本

—

科伦 4 月 4 日^①。 我们听到了各方面的责难，说我们没有详述构成现代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物质基础的经济关系。 我们只是当这些关系在政治冲突中直接表现出来的时候，才有意地讲到过这些关系。

过去首先必须从日常历史进程中去考察阶级斗争，并根据已有的和每天新出现的历史材料来从经验上证明：当实现了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的工人阶级遭到失败的时候，它的敌人（在法国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在整个欧洲大陆则是反对过封建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也同时被战胜了；法国“正直的共和国”的胜利，同时也就是以争取独立的英勇战争响应了二月革命的那些民族的失败；最后，随着革命工人的失败，欧洲又落到了过去那种受双重奴役即受英俄两国奴役的地位。巴黎的六月斗争，维也纳的陷落，柏林十一月^②的悲喜剧，波兰、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拚命努力，爱尔兰的严重饥荒——这些就是那些集中表现了欧洲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主要事件。我们曾经根据这些实例证明

① 《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某些版本中（包括 1891 年版在内）删掉了每篇文章开头的日期。——编者注

②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柏林十一月”前面加有“1848 年”。——编者注

过：任何一次革命起义，不论它的目的仿佛距离阶级斗争多么远，在革命的工人阶级没有获得胜利以前，都是不免要失败的；任何一种社会改革，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封建反革命没有在世界战争中较量一下以前，都是要成为空想的。在我们的阐述中，也如在现实中一样，比利时和瑞士都是大历史画中的两幅悲喜剧式的、漫画式的世俗画：前者是资产阶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后者是资产阶级共和制的典型国家，两者都自以为既跟阶级斗争无关，又跟欧洲革命无关。

现在，在我们的读者看到了 1848 年以波澜壮阔的政治形式展开的阶级斗争以后，我们想更切近地考察一下资产阶级的生存及其阶级统治和工人的奴役地位所依为基础的经济关系本身，也就适当其时了。

我们分三大部分来加以说明：（1）雇佣劳动对资本的关系，工人的奴役地位，资本家的统治；（2）中等资产阶级和农民等级^①在现存制度下必然发生的灭亡过程；（3）欧洲各国资产者阶级在商业上受世界市场霸主英国的奴役和剥削的情形。

我们力求说得尽量简单和通俗，我们就当读者连最起码的政治经济学概念也没有。我们希望工人能明白我们的解说。加之，在德国到处对一些最简单的经济关系的了解都极端无知和十分混乱，从特许的现存制度的辩护者到冒牌的社会主义者和未被承认的政治天才都莫不如此，这种人在四分五裂的德国比“诸侯王爷”还多。

①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农民等级”改为“所谓的市民等级”。——编者注

我们首先来讲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工资？它是怎样决定的？

假如问工人们：“你们的工资是多少？”，那末一个工人回答说：“我做一天工从资产者那里得到一法郎^①。”；另一个工人回答说：“我得到两法郎”，等等。由于他们工作的劳动部门不同，他们每一个人因劳动了一定的时间或^②做了一定的工作（譬如，织成一尺麻布或排好一个印张的字）而从各自的资产者那里得到的货币数量也不同。尽管他们得到的货币数量不同，但是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工资是资产者为了偿付劳动一定的时间或完成一定的工作而支出的一笔货币。

可见^③，资产者是用货币购买工人的劳动。工人是为了货币而向资产者出卖自己的劳动^④。资产者用以购买工人劳动^⑤的那个货币量，譬如说两法郎，也可以买到两磅糖或一定数量的其他某种商品。他用以购买两磅糖的两法郎，就是两磅糖的价格。他用以购买 12 小时劳动^⑥的两法郎，就是 12 小时劳动的价格。可见，劳动^⑦是一种商品，是和沙糖一

① 1 法郎等于 8 普鲁士银格罗申。（在 1891 年版本中，“法郎”完全改为“马克”。——编者注

② 在 1891 年版本中删去了：“劳动了一定的时间或”。——编者注

③ 在 1891 年版本中“可见”后面加有“看起来仿佛”。——编者注

④ 在 1891 年版本中“劳动”后面加有：“但这只是表面情形。实际上，他们是为了货币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资本家以一日、一周、一月等等为期购买这个劳动力。而当他把劳动力买到手以后，他就使用它，迫使工人在约定的期间内劳动”。——编者注

⑤ 在 1891 年版本中，“资产者用以购买工人劳动”改为“资本家用以购买工人劳动力”。——编者注

⑥ 在 1891 年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使用”。——编者注

⑦ 在 1891 年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编者注

模一样的商品。前者是用钟点来计量的，后者是用重量来计量的。

工人拿自己的商品即劳动^①去换得资本家的商品，即换得货币，并且这种交换是按一定的比率进行的。一定量的货币交换一定量的劳动^②时间。织布工人的12小时劳动交换两法郎。但是，难道这两法郎不是代表其他一切可以用两法郎买到的商品吗？可见，实质上工人是拿他自己的商品即劳动交换各种各样的其他商品^③，并且是按一定的比率变换的。资本家付给他两法郎，就是为交换他的劳动日而付给了他一定量的肉，一定量的衣服，一定量的劈柴，一定量的灯光，等等。可见，这两法郎是表现劳动^④跟其他商品相交换的比例，即表现他的劳动^⑤的交换价值。商品通过货币表现出来的交换价值，也就称为商品的价格。所以，工资只是劳动价格^⑥的特种名称，是只能存在于人的血肉中的这种特殊商品价格的特种名称。

拿任何一个工人来说，比如拿一个织布工人来说吧。资产者^⑦供给他一架织布机和一些纱。织布工人动手工作，纱变成了布。资产者^⑧把布拿去，卖了——比方说——20法郎。

①④⑤ 在1891年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编者注

② 在1891年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使用”。——编者注

③ 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交换各种各样的其他商品”改为“劳动力交换各种各样的商品”。——编者注

⑥ 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价格”改为“通常被称为劳动价格的劳动力价格”。——编者注

⑦⑧ 在1891年的版本中，“资产者”改为“资本家”。——编者注

织布工人的工资是不是这块布中的一份，二十法郎中的一份，他的劳动产品中的一份呢？绝对不是。因为这个织布工人是在布还没有卖出很久以前，甚至可能是在布还没有织成很久以前就得到了自己的工资的。可见，资本家支付的这笔工资并不是来自他卖布所赚的那些货币，而是来自他原来储备的货币。织布工人从资产者那里领来使用的织布机和纱不是他的产品，同样，他用自己的商品即劳动^①交换所得的那些商品也不是他的产品。可能有这样的情形：资产者给自己的布找不到一个买主。他出卖布所赚的钱，也许甚至不能捞回他用于开销工资的款项。也有可能他出卖布所得的钱，比他付给织布工人的工资数目大得多。这一切都与织布工人毫不相干。资本家拿自己的一部分现有财产即一部分资本去购买织布工人的劳动^②，这就同他拿他的另一部分资本去购买原料（纱）和劳动工具（织布机）完全一样。购买了这些东西（其中包括生产布所必需的劳动^③）以后，资本家就用只是属于他的原料和劳动工具进行生产。当然，我们这位善良的织布工人现在也属于劳动工具之列，他也做织布机一样在产品中或在产品价格中是没有份的。

所以，工资不是工人在他所生产的商品中占有的一份。工资是原有商品中由资本家用以购买一定量的生产劳动^④的那一部分。

总之，劳动^⑤是一种商品，是由其所有者即雇佣工人出

①②③④⑤ 1891 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编者注

卖给资本的一种商品。他为什么出卖它呢？为了生活。

可是^①，劳动是工人本身的生命活动，是工人本身的表现。工人正是把这种生命活动出卖给别人，以获得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可见，工人的生命活动对于他不过是使他能以生存的一种手段而已。他是为生活而工作的。他甚至不认为劳动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相反地，对于他来说，劳动就是牺牲自己的生活。劳动是已由他出卖给别人的一种商品。因此，他的活动的产物也就不是他的活动的目的。工人为自己生产的不是他织成的绸缎，不是他从金矿里开采出的黄金，也不是他盖起的高楼大厦。他为自己生产的是工资，而绸缎、黄金、高楼大厦对于他都变成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也许是变成棉布上衣，变成铜币，变成某处地窖的住所了。一个工人在一昼夜中有 12 小时在织布、纺纱、钻孔、研磨、建筑、挖掘、打石子、搬运重物等等，他能不能认为这 12 小时的织布、纺纱、钻孔、研磨、建筑、挖掘、打石子是他的生活的表现，是他的生活呢？恰恰相反，对于他来说，在这种活动停止以后，当他坐在饭桌旁，站在酒店柜台前，睡在床上的时候，生活才算开始。在他看来，12 小时劳动的意义并不在于织布、纺纱、钻孔等等，而在于这是挣钱的方法，挣钱使他能吃饭、喝酒、睡觉。假如说蚕儿吐丝作茧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那末它就可算是一个真正的雇佣工人了。

劳动^②并不向来就是商品。劳动并不向来就是雇佣劳动、

①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可是”后面加有：“劳动力在动作中的表现”。——编者注

② 1891 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编者注

即自由劳动。奴隶就不是把他自己的劳动^①出卖给奴隶主，正如耕牛不是向农民卖工一样。奴隶连同自己的劳动^②一次而永远地卖给自己的主人了。奴隶是商品，可以从一个所有者手里转到另一个所有者手里。奴隶本身是商品，但劳动^③却不是他的商品。农奴只出卖自己的一部分劳动^④。不是他从土地所有者方面领得报酬；相反地，土地所有者从他那里收取贡赋。农奴是土地的附属品，替土地所有者生产果实。相反地，自由工人自己出卖自己，并且是零碎地出卖。他每天把自己生命中的8小时、10小时、12小时、15小时拍卖给出钱最多的人，拍卖给原料、劳动工具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即拍卖给资本家。工人既不属于私有者，也不属于土地，但是他每日生命的8小时、10小时、12小时、15小时却属于它的购买者。工人只要愿意，就可以离开雇用他的资本家，而资本家也可以随意辞退工人，只要工人使他不能再获得利益或者不能使他获得预期的利益，他就可以辞退。但是，工人是以出卖劳动^⑤为其工资的唯一来源的，如果他不愿饿死，就不能离开整个购买者阶级即资本家阶级。工人不是属于某一个资产者，而是属于整个资产阶级^⑥；至于工人给自己寻找一个雇主，即在资产阶级^⑦中间寻找一个买主，那是工人自己的事情了。

①②③④⑤ 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编者注

⑥ 在1891年的版本中，“不是属于某一个资产者，而是属于整个资产阶级”改为“不是属于某一个资本家，而是属于整个资本家阶级”。——编者注

⑦ 在1891年的版本中，“资产阶级”改为“资本家阶级”。——编者注

现在，在更详细地谈论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以前，我们先简短地叙述一下在决定工资时起作用的一些最一般的条件。

我们已经说过，工资是一定商品——劳动^① 的价格。所以，工资是由那些决定其他一切商品价格的规律决定的。

那末，试问：商品的价格是怎样决定的呢？

二

科伦 4 月 5 日。商品的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

它是由买主和卖主之间的竞争即供求关系决定的。决定商品价格的竞争是三方面的。

同一种商品，有许多不同的卖主供应。谁以最便宜的价格出卖同一质量的商品，谁就一定会战胜其他卖主，从而保证自己有最大的销路。于是，各个卖主彼此间就进行争夺销路、争夺市场的斗争。他们每一个人都想出卖商品，都尽可能多卖，如果可能，都想由他一个人独卖，而把其余的卖主排挤掉。因此，一个人就要比另一个人卖得便宜些。于是卖主之间就发生了竞争，这种竞争降低他们所供应的商品的价格。

但是买主之间也有竞争，这种竞争反过来提高所供应的商品的价格。

最后，买主和卖主之间也有竞争。前者想买得尽量便宜

①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编者注

些，后者却想卖得尽量贵些。买主和卖主之间的这种竞争的结果怎样，要依上述竞争双方的对比关系怎样来决定，就是说要看是买主阵营里的竞争激烈些呢还是卖主阵营里的竞争激烈些。产业把两支军队抛到战场上对峙，其中每一支军队内部又发生内讧。战胜敌人的是内部冲突较少的那支军队。

假定说，市场上有 100 包棉花，而买主们却需要 1000 包。在这种情形下，需求比供应大 10 倍，因而买主之间的竞争就会很激烈；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竭力设法至少也要搞到 1 包，如果可能，就把 100 包全都搞到手里。这个例子并不是随意虚构的。在商业史上有过这样一些棉花歉收的时期，那时几个资本家彼此结成联盟，不只想把 100 包棉花都收买下来，而且想把世界上的全部存棉都收买下来。这样，在我们前述的情形下，每一个买主都力图排挤掉另一个买主，出较高的价格收买每包棉花。棉花的卖主们看见敌军队伍里发生极剧烈的内讧、并完全相信他们的一百包棉花都能卖掉，因此他们就严防自己内部打起架来，以免在敌人竞相抬高价格的时候降低自己商品的价格。于是卖主阵营里忽然奠定了和平。他们冷静地叉着双手，像一个人似地对抗买主；只要那些最热衷的买主出价又没有一定的限度，那卖主的贪图也就没有止境了。

可见，某种商品的供应低于需求，那末这种商品的卖主中间的竞争就会很弱，甚至于完全没有竞争。卖主中间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减弱，买主中间的竞争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加剧。结果便是商品价格或多或少显著地上涨。

大家知道，较为常见的是产生相反后果的相反情形：供

应大大超过需求，卖主中间拚命竞争，买主少，商品贱价拍卖。

但是，价格上涨和下跌是什么意思呢？高价和低价是什么意思呢？沙粒在显微镜下就显得高，宝塔比起山岳来就显得低了。既然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那末供求关系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让我们随便问一个资产者吧。他会像新即位的亚历山大大帝一样，马上毫不犹豫地利用乘法表来解开这个形而上学的纽结。他会对我们说，假如我生产我出卖的这个商品的费用是 100 法郎，而我把它卖了 110 法郎（自然是在一年期满后），那末这是一种普通的、老实的、正当的利润。假如我在进行交换时得到了 120 或 130 法郎，那就是高额利润了。假如我得到了整整 200 法郎，那就会是特高的巨额利润了。对于这个资产者来说，究竟什么是衡量利润的尺度呢？这就是他的商品的**生产费用**。假如他拿自己的商品换来的一定数量的别种商品，其生产费用少于他的商品的生产费用，那他就算亏本了。可是假如他拿自己的商品换来的一定数量的别种商品，其生产费用大于他的商品的生产费用，那他就算赢利了。他是以**生产费用**作为零度，根据他的商品的交换价值在零度上下的度数来测定他的利润的升降的。

由此可见，供求关系的改变，引起价格的上涨或下跌，引起高价或低价。

假如某一种商品的价格，由于供应不足或需求剧增而大大上涨，那末另一种商品的价格就不免要相应地下跌，因为商品的价格不过是以货币来表示的别种商品和它交换的比率。

举例说，假如一尺绸缎的价格从 5 法郎上涨到 6 法郎，那末白银的价格对于绸缎来讲就下跌了，其他一切商品也都是这样，它们的价格虽然没有改变，但比起绸缎来却是跌价了。这时若要交换得原来那么多的绸缎，就必须拿出更多的商品。

商品价格上涨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大量资本将涌向繁荣的产业部门中去，而这种资本流入较为有利的产业部门中去的现象，要继续到该部门的利润跌落到普通水平时为止，或者更确切些说，要继续到该部门产品的价格由于生产过剩而跌落到生产费用以下时为止。

反之，假如某一种商品的价格跌落到它的生产费用以下，那末资本就要从该种商品生产部门中流出去了。除了该工业部门已经不合时代要求，因而必然衰亡以外，该商品的生产，即该商品的供应，就要因为资本的这种外流而缩减，直到该商品的供应和需求相适应为止，就是说，直到该商品的价格重新上涨到它的生产费用水平，或者更确切些说，直到供应低于需求，即直到商品价格又上涨到它的生产费用以上为止，因为商品的现时价格总是高于或低于它的生产费用。

由此可见，资本是不断地从一个生产部门向另一个生产部门流出或流入的。价格高就引起资本的过分猛烈的流入，价格低就引起资本的过分猛烈的流出。

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研究问题时能够证明：不仅供应，连需求也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可是，这样一来，我们就未免离题太远了。

我们刚才说过，需求和供应的波动，每次都把商品的价格引导到生产费用的水平。固然，商品的实际价格始终不是

高于生产费用，就是低于生产费用；但是，上涨和下降是相互抵消的，因此，在一定时间内，如果把工业中的资本流入和流出总合起来看，就可看出各种商品是依其生产费用而互相交换的，所以它们的价格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

价格由生产费用决定这一点，不应当了解成像经济学家们所了解的那种意思。经济学家们说，商品的平均价格等于生产费用；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规律。他们把价格的上涨被价格的下降所抵消，而下降则被上涨所抵消这种无政府状态的变动看作偶然现象。那末，同样也可以（另一些经济学家就正是这样做的）把价格的波动看作规律，而把价格由生产费用决定这一点看作偶然现象。可是实际上，只有在这种波动的进程中，价格才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我们细加分析时就可以看出，这种波动起着极可怕的破坏作用，并像地震一样震撼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这种无秩序状态的总运动就是它的秩序。在这种产业无政府状态的进程中，在这种循环运转中，竞争可以说是拿一个极端去抵消另一个极端。

由此可见，商品价格是由生产费用这样来决定的：某些时期，某种商品的价格超过它的生产费用，另一些时期，该商品的价格却下跌到它的生产费用以下，而抵消以前超过的时期，反之亦然。当然，这不是就个别产业的产品来说的，而只是就整个产业部门来说的。所以，这同样也不是就个别产业家来说的，而只是就整个产业家阶级来说的。

价格由生产费用决定，就等于说价格由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因为构成生产费用的是：（1）原料和劳动

工具^①，即产业产品，它们的生产耗费了一定数量的工作日，因而也就是代表一定数量的劳动时间；（2）直接劳动，它也是以时间计量的。

一般调节商品价格的那些最一般的规律，当然也调节工资，即调节劳动价格。

劳动报酬忽而提高，忽而降低，是依供求关系为转移的，依购买劳动^② 的资本家和出卖劳动^② 的工人之间的竞争情形为转移的。工资的波动一般是和商品价格的波动相适应的。可是，在这种波动的范围内，劳动的价格是由生产费用即为创造劳动^④ 这一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来决定的。

那末，劳动^⑤ 本身的生产费用究竟是什么呢？

这就是为了使工人保持其为工人并把他训练成为工人所需要的费用。

因此，某一种劳动所需要的训练时间愈少，工人的生产费用也就愈少，他的劳动的价格即他的工资也就愈低。在那些几乎不需要任何训练时间，只要有工人的肉体存在就行的产业部门里，为造成工人所需要的生产费用，几乎只归结为维持工人生存^⑥ 所需要的商品。因此，工人的劳动的价格是由必需生活资料的价格决定的。

可是，这里还应该注意到一种情况。

工厂主在计算自己的生产费用，并根据生产费用计算产

① 1891 年的版本中，“劳动工具”改为“劳动工具损耗部分”。——编者注

②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编者注

⑥ 1891 年的版本中，“生存”后面加有“及其劳动能力”。——编者注

品的价格的时候，是把劳动工具的损耗也计算在内的。譬如说，假如一架机器值一千法郎，使用期限为十年，那末他每年就要往商品价格中加进一百法郎，以便在十年期满时有可能用新机器来更换用坏的机器。同样，简单劳动⁹的生产费用中也应加入延缓工人后代的费用，即使工人阶级能够繁殖后代并用新工人来代替失去劳动能力的工人的费用。所以，工人的损耗也和机器的损耗一样，是要计算进去的。

总之，简单劳动^①的生产费用就是维持工人生存和延续工人后代的费用。这种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的费用的价格就是工资。这样决定的工资就叫做最低工资。这种最低工资，也和商品价格一般由生产费用决定一样，不是就单个人来说的，而是就整个种属来说的。单个工人所得，千百万工人所得，不足以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但整个工人阶级的工资在其波动范围内则是和这个最低额相等的。

现在，我们既已讲明了调节工资以及其他任何商品的价格的最一般规律，我们就能更切近地研究我们的本题了。

三

科伦 4月 6 日。资本包括原料、劳动工具和各种生活资料，这些东西是用以生产新的原料、新的劳动工具和新的生活资料的。资本的所有这些组成部分都是劳动的创造物，劳动的产品，积累起来的劳动。作为进行新生产的手段的积累

①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编者注

起来的劳动就是资本。

经济学家们就是这样说的。

什么是黑奴呢？黑奴就是黑种人。上面的说明和这个说明是一样的。

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沙糖并不是沙糖的价格一样。

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①。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②，才会有生产。

生产者相互发生的这些社会关系，他们借以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于共同生产的条件，当然依照生产资料的性质而有所不同。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总之，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

① 在1891年的版本中，“不仅仅与自然界发生关系”改为“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编者注

② 1891年的版本中，“对自然界的关系”改为“对自然界的影响”。——编者注

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

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构成资本的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难道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不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生产出来和积累起来的吗？难道这一切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被用来进行新生产的吗？并且，难道不正是这种一定的社会性质把那些用来进行新生产的产品变为资本的吗？

资本不仅包括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不仅包括物质产品。并且还包括交换价值。资本所包括的一切产品都是商品。所以，资本不仅是若干物质产品的总和，并且也是若干商品或若干交换价值或若干社会定量的总和。

不论我们是以棉花代替羊毛也好，是以米代替小麦也好，是以轮船代替铁路也好，只要这些体现资本的棉花、米和轮船同原先体现资本的羊毛、小麦和铁路具有同样的交换价值即同样的价格，那末资本依然还是资本。资本的肉体可以经常改变，但不会使资本性质有丝毫改变。

虽然任何资本都是一些商品即交换价值的总和，然而远不是任何一些商品即交换价值的总和都是资本。

任何一些交换价值的总和都是一个交换价值。任何单个交换价值都是一些交换价值的总和。例如，值 1000 法郎的一

座房子是 1000 法郎的交换价值。值一生丁^①的一印张纸是 100/100 生丁的交换价值的总和。能同别的产品交换的产品就是商品。这些产品由以交换的一定比率就是它们的交换价值，如果这种比率是用货币来表示的，就是它们的价格。这些产品的数量多少丝毫不能改变它们成为商品，或者表现交换价值，或者具有一定价格的这种性能。一株树不论其大小如何，终究是一株树。我们拿铁同别的产品交换时不是以两为单位，而是以公担为单位，难道铁作为商品，作为交换价值的性能竟会因此而改变吗？铁作为一种商品，只是依其数量多少而具有大小不同的价值，高低不同的价格。

一些商品即一些交换价值的总和究竟是怎样成为资本的呢？

它成为资本，是由于它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即作为一种属于社会一部分的力量，借交换直接的、活的劳动^②而保存下来并增殖起来。除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阶级的存在是资本的必要前提。

只是由于积累起来的、过去的、物化的劳动支配直接的、活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劳动才变为资本。

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自己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

资本和雇佣劳动^③是怎样进行交换的呢？

①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生丁”改为“分尼”。——编者注

②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编者注

③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资本和雇佣劳动”改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编者注

工人拿自己的劳动^① 换到生活资料，而资本家拿归他所有的生活资料换到劳动，即工人的生产活动，亦即创造力量。这种力量不仅能补偿工人所消费的东西，并且还使积累起来的劳动具有比以前更大的价值。工人从资本家那里得到一部分现有的生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对工人有什么用处呢？用于直接消费。可是，如果我不把靠这些生活资料维持我的生活的一段时间用来生产新的生活资料，即在消费的同时用我的劳动创造新价值来补偿那些因消费而消失了的价值，那末我一把这些生活资料消费完，它们对于我就算是完全白耗费了。但是，工人为了换到生活资料，正是把这种贵重的再生产力量让给了资本家。因此，对于工人本身来说，这种力量是白耗费了。

举一个例子来说吧。有个农场主每天付给他的一个短工 5 银格罗申。这个短工为得到这 5 银格罗申，就整天在农场主的田地上干活，保证农场主能得到 10 银格罗申的收入。农场主不但收回了他付给短工的价值，并且还把它增加了一倍。可见，他有成效地、生产性地使用和消费了他付给短工的 5 银格罗申。他拿这 5 银格罗申买到的正是一个短工的能生产出双倍价值的农产品并把五银格罗申变成十银格罗申的劳动和力量。短工则拿他的生产力（他正是把这个生产力让给了农场主）换到 5 银格罗申，并用它们换得迟早要消费掉的生活资料。所以，这五银格罗申的消费有两种方法：对资本家来说，是有生产性的，因为他用这五银格罗申换来的劳动力

①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编者注

使他得到了 10 银格罗申；对工人来说，是非生产性的，因为他用这五银格罗申换来的生活资料永远消失了，他只有再和农场主进行同样的交换才能重新取得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这样，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两者相互制约；两者相互产生。

一个棉纺织厂的工人是不是只生产棉织品呢？不是，他生产资本。他生产重新供人利用去支配他的劳动并借他的劳动创造新价值的价值。

资本只有同劳动^① 交换，只有引起雇佣劳动的产生，才能增加起来。雇佣劳动^② 只有在它增加资本，使奴役它的那种权力加强时，才能和资本交换。因此，资本的增加就是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增加。

所以，资产者及其经济学家们断言，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千真万确呵！工人若不受雇于资本家就会灭亡。资本若不剥削劳动^③ 就会灭亡，而要剥削劳动^④， 资本就得购买劳动^⑤。投入生产的资本即生产资本增殖愈快，也就是说，产业愈繁荣，资产阶级愈发财，生意愈兴隆，资本家需要的工人也就愈多，工人出卖自己的价格也就愈高。

原来，生产资本的尽快增加竟是工人能勉强过活的必要条件。

但是，生产资本的增加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权力的增加，就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

①③④⑤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编者注

②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雇佣劳动”改为“雇佣工人的劳动力”。——编者注

级的统治力量的增加。雇佣劳动生产着对它起支配作用的他人财富，也就是说生产着同它敌对的力量——资本，而它从资本那里取得就业手段，即取得生活资料，是以雇佣劳动又会变成资本的一部分，又会变成使资本加速增殖的杠杆为条件的。

断言资本的利益和劳动的利益^① 是一致的，事实上不过是说资本和雇佣劳动是同一种关系的两个方面罢了。一个方面制约着另一个方面，就如同高利贷者和挥霍者相互依存一样。

当雇佣工人仍然是雇佣工人的时候，他的命运是取决于资本的。所谓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一致就是这么一回事。

四

科伦 4 月 7 日。资本愈增长，雇佣劳动量就愈增长，雇佣工人人数就愈增加，一句话，受资本支配的人数就愈增多。我们且假定有这样一种最适意的情形：随着生产资本的增加，对劳动的需求也增加了，因而劳动价格即工资也提高了。

一座小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可怜的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毫不讲究或者要求很低；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

①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劳动的利益”改为“工人的利益”。——编者注

扩大起来，但是，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末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被人轻视。

工资的任何显著的增加是以生产资本的迅速增加为前提的。生产资本的迅速增加，就要引起财富、奢侈，社会需要和社会享受等同样迅速的增长。所以，工人可以得到的享受纵然增长了，但是，比起资本家的那些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为增加的享受来，比起一般社会发展水平来，工人所得到的社会满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对于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的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去衡量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是相对的。

工资一般不仅是我能够用它交换到的商品数量来决定的。工资包含着各种对比关系。

首先，工人靠出卖自己的劳动^① 取得一定数量的货币。工资是不是单由这个货币价格来决定的呢？

在十六世纪，由于美洲的发现^②，欧洲流通的黄金和白银的数量增加了。因此，黄金和白银的价值和其他各种商品比较起来就降低了。但是，工人们出卖自己的劳动^③所得到的银币数仍和从前一样。他们的劳动的货币价格仍然如旧，然而他们的工资毕竟是降低了，因为他们拿同样数量的银币所交换到的别种商品比以前少了。这是促成十六世纪资本增殖

①③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编者注

②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美洲的发现”改为“在美洲发现了更丰富和更易于开采的金矿”。——编者注

和资产阶级兴盛的原因之一。

我们再举一个别的例子。1847年冬，由于歉收，最必需的生活资料（面包、肉类、黄油、干酪等等）大大涨价了。假定工人靠出卖自己的劳动^①所得的货币量仍和以前一样。难道他们的工资没有降低吗？当然是降低了。他们拿同样多的货币所能换到的面包、肉类等等东西比从前少了。他们的工资降低并不是因为白银的价值减低了，而是因为生活资料的价值增高了。

我们最后再假定，劳动的货币价格仍然未变，可是一切农产品和工业品由于使用新机器、年成好等等原因而降低了价格。这时，工人拿同样多的货币可以买到更多的各种商品。所以，他们的工资正因为工资的货币价值仍然未变而提高了。

总之，劳动的货币价格即名义工资，是和实际工资即用工资实际交换所得的商品量并不一致的。因此，我们谈到工资的增加或降低时，不应当仅仅注意到劳动的货币价格，仅仅注意到名义工资。

但是，无论名义工资，即工人把自己卖给资本家所得到的货币量，无论实际工资，即工人用这些货币所能买到的商品量，都不能把工资所包含的各种对比关系完全表示出来。

此外，工资首先是由它和资本家的赢利即利润的对比关系来决定的。这就是比较工资、相对工资。

实际工资所表示的是同其他商品的价格相比的劳动价格，反之，相对工资所表示的则是同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价格

① 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编者注

相比的直接劳动价格，是雇佣劳动和资本的相对价值，是资本家和工人的相互价值^①。

实际工资可能仍然未变，甚至可能增加了，但是相对工资却可能降低了。假定说，一切生活资料跌价三分之二，而日工资只降低了三分之一，比方由 3 法郎降低到 2 法郎。这时，虽然工人拿这 2 法郎可以买到比从前拿 3 法郎买到的更多的商品，但是和资本家的利润比较起来，工人的工资终究是降低了。资本家（比如，一个工厂主）的利润增加了 1 法郎，换句话说，资本家拿比以前少的交换价值付给工人，而

①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恩格斯把自“反之，相对工资”以下的一段话改为：“而相对工资所表示的，则是直接劳动从劳动新创造出的价值中所获得的那个同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资本从这种价值中所取得的份额相比较的份额。”

上面，在第 14 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 354 页——编者注]上，我们说过：‘工资不是工人在他所生产的商品中占有的一份。工资是原有商品中由资本家用以购买一定量的生产劳动力的那一部分。’但是，资本家要从卖出由工人创造的产品所得的进款中再补偿这笔工资。资本家在补偿这笔工资时，照例要在扣除生产费用后，还有若干剩余，即还有利润。工人所生产的商品的销售价格，对资本家来说可分为三部分：第一，补偿他所垫支的原料价格和他所垫支的工具、机器及其他劳动资料的损耗；第二，补偿资本家所垫支的工资；第三，这些费用以外的余额，即资本家的利润。第一部分只是补偿原已存在的价值；很清楚，补偿工资的那一部分和构成资本家利润的余额完全是从工人劳动所创造出来的并附加到原料价值上去的新价值中得来的。而在这个意义上说，为了把工资和利润加以比较，我们可以把两者都看成是工人生产的产品中的份额。”——编者注

工人却得替资本家生产出比以前多的交换价值。资本的价值比劳动的价值提高了^①。社会财富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更不平衡了。资本家用同样多的资本支配着更多的劳动。资本家阶级支配工人阶级的权力增加了，工人的社会地位更坏了，比起资本家的地位来又降低了一级。

决定工资和利润在其相互关系上的降低和增加的一般规律究竟是怎样的呢？

工资和利润是互成反比的。资本的交换价值^② 即利润愈增加，则劳动的交换价值^③ 即按日工资就愈降低；反之亦然。利润增加多少，工资就降低多少；而利润降低多少，则工资就增加多少。

也许有人会驳斥说：资本家赢利可能是由于他拿自己的产品同其他资本家进行了有利的交换，可能是由于开辟了新的市场或者原有市场上的需要骤然增加等等，从而对他的商品的需求量大为增加；所以，一个资本家所得利润的增加可能是由于损害了其他资本家的利益，而与工资即劳动^④ 的交换价值的涨落无关；或者，资本家所得利润的增加也可能是由于改进了劳动工具，采用了利用自然力的新方法等等。

首先必须承认，所得出的结果依然是一样的，只不过这

① 在1891年的版本中，“资本的价值比劳动的价值提高了”改为“资本所得的份额比劳动所得的份额提高了”。——编者注

② 在1891年的版本中，“资本的交换价值”，改为“资本的所得份额”。——编者注

③ 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的交换价值”改为“劳动的所得份额”。——编者注

④ 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别人的劳动”。——编者注

是经过相反的途径得出的。固然，利润的增加不是由于工资的降低，但是工资的降低却是由于利润的增加。资本家用同一数量的劳动^①，购得了更多的交换价值，而对这个劳动却没有多付一文。这就是说，劳动所得的报酬同它使资本家得到的纯收入相比却减少了。

此外，我们还应提醒，无论商品价格如何波动，每一种商品的平均价格，即它同别种商品相交换的比率，总是由它的生产费用决定的。因此，资本家相互间的盈亏得失必定在整个资本家阶级范围内互相抵销。改进机器，在生产中采取利用自然力的新方法，使得在一定的劳动时间内，用同样数量的劳动和资本可以创造出更多的产品，但绝不是创造出更多的交换价值。如果我用纺纱机能够在一小时内生产出比未发明这种机器以前的产量多一倍的纱，比方从前为 50 磅，现在为 100 磅，那末我用这 100 磅纱交换^②所得的商品，并不比以前用 50 磅交换到的多些，因为纱的生产费用减低了一半，或者说，因为我用同样多的生产费用能够生产出比以前多一倍的产品。

最后，不管资本家阶级即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也好，整个世界市场的也好）相互之间分配生产所得的纯收入的比率如何，这个纯收入的总额归根到底只是活劳动^③ 加到全部积累起来的劳动上去的那个数额。所以，这个总额是按劳动增殖资本的比率，即按利润比工资增加的比率增长的。

①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别人的劳动”。——编者注

②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交换”，前面加有“在一定时间内”。——编者注

③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活劳动”改为“直接劳动”。——编者注

可见，即使我们单只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这个范围内观察问题，也可以知道资本的利益和雇佣劳动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

资本的迅速增加就等于利润的迅速增加。而利润的迅速增加只有在劳动的交换价值^{脚注 32}同样迅速下降，相对工资同样迅速下降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即使在实际工资同名义工资即劳动的货币价值同时增加的情况下，只要实际工资不是和利润同等地增加，相对工资还是可能下降的。比如说，在经济兴旺的时期，工资提高 5%，而利润却提高 30%，那末比较工资即相对工资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

所以，一方面工人的收入在资本迅速增加的情况下也有所增加，可是另一方面横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社会鸿沟也同时扩大，而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劳动对资本的依赖程度也随着增大。

所谓资本迅速增加对工人有好处的论点，实际上不过是说：工人把他人的财富增殖得愈迅速，落到工人口里的残羹剩饭就愈多，能够获得工作和生活下去的工人就愈多，依附资本的奴隶人数就增加得愈多。

这样我们就看出：

即使最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情势，即使资本的尽快增加如何改善了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也不能消灭工人的利益和资产者即资本家的利益之间的对立状态。利润和工资仍然是互成反比的。

①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劳动的交换价值”改为“劳动价格”。——编者注

假如资本增加得迅速，工资是可能提高的；可是资本家的利润增加得更迅速无比。工人的物质生活改善了，然而这是以他们的社会地位的降低为代价换来的。横在他们和资本家之间的社会鸿沟扩大了。

最后：

所谓生产资本的尽快增加是对雇佣劳动最有利的条件这种论点，实际上不过是说：工人阶级愈迅速地扩大和增加敌对它的力量，即愈迅速地扩大和增加支配它的他人财富，它就能在愈加有利的条件下重新为资产阶级增殖财富、重新为资本加强权力而工作——这样的工作无非是它本身在铸造金锁链，让资产阶级用来牵着它走罢了。

五

科伦 4 月 10 日。然而，是不是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们所说的那样，生产资本的增加真的和工资的提高密不可分呢？我们不应当听信他们的话。我们甚至于不能相信他们的这种说法：似乎资本长得越肥，它的奴隶也吃得越好。资产阶级太开明了，太会打算了，它没有封建主的那种以奴仆的衣着华丽夸耀于人的偏见。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迫使它锱铢必较。

因此我们就应当更仔细地研究一个问题：

生产资本的增长是怎样影响工资的？

如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资本整个说来是在不断增长，那末劳动的积累就是更多方面的了。资本的数目和资本的数

额^①日益增加。资本的增殖加剧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资本数额的增加，就使得有可能把装备着火力更猛烈的斗争武器的更强大的工人大军抛入产业战场。

一个资本家只有在自己更便宜地出卖商品的情况下，才能把另一个资本家逐出战场，并占有他的资本。可是，要能够贱卖而又不破产，他就必须廉价生产，就是说，必须尽量增加劳动的生产力。而增加劳动的生产力的首要办法是更细地分工，更全面地运用和经常地改进机器。内部实行分工的工人大军愈庞大，应用机器的规模愈广大，生产费用相对地就愈迅速缩减，劳动就更有效率。因此，资本家之间就发生了各方面的竞争：他们竭力设法扩大分工和增加机器，并尽可能大规模地使用机器。

可是，假如某一个资本家由于更细地分工、更多地采用新机器并改进新机器，由于更有利和更广泛地利用自然力，因而有可能用同样多的劳动或积累起来的劳动生产出比他的竞争者更多的产品（即商品），比如说，在同一劳动时间内，他的竞争者只能织出半尺麻布，他却能织出一尺麻布，那末他会怎样办呢？

他可以继续按照原来的市场价格出卖每半尺麻布，但是这样他就不能把自己的敌人逐出战场，就不能扩大自己的销路。可是随着他的生产的扩大，他对销路的需要也增加了。固然，他所采用的这些更有力更贵重的生产资料使他能够廉价

① 在1891年的版本中，“资本的数目和资本的数额”改为“资本家的数目和他们的资本的数额”。——编者注

出卖商品，但是这种生产资料又使他不得不出卖更多的商品，为自己的商品争夺更大得多的市场。因此，这个资本家出卖半尺麻布的价格就要比他的竞争者便宜些。

虽然这个资本家生产一尺麻布的费用并不比他的竞争者生产半尺麻布的费用多，但是他不会以他的竞争者出卖半尺麻布的价格来出卖一尺麻布。不然他就占不到任何便宜，而只是通过交换把自己的生产费用收回罢了。如果他的收入终究还是增加了，那只是因为他动用了更多的资本，而不是因为他的资本比别人的资本更多地增加了自己的价值。而且只要他把他的商品价格定得比他的竞争者低百分之几，他追求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他压低价格就能把他的竞争者挤出市场，或者至少也能夺取他的竞争者的一部分销路。最后，我们再提一下，现时价格总是高于或低于生产费用，这取决于该种商品是在产业的旺季出卖的还是在淡季出卖的。一个采用了生产效能更高的新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能得到的超出他的实际生产费用的百分率，是依每尺麻布的市场价格高于或低于迄今的一般生产费用为转移的。

可是这个资本家的特权不会长久，因为同他竞争的资本家也会采用同样的机器，实行同样的分工，并以同样的或更大的规模采用这些机器的分工。这些新措施将得到广泛的推广，直到麻布价格不仅跌到原先的生产费用以下，而且跌到新的生产费用以下为止。

这样，资本家的相互关系又会像采用新生产资料以前那样了：如果说他们由于采用这种生产资料曾经能够用以前的价格供给加倍的产品，那末现在他们已不得不按低于以前的

价格出卖加倍的产品了。在这种新生产费用的水平上，同样一场钩心斗角的斗争又重新开始。又有人实行更细的分工，又有人增加机器数量，利用这种分工的范围和采用这些机器的规模日益扩大。而竞争又对这个结果发生反作用。

由此可见，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总在不断变更，不断革命化；分工必然要引起更进一步的分工；机器的采用必然要引起机器的更广泛的采用；大规模的生产必然要引起更大规模的生产。

这是一个规律，这个规律一次又一次地把资产阶级的生产甩出原先的轨道，并迫使资本加强劳动的生产力，因为它以前就加强过劳动的生产力；这个规律不让资本有片刻的停息，老是在它耳边催促说：前进！前进！

这个规律正就是那个在商业的周期性波动中必然使商品价格和商品生产费用趋于一致的规律。

不管一个资本家运用了效率多么高的生产资料，竞争总使这种生产资料的采用成为普遍的现象，而当这种生产资料的采用一旦成为普遍的现象时，他的资本具有更大效率的唯一后果就只能是：要取得原有的价格，他就必须供给比以前多 10 倍、20 倍、100 倍的商品。可是，因为现在他必须售出也许比以前多 1000 倍的商品，才能靠增加所售产品数量的办法来弥补由于售价降低所受的损失；因为他现在必须卖出更多的商品不仅是为了得到利润^①，并且也是为了抵补生产费用（我们已经说过，生产工具本身也日益昂贵）；因为此时这

①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得到利润”改为“得到更多的利润”。——编者注

种大量出卖不仅对于他而且对于他的竞争对手都成了生死问题，所以先前的斗争就因已经发明的生产资料的生产效率愈大而愈残酷无情地激烈起来。所以，分工和机器的采用又将以更大得无比的规模发展起来。

不管已被采用的生产资料的力量多么强大，竞争总是要把资本从这种强大力量中得到的黄金果实夺去，使商品的价格降低到生产费用的水平；也就是说，只要有可能更廉价的生产，即有可能用同一数量的劳动生产更多的产品，竞争就使廉价生产即按原先价格供给日益增多的产品数量成为确定不移的规律。可见，资本家努力的结果，除了必须在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商品以外，换句话说，除了使他的资本的价值增殖的条件恶化以外，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因此，虽然竞争经常以其生产费用的规律迫使资本家坐卧不宁，把他制造出来对付竞争者的一切武器倒转来针对着他自己，但资本家总是想方设法在竞争中取胜，孜孜不倦地采用价钱较贵但能进行廉价生产的新机器，实行新分工，以代替旧机器和旧分工，并且不等到竞争使这些新措施过时，就这样做了。

现在我们若是想像一下这种狂热的激发状态同时笼罩了整个世界市场，那我们就会明白，资本增殖、积累和集聚的结果，如何导向了不断地、日新月异地、更大规模地实行分工，采用新机器，改进旧机器。

这些同生产资本的增殖分不开的情况又怎样影响工资的确定呢？

更进一步的分工使 1 个工人能做 5 个、10 个乃至 20 个人的工作，因而就使工人之间的竞争加剧 5 倍、10 倍乃至 20

倍。工人之间的竞争不只表现于 1 个工人把自己出卖得比另 1 个工人贱些，而且还表现于 1 个工人做 5 个、10 个乃至 20 个人的工作。而资本所实行的和经常扩展的分工就迫使工人进行这种竞争。

其次，分工愈细，劳动就愈简单化。工人的特殊技巧失去任何价值。工人变成了一种简单的、单调的生产力，就不需要体力上或智力上的特别本事和技能了。他的劳动成为人人都能从事的劳动了。因此，工人受到四面八方的排挤；我们还要提醒一下，一种工作愈简单，就愈容易学会，为学会这种工作所需要的生产费用愈少，工资也就愈降低，因为工资像一切商品的价格一样，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

总之，劳动愈是不能给人以乐趣，愈是令人生厌，竞争也就愈激烈，工资也就愈减少。工人想维持自己的工资总额，就得多劳动：多工作几小时或者在一小时内造出更多的产品。这样一来，工人为贫困所迫，就愈加重分工的极危险的后果。结果就是：他工作得愈多，他所得的工资就愈少。这里的原因很简单：他工作得愈多，他给自己的工友们造成的选择就愈激烈，因而就使自己的工友们变成他自己的竞争者，这些竞争者也像他一样按同样恶劣的条件出卖自己。所以，原因同样很简单：他归根到底是自己给自己，即自己给作为工人阶级一员的自己造成竞争。

机器也发生同样的影响，而且影响的规模更大得多，因为机器用不熟练的工人代替熟练工人，用女工代替男工，用童工代替成年工；因为在最先使用机器的地方，机器就把大批手工工人抛到街头上去，而在机器日益完善、改进或为生

产效率更高的机器所替换的地方，机器又把一批一批的工人排挤出去。我们在前面大略地描述了资本家相互间的产业战争。这种战争有一个特点，就是致胜的办法与其说是增加劳动大军，不如说是减少劳动大军。统帅们即资本家们相互竞赛，看谁能解雇更多的产业士兵。

不错，经济学家们告诉我们说，似乎因采用机器而成为多余的工人可以在新的工业部门里找到工作。

他们不敢干脆地肯定说，在新的劳动部门中找到栖身之所的就是那些被解雇的工人。事实最无情地粉碎了这种谎言。其实，他们不过是肯定说，在工人阶级的其他组成部分面前，譬如说，在一部分已准备进入那种衰亡的产业部门的青年工人面前，出现了新的就业门路。这对于不幸的工人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资本家老爷们是不会缺少可供剥削的新鲜血肉的，于是他们就让死人们去埋葬自己的尸体。这种安慰，与其说是对工人的安慰，不如说是对资本家本身的安慰。要知道，假若机器消灭了整个雇佣工人阶级，那末资本的最可怕的时刻就会到来，因为资本没有雇佣劳动就不再成为资本了！

就假定那些直接被机器从一个产业部门排挤出去的工人以及原已指望受雇于该产业部门的那一部分青年工人都能找到新工作。是否可以相信新工作的报酬会和已失去的工作的报酬同样高呢？要是这样，那就是违反了一切经济规律。我们说过，现代产业经常是用简单的和低级的工作来代替较复杂和较高级的工作的。

既是这样，被机器从一个产业部门排挤出去的一大批工人若不甘愿领取更低更坏的报酬，又怎能在别的部门找到栖

身之所呢？

有人说制造机器本身的工人是一种例外。他们说，既然产业需要并使用更多的机器，机器的数量就必然增加，因而机器的生产也必然增加，而在这个生产部门中工作的工人人数也必然随之增加；况且这个产业部门的工人是熟练工人，而且还是受过教育的工人。

从1840年起，这种原先也只有一半正确的论点已经毫无正确的影子了，因为机器生产部门也完全和棉纱生产部门一样，日益多方面地采用机器，而机器生产部门的工人，比起极完善的机器来，只能起着极不完善的机器的作用。

可是，在一个男工被机器排挤出去以后，工厂方面也许会雇佣三个童工和一个女工！难道先前一个男工的工资不是应该足够养活三个孩子和一个妻子吗？难道先前最低工资不是应该足够维持工人生活和繁殖工人后代吗？资产阶级爱说的这些话在这里究竟证明了什么呢？只证明了一点：现在要得到维持一个工人家庭生活的工资，就得消耗比以前多三倍的工人生命。

总括起来说：生产资本愈增加，分工和采用机器的范围就愈扩大。分工和采用机器的范围愈扩大，工人之间的竞争就愈剧烈，他们的工资就愈减少。

加之，工人阶级还从较高的社会阶层中得到补充；降落到无产阶级队伍里来的有大批小产业家和小食利者，他们除了赶快跟工人一起伸手乞求工作，毫无别的办法。这样，伸出来乞求工作的手像森林似地愈来愈稠密，而这些手本身则愈来愈消瘦。

不言而喻，小产业家是支持不住这种战争^① 的：这种战争的首要条件之一就是生产的规模经常扩大，也就是说必须要做大产业家而绝不能做一个小产业家。

当然，还有一点也是用不着进一步说明的：资本愈增殖，资本的总量和数目愈增加，资本的利息也就愈减少；因此，小食利者就不可能再依靠利息来维持生活，必须投到产业方面去，即补充小产业家的队伍，从而增加无产者的候补人数。

最后，上述发展进程愈迫使资本家以日益扩大的规模使用既有的巨大的生产资料，并为此而动用一切信贷机构，而“地震”^②也来得愈来愈频繁，在每次地震中，商业界只是由于埋葬一部分财富、产品以至生产力才维持下去，——也就是说，危机来得愈益剧烈了。这种危机之所以来得愈频繁和愈剧烈，就是因为随着产品总量的增加，亦即随着对扩大市场的需要的增长，世界市场变得愈加狭窄了，剩下可供榨取的市场^③ 愈益减少了，因为先前发生的每一次危机都把一些新市场或以前只被微微榨取过的市场卷入了世界贸易。但是，资本不光靠剥削劳动来生活。像显贵的野蛮的奴隶主一样，资本也要他的奴隶们陪葬，即在危机时期要使大批的工人死亡。由此可见：如果说资本增长得迅速，那末工人之间的竞争就增长得更迅速无比，就是说，资本增长得愈迅速，工人阶级的就业手段即生活资料就相对地缩减得愈厉害；虽然如此，资

① 在1891年的版本中，“战争”改为“斗争”。——编者注

② 在1891年的版本中，“地震”改为“产业方面的地震”。——编者注

③ 在1891年的版本中，“市场”改为“新市场”。——编者注

本的迅速增长对雇佣劳动却是最有利的条件。

(待续)

根据 1847 年 12 月下半月

原文是德文

所做的讲演写成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出版《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

第 6 卷第 473——506 页

载于载于 1849 年 4 月 5—8 日

和 11 日“新莱茵报”第 264—

267 号和第 269 号

注 释

1 《雇佣劳动与资本》是马克思根据他于 1847 年 12 月下半月在布鲁塞尔德国工人协会所作的讲演而写的。约·魏德迈抄写的标题为《工资》的手稿被保存了下来，这部手稿跟《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本文几乎完全一致。1848 年初，马克思试图在布鲁塞尔发表这部著作。可是，由于马克思被逐出比利时而未能出版。

这部著作以《新莱茵报》社论的形式于 1849 年 4 月 5—8 日和 11 日首次发表，标题为《雇佣劳动与资本》。由于马克思暂时离开科伦，后来又由于德国政局更加紧张以及“新莱茵报”的停刊，这些文章的刊载遂告中断。

《雇佣劳动与资本》的首次发表，就已经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德国工人中的传播。例如，根据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的决定，马克思的这些文章曾被推荐给科伦和其他城市的工人联合会讨论。

《新莱茵报》停刊后，马克思曾想出版《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单行本，可是他未能亲自实现这个想法。这部著作的单行本于 1880 年在布勒斯劳首次出版，马克思未能参与其事。1881 年又在同一地方再版。在恩格斯的参加下，这部著作于 1884 年又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并附有恩格斯写的一篇关于该书发表经过的简短前言。1891 年，为了在工人中进行宣传，这本小册子又出了一种新版，由恩格斯校订并写了导言。

现在发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仍然是不完全的。马克思于 1847 年 12 月写的手稿《工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6 卷第 635—660 页）可以作为正文的部分补充。

凡恩格斯在 1891 年的单行本中所作的重要更改，均在注脚中注明。这部著作的章节是按“新莱茵报”发表时的样子划分的。

2 这篇导言是恩格斯为他校订的、于 1891 年在柏林出版的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新版单行本而写的。恩格斯在导言开头，把他为这一著

作的 1884 年版本所写的前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204 页）全部复述一遍。为了在工人当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曾大量刊印了附有恩格斯这篇导言的小册子。

导言在工人和社会主义报刊上获得广泛的传布，它以独立的论文形式登载出来。在单行本出版以前，它曾发表在 1891 年 5 月 13 日《前进报》第 109 号附刊上，标题是：《雇佣劳动与资本》。它还稍经删节载于 1891 年 5 月 30 日《自由报》第 22 号，1891 年 7 月 10 日意大利杂志《社会评论》第 10 期，1891 年 7 月 22 日《社会主义者报》第 44 号，1892 年法国社会主义杂志《社会问题》的文集，以及其他报刊。

马克思的这一著作后来根据 1891 年版本译成许多种外文出版，所有这些版本都收有这篇导言。

3 德意志工人协会 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 1847 年 8 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向他们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比利时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合法中心，并跟佛来米和瓦伦工人俱乐部保持了直接的联系。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 1848 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后不久，由于该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

4 指 1849 年沙皇军队为了镇压匈牙利资产阶级革命和恢复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而对匈牙利进行的武装干涉，以及为维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 1849 年 3 月 28 日通过的国宪法而举行的起义（这些起义是德国 1848-1849 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阶段）。- 第 340 页。

5 恩格斯指 1891 年五一庆祝活动。在某些国家（英国、德国）里，是在 5 月 1 日以后头一个星期日庆祝五一节的，1891 年，5 月 1 日以后头一个星期日是在 5 月 3 日。英国、奥地利、德国、法国、意大利、俄国和其他国家许多城市的工人，在 1891 年五一纪念日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

马克思

哥达纲领批判¹（节录）

恩格斯写的序言

这里刊印的手稿——对纲领草案的批判以及给白拉克的附信——曾于 1875 年哥达合并代表大会² 召开以前不久送给白拉克，请他转给盖布、奥艾尔、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过目，然后退还马克思。既然哈雷党代表大会³ 已把关于哥达纲领的讨论提到了党的议事日程，所以我认为，如果我还延迟发表这个有关这次讨论的重要的——也许是最重要的——文件，那我就要犯隐匿罪了。

但是，这个手稿还有另外的和更广泛的意义。其中第一次明确而坚定地表明了马克思对拉萨尔从他开始从事鼓动工作起就采取的方针的态度，并且同样地表明了对拉萨尔的经济学原则和策略的态度。

这里用以剖析纲领草案的那种无情的尖锐性，用来表述得出的结论和揭露草案缺点的那种严厉性，——这一切在十五年以后的今天已不会使人见怪了。道地的拉萨尔主义者只是在国外还作为一些孤独的残余存在着，而哥达纲领甚至也被它的那些创造者们在哈雷当做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东西抛

弃了。

虽然如此，凡是在对内容没有影响的地方，我还是把一些针对个别人的尖锐的词句和评语删掉了，而用省略号来代替。如果马克思今天发表这个手稿，他自己也会这样作的。手稿中有些地方口气很激烈，这是由下述两种情况引起的：第一，马克思和我对德国运动的关系，比对其他任何一国运动的关系都更为亲切；因此这个纲领草案中所表现的断然的退步，就不能不使我们感到特别愤慨。第二，我们那时正在同巴枯宁及其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最激烈的斗争，——那时离国际海牙代表大会⁴闭幕才两年，——他们把德国工人运动中发生的一切都归咎于我们；因而我们不得不预料，他们也会诬指我们是这个纲领的秘密创作者。这些顾虑现在已经消失，因而一些有关的地方也就随之失去必要性了。

由于出版法的缘故，有些语句只用省略号暗示出来。凡是我不得不选用比较缓和的说法的地方，都加上了方括弧。其他地方都按手稿付印。

弗·恩格斯

1891年1月6日于伦敦

载于1890—1891年《新时代》

原文是德文

杂志第1卷第18期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2卷第105—106页

给威·白拉克的信

1875年5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白拉克：

对合并纲领的下列批评意见，请您阅后转交盖布和奥艾尔、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过目。我工作太忙，已经不得不远远超过医生给我规定的工作时间。所以，写这么多张纸，对我来说决不是一种“享受”。但是，为了使党内的朋友们——而这些意见就是为他们写的——以后不致误解我这方面不得不采取的步骤，这是必要的。这里指的是，在合并大会以后，恩格斯和我将要发表的一个简短的声明，声明的内容是：我们和上述原则性纲领毫不相干，我们和它毫无共同之点。

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在国外有一种为党的敌人所热心支持的见解——一种完全荒谬的见解，仿佛我们在这里秘密地领导所谓爱森纳赫党⁵的运动。例如巴枯宁还在他新近出版的一本俄文著作里要我不仅为这个党的所有纲领等等负责，甚至要为李卜克内西自从和人民党⁶合作以来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负责⁷。

撇开这一点不谈，我的义务也不容许我即使只用外交式的沉默方法来承认一个我认为应当根本抛弃并且会使党瓦解的纲领。

一步实际运动要比一打纲领更为重要。所以，既然不可能——而局势也不容许这样做——超过爱森纳赫纲领，那就干脆缔结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行动协定好了。但是，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应该是把这件事情推迟到由较长时间的共同工作准备好了的时候再做），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一些可供人们用以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

拉萨尔派的领袖们之所以跑来靠拢我们，是因为他们为形势所迫。如果一开始就向他们声明决不会拿原则来做买卖，那末他们就只好满足于一个行动纲领或共同行动的组织计划了。可是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允许他们拿着全权委托书来出席，并且自己承认他们的这种全权委托书有效，就是说，向那些本身需要援助的人们无条件投降。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在召开妥协的代表大会以前就召开了代表大会，而自己的党却只是在事后才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人们显然是想杜绝一切批评，不让自己的党有一个深思的机会。大家知道，合并这一事实本身是使工人感到满意的；但是，如果有人以为这种一时的成功不是用过高的代价换来的，那他就错了。

此外，即使这个纲领没有把拉萨尔的信条奉为神圣，也是完全不适宜的。

我将在最近把《资本论》法文版的最后几册寄给您。排印工作因法国政府禁止而耽搁了很久。在本星期内或下星期初本书可以印完。前六册您已经收到没有？请把伯恩哈特·贝克尔的地址也告诉我，我也要给他寄最后几册去。⁸

《人民国家报》出版社⁹有一种特别的习气。例如到现在为止连一本新版的“科伦共产党人案件”¹⁰也没有给我寄

来。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卡尔·马克思

写于 1875 年 5 月 5 日

原文是德文

摘要载于 1890—1891 年《新时代》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杂志第 1 卷第 18 期

第 19 卷第 13—14 页

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

一

1. “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而因为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

本段第一部分：“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
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的表现，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上面那句话在一切儿童识字课本里都可以找到，但是这句话只是在它包含着劳动具备了相应的对象和资料这层意思的时候才是正确的。然而，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不应当容许这种资产阶级的说法，对那些唯一使这种说法具有意义的条件避而不谈。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分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做隶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资产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给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因为正是从劳动所受的自然制约性中才产生

出如下的情况：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生存。

但是不管这句话缺点如何，我们且把它放在一旁，不去管它。那么结论应当怎样呢？显然应当是：

“既然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要不占有劳动的产品就不能占有财富。因此，如果他自己不劳动，他就是靠别人的劳动生活，而且他自己的文化也是靠别人的劳动获得的。”

可是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借助于“而因为”这种暧昧的字眼添上第二句话，以便从第二句中，而不是从第一句中作出结论来。

本段第二部分：“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

根据第一句话，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离开劳动。相反地，我们现在却看到，任何一种“有益的”劳动都不能离开社会。

那么同样也可以说，只有在社会里，无益的、甚至有损公益的劳动才能成为一个职业部门，只有在社会里才可以游手好闲，如此等等，——一句话，可以抄袭卢梭的全部著作了。

而什么是“有益的”劳动呢？只不过是能产生预期效果的劳动。一个蒙昧人（而人在他已不再是猿类以后就是蒙昧人）用石头击毙野兽，采集果实等等，就是进行“有益的”劳动。

第三，结论：“而因为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

多妙的结论！既然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劳动所得就应当属于社会，而单个的工人从中获得的仅仅是不必用来维持劳动“条件”即维持社会的那一部分。

事实上，这个论点在一切时代都被**当时的社会制度的捍卫者**所承认。首先要满足政府方面以及依附于它的各个方面的要求，因为政府是维持社会秩序的社会机关；其次要满足各种私有财产^①方面的要求，因为各种私有财产是社会的基础，如此等等。你们看，这些空洞的辞句是随便怎么摆弄都可以的。

本段第一和第二两部分只有像下面这样说才能有些合乎情理的联系：

“劳动只有作为社会的劳动”，或者换个说法，“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能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

这个论点无可争辩地是正确的，因为孤立的劳动（假定它的物质条件是具备的）虽能创造使用价值，但它既不能创造财富，也不能创造文化。

但是另一个论点也是同样无可争辩的：

“随着劳动的社会性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劳动之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劳动者方面的贫穷和愚昧、非劳动者方面的财富和文化也发展起来。”

①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是：“私有者”。——编者注

这是到现时为止的全部历史的规律。因此，不应当泛泛地谈论“劳动”和“社会”，而应当在这里清楚地证明，在现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最终创造了物质的和其他的条件，使工人能够并且不得不铲除这个社会祸害^①。

实际上，把这整个行文和内容都不妥当的条文放在这里，只不过是为了要把拉萨尔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作为第一个口号写在党的旗帜上。以后我还要回过来谈“劳动所得”、“平等的权利”等等，因为同样的东西在下面又以稍微不同的形式重复出现。

2. “在现代社会中，劳动资料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由此造成的工人阶级的依附性是一切形式的贫困和奴役的原因。”

这段从国际章程中抄来的话，经过这番“修订”就变成荒谬的了。

在现代社会中，劳动资料为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所垄断（地产的垄断甚至是资本垄断的基础）。无论是前一个或者后一个垄断者阶级，国际章程在有关条文中都没有提到。它谈到的是“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生活源泉”这一补充语充分表明，劳动资料也包括土地。

其所以作这种修订，是因为拉萨尔由于现在大家都知道的理由仅仅攻击了资本家阶级，而没有攻击土地所有者。在英国，资本家多半不是他的工厂所在的那块土地的所有者。

3. “劳动的解放要求把劳动资料提高为社会

①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这里是：“历史祸害”。——编者注

的公共财产，要求集体调节总劳动并公平分配劳动所得。”

“把劳动资料提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应当是说把它们“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这不过是顺便提一句罢了。

什么是“劳动所得”呢？是劳动的产品呢，还是产品的价值？如果是后者，那末，是产品的总价值呢，或者只是劳动新添加在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上的那部分价值？

“劳动所得”是拉萨尔为了代替明确的经济概念而提出的一个模糊观念。

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

难道资产者不是断定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权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地由经济关系产生出法权关系吗？难道各种社会主义宗派分子关于“公平的”分配不是有各种极为不同的观念吗？

为了弄清楚“公平的”分配一语在这里指什么东西，我们必须把第一段和本段对照一下。本段设想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劳动资料是公共财产，总劳动是由集体调节的”，而在第一段里我们则看到，“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

“属于社会一切成员”？也属于不劳动的成员吗？那么“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又在哪里呢？只属于社会中劳动的成员吗？那么社会一切成员的“平等的权利”又在哪里呢？

“社会一切成员”和“平等的权利”显然只是些空话。问题的实质在于：在这个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劳动者都应

当得到“不折不扣的”拉萨尔的“劳动所得”。

如果我们把“劳动所得”这个用语首先理解为劳动的产品，那末集体的劳动所得就是社会总产品。

现在从它里面应该扣除：

第一，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

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

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

从“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里扣除这些部分，在经济上是必要的，至于扣除多少，应当根据现有的资料和力量来确定，部分地应当根据概率论来确定，但是这些扣除根据公平原则无论如何是不能计算的。

剩下的总产品中的其他部分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

在把这部分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得从里面扣除：

第一，和生产没有关系^①的一般管理费用。

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极为显著地缩减，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

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

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显著增加，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

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

只有现在才谈得上纲领在拉萨尔的影响下偏狭地专门注

①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这里是：“没有直接关系”。——编者注

意的那种“分配”，就是说，才谈得上在集体中的个别生产者之间进行分配的那部分消费资料。

“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有折有扣的”了，虽然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福利。

正如“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一语消失了一样，“劳动所得”一语现在也在整个地消失。

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于是，“劳动所得”这个由于含意模糊就是现在也不能接受的用语，便失去了任何意义。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所有的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每一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会劳动日里的一分。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

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分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

显然，这里通行的就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环境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末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存在于**平均数中**，并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

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

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为了要使它能够成为一种尺度，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①不同

①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这里还有：“劳动者的”。——编者注

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① 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的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的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在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做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做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

^①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这里还有：“劳动者的”。——编者注

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我较为详细地一方面谈到“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另一方面谈到“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这是为了要指出：这些人犯了多么大的罪，他们一方面企图把那些在某个时期曾经有一些意思，而现在已变成陈词滥调的见解作为教条重新强加于我们党，另一方面又打算用民主主义者和法国社会主义者所惯用的关于权利等等的空洞的废话，来歪曲那些花费了很大力量才灌输给党而现在已在党内扎了根的现实主义观点。

除了上述的一切之外，把所谓分配看做事物的本质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

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就在于：物质的生产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的手中，而人民大众则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末自然而然地就要产生消费资料的现在这样的分配。如果物质的生产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末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既然真实的关系早已弄清楚了，为什么又要开倒车呢？

4. “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情，对它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

前一句是从国际章程的导言中抄来的，但是经过了“修订”。那里写道：“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自己的事情”，这里却说“工人阶级”应当解放——解放什么？——“劳动”。谁能了解，就让他去了解吧。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补偿，后一句却纯粹引用了拉萨尔的话：“对它（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组成反动的一帮。”

在《共产党宣言》里写道：“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衰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①

在这里，资产阶级作为大工业的体现者，对那些力求保持过时的生产方式所创造的一切社会阵地的封建主和中层等级说来，是被当做革命阶级看待的。所以他们并不是同资产阶级一起只组成反动的一帮。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说来是革命的，因为它本身是在大工业基地上成长起来的，它力求使生产摆脱资产阶级企图永远保存的资本主义性质。但是，《宣言》又补充说：

“中间等级……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

所以，从这个观点看来，说什么对工人阶级说来，中间等级“同资产阶级一起”并且加上封建主“只组成反动的一帮”，这也是荒谬的。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61页。——编者注

难道在最近这次选举¹¹中有人向手工业者、小工业家等等以及农民宣布说：“对我们说来，你们同资产者和封建主一起只组成反动的一帮”吗？

拉萨尔熟知《共产党宣言》，就像他的信徒熟知他写的福音书一样。他这样粗暴地歪曲《宣言》，不过是为了粉饰他同专制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这些敌人结成的反资产阶级联盟。

此外，在上面这一段里他的格言是勉强被塞进去的，它同那句从国际章程中摘来但被歪曲了的引语毫不相干。这纯粹是一种狂妄无耻的做法，这种做法当然绝对不是俾斯麦先生所不喜欢的，这是柏林的马拉¹²所干出来的廉价的无耻行径之一。

5.“工人阶级为了本身的解放，首先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同时意识到，它的为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所共有的那种意图必然导致的结果，将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

同《共产党宣言》和先前的一切社会主义相反，拉萨尔以最狭隘的民族观点来对待工人运动。有人竟在这方面追随他，而且这是在国际的活动以后！

为了能够进行斗争，工人阶级必须在国内组成为一个阶级，而且它的直接的斗争舞台就是本国，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它的阶级斗争不是就内容来说，而是像《共产党宣言》所指出“就形式来说”是本国范围内的斗争。但是，“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例如德意志帝国，本身在经济上又处在“世界市场的范围内”，而在政治上则处在“国家体系的范围内”。

任何一个商人都知道，德国的贸易同时就是对外贸易，而俾斯麦先生的伟大恰好在于他实行一种国际的政策。

而德国工人党把自己的国际主义归结为什么呢？就是意识到它的意图所导致的结果将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这句话是从资产阶级的和平和自由同盟¹³那里抄来的，它应当被当做各国工人阶级在反对各国统治阶级及其政府的共同斗争中的国际兄弟联合的等价物。这样，关于德国工人阶级的国际职责连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德国工人阶级就应当这样对付本国的、为反对工人阶级而已经同其他一切国家的资产者紧密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和俾斯麦先生的国际阴谋政策¹⁴！

实际上，这个纲领的国际主义，比那个自由贸易派的国际主义还差得难以估量。自由贸易派也说，它的意图所导致的结果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但是它还做一些事使贸易成为国际性的，而决不满足于一切民族各自在本国内从事贸易的意识。

各国工人阶级的国际活动绝对不依赖于“国际工人协会”的存在。“国际工人协会”只是要为这种活动创立一个中央机关的第一个尝试；这种尝试由于它所产生的推动力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成绩，但是在巴黎公社失败之后，已经不能再以它的第一个历史形态继续下去了。

俾斯麦的《北德报》为了取悦于自己的主人，宣称德国工人党在新纲领中放弃了国际主义，它的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¹⁵。

二

“德国工人党从这些原则出发，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争取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废除工资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和——任何形式的剥削，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

关于“自由”国家，我以后再讲。

这样，德国工人党将来就不得不相信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¹⁶了！为了不让它埋没掉，竟胡说什么“废除工资制度（应当说：雇佣劳动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如果我废除了雇佣劳动，那末我当然也废除了它的规律，不管这些规律是“铁的”还是海绵的。但是拉萨尔反对雇佣劳动的斗争几乎只是绕着这个所谓规律兜圈子。所以，为了证明拉萨尔派已经获得胜利，“工资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都应当被废除掉，而不是不连同后者。

大家知道，在“铁的工资规律”中，除了从歌德的“永恒的、铁的、伟大的规律”¹⁷中抄来的“铁的”这个词以外，没有一样东西是拉萨尔的。“铁的”这个词是虔诚的信徒们借以互相识别的一个标记。但是，如果我接受带有拉萨尔印记因而是拉萨尔意义下的规律，那末我就不得不连同他的论据一块接受下来。这个论据是什么呢？正如朗格在拉萨尔死后不久的言行所表明的，这就是（朗格自己宣扬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¹⁸。但是，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那末，我即使把雇佣劳动废除了一百次，也还废除不了这个规律，因为在这

种情况下，这个规律不仅支配着雇佣劳动制度，而且支配着一切社会制度。经济学家们五十多年以来正是以此为根据证明社会主义不能消除**自然本身造成**的贫困，而只能使它**普遍化**，使它同时分布在社会的整个表面上！

但是，这一切都不是主要的。**完全撇开**拉萨尔对这个规律的**错误了解**不谈，真正令人气愤的退步是在于：

自从拉萨尔死后，在我们党内，这样一种科学见解已经给自己开辟了道路，这就是**工资不是它表面上呈现的那种东西，不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而只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掩蔽形式**。这样，过去关于工资的全部资产阶级见解以及对这种见解的全部批评都被彻底推翻了，并且弄清了：雇佣工人只有为资本家（因而也为他们的剩余价值的分享者）白白地劳动一定的时间，才被允许为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劳动，就是说，才被允许生存；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中心问题就在于：用延长劳动日的办法，或者用提高生产率、从而使劳动力更加紧张的办法等等，来增加这个无偿劳动；因此，雇佣劳动制度是奴隶制度，而且社会劳动生产力愈发展，这种奴隶制度就愈残酷，不管工人得到的报酬较好或是较坏。而现在，当这个见解已经在我们党内愈来愈给自己开辟出道路的时候，竟有人倒退到拉萨尔的教条那里去，虽然他们应当知道，拉萨尔并不懂得什么是工资，而是跟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外表当做事物的本质。

这正像奴隶们最终发现了自己处于奴隶地位的秘密而举行起义时，其中有一个为陈旧观点所束缚的奴隶竟要在起义的纲领上写道：奴隶制度必须废除，因为在奴隶制度下，奴

隶的给养最大限度不能超过一定的、非常低的标准！

我们党的代表们对这个在党员群众中广泛传播的见解竟能进行这样惊人的侵犯，仅仅这一件事实岂不就证明了他们在草拟妥协的纲领时轻率得多么令人不能容忍，多么缺乏责任感！

本段末尾“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这一不明确的语句，应当改成：随着阶级差别的消灭，一切由此差别产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就自行消失。

三

“为了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德国工人党要求在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下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无论在工业中，或是在农业中，生产合作社都必须普遍建立起来，以便从它们里面产生出调节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组织。”

在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之后，就是这个先知提出的救世良方。这里“道路开辟”得确实不错。现存的阶级斗争被换上了拙劣的报刊作家的空话：需要“开辟道路”来“解决”的“社会问题”。 “调节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组织”不是从社会的革命转变过程中，而是从国家给予生产合作社的“国家帮助”中“产生出来”，并且这些生产合作社是由国家而不是由工人“建立起来”的。这真不愧为拉萨尔的幻想：靠国家贷款能够建设一个新社会，就像能够建设一条新

铁路一样！

由于还知道点羞耻，于是就把“国家帮助”置于……“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之下。

第一，德国的“劳动人民”大多数是农民而不是无产者。

第二，“民主的”这个词在德文里意思是“人民当权的”。什么是“劳动人民的人民当权的监督呢”？何况所说的是这样的劳动人民，他们通过向国家提出的这些要求表明他们充分意识到自己既没有当权，也没有成熟到当权的程度！

在这里详细批评毕舍在路易一菲力浦时代为了对付法国社会主义者而开列并由“工场”¹⁹派的反动工人所采用的药方，那是多余的。主要的过失不在于把这个特殊的万灵药方写入了纲领，而在于从阶级运动的立场完全退到宗派运动的立场。

如果工人们力求在社会的范围内，首先是在本民族的范围内建立集体生产的条件，这只是表明，他们在争取变革现在的生产条件，而这同靠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社毫无共同之处。至于现存的合作社，那末只有它们是工人自己独立创设的，既不受政府的保护，也不受资产者的保护，才是可贵的。

四

现在我们来谈民主的一节。

A. “国家的自由基础”。

首先，照第二节的说法，德国工人党力求争取“自由国家”。

自由国家是个什么东西呢？

使国家变成“自由的”，这决不是已经摆脱了狭隘的奴才思想的工人的目的。在德意志帝国，“国家”差不多是和在俄国一样地“自由”。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

德国工人党——至少是当它接受了这个纲领的时候——表明：它对社会主义思想领会得多么肤浅；它不把现存社会（对任何未来的社会也是一样）当做现存国家的**基础**（或者不把未来社会当做未来国家的基础），反而把国家当做一种具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础”的独立本质。

而且在纲领中还荒谬地滥用了“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等字眼，甚至更荒谬地误解了向之提出自己要求的那个国家！

“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发展了。“现代国家”却各不相同。它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同在瑞士不一样，在英国同在美国不一样。所以，“现代国家”是一种虚构。

但是，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的国家，不管它们的形

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筑在资本主义多少已经发展了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具有某些极重要的共同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谈“现代国家制度”，而未来就不同了，到那时“现代国家制度”现在的根基即资产阶级社会已经消亡了。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代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否则，即使你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名词联接一千次，也丝毫不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但是，这个纲领既没谈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也没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

纲领的政治要求除了陈旧的^①、人所共知的民主主义的废话，如普选权、直接立法权、人民权利、人民军队等等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内容。这纯粹是资产阶级的人民党、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回声。所有这些要求凡不属于空想的，都已经实现了。不过实现了这些要求的国家不是在德意志帝国境内，而是在瑞士、美国等等。这类“未来的国家”就是现代的国家，虽然它是存在于德意志帝国的“范围”以外。

但是他们忘记了一点。既然德国工人党明确地声明，它

①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没有：陈旧的。——编者注

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内，就是说，是在自己的国家即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内进行活动，——否则，它的大部分要求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人们只要求他们所没有的东西——那末，它就不应该忘记主要的一点，这就是这一切美丽的东西都建立在承认所谓人民主权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只有在民主共国内才是适宜的。

既然他们没有勇气^①——而这是明智的，因为形势要求小心谨慎——像法国工人纲领在路易-菲力浦和路易-拿破仑时代那样要求民主共和国，那就不应当采取这个既不“诚实”²⁰也不体面的手法：居然向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要求只有在民主共和国里才有意义的东西，并且还庄严地向这个国家保证：他们认为能够用“合法手段”争得这类东西！

庸俗的民主派把民主共和国看做千年王国，他们完全没有想到，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最后的国家形式里阶级斗争要进行最后的决战，——就连这样的庸俗的民主派也比这种局限于为警察所容许而为逻辑所不容许的范围内的民主主义高明得多。

事实上，他们是把“国家”了解为政府机器，或者了解为构成一个由于分工而和社会分离的独特机体的国家，这可以从下面的话得到证明：“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经济基础：实行统一的累进所得税……”。赋税是政府

①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这里有一个脚注：“1891年版是：既然他们不能”。——编者注

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在存在于瑞士的“未来国家”里，这种要求差不多已经实现了。所得税是以不同社会阶级的不同收入来源为前提，就是说，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前提。所以，利物浦的财政改革派——以格莱斯顿的弟弟为首的资产者们——提出和这个纲领相同的要求，这是不足为奇的。

B. 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基础：

1. 通过国家去实施普遍的和平等的国民教育。
实施普遍的义务教育。实施免费教育。”

平等的国民教育？他们怎样理解这句话呢？是不是以为在现代社会里（而所谈到的只能是现代社会）教育对一切阶级都可能是平等的呢？或者是要求上层阶级也被迫降到很低的教育水平——国民小学，即降到不仅唯一适合于雇佣工人的经济状况、而且唯一适合于农民的经济状况的教育水平呢？

“实施普遍的义务教育。实施免费教育”。前者甚至存在于德国，后者就国民小学来说存在于瑞士和美国。如果说，在美国的几个州里，高等学校也是“免费的”，那末，事实上这不过是从总税收中替上层阶级支付了教育费用而已。顺便指出，A. 项第5条所要求的“免费诉讼”也是如此。刑事诉讼到处都是免费的；而民事诉讼几乎只涉及财产纠纷，因而几乎只和有产阶级有关。难道它们应当用人民的金钱来打官司吗？

在关于学校的一段里，和国民小学一起至少还应当提出技术学校（理论的和实践的）。

“通过国家来实施国民教育”是完全要不得的。用一般的法律来确定国民小学的经费、教员的资格、学习的科目等等，并且像美国那样通过国家视察员来监督这些法律规定的实施，这和指定国家为人民的教育者完全是两回事！相反地，应该使政府和教会一样地对学校不起任何影响。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内（他们会说，他们谈的是“未来的国家”，但是这种空洞的遁辞在这里也无济于事，——我们已经看到，在这方面是怎样一回事了），倒是国家需要从人民方面受到严格的教育。

但是整个纲领，尽管满是民主的喧嚣，却彻头彻尾地感染了拉萨尔派的对国家的忠顺信仰，或者说感染了并不比前者好一些的对民主奇迹的信仰，或者说得更正确些，它是这两种同样背离社会主义的对奇迹的信仰的妥协。

“科学自由”——普鲁士宪法中有一条就是这样写的。为什么把它写在这里呢？

“信仰自由”！如果现在，在进行“文化斗争”²¹的时候，要想提醒自由主义者记住他们的旧口号，那末只有采用下面这样的形式才能做到这一点：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宗教需要，就像实现自己的肉体需要一样^①，不受警察干涉。但是工人党本来应当乘此机会说出自己的看法：资产阶级的“信仰自由”不过是容忍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自由而已，而工人党却力求把信仰从宗教的妖术中解放出来。但是他们不愿越过“资产阶级的”水平。

①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这里有一个脚注：“1891年版是：实现自己的宗教需要……”。——编者注

现在我就要讲完了，因为纲领中接下去的部分在里面并不是主要的。所以我在这里只简单地谈一谈。

2. “正常的劳动日。”

其他任何国家的工人党都没有局限于这种含糊的要求，而总是明确地指出，在当前条件下多长的劳动日是正常的。

3. “限制妇女劳动和禁止童工。”

如果限制妇女劳动指的是劳动日的长短和工间休息等等，那末劳动日的正常化就应当已经包括了这个问题；否则，限制妇女劳动只能意味着在那些对妇女身体特别有害或者对女性不道德的劳动部门中禁止妇女劳动。如果指的就是这点，那就应当加以说明。

“**禁止童工**”！这里绝对必须指出**年龄界限**。

普遍禁止童工是和大工业的存在不相容的，所以这是空洞的虔诚的愿望。

实行这一措施——如果可能的话——是反动的，因为在按照各种年龄严格调节劳动时间并采取其他保护儿童的预防措施的条件下，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

4. “对工厂工业、作坊工业和家庭工业实行国家监督。”

在普鲁士德意志这样一个国家里，应该明确地要求，工厂视察员只有经过法庭才能撤换；每个工人都可以向法庭告发视察员的失职行为；视察员必须是医生出身。

5. “调整监狱劳动。”

在一个一般的工人纲领里面，这是一种微不足道的要求。无论如何应该明白说出，工人们完全不愿意由于担心竞争而让一般犯人受到牲畜一样的待遇，特别是不愿意使他们失掉改过自新的唯一手段即生产劳动。这是应当期望于社会主义者的最低限度的东西。

6. “有效的责任法。”

应该说明，“有效的”责任法是指什么东西。

顺便指出，在关于正常劳动日的一条中，忽略了工厂立法中关于卫生设施和安全措施等等那一部分。只有当这些规定遭到破坏时，责任法才发生效力。

总之，这一部分也是写得很草率的。

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写于 1875 年 4 月—5 月初

原文是德文

摘要载于 1890—1891 年《新时代》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杂志第 1 卷第 18 期

第 19 卷第 15—35 页

注 释

1 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是对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的典范。这一著作于 1875 年 4—5 月初写成并于 1875 年 5 月 5 日寄给了爱森纳赫派的领导（给威·白拉克）。它包含了对将要合并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草案的批评意见，这些意见是为在哥达举行的合并大会而准备的。

《哥达纲领批判》是恩格斯于 1891 年不顾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领导的反对而首先发表的。它当时刊登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 1890—1891 年第 1 卷第 18 期上，并附有恩格斯的序言。

恩格斯在发表《哥达纲领批判》的同时，也一起发表了直接同它有关的马克思在 1875 年 5 月 5 日给威·白拉克的信。

正如大家从恩格斯 1891 年 2 月 23 日给卡·考茨基的信中所知道的，在发表《哥达纲领批判》时，恩格斯不得不同意缓和某些最尖锐的地方。收在本卷中的这一文件同马克思的手稿完全一致。

2 在哥达代表大会上（1875 年 5 月 22—27 日），德国当时存在的两个工人组织——由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于 1869 年在爱森纳赫建立的并由他们领导的社会民主工党（所谓爱森纳赫派 和由哈森克莱维尔哈赛尔曼和特耳克领导的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一合并成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3 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在反社会党人法取消后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于 1890 年 10 月 16 日根据哥达纲领要起草人威廉·李卜克内西的提议，决定起草一个新纲领草案，提交下届党代表大会讨论这个新纲领于 1891 年 10 月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被通过，一般称为爱尔福特纲领。

4 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于 1872 年 9 月 2—7 日举行。和过去历次代表大会相比，海牙代表大会按其组成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大会。出席这

次代表大会的有代表十五个全国性组织的六十五名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领导了这次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们多年来为反对工人运动中的各种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而进行的斗争胜利结束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分裂活动受到谴责，他们的领导者巴枯宁等被开除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将来建立各国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奠定了基础。

5 1869 年 8 月 7-9 日在爱森纳赫举行了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社会民主党人的全德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即后来大家熟悉的爱森纳赫党。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即爱森纳赫纲领，总的来说，保持了国际的各项要求的精神。

6 德国人民党 成立于 1865 年，由主要是德国南部各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德国人民党反对确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这个党执行反普鲁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号，同时也反映了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义意图。它宣传建立联邦制的德国的思想，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

1866 年，以工人为基本核心的萨克森人民党并入德国人民党。人民党的这支左翼，除了反普鲁士的情绪和力求共同努力以民主方法解决国家的全民族的统一问题之外，在实质上与原来的德国人民党毫无共同之点，以后它就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后来该党的基本成员脱离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于 1869 年 8 月参加了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工作。

6 指巴枯宁在他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所说的话，该书第一卷于 1873 年在瑞士出版。马克思在自己作的巴枯宁这本书的摘要中揭露了巴枯宁提出的责难是毫无根据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655—708 页）。

8 指马克思亲自校订的《资本论》第一卷的法文译本，这一译本于 1872 — 1875 年在巴黎分册出版。

- 9 《人民国家报》出版社是社会民主工党的出版社，它附属于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编辑部。
- 10 指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 卷第 457 — 536 页）的第二版，它是由《人民国家报》出版社于 1875 年在莱比锡出版的。
- 11 指 1874 年 1 月 10 日的帝国国会选举。
- 12 马克思在这里大概是把《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主编哈赛尔讽刺地称为马拉。
《新社会民主党人报》（*Neuer Sozial-Demokrat*）是 1871 年至 1876 年在柏林每周出版三次的德文报纸，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该报的方针完全反映了拉萨尔派所执行的迎合俾斯麦制度和巴结德国统治阶级的政策，反映了拉萨尔派领导人的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该报站在宗派主义的立场上，一贯反对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支持巴枯宁分子和其他反无产阶级流派的人们所进行的仇视总委员会的活动。
- 13 和平和自由同盟是由一批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维·雨果朱·加里波第等人曾积极参加）于 1867 年在瑞士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组织，1867—1868 年米·巴枯宁参加了同盟的工作。起初，同盟在巴枯宁的影响下企图利用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协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和平和自由同盟曾声称通过建立“欧洲联邦”可以消除战争，以此在群众中散布荒谬的幻想，诱使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
- 14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在 1871—1872 年，斯麦企图同奥地利和俄国签订一个正式协定，目的是要共同迫害革命运动，特别是第一国际。1873 年 10 月，根据俾斯麦的倡议，缔结了所谓三国同盟，即德国、俄国和奥匈帝国三国政府之间一旦发生“欧洲动荡”采取共同行动的协定。
- 15 马克思指的是 1875 年 3 月 20 日《北德总汇报》就德国社会民党的领草

案发表的一篇社论；社论指出，“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在某些方面变得比较谨慎了；它在背弃国际”。

《北德总汇报》(《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是德国保守派的日报，十九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是俾斯麦政府的半官方报纸1861年至1918年在柏林出版。

- 16 拉萨尔对他的“铁的工资规律”作了如下的表述“这个在现今的关系之下，在劳动的供求的支配之下，决定着工资的铁的经济规律是这样的平均工资始终停留在一国人民为维持生存和繁殖后代按照习惯所要求的必要的生活水平上。”

这是这样的一个中心点：实际日工资总是在它周围摆动，既不能长久地高于它，也不能长久地低于它。实际的日工资不能长期地高于这个平均数，因为，否则就会由于工人状况的改善而发生工人人口从而人手供应的增加，结果又会把工资压低到原来的或者低于原来的水平。

工资也不可能长期地大大低于这个必要的生活水平。因为，那时就会发生人口外流、独身生活、节制生育，以至最后由于贫困而造成工人人数减少等现象，这样，就会使工人手的供应短缺，从而使工资重新回到它原来的较高的水平。因此，实际的平均工资处于运动之中，始终围绕着它这个重心上下摆动，时而高些，时而低些。”(见《工人读本，拉萨尔1863年5月17和19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演讲》1887年霍廷根—苏黎世版)

拉萨尔最初是在《就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给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1863年黎世版第15—16页)中论述这个“规律”的。

- 17 引自歌德的诗《神圣的》。

- 18 指弗·阿·朗格在其著作《工人问题对现在和将来意义》1865年杜伊斯堡版第144—161、180页(《Die Arbeiterfrage in ihrer Bedeutung fur Gegenwart und Zukunft》. Duisburg, 1865, S. 144—161, 180)上所发表的言论。

- 19 “工场”（《*L' Atelier*》）是一种法文月刊，受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手工业者和工人的刊物，1840 年至 1850 年在巴黎出版，编辑部由工人代表组成，每三月改选一次。
- 20 人们把爱森纳赫派称为“诚实的人”。
- 21 “文化斗争”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给俾斯麦政府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采取的一套法律措施所起的名称。这套措施是在为世俗文化而斗争的幌子下实行的，其目的是反对天主教，反对支持德国西南部中小各邦的官吏、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分裂主义和反普鲁士倾向的“中央”党。在八十年代，俾斯麦为了纠集反动力量把这些措施中的大部分取消了。

马克思

工资、价格和利润¹

几点说明

公民们！

在没有谈到本题之前，请允许我先作几点说明。

目前大陆上正流行着一种真正的罢工流行病，增加工资的要求已成为普遍的要求。这个问题将要在我们的大会上提出讨论^①。你们是国际协会的领导，对这个极重要的问题应当有确定的见解。因此，我认为有责任把这个问题彻底分析一下，即使这样做会冒着使你们很不耐烦的危险。

我要先说明的第二点，是关于公民韦斯顿的。他不仅向你们说明了他分明知道是极不受工人阶级欢迎的观点，而且公开为这些观点进行辩护，并且认为这样做对工人阶级有利。他所表现的这种道义上的勇气，是我们每个人都应深表尊敬的。虽然我这篇报告措词激烈，但我希望，在这报告结束后公民韦斯顿会发觉到，我同意据我看来是构成他的论纲基础的那种思想，不过我认为他的论纲就其现有的形式来讲，在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82—583页。——编者注

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实践中是危险的。

现在我就来谈我们所关心的问题。

1. 生产和工资

公民韦斯顿的论证，实际上是根据两个前提：

(1) 国民产品量是一种不变的东西，或者像数学家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常量或常数；

(2) 实际工资总额，即依能够用以购买的商品的数量来测定的工资总额，是一个不变额，一个常数。

他的前一个论断显然是错误的。你们可以看到，产品的价值和数量在逐年增加，国民劳动的生产力在逐年扩大，而用来流通这种日益增加的产品所必需的货币数量也不断地发生变化。凡是对全年来说或对各年相互比较的年度来说是正确的，对一年中的每一天平均来说也是正确的。国民产品的数或量总是不断地发生变化。这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变数，并且即令把人口数方面的变化撇开不说，它也由于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力方面的不断变化而必然是一个变数。如果一旦发生了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那末，这种提高本身，无论其后果如何，决不会直接引起产品量的变化，这点是完全正确的。这种提高最初会是在当时现实情况的基础上发生的。但是，如果说在工资提高之前国民产品是一个变数而不是一个常数，那末，在工资提高之后，它仍然是一个变数而不是一个常数。

但是，就假定国民产品量不是一个变数，而是一个常数

吧。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朋友韦斯顿所当做逻辑结论的东西也仍然只是一种武断。如果我们有一个假定为 8 的定数，那末这个数的绝对界限并不妨碍它的各部分改变其相对界限。如果利润为 6，工资为 2，那末工资也可以增加至 6，利润减少至 2，而总数仍然是 8。因此，产品量不变的事实，无论如何也不能证明工资总额也应该是不变的。那末，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究竟怎样证明工资总额是一成不变的呢？他不过是断定如此罢了。

但是，即使是同意他的这个论断，那这个论断也应当在两方面都适用，然而公民韦斯顿却使它只适用于一方面。如果工资总额是一个常数，那末，它就既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因此，如果说工人争取暂时增加工资的做法是愚蠢的，那末资本家争取暂时降低工资的做法也是愚蠢的。我们的朋友韦斯顿并不否认，工人在一定的情况下能够迫使资本家增加工资；但是，由于他觉得工资总额是天然的常数，所以在在他看来，工资增加之后，必然接着有一个反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他又知道资本家能够强使工资降低，并且资本家确实是经常企图这样做。依照工资不变的原则，在这种场合，也应当像在前一种场合一样，接着来一个反作用。因此，工人对降低工资的企图或对事实上已把工资降低的现象进行反抗，是做得正确的。所以，他们力求增加工资，也是做得正确的，因为任何一种反抗降低工资的行动都是一种争取增加工资的行动。因此，依照公民韦斯顿自己提出的工资不变原则，工人也应当在一定情况下联合起来，为增加工资而斗争。

如果公民韦斯顿否认这个结论，他就必须放弃这个结论

所据以产生的那个前提。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应该说工资总额是一个常数，而应该说工资总额虽然不可能并且不应该提高，但在资本想要把它减少时，它就可能并且应该降低。如果资本家不愿意用肉而用马铃薯，不愿意用小麦而用燕麦来养活你们，你们也必须把他的意志看做政治经济学的规律而唯命是从。如果一个国家的工资水平比另一个国家的高，例如美国比英国高，那末，你们就应当以美国资本家和英国资本家愿望的不同来解释这种工资水平的不同。这种方法自然不仅会使研究经济现象的工作异常简化，而且也会使研究其他一切现象的工作都极其简化了。

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可以问：为什么美国资本家的愿望同英国资本家的愿望不一样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超出愿望的范围。牧师可以说：上帝愿意法国是一个样，而愿意英国是另一个样。如果我要求他向我说明为什么有这种愿望的两重性，他会厚颜无耻地回答说，上帝高兴在法国抱一种愿望，在英国抱另一种愿望。但是，我们的朋友韦斯顿当然不会去作这种完全否定一切合理推论的论证。

诚然，资本家是愿意获取尽量多的东西的。但是，我们的任务不是要谈论他的愿望，而是要研究他的力量，研究这种力量的界限以及这些界限的性质。

2. 生产、工资、利润

公民韦斯顿向我们所做的报告的内容，可以装进一颗核

桃壳。

他的全部推论可以归结如下：如果工人阶级强迫资本家阶级以货币工资形式付给他的是 5 先令，而不是 4 先令，那末，资本家以商品形式归还给工人的就会是价值 4 先令的东西，而不是价值 5 先令的东西。在这种情形下，工人阶级在工资增加之前用 4 先令所能买到的东西，现在就不得不用 5 先令去买了。但是，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形呢？为什么资本家卖价值 4 先令的商品时索取 5 先令呢？因为工资额是不变的。但是为什么工资额是由价值 4 先令的商品来决定呢？为什么不是由价值 3 先令或 2 先令，或其他数目的商品来决定呢，如果工资额的界限是由一种既不依资本家的意志又不依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规律来决定，那末，公民韦斯顿就应当首先阐述这一规律，并证明这一规律。其次，他还应当证明，在每一定的时期内，实际上所支付的工资额，总是完全符合于必要的工资额而始终没有出入。另一方面，如果工资额的一定界限只是取决于资本家的意志或其贪欲的界限，那末，这种界限就是随意的，没有什么必要性，它们可以依照资本家的意志而改变，因此也可以违反他的意志而改变。

公民韦斯顿用下面的例子来说明他的理论。他说，如果一个盆盛着一定量的汤，供给一定数量的人分食，那末，这一定量的汤决不会因为汤匙子的增大而增多起来。我觉得这个例子实在有点庸俗^②。这个例子颇使我想起梅涅尼·阿格

② 双关语：“匙子”的原文是《spoon》，也有“笨汉”的意思：“庸俗”的原文是《spoony》，是《spoon》的形容词，也有“愚蠢”的意思。——编者注

利巴用过的一个比喻。当罗马平民起来反对罗马贵族时，贵族阿格利巴对他们说，贵族的肚子养活着国家躯体上的平民的四肢。但是，阿格利巴没有能够证明，用食物填满一个人的肚子就可以养活另一个人的四肢。公民韦斯顿则忘记了，在工人从其中取汤喝的盆里盛着国民劳动的全部产品，妨碍他们从汤盆里取出较多汤来喝的，并不是汤盆容量狭小，也不是汤盆里盛的东西少，而只是他们的汤匙子太小了。

资本家是用什么诡计来把价值 4 先令的东西卖 5 先令的呢？就是靠抬高他所出卖的商品的价格的办法。但是商品价格的提高或者——更广泛些说——商品价格的变动，以及商品价格本身，是否仅仅取决于资本家的意志呢？或者相反，为了实现这个意志还需要有一定的条件呢？如果不需要这些条件，那末市场价格的涨落及其不断的变动，就成为一个不可解答的哑谜了。

既然我们假定，无论在劳动生产力中，无论在所使用的资本和劳动的数量中，亦无论在用来估量产品价值的货币价值中，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而发生了**变化的只是工资水平**，那末这种**工资的提高**怎样能够影响到商品的价格呢？它影响到商品的价格，仅仅是因为它影响这些商品的实际供求关系。

工人阶级，就其全体来说，把自己的收入耗费在并且不得不耗费在购买日用必需品上，这完全是确实的。所以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总要引起对日用必需品的需求的提高，从而引起日用必需品市场价格的提高。对于生产这些必需品的资本家说来，他们所支付的工资提高了，他们就靠提高他们的商品的市场价格来求得补偿。但是那些不生产日用必需品的

资本家又怎样呢？不要以为这种资本家的人数很少。你们如果注意到国民产品的三分之二是由五分之一的人口所消费，——而有一个下院议员不久前甚至断言这部分产品只由七分之一的人口所消费，——那你们就会知道，该有多么巨大的一部分国民产品要作为奢侈品来生产或用来交换奢侈品，该有多么大量的日用必需品要浪费在豢养仆役、马匹、猫等等上面；我们凭经验知道，这种浪费在日用必需品价格提高时总是要大大受到限制的。

那末，不生产日用必需品的那些资本家所处的境况究竟会怎样呢？他们不可能用抬高自己商品价格的办法来补偿因普遍增加工资而引起的利润率下降，因为对这些商品的需求不会增加起来。他们的收入会减少，并且他们还不免要从这种业已减少的收入中支付更多的钱去买同样数量的涨了价的日用必需品。不仅如此。由于他们的收入减少，他们还不得不缩减用于奢侈品的支出，因此他们彼此间对于他们自己商品的需求也要缩减。由于需求额的这样缩减，他们所出产的商品的价格就要降低。所以，这些工业部门中的利润率的下降，不仅是由于工资水平普遍提高的影响，而且是由于工资普遍提高、必需品价格上升和奢侈品价格下降的共同作用的影响。

那末，投在各个不同工业部门中的资本的这种利润率上的差别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当然，其后果也同各个生产部门中的平均利润率因某种原因而产生差别时一样。资本和劳动就会从获利较少的部门转移到获利较多的部门中去，而资本和劳动的这种转移过程，一直要继续到一些工业部门中

的供给量增加到符合于增长了的需求量，而其他工业部门中的供给量缩减到符合于缩减了的需求量时才会停止下来。只有经过这种变化，各个不同的工业部门中的利润率才会重新趋于平衡。既然所有这种转移的发生，最初只是起因于各种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动，那末，当这个原因一旦消失之后，这个原因所发生的作用也就会停止，价格就要回复到原来的水平和平衡状态。因工资提高而引起的利润率的下降，决不会局限于单个的工业部门，而会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按照我们的假定，劳动生产力没有变化，产品总量也没有变化，而有所变化的是这一定量产品的形式。现在大部分产品将以日用必需品的形式存在，小部分产品将以奢侈品的形式存在，或者——实际上结果是一样——小部分产品用来交换外国奢侈品，并以其原来的形式消费掉！或者——实际上结果也还是一样——大部分本国产品不是用去交换外国奢侈品，而是用去交换外国日用必需品。因此，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在市场价格暂时混乱之后只会引起利润率的普遍下降，不会引起商品价格稍许长期的变动。

如果说有人问，我在上述论证中是从假定全部工资增加数都用于日用必需品这点出发，那末我就会回答说，我作的这个假定最有利于公民韦斯顿的观点。如果工资增加数是花费在从前不属于工人消费范围的物品上面，那末，工人购买力的实际提高就会无需乎证明了。可是，既然他们购买力的这种提高仅仅是工资增加的结果，那末，这种提高的限度就应当恰巧符合于资本家购买力降低的限度。因此，对商品需求的总量不会增加，而可能有所变更的是这种需求的各个构成

部分。一方需求的增加会由另一方需求的减少来抵消。既然总的需求量因此仍旧不变，那末商品的市场价格也不会有任何的变动。

这样，我们就要从两种情况中作出选择：或者是工资增加数均等地耗费于一切消费品，这样，工人阶级方面的需求的扩大就要由资本家阶级方面的需求的缩小来抵偿；或者是工资增加数只耗费于某几种市场价格暂时上涨的物品，这样，由此而引起的某些工业部门中的利润率的上升，以及与之相应的其他某些工业部门中的利润率的下降，就会引起资本和劳动分配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必将继续下去，直到一些工业部门中的供给量增加到符合于增长了的需求量，而另一些工业部门的供给量降低到符合于减少了的需求量时为止。在前一种假定下，商品的价格不会发生任何变动；在后一种假定下，商品的交换价值经过市场价格的某些变动之后，又会降低到原先的水平。在前后两种假定下，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除了引起利润率的普遍下降之外，终归不会引起任何别的后果。

公民韦斯顿为了推动你们的想像力，就建议你们想一想英国农业工人的工资普遍从 9 先令增加到 18 先令时所要引起的种种困难。他高喊道，你们只要想一想对日用必需品的需求的大量增加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日用必需品价格的惊人上涨的情景吧。但是，你们都知道，美国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比英国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资多一倍以上，虽然美国农产品的价格比英国低，虽然美国的劳动与资本的整个关系同英国一样，虽然美国产品的年产量比英国少得多。我们的朋友为什

么要敲警钟呢？只不过是为了要回避真正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罢了。工资忽然从 9 先令增加到了 18 先令，就是说工资忽然增加了百分之百。不过，我们现在决不是要讨论英国普遍的工资水平能不能突然提高百分之百的问题。我们根本用不着去谈论工资提高的数量，因为在每一个具体场合下，工资提高的数量都要以一定的情况为转移，并且要适应于这种情况。我们只是要弄清楚这样一个问题，即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即使不超过百分之一，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总之，我把我们的朋友韦斯顿关于工资提高百分之百的幻想撇开不谈，而请你们注意英国在 1849 年至 1859 年时期内确实有过的工资提高的情形。

你们都知道，1848 年实行了十小时工作日法令，或者说得更正确点，十小时半工作日法令。这是我们亲眼见过的极大的经济改革之一。实行这一法令，意味着并不是在某些地方性的企业中，而是在英国赖以统治世界市场的主要工业部门中突然和强制地提高工资。这是在特别不利的情况下提高工资。尤尔博士、西尼耳教授以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其他所有的官方代表都曾证明说——而且我应该指出，他们所根据的理由远胜过我们的朋友韦斯顿——这一法令是为英国工业敲丧钟。他们证明说，这里问题不在于简单的工资增加，而在于工资的这种增加起因于所使用的劳动量的减少并且以这种减少为基础。他们断言，人们想从资本家手里夺去的第十二小时，正好是资本家赖以获得利润的唯一的一个小时。他们危言耸听，说这会使积累减少，价格提高，市场丧失，生产缩小，从而会引起工资降低，弄得彻底破产。他们甚至声

称，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的最大限度法令²与这个法令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是说得有理。但是，结果怎样呢？结果是：工作日虽然缩短了，工厂工人所领的货币工资却提高了；工厂中的在业工人数目大大增加了；工厂产品的价格不断地降低了；工厂工人的劳动生产力惊人地发展了；工厂产品的销售市场空前地日益扩大了。1861年在曼彻斯特科学促进协会的会议上，我亲自听到纽曼先生承认说，他本人、尤尔博士、西尼耳以及经济科学的其他所有的官方代表都错了，而人民的直觉是正确的。我所说的不是弗兰西斯·纽曼教授，而是威廉·纽曼先生³，他在经济科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他是托马斯·图克先生的《价格史》一书的合著者和出版者，这是一部追溯了1793年至1856年的价格史的佳作¹²³。如果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的固定不变的观念，即关于不变的工资总额，不变的产品量，不变的劳动生产力水平，不变的资本家的意志，以及他的其他各种固定不变论和最终完成论都是正确的话，那末西尼耳教授的悲观的预言也将是正确的，而罗伯特·欧文却是不正确的了，欧文早在1815年便已宣布说，普遍限制工作日是解放工人阶级的第一个准备步骤⁴，并且他不惜违反一般人的成见，独自在自己开办于新拉纳克的棉织工厂里真正实行了这种限制工作日的办法。

在十小时法令颁布实行并从而引起工资提高的时候，大不列颠农业工人的工资也由于某些不必在此列举的原因而有过普遍的提高。

为了使你们不致发生误会，我要在这里预先说明几句，

虽然这样做对于我的直接目的并没有什么必要。

如果一个人每星期的工资是 2 先令，后来他的工资提高到 4 先令，那末工资水平就提高了 100%。若从工资水平提高的观点来看工资的这种提高，那末这种提高可以说是很大的，但工资的实际数额——每星期 4 先令——仍然是极其微小而不能糊口的一种施舍。所以不应当为工资水平提高的动听的百分比所迷惑。我们必须经常这样问：原来的工资数是多少？

其次，也不难了解，如果 10 个工人每星期各得 2 先令，5 个工人每星期各得 5 先令，还有 5 个工人每星期各得 11 先令，那末这 20 个人每星期总共收入 100 先令或 5 英镑。如果后来他们每星期的工资总数有了增加，假定为 20%，那末就是从 5 英镑增加到了 6 英镑。就平均数来看，可以说工资的总的水平增加了 20%，尽管实际上其中 10 个工人的工资并没有变，5 个工人的工资每人从 5 先令增加到 6 先令，另外 5 个工人的工资总额则从 55 先令增加到 70 先令。其中半数工人的状况丝毫没有改善，四分之一工人的状况改善得很小，只有剩下的四分之一才真正得到了改善。然而，如果以平均数字来说，那末这 20 个工人的工资总数是增加了 20%，同时既然问题涉及到雇这些工人的全部资本以及他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格，所以这里的情形与工资的平均提高同等地涉及到所有工人的情况完全一样。关于上面所谈的那些农业工人的例子，由于他们的工资水平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各个郡中极不相同，所以工资的提高对他们所发生的影响也很不平衡。

末了，在这次工资提高的时期中，有许多因素，如对俄战争所引起的新的税赋，农业工人住宅的大批毁坏⁶ 等等，曾起过相反的作用。

在预先作了这些说明之后，现在我再来谈大不列颠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在 1849 年至 1859 年时期大约提高了 40% 这一事实。为了证明这点，我可以举出大量的和详细的材料，但是，就面前的目的来说，我认为只要请你们去看看已故的约翰·查·摩尔顿先生 1859 年在伦敦艺术和手工业协会⁷ 宣读的那篇题为《用在农业中的力量》的批判性的诚实报告⁸，也就够了。摩尔顿先生所引用的材料，是他从苏格兰 12 个郡和英格兰 35 个郡内大约 100 个农场主的账簿和其他真实文据中搜集来的。

按照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的意见，特别是如果注意到工厂工人工资同时提高的情形，农产品的价格在 1849—1859 年间应该有惊人的提高。但实际情形又怎样呢？虽然发生了对俄战争，而且 1854—1856 年间有好几次歉收，但英国主要农产品小麦的平均价格在 1838—1848 年间是每一夸特约为 3 英镑，而在 1849—1859 年间则降到每一夸特约为 2 英镑 10 先令了。这就是说，在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提高了 40% 的同时，小麦的价格却降低了 16% 以上。在同一时期中，如果把它的末期同它的初期比较一下，即把 1859 年同 1849 年比较一下，则正式登记的贫民已从 934419 人减到 860470 人，即减少了 73949 人。我承认，减少的数目确实很小，并且这种减少在以后几年中又没有了，但无论如何总是减少了。

人们可以说，由于废除了谷物法⁹，英国在 1849 年至

1859 年间从国外输入的谷物比 1838—1848 年间增加了一倍以上。但结果怎样呢？如果从公民韦斯顿的观点出发，那末国外市场上突然发生的这种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需求，一定会使农产品的价格大大提高，因为不论这种增长的需求是发生在国外或国内，其影响都是相同的。但实际情形又是怎样呢？在这个时期中，法囯除了几个歉收的年份外，经常有人抱怨谷物价格惨跌，美国人不得不屡次将他们多余的农产品焚毁，而俄国，如果相信乌尔卡尔特先生的话，则鼓励了美国的内战，因为美国人的竞争曾破坏了俄国农产品向欧洲市场的输出。

如果把公民韦斯顿的论证化为抽象的形式，那就是这样：需求的任何提高都是在一定的产品量基础上发生的。因此，需求的提高永远也不能增加所需商品的供给，而只能提高这些商品的货币价格。可是，甚至最普通的观察也可以表明，需求的提高在某些场合完全不改变商品的市场价格，在另一些场合也只会使市场价格暂时提高，接着就会是供给的增加。这种供给的增加又必然使价格重新降到原先的水平，在某些场合还会使它低于原先的水平。至于需求的提高是由于工资的增加或是由于其他什么原因，这丝毫不能使问题有所改变。从公民韦斯顿的观点来看，这个一般的现象，也像那些在特别情况下，即在工资提高的情况下所发生的现象一样，是难于解释的。所以，他的论证在我们所讨论的问题上丝毫也不能证明出什么东西。这种论证只是表明，公民韦斯顿弄不清那些使需求的提高会引起供给的增加，而并不一定会引起市场价格的提高的规律。

3. 工资和货币

在讨论的第二天，我们的朋友韦斯顿已经给自己的旧论断套上了新的形式。他说：在货币工资普遍提高的情况下，要支付这些工资就需要有更多的现金。如果货币的数量是固定不变的，那又怎能用这种数量不变的货币去支付增加了的货币工资呢？以前的困难是：虽然工人的货币工资增加了，而工人所能得到的商品数量仍然没有变；现在的困难是：虽然商品数量没有变，而货币工资却增加了。当然，如果你们不承认公民韦斯顿原先的教条，由此而产生的困难也就消灭了。

可是我要向大家指出，这个关于货币的问题和我们现在所研究的问题没有任何关系。

在你们的国家里，支付机构比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完善得多。由于有了广泛的和集中的银行系统，为了周转同样数目的价值或进行同样的或数量更大的交易所需要的货币就少得多了。例如工资的情形就是这样：英国工厂工人每星期把自己的工钱付给商店老板，商店老板每星期把这些钱送交银行家，银行家每星期把这些钱交还给工厂主，工厂主再把这些钱付给自己的工人，如此循环不已。由于有这样的机构，一个工人每年的工资假定为 52 英镑，只要用一个每星期照样周转一次的索维林^③ 便足够支付了。但是，这种机构甚至在英格兰也不如在苏格兰那样完善；而且它并不是到处都

③ 索维林是英国的一种金币，同英镑价值相等。——编者注

一样完善，所以我们看到，例如有些农业区域和纯工业区域比较起来，为了周转少得多的价值额却需要多得多的现金。

你们如果渡过海峡，就可以看到，大陆上的货币工资比英国的低得多，然而在德国、意大利、瑞士和法国，为了支付这些工资却需要大得多的货币额。在那里，每一个索维林都不能那样快地为银行家取得，也不能那样快地回到工业资本家的手中，所以，如果在英国只需要一个索维林就可以在一年的流通中代替 52 英镑的话，那末，在大陆上，为了在一年内支付 25 英镑的货币工资，也许就需要 3 个索维林。因此，如把大陆各国和英国加以比较，你们立刻就可以看出，低额的货币工资可能比高额的货币工资需要更多的现金，而实际上这纯粹是个技术问题，同我们所考察的问题毫无关系。

据我知道的最确切的计算，英国工人阶级每年的收入可以估计为 25000 万英镑。这个庞大的数目大约是用 300 万英镑来流通的。假定工资增加 50%，支付这笔工资所需要的货币就不是 300 万英镑，而是 450 万英镑。由于工人每日开支有很大一部分是用银币和铜币，即普通的铸币（这些铸币对于金子的相对价值，和不兑换的纸币一样，是由法律任意规定的），所以货币工资提高 50%，至多只需要 100 万索维林的补充货币加入流通。于是，以金条或铸币形式储藏在英格兰银行或私人银行家钱库里的 100 万英镑就会进入流通。然而，因铸造这 100 万补充铸币或因其在流通中的损耗所引起的少量费用甚至也可以节省下来，而这些费用在增加流通手段会引起某些困难时也确实是节省下来的。你们都知道英国的流通货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各种银行券，在商人彼此进行交

易以及在消费者与商人彼此进行比较大宗的支付时都采用这种银行券。另一类为金属货币，在零售贸易中流通。这两种流通货币虽然种类不同，但它们却是交错使用的。例如，甚至在比较大宗的支付中，使用金币来支付 5 英镑以下的零数是极为广泛的。如果明天发行 4 英镑、3 英镑、或 2 英镑的银行券，那末充满这些流通渠道的金币立刻就要被排挤，并流到那些因货币工资增加而需要它们的地方去。这样一来，因货币工资增加 50% 所需要的 100 万补充额，无须增加一个索维林也可以得到了。增大期票的流通而不另发银行券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例如在郎卡郡这个方法就实行了很久。

如果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就像公民韦斯顿对于农业工人工资所假设的那样增加 100%，——会引起日用必需品价格的大涨，并且依照公民韦斯顿的观点，需要有一笔无法得到的补充货币额，那末，**工资的普遍下降**，就会在同样的程度上——不过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引起同样的后果。好极了！你们都知道，1858—1860 年是棉织工业最繁荣的时期，特别是 1860 年在这方面是商业史上空前未有的一年，其他一切工业部门在这时期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1860 年棉织工业工人以及与其有关的一切其他部门工人的工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但是美国危机一发生后，所有这些工人的工资都忽然降低到大约为过去工资的 $1/4$ 。如果朝着相反的方向变动，那就该是增加 300%。如果工资从 5 提高到 20，我们便说工资增加了 300%；如果工资从 20 降到 5，我们便说工资减少了 75%。但是在一种场合增加的数目和在另一种场合减少的数目是相同的，即 15 先令。所以，这是工资水平的一种突

然的、从未有过的变动，如果我们不仅计算那些直接在棉织工业中做工的工人，而且还计算那些间接依靠于棉织工业的工人，那末这种变动所涉及的工人数目，就要比农业工人的数目多 1/2。但小麦的价格降低了没有呢？没有，它已由 1858—1860 年三年中每一夸特年平均价格 47 先令 8 达士提高到 1861—1863 年三年中每一夸特年平均价格 55 先令 10 达士。至于说到货币，那末 1861 年造币厂所铸的币额数为 8 673 232 英镑，而 1860 年所铸的只有 3 378 102 英镑。换句话说，1861 年所铸的铸币比 1860 年所铸的多 5 295 130 英镑。诚然，1861 年流通的银行券比 1860 年少了 1 319 000 英镑。但我们减去这个数目，1861 年所用的流通货币和 1860 年这个繁荣的年度相比较，仍然要多出 3 976 130 英镑，即约多 400 万英镑；而英格兰银行所储存的金子在这个时期却有缩减，虽然不是在同样大的比例上，但却是在近似的比例上缩减了。

现在把 1862 年和 1842 年比较一下。1862 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除了流通中的商品的价值和数量有极大的增加以外，单是用于定期支付股票、债券等等的资本、用于定期支付铁路用费的资本就达 32000 万英镑，这个数目如在 1842 年是会令人难以置信的。虽然如此，1862 年和 1842 年流通中的货币总额还是几乎相等的。并且你们一般还可以看出，当不仅商品价值，而且一般货币交易价值都在大量增加的时候，流通的货币却有逐步缩减的趋势。从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的观点看来，这是一个不可解答的谜。

如果他对问题比较深入地考察一下，他就会发现：即使把工资完全撇开不谈，并假定工资固定不变，流通中的商品

的价值和数量以及一般货币交易的数额，都是每天变化的；所发行的银行券的数量是每天变化的；不以货币作媒介而专借期票、支票、转账信贷和票据交换实现的支付的数额是每天变化的；由于需要实在的金属货币，市面上流通的铸币的数量与储存的或藏在银行仓库中的铸币和金条的数量间的比例是每天变化的；国内流通所吸收的金子的数量和被送到国外供国际流通的金子的数量是每天变化的；那时他就会了解到：他的关于货币总额仿佛是固定不变的教条，是一种和日常生活矛盾的荒谬绝伦的错误。公民韦斯顿不应该把自己对于货币流通规律的无知变成反对提高工资的论据，而应该去研究使货币流通能适应不断变化着的条件的那些规律。

4. 供给和需求

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确信一句拉丁谚语：《repetitio est materstudiorum》（复习是学业之母）。所以他又一次用新的方式来重述他原来的教条，硬说因工资提高而引起的货币紧缩，定将使资本减少等等。既然我们已经讲过他的关于货币的奇谈，所以我认为再来详细地研究那些在他看来应从他所臆造的货币流通难关中产生的虚构后果，就完全是多余的了。我最好还是直接来试图把他的那个教条——仍然是原来的那个教条，不过他用各种不同的形式把它反复陈述出来罢了——化为它的最简单的理论形式。

他论述自己的命题时所采取的那种非批判的态度，只要指出一点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反对提高工资，或是反对因

工资提高而产生的高工资。现在我要问他：究竟什么是高工资，什么是低工资呢？例如，为什么每星期 5 先令就是低工资，而每星期 20 先令就是高工资呢？如果说 5 与 20 相比算是低工资，那末 20 与 200 相比就更低了。如果某人在作关于寒暑表的讲演时，大谈什么高温度和低温度，那他并不能告诉谁以任何知识。他首先应该谈冰点和沸点是怎样确定的，应该告诉别人这两个标准点是由自然规律所决定的，而并不是由出卖或制造寒暑表的人随便规定的。然而公民韦斯顿在谈到工资和利润的时候，不仅没有从经济规律中推演出这样的标准点，而且甚至不觉得有寻找它们的必要。尽管非常明显：工资只有和一种测量其大小的标准相比较时，才能够谈高或低，但他却满足于关于高低的一种流行的庸俗的说法，好像这种说法具有什么固定的意义。

他不能向我说明，为什么一定量的劳动要用一定量的货币来支付。如果他回答我说，这是由供求规律决定的，那我就立刻要问他，供给和需求本身又是由什么规律调节的呢？于是他的那种回答就立刻会使他受窘。劳动的供求关系经常在变化，随着这种变化劳动的市场价格也在不断变化。如果需求超过供给，工资就要上涨；如果供给超过需求，工资就要下降，虽然在这种情形下，可能仍有必要例如用罢工或别的方法去探测需求和供给的实际情况。但是，如果你们承认供给和需求是调节工资的规律，那末声言表示反对提高工资便是一种幼稚和无谓的举动，因为按照你们所凭借的那个至高无上的规律，工资的周期性的上涨，也和工资的周期性的下降一样，是必要的和合理的。如果你们不承认供给和需求是

调节工资的规律，那我就要重新提出自己的问题：为什么一定量的劳动要用一定量的货币来支付呢？

但是，让我们从更广的方面来研究一下问题：你们如果以为劳动和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归根到底仿佛是由供给和需求决定的，那你们就完全错了。供给和需求只调节着市场价格一时的变动。供给和需求可以说明为什么一种商品的市场价格会涨到它的价值以上或降到它的价值以下，但决不能说明这个价值本身。假定说，供给和需求是相互平衡，或如经济学家所说，是相互抵消的。当这两个相反的力量相等的时候，它们就相互抑制而停止发生任何一方面的作用。当供给和需求相互平衡而停止发生作用的时候，商品的市场价格就会同它的实在价值一致，就会同它的市场价格绕之变动的标准价格一致。所以在研究这个价值的本质时，我们完全不用谈供给和需求对市场价格发生的那种一时的影响。这点无论对于工资来说，或对于其他一切商品的价格来说，都是一样的。

5. 工资和价格

我们的朋友所持的一切论据，如果用最简单的理论形式表达出来，只能归结成下面这样一个教条：“商品的价格是由工资来决定或调节的”。

我可以举出实际的经验来驳斥这种已被驳倒的陈腐谬论。我可以告诉你们，英国工厂工人、矿工、造船工人等等的劳动的价格虽然比较高，但他们的产品却比其他所有国家的同类产品卖得便宜；同时，英国农业工人的劳动的价格虽

然比较低，但他们的产品几乎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同类产品都要贵。我可以用比较同一个国家的不同产品或不同国家的各种商品的办法来证明，除掉一些与其说是本质上的不如说是表面上的例外情形，平均说来，价格高的劳动生产价格低的商品，而价格低的劳动生产价格高的商品。这当然绝对不是证明，一种场合下的劳动价格高和另一种场合下的劳动价格低，每次都是造成这绝对相反结果的原因，但这无论如何证明，商品的价格不是由劳动的价格来决定。不过我们完全不必采用这种经验主义的方法。

但是，也许有人会否认公民韦斯顿曾提出过“商品的价格是由工资来决定或调节的”这个教条。的确，他一次也没有下过这样的定义。甚至相反，他曾说利润和地租也是商品价格的构成部分，因为不仅工人的工资，而且资本家的利润和土地所有者的地租，也非从商品的价格中支付不可。但是，照他的意见，价格是由什么构成的呢？首先是由工资构成的。然后再加上给资本家的百分之几，给土地所有者的百分之几。现在假定生产一种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的报酬为 10；如果利润率与支出的工资相比是 100%，那末资本家就要加上 10；如果地租率与工资相比也是 100%，那末就要再加上 10；于是商品的全部价格就是 30。但是，这样决定价格不过意味着价格是由工资决定罢了。如果在上述场合，工资涨到 20，那末商品的价格就要涨到 60，其余类推。因此，提出价格由工资来调节的这一教条的所有旧政治经济学作家们，都企图用利润和地租只是加在工资上的百分数的说法来证明这一点。当然，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把这些增加的百分数的限度归结为某种经

济规律。相反，他们大概认为利润是由传统、风俗和资本家的意志决定的，或者是由别种同样臆造的和不可解释的方式决定的。他们断言利润决定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但这种说法丝毫也没有说明什么问题。诚然，这种竞争无疑会拉平不同生产部门的不同利润率，即把这些利润率引到一个平均的水平，但它却绝对不能决定这个水平本身或一般利润率。

我们说商品的价格是由工资决定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既然工资是劳动价格的一种称呼，那我们就是说，商品的价格是由劳动的价格来调节的。既然“价格”是交换价值，——而我讲到价值时，总是指交换价值而言，——即用货币来表现的交换价值，于是这一原理就归结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的价值来决定的”，或“劳动的价值是价值的一般尺度”。

但是，这样一来，“劳动的价值”本身又是怎样决定的呢？我们在这里陷入了窘境。自然，如果我们想依照逻辑从事推论，那我们就一定要陷入窘境。可是，这个教条的维护者是不大关心逻辑的。例如以我们的朋友韦斯顿来说吧。起初他告诉我们，商品的价格由工资来决定，所以当工资增加的时候，价格也要提高。随后他又向我们证明，相反，工资的增加不会有任何好处，因为商品的价格也要随之提高起来，因为工资实际上是由工资所能买来的那些商品的价格来测量的。总之，我们开始时声明说商品的价值由劳动的价值来决定，末尾却又声明说劳动的价值由商品的价值来决定了。这样一来，我们真是在瞎兜圈子，始终得不出任何结论。

总的说来，如果我们把一种商品的价值，例如劳动、谷物或其他某种商品的价值作为价值的一般尺度和调节器，那

我们显然只是在躲避困难，因为我们是用一种其本身又需要被决定的价值来决定另一种价值。

“商品的价格是由工资决定的”这一教条，如果用它的最抽象的说法来表示，就是说“价值是由价值决定的”，而这种同义反复只是表明我们实际上对价值一窍不通。如果接受这个前提，那末所有关于政治经济学一般规律的推论都变成了空洞的呓语。所以，李嘉图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 1817 年出版的自己那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把那种认为“价格由工资来决定”的流行已久的陈旧不堪的虚伪学说完全粉碎了¹⁰。亚当·斯密和他的那些法国老前辈在自己著作中真正科学的部分驳斥过这种虚伪学说，但是他们在自己著作中比较肤浅和庸俗的章节里，却又把这种虚伪学说再现了出来。

6. 价 值 和 劳 动

公民们，现在我必须来实际地阐明我们所研究的问题了。我不能保证我能完全令人满意地做到这点，因为要做到这点，我就不能不涉及政治经济学的全部领域。我只能如法国人所说的那样《effleurer la question》，即只能涉及一些基本问题。

我们所要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商品的价值？它是由什么决定的？

初看起来，似乎商品的价值是一种完全相对的东西，如果不研究某一个商品和其他一切商品之间的关系，那就不能确定它的价值。的确，讲到价值时，讲到其一个商品的交换

价值时，我们指的是这一个商品与其他一切商品交换时的数量上的比例。但是这时又会发生一个问题：商品相互交换的比例又是怎样决定的呢？

我们根据经验知道，这些比例是无限地不同的。如果我们拿某种商品，例如拿小麦来说，那我们就会发现，一夸特小麦同其他各种商品相交换差不多有无数不同的比例。但因为小麦的价值在所有这些场合都依然是一样的，不管它是表现在丝绸上也好，表现在金子或其他某种商品上也好；所以这个价值就应当是一种不同于它与其他商品交换的那些不同比例的东西，是与这些比例毫不相干的独立的东西。一定有可能用一种极不同的形式来表现不同商品间的这些不同的等量关系。

其次，假如我说一夸特小麦按一定的比例与铁相交换，或者说一夸特小麦的价值表现为一定数量的铁，那我也就是说，小麦的价值和它那个表现为铁的等价物等于既不是小麦又不是铁的某个第三种东西，因为我的出发点是：小麦和铁以两种不同的形态来表现同一的数量。所以，这两种商品中的每一种，不论是小麦或铁，都一定能不依赖于另一种而化成这个第三种东西，即化成作为它们的共同尺度的东西。

我要用一个十分简单的几何学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当我们要比较形状不同和大小不同的三角形面积，或是比较三角形面积与矩形或其他某种直线形面积时，我们是怎样着手的呢？这时，我们就把任何一个三角形的面积还原为全然不同于它的外形的一种表现形式。既然我们根据三角形的特性知道三角形的面积等于它的底乘高的一半，于是我们就能把各种三角形的大小以及一切直线形的大小相互加以比较，因

为每一种直线形都可以分解为一定数量的三角形。

在计算商品价值时，也应当使用这种方法。我们应当有可能把一切商品化为一种它们所共有的表现形式，只是按照它们所含有的同一尺度的比例去区别它们。

既然商品的交换价值不过是这些东西的社会职能而与它们的自然属性毫无共同的地方，所以我们首先就要问，所有商品共同的社会实体是什么呢？这就是劳动。为要生产一个商品，就必须在这个商品上耗费或投入一定量的劳动。并且我不是简单说劳动，而是说社会劳动。如果一个人生产一个物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直接需要，是为了供自己消费，那他所创造的就是产品而不是商品。他作为一个为自己工作的生产者，与社会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一个人为要生产一个商品，他就不仅要生产能满足某种社会需要的物品，并且他的劳动本身也应该是构成社会所耗费的劳动总额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的劳动应该服从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没有其他部分的劳动，这种劳动就不能存在，而这种劳动之所以必需，又是为了补充其他部分的劳动。

当我们把商品看作价值时，我们是只把它们看作体现了的、凝固了的或所谓结晶了的社会劳动。从这个观点来看，它们所以能够互相区别，只是由于它们代表着较多或较少的劳动量。例如生产一条丝手巾也许比生产一块砖所耗费的劳动量要多。但是劳动量是由什么来测量的呢？是由劳动所经历的时间，如小时、日等等来测量的。为了能够用这种尺度来测量劳动，就必须把各种劳动化为平均的或简单的劳动，作为它们的单位。

于是我们便得出下面的结论：商品具有价值，是因为它是社会劳动的结晶。商品的价值的大小或它的相对价值，取决于商品所含的社会实体量的大小，即取决于生产这个商品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所以各商品的相对价值，是由耗费于、体现于、凝固于各该商品中的相应的劳动量或劳动额来决定的。凡生产商品中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相同，则商品中所含的相当数量也相同。或者说：一个商品的价值对另一个商品的价值的关系，相当于一个商品中凝固的劳动量对另一个商品中凝固的劳动量的关系。

我料想你们中有许多人一定要问：商品价值由工资来决定与商品价值由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来决定，这两种论断之间是否真正有很大的区别或确实有什么区别呢？但你们应当知道，劳动报酬同劳动数量是完全不相同的东西。假定说，例如一夸特小麦和一盎斯金子包含了同等数量的劳动。我举这个例子，是因为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他的第一部著作里曾引用过它，这部著作于1729年出版，题为《试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¹¹，他是首先发现价值的真正实质的人中的一个。总之，我们已假定，一夸特小麦和一盎斯金子是同等的价值或等价物，因为它们都是凝结于它们本身中的若干个工作日或若干工作周的同等数量的平均劳动的结晶。我们这样来决定金子和谷物的相对价值，是否多少要依据农业工人和矿工的工资呢？一点也不。关于究竟怎样支付他们每天或每周的劳动的问题，以及甚至关于是否采用雇佣劳动的问题，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完全没有确定的问题而遗留下来。如果采用了雇佣劳动，那末这两个工人的工资可能是完全不相等

的。一个把劳动体现在一夸特小麦上的工人可能只获得两蒲式耳小麦的工资，而那个开矿的工人却可能获得半盎斯金子的报酬。或者，如果假定他们的工资是相等的，那末，这种工资也可能在极不相同的比例上背离他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这种工资可能等于一夸特小麦或一盎斯金子的 $1/2$ 、 $1/3$ 、 $1/4$ 、 $1/5$ 或其他某种份量。他们的工资当然不能高于他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不能多于这个价值，但它却可能少于这个价值，并且是在极不相同的程度上少于这个价值。他们的工资要受产品的价值的限制，但是他们的产品的价值却丝毫不受工资的限制。而最主要的是，例如谷物和金子的价值，相对价值，完全不依所用劳动的价值来规定，即不依工资来规定。因此，以商品中凝固的相对劳动量去决定商品价值，与那种以劳动的价值或工资去决定商品价值的同义反复的方法全然不同。不过，这一点我们在以后的探讨过程中还要进一步加以阐明。

我们计算一个商品的交换价值时，必须把预先用在这个商品原料中的劳动量以及消耗在实现这种劳动所必需的装备、工具、机器和房屋的劳动，加到生产的最后阶段所费的劳动量上去。例如，一定量棉纱的价值，是若干劳动量的结晶，即在纺织过程中加在棉花上的劳动量，预先体现于棉花本身的劳动量，体现于煤炭、油料及其他各种生产辅助材料的劳动量以及用于蒸汽机、纱锭、厂房等等的劳动量的结晶。本来意义上的生产工具，如工具、机器和厂房，可以在辗转重复的生产过程中服务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如果它们像原料一样是一下子就消耗完了，那末它们的全部价值也会一下

子就转移到那些用它们生产出来的商品上去。但是，因为例如纱锭只能逐渐消耗完，所以就要作出一种平均计算，而以纱锭的平均生存寿命和它在一定时间内，譬如在一天内的平均消耗程度作为这种计算的基础。这样我们就可以计算出纱锭价值中哪一部分是转移到每天纺出的棉纱上，因而也就可以计算出，例如一磅棉纱所费的全部劳动量中，有哪一部分是预先体现于纱锭的劳动。就我们现有的目的而论，对于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必要作更加详细的说明了。

也许会有人这样认为，既然一个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量来决定，那末一个人愈懒或愈笨，他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就愈大，因为他制造这个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愈多。然而，如果作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一种可悲的错误。你们记得我曾经用过“社会劳动”这个用语，而“社会”这个用语的意义是非常大的。我们说一个商品的价值是由耗費于或结晶于这个商品中的劳动量来决定，我们所指的是在一定的社会状态中，在一定的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在所用劳动强度和技巧的一定社会平均水平下，生产这个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在英国，当蒸汽织机开始和手织机相竞争时，为了把一定量的纱转化为一码布或一码呢子，只需要原先劳动时间的一半。诚然，可怜的手织机织工现在已不是像从前那样每天劳动 9 小时或 10 小时，而是每天要劳动 17 至 18 小时了。但是，在他劳动 20 小时的产品中现在只包含有 10 小时的社会劳动，或 10 小时为了把一定量的纱转化成布所必须耗費的社会必要劳动。因此，他现在劳动 20 小时的产品所包含的价值，并不比他从前劳动 10 小时的产品所包含的价值多。

总之，如果说各个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体现在各该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来决定，那末，凡是生产某一个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增加，这个商品的价值就必定增加，而凡是生产它所需要的劳动量减少，它的价值就必定减少。

如果说为生产一定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是固定不变的，那末这些商品的相对价值也是固定不变的。但是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生产一个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是随着所用劳动的生产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劳动的生产力愈高，则在一定的劳动时间内所制成的产品也愈多；劳动的生产力愈低，则在同一时间内所制成的产品也愈少。举例说，如果由于人口增加而必须耕种肥沃程度较低的土地，为要获得与先前同量的产品，就必须耗费较大的劳动量，农产品的价值也就会因而提高。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纺纱工人运用现代生产资料在一个工作日内能比他从前运用手纺车在同一时间内把多几千倍的棉花纺成纱，那末，每一磅棉花所吸收的纺纱工人的劳动，就显然只有以前的几千分之一，因而在纺纱过程中所加于每一磅棉花上的价值也显然只有从前的几千分之一。于是棉纱的价值也要相应地减少。

如果把不同的人的天然特性和他们的生产技能上的区别撇开不谈，那末劳动生产力主要应当取决于：

(1) 劳动的自然条件，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矿山的丰富程度等等；

(2) 劳动的社会力量的日益改进，这种改进是由以下各种因素引起的，即大规模的生产，资本的集中，劳动的联合，分工，机器，生产方法的改良，化学及其他自然因素的应用，

靠利用交通和运输工具而达到的时间和空间的缩短，以及其他各种发明，科学就是靠这些发明来驱使自然力为劳动服务，并且劳动的社会性质或协作性质也是由于这些发明而得以发展起来。劳动生产力愈高，消耗在一定量产品上的劳动就愈少，因而产品的价值也愈小。劳动生产力愈低，消耗在同量产品上的劳动就愈多，因而产品的价值也愈高。因此，我们可以把下面这一点确定为一般的规律：

商品的价值与生产这些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成正比，而与所耗费的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

上面我们所说的都是关于**价值**的问题，现在我要就**价格**的问题，即**价值**所采取的特殊形式的问题补充几句。

价格本身不过是**价值的货币表现**罢了。例如，一切商品的价值在英国是用金的价格来表现，而在欧洲大陆则主要是用银的价格来表现。金或银的价值，和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都是由开采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来决定的。你们会用你们国内的一定量产品，即用你们国内一定量劳动凝结在里面的产品，去交换那些出产金银的国家的产品，即交换有它们一定量劳动凝结在里面的产品。人们正是这样，即实际上是通过商品交换商品来逐渐学会用金和银表现一切商品的价值，即生产各该商品所消耗的劳动量。只要仔细看看这种**价值的货币表现**，亦即**价值向价格的转化**，你们就会发现这里谈的是一个过程，而一切商品的**价值**都是经由这个过程获得**独立的和一致的形式**，换句话说，一切商品的价值都经由这个过程表现为同一的社会劳动量。既然价格只是价值的货币表现，所以亚当·斯密就称之为**自然价格**，而法国的重农学

派则称之为“必要价格”。

那末，价值和市场价格间的关系或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你们都知道，无论各个生产者的生产条件如何不同，一切同类商品的市场价格却总是一样。市场价格只是表现平均的生产条件下为供给市场以一定数量的一定产品所必需的平均社会劳动量。市场价格是依据该种商品的总额来计算的。在这个范围内，商品的市场价格是和它的价值相符的。另一方面，市场价格有时高于价值或自然价格和有时低于价值或自然价格的这种变动，是以供给和需求的变动为转移。市场价格背离价值的情形经常都可以看见，但是正如亚当·斯密所说：

“自然价格好像是一种中心价格，一切商品的价格都趋向于这一中心价格。各种偶然的情况可能有时把商品的价格保持在大大超过自然价格的水平上，有时又使商品的价格低于这个水平。但是不管有怎样的障碍使价格背离这个稳定的中心，商品的价格总是经常趋向于这个中心”。¹²

我现在不能来仔细地分析这个问题。这里只需要指出下面一点：如果供给和需求互相平衡，则商品的市场价格相当于它们的自然价格，即相当于由生产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来决定的它们的价值。但供给和需求必定要经常趋于相互平衡，虽然这种平衡只能靠一个变动补偿另一个变动，以下落补偿上涨来实现，或者相反。如果你们不是只考察每天的变动，而是分析较长时期里的市场价格的运动，例如像图克先生在他的《价格史》里面做过的那样，那末你们就会发现，市场价格的变动，市场价格的背离价值，市场价格的上涨和下

落，都是互相抵销和互相补偿的；所以，如果把垄断组织的影响及其他某些变更撇开不说，——关于这些，我现在不能详细谈到，——那末一切种类的商品，平均说来总是按它们各自的价值，即它们的自然价格出售的。市场价格的变动达到互相补偿所要经历的平均时期，对于不同种类的商品来说是不相同的，因为供给适合于需求这一点对某种商品来说比较容易，而对另一种商品来说则比较困难。

由此可见，既然一般说来一切种类的商品在较长时期内都是按自己的价值出售，那末，假设利润——不是指个别场合，而是指各个工业部门中经常的和普通的利润——是来源于额外提高商品价格或者是由于商品按超过其价值的价格出卖，就未免太荒谬了。如果我们把这种假设综合起来，那它的荒谬性质就非常清楚了。凡是一个人作为卖者经常赢得的东西，他总是不免要作为买者丧失掉。即使指出有些人是买者而不同时又是卖者，是消费者而不同时又是生产者，那也无济于事。这些人付给生产者的东西，是他们起先应该从生产者那里无代价地获得的。如果一个人起先拿了你的钱，然后又在购买你的商品时将钱还给你，那你就是按过高的价格把你的商品卖给他，你也永远不会发财致富。这种交易可能减少亏损，但是决不能产生利润。

所以，你们如想说明利润的一般本质，就应该从这样一个原理出发，即商品平均说来是按自己的实际价值出卖的，利润是从商品按其价值出卖得来的，也就是从商品按其所体现的劳动量的比例出卖得来的。如果你们不能根据这种假定来说明利润，那你们就根本不能说明利润。这好像是不近情理，

好像是与日常经验相抵触。但是，地球围绕太阳运行以及水由两种易燃气体所构成，也好像是不近情理。日常经验只能抓住事物诱人的外观，如果根据这种经验来判断问题，那末科学的真理就会总是显得不近情理了。

7. 劳 动 力

当我们在如此简略的叙述中尽可能地分析了价值的本质，分析了任何商品的价值的本质以后，我们就应当集中注意力来研究特别的劳动的价值。这里我又要用一种在你们看来好像是不近情理的论断来使你们惊讶了。你们都相信，你们每天所出卖的是自己的劳动，因而劳动是有价格的，并且，既然商品的价格只是它的价值的货币表现，那就一定存在有一种作为劳动的价值的东西。但是，作为劳动的价值的东西，就其通常意义来说，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我们已经说过，凝结在商品里的必要劳动量构成商品的价值。现在我们来应用这个价值的概念，又怎能确定比如说十小时工作日的价值呢？这个工作日里包含有多少劳动呢？十小时劳动。如果我们说十小时工作日的价值等于十小时的劳动，或等于这个工作日所包含的劳动量，那无非是同义反复，甚至是毫无意义。显然，当我们发现“劳动的价值”一语所包含的真实而隐藏的意义以后，我们就能够说明对于价值的这种不合理和似乎是不可能的用法了，也好像我们认识了天体的实际运行情形以后，就能够说明我们所看到的天体运行情形一样。

工人所出卖的不直接是他的劳动，而是他暂时转让给资

本家支配的他的劳动力。情况确实是这样，连法律也规定了——我不知道英国的法律究竟怎样，但至少大陆上的一些国家的法律规定了——允许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最大期限。如果允许无限期地出卖劳动力，那就会使奴隶制立刻恢复起来。如果这种出卖包括一个工人的一生，那就会立刻把他变成他的雇主的终身奴隶。

英国最老的经济学家和最独特的哲学家之一托马斯·霍布斯，在他的著作《利维坦》中，已本能地发觉了他所有的那些继承者都没有觉察到的这件事实。他说：

“一个人的价值或所值，像其他一切东西的价值或所值一样，就是他的价格，即他的能力被人使用时应获得的报酬。”¹³

如果我们从这一原理出发，那我们就能像确定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来确定劳动的价值。

但是在这样作以前，我们应当问：怎样产生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市场上一方面有一种人是买者，他们占有土地、机器、原料和生活资料，即占有那些除掉原始状态的土地以外的尽是劳动的产品的东西，另一方面有一种人是卖者，他们除掉自己的劳动力，除掉劳动的手和头，再没有别的东西可卖了；前者经常买进是为了吸取利润和发财致富，后者经常卖出则是为了谋生。要研究这个问题，就得研究被经济学家称作先期积累或原始积累、实际上应该称作原始剥夺的东西。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所谓原始积累不过是使劳动者与其劳动资料间原先存在过的统一归于破坏的一连串历史过程。可是，这样来研究，就会超出目前这个题目的范围。劳动者脱离劳动资料的现象一旦成为事实，它就会继续保持下去，并

且要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产生出来，直到有一种新的和根本的生产方式方面的革命把这种现象消灭，并在新的历史形态中把原先存在过的统一恢复为止。

那末，劳动力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呢？

也如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由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量来决定。一个人的劳动力只有当他活着的时候才存在。一个人要成长和维持生活，就必须消费一定量的生活资料。但是，一个人也和一部机器一样是不免要损坏的，所以必须用另一个人来代替他。工人除了维持自己生活所必需的一定量生活资料以外，还需要有一定量的生活资料来养育子女，因为他们将在劳动市场上代替他，并且还要延续工人的种族。此外，还需要花费一定数量的价值，使工人能够发展自己的劳动力和获得一定的技能。就我们的目的而论，只需要考察一下中等劳动，这种劳动的教育和训练的费用是很小的。但是，我必须顺便指出，既然各种不同质量的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各不相同，所以各种不同生产部门所用劳动力的价值也一定各不相同。因此，对平等工资的要求是基于一种错误，是一种永远不能实现的妄想。这种要求乃是承认前提而企图避开结论的那种虚妄和肤浅的激进主义的产物。在雇佣劳动制的基础上，劳动力的价值也像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那样来确定；既然各种不同的劳动力具有不同的价值，即它们的生产需要有不同的劳动量，所以在劳动市场上，它们也就应当按不同的价格来支付。在雇佣劳动制基础上要求平等的报酬或仅仅是公平的报酬，就犹如在奴隶制基础上要求自由一样。什么东西你们认为是公道的和公平的，这与问题毫

无关系。问题在于在一定的生产制度下什么东西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

由此可见，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来决定的。

8. 剩余价值的生产

现在我们假定，一个工人每天必需的生活资料的平均量需要 6 小时的平均劳动才能生产出来。同时我们又假定，这 6 小时的平均劳动也体现在等于 3 先令的金的数量上。那末 3 先令就是这个工人劳动力一天价值的价格或其货币表现。如果他每天工作 6 小时，那他每天所生产的价值就足以使他获得他每天平均必需的生活资料量，即维持他这个工人的生存。

但是这个人是个雇佣工人。因此，他必须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如果他把自己的劳动力每天卖 3 先令或每周卖 18 先令，他就是按劳动力的价值出卖的。假定他是一个纺纱工人。如果他每天工作 6 小时，那末他每天加到棉花上去的价值就是 3 先令。他每天加到棉花上去的这个价值就是他的工资的确切的等价，也就是他每天所得到的他的劳动力的价格的等价。可是，在这种场合，资本家就得不到任何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了。于是，我们在这里就遇到真正的困难了。

资本家购买了工人的劳动力并支付了这劳动力的价值，就像所有其他买主一样，获得了消费或使用他所买的这个商品的权利。迫使一个人去工作以消费或使用他的劳动力，就

像开动一架机器以消费或使用这架机器一样。资本家支付了工人劳动力的一天或一周的价值，从而获得了在整天或整周内使用这个劳动力或迫使它去工作的权利。工作日或工作周自然也有一定的界限，可是这点我们留待以后再详细谈。

现在我希望你们注意一个关键问题。

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维持或再生产这个劳动力所必需的劳动量决定的，而对这劳动力的使用则只受工人工作能力和体力的限制。劳动力的一天或一周的价值同劳动力的每天或每周的消耗全然不同，犹如一匹马所需要的饲料同它能供人乘骑的时间完全不是一回事一样。限定工人劳动力价值的劳动量，并不构成工人劳动力所能完成的劳动量的界限。我们以我们的纺纱工人为例来说吧。我们已经知道，为要保证自己劳动力每天的再生产，他必须每天再生产 3 先令的价值，而这是他每天工作 6 小时就可以作到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他能每天工作 10 小时，12 小时或更多的小时。然而资本家在支付了这个纺纱工人的一天或一周的劳动力价值之后，就获得了在整天或整周内使用这个劳动力的权利。这样，资本家就迫使这个纺纱工人，比如说，一天工作 12 小时。纺纱工人除了必须工作 6 小时以补偿他的工资或他的劳动力价值以外，还必须额外工作 6 小时，这 6 小时我称之为剩余劳动时间，并且这个剩余劳动将体现在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上面。假如我们这个纺纱工人每天工作 6 小时就在棉花上加 3 先令的价值，即加构成他所得工资的确切等价的价值，那末，他在 12 小时内就要在棉花上加 6 先令的价值，生产出相应的剩余数量的棉纱。既然他已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了资本家，于是他

所创造的全部价值或他所创造的全部产品，便都属于资本家，属于他的劳动力的暂时所有者。于是资本家预付 3 先令，结果却实现出 6 先令的价值，因为他预付的是 6 小时劳动结晶的价值，而他取得的却是 12 小时劳动结晶的价值。资本家每天重复这一过程，他每天都预付 3 先令和每天取得 6 先令，这 6 先令中有一半又拿去支付工资，另一半则构成资本家不付任何等价而白白获得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的生产或雇佣劳动制度，正是以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这种交换为基础，同时这种交换必然经常使工人作为工人再生产出来，使资本家作为资本家再生产出来。

在其他一切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剩余价值率取决于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需的那部分工作日和专为资本家服务的剩余时间或剩余劳动之间的比。所以，剩余价值率是依工作日在多大程度上超过工人只再生产其劳动力价值或补偿其工资所费的劳动时间为转移的。

9. 劳 动 的 价 值

现在我们应当回过头来谈谈“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这个用语了。

我们已经知道，实际上，劳动的价值无非是由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那些商品的价值来测量的劳动力的价值。但是，因为工人领得工资是在自己的劳动完毕以后，并且因为工人知道他实际上让给资本家的正是他自己的劳动，所以他必然以为他的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就是自己劳动本身的价格或价

值。如果他的劳动力的价格等于体现 6 小时劳动的 3 先令，而他又是每日工作 12 小时，那末他就必然要把这 3 先令看成是 12 小时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虽然这 12 小时的劳动是体现在 6 先令的价值中。由此就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虽然严格说来，劳动的价值或价格是个无意义的名词，但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却具有**劳动本身的价格或价值的外观**。

第二，虽然工人每天的劳动只有一部分是有偿的，而另一部分是无偿的；虽然正是这一无偿的或剩余的劳动构成产生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基础，但是从表面看来，仿佛全部劳动都是有偿的劳动。

这种虚假的外观，就是雇佣劳动和其他历史形态的劳动不同的地方。在雇佣劳动制度的基础上，甚至无偿的劳动也好象是有偿的劳动；反之，奴隶的那部分有偿的劳动，却好象是无偿的劳动。奴隶为要工作，自然必须生活，他的工作日的一部分就得用来抵偿他自己维持生活的价值；但是，由于奴隶和奴隶主之间没有订立任何交易合同，由于双方又没有什么买卖行为，所以奴隶的全部劳动似乎都是无报酬的。

另一方面，再以农奴为例。可以说，农奴在整个东欧直到昨天还存在着。农奴在自己的或分给他使用的田地上为自己劳动 3 天，其余 3 天则在自己主人的领地上从事强迫的无报酬的劳动。所以，这里劳动中的有偿部分和无偿部分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显然分开了的，于是我们的自由主义者就义愤填膺地认为强迫人白干活的思想是荒谬的。

其实，一个人无论是一周中在他自己的田地上为自己劳

动 3 天，再在自己主人领地上无报酬地劳动 3 天，或是一天里在工厂或作坊中替自己劳动 6 小时，再为他的雇主劳动 6 小时，结果都一样，不过在后一场合，劳动的有偿部分和无偿部分是不可分割地混在一起了，整个交易的实质都因有合同存在和周末支领工资而完全被掩饰了。这种无报酬的劳动在一种场合似乎是自愿的，而在另一种场合则似乎是强迫的。全部区别就在于此。

如果我将使用“劳动价值”这一用语，那不过是把它作为表示“劳动力价值”的通常流行的名词罢了。

10. 利润是按照商品的价值 出卖商品时获得的

假定 1 小时的平均劳动体现为等于 6 达士的价值，或 12 小时的平均劳动体现为 6 先令。又假定劳动的价值等于 3 先令或 6 小时劳动的产品。其次，如果商品生产过程中所耗去的原料和所损耗的机器等等体现了 24 小时的平均劳动，那末这些生产资料的价值就等于 12 先令。此外，如果资本家所雇的工人再把 12 小时自己的劳动加到这些生产资料上去，这 12 小时就创造出 6 先令的附加价值。所以产品的价值总额共为 36 小时的物化劳动，即等于 18 先令。但是，既然劳动的价值或付给工人的工资只等于 3 先令，那末，资本家对于由工人所耗费并体现在商品价值里的 6 小时剩余劳动，就没有支付任何等价。这样，当资本家把这个商品按其价值出卖为 18 先令时，就把他没有付出任何等价的 3 先令的价值一并实现了。

这 3 先令就是他装进自己口袋里的剩余价值或利润。可见，资本家实现这 3 先令的利润，并不是由于他按照超过商品价值的价格出卖自己的商品，而是由于他按照商品的实在价值出卖这个商品。

商品的价值是由该商品所包含的全部劳动量决定的。但是，这劳动量有一部分体现为用工资形式付过等价的价值，另一部分则体现为没有付过任何等价的价值。商品中所含的劳动，一部分是有偿劳动，另一部分是无偿劳动。所以，资本家按照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即出卖耗费在该商品上的全部劳动量的结晶，是一定要获得利润的。资本家出卖的不仅有他支付过等价的东西，而且还有他分文未付的东西，虽然这东西曾费去了他所雇的工人的劳动。资本家在商品上费去的，和商品实在费去的，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总之，我重复说一遍，正常的和平均的利润，不是由于超过商品实在价值出卖商品得来的，而是按商品实在价值出卖商品得来的。

11. 剩余价值分解成的各个部分

剩余价值，或商品全部价值中体现着工人剩余劳动或无偿劳动的那一部分，我称之为利润。这种利润并不是全部都归企业资本家占有。土地所有者垄断土地——不管这土地是用于农业，用于建筑，用于铁路还是用于其他某种生产目的，——就有可能以地租名义取得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企业资本家拥有劳动资料，就有可能生产剩余价值，亦即占有一定量的无偿劳动；所以，凡是全部或部分地把劳动

资料贷给企业资本家的劳动资料所有者，简言之，就是放债的资本家，也有可能以收取利息的名义要求取得这剩余价值中的另一部分。这样，留归企业资本家本身的，就只有称为产业利润或商业利润的那一部分了。

至于上述三种人这样瓜分全部剩余价值究竟由什么规律来调节的问题，与本题毫无关系。但从以上所述中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

地租、利息和产业利润不过是商品的剩余价值或商品中所含无偿劳动不同部分的不同名称罢了，它们都是同样从这个泉源并且只是从这一个泉源产生的。它们不是由土地本身和资本本身产生出来的，但是土地和资本使其所有者可能从企业资本家压榨工人所得来的剩余价值中各分得一份。对于工人来说，究竟企业资本家是把这剩余价值——工人剩余劳动或无偿劳动的产物——全部占为己有，或是不得不将其中某些部分以地租和利息的名义分给第三者，这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假定说，一个企业资本家只使用自己的资本，并且他本人又是其所需土地的所有者。在这种场合，剩余价值就要完全归他所有了。

直接向工人榨取这剩余价值的正是企业资本家，不论最终他能把这剩余价值中的哪一部分留归自己。所以，整个雇佣劳动制度，整个现代生产制度，正是建立在企业资本家和雇佣工人间的这种关系上面。因此，有几位参加我们讨论的公民要想模糊事情的真相，把企业资本家和工人间的这种根本关系看作一个次要的问题，是不正确的。虽然他们断定，在一定情况下，价格的上涨对企业资本家、土地所有者、货币

资本家以至征税者影响的程度极不相同，是正确的。

从以上所述中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商品价值中只代表原料和机器的价值的那一部分，即只代表消耗了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的那一部分，绝不会构成收入，只是补偿资本罢了。但是，即使把这个问题撇开不谈，如果说商品价值中的另一部分，即构成收入或可能以工资、利润、地租、利息的形式花费掉的那一部分，是由工资的价值、地租的价值和利润的价值等等所构成，那也是不正确的。我们先把工资除开不说，只来研究产业利润、利息和地租。我们刚才说过，商品中所包含的剩余价值或商品价值中体现无偿劳动的这一部分价值，其本身分解成不同名称的三个部分。可是，如果说商品中的这一部分价值是由这三个组成部分各自独立的价值相加而构成或形成的，那就大错特错了。

如果一小时的劳动体现为 6 达尼的价值，如果工人的一个工作日为 12 小时，如果这段时间有一半是无偿劳动，那末这种剩余劳动就在商品上加 3 先令的剩余价值，即没有付过任何等价的价值。这 3 先令的剩余价值，就是企业资本家可以按任何比例去同土地所有者及放债人瓜分的全部基金。这 3 先令的价值，构成他们能够彼此瓜分的那个价值的限度。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企业资本家在商品的价值上任意加上一份价值作为自己的利润，然后再加上另一份价值给土地所有者等等，从而这商品的总价值是由这些任意规定的价值形成的。这样，你们可以看出，下面这种流行的观点，即把一定量的价值分解为三部分同这一定量的价值由三种独立价值相加形成这二者混淆起来，因而把地租、利润和利息所由产生

的总和价值变成一种随意的定量，该是如何荒谬了。

假定一个资本家所实现的全部利润等于 100 英镑， 我们把利润的这个数目看作一个**绝对量**而称之为**利润量**。如果我们计算这 100 英镑对于预付资本的比， 我们就把这个**相对量**称为**利润率**。显然，这个利润率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表示。

假定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为 100 英镑。如果所创造出的剩余价值也是 100 英镑，那就表明这工人的工作日一半是无偿劳动，并且——如果我们用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价值去测量这个利润的话——我们就可以说，**利润率**等于 100%，因为预付的价值为 100，而所实现的价值则为 200。

另一方面， 如果我们不是只看到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 而是看到**全部**预付的资本， 即假定为 500 英镑，其中有 400 英镑代表原料、机器等等的价值，那末我们就看到，**利润率**只等于 20%，因为这 100 英镑的利润只为**全部**预付资本的 1/5。

前一种表示利润率的方式，是表明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间的实在对比关系，即对劳动进行 *exploitation* (剥削) (请允许我用这个法文字) 的实在程度的唯一方式；后一种表示方式是通常习惯用的，并且它确实也适用于某几种目的，至少是非常便于掩饰资本家榨取工人无偿劳动的程度。

在我以后的说明中，我将使用**利润**一语来标明资本家所榨取的剩余价值总量，不管这剩余价值在不同人群间如何分配；而我在使用**利润率**一语时，则总是用利润对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价值的比率来测量利润。

12. 利润、工资和价格间的一般关系

如果从商品的价值中除去补偿原料和耗费在商品上的其他生产资料的价值，即除去代表商品中包含的过去劳动的价值，那末，这商品价值的其余部分就是工人在最后一次生产过程中所加的劳动量。如果这个工人每天工作 12 小时，而 12 小时的平均劳动结晶为 6 先令的金量，那末这加的 6 先令价值就是他的劳动所创造的唯一价值。这种由工作时间所决定的一定的价值，就是工人和资本家双方都从中各分一份的唯一基金，即分为工资和利润的唯一价值。显然，这两方面虽然可以按各种不同比例来分配这一价值，但是这一价值本身是不会变化的。假如不是以一个工人而是以全体工人人数计算，或者不是以一个工作日而是例如以 1200 万个工作日计算，也同样不会有什么变化。

因为资本家和工人所能分配的仅仅是这个有限的价值，亦即由工人全部劳动所测量的价值，所以一方面分得的愈多，他方面分得的就愈少，反之亦然。假如有一个一定的数，则这个数中一部分所增加的，总是另一部分所减少的。假如工资变动，利润就要朝相反的方向变动。假如工资下降，利润就要上涨；假如工资上涨，利润就要下降。如果按照上面的假设，工人得 3 先令，即等于他所创造的价值的一半，换句话说，如果他的整个工作日一半是有偿劳动，一半是无偿劳动，利润率就是 100%，因为资本家所得的也是 3 先令。假如工人只得 2 先令，或者说他在一个工作日中只有 $1/3$ 的时间

是为自己工作，资本家得到的就是 4 先令，利润率就是 200%。如果工人得到的是 4 先令，资本家只得 2 先令，利润率就降至 50%。但是所有这一切变动都不会影响到商品的价值。可见，工资的普遍提高只会引起一般利润率的降低，而不会影响到商品的价值。

虽然各商品的市场价格归根到底应当由各商品的价值来调节，各商品的价值又唯一由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总量来决定，而与各该劳动量分为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毫无关系，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例如在 12 小时内所生产的个别或成批商品的价值会是固定不变的。在一定的劳动时间内或由一定的劳动量所生产的商品的数或量，取决于所用劳动的生产力，而不取决于这劳动的时间上的伸延或长度。例如，一个纺纱工人在一个 12 小时的工作日内，在一种劳动生产力的水平下能生产 12 磅棉纱，而在一种较低的劳动生产力水平下只能生产 2 磅棉纱。这就是说，如果 12 小时的平均劳动体现在价值上为 6 先令，那末，在前一场合是 12 磅棉纱值 6 先令，而在后一场合是 2 磅棉纱也值 6 先令。这样一来，在前一场合一磅棉纱只值 6 达士，在后一场合一磅棉纱竟值 3 先令。这种价格上的差异，就是所用劳动的生产力有差异的结果。当生产力较高时，1 磅棉纱体现 1 小时劳动；当生产力较低时，1 磅棉纱则体现 6 小时劳动。在前一场合，1 磅棉纱的价格只等于 6 达士，尽管工资较高而利润率较低，在后一场合，1 磅棉纱的价格则等于 3 先令，尽管工资较低而利润率较高。其所以这样，是因为 1 磅棉纱的价格是由耗费在这磅棉纱里面的全部劳动量来决定的，而不是由这个劳动量分为有偿劳动

和无偿劳动的比例来决定的。于是，我前面所提到的那个事实，即支付得高的劳动可能生产出低廉的商品，而支付得低的劳动可能生产出昂贵的商品这一事实，也就仿佛不再是不近情理的了。这一事实只是反映一个一般的规律，即商品的价值由消耗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来决定，而且这个劳动量完全依所用劳动的生产力为转移，因而也随劳动生产率的每一变化而变化。

13. 争取提高工资或反对降低 工资的一些最重要场合

现在让我们来十分认真地研究一下争取提高工资或反对降低工资的一些最重要场合。

(1) 我们已经知道，**劳动力的价值**或——用较为流行的说法来表示——**劳动的价值**，是由生活资料的价值或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劳动量来决定的。因此，假如在一国里，一个工人平均每天所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为 6 小时的劳动并表现为 3 先令，那末这个工人为生产出他一天的生活费用的等价，就必须每天工作 6 小时。如果整个工作日为 12 小时，那末资本家付给他 3 先令，便偿付了他的劳动的价值。工作日有一半是无偿劳动，利润率等于 100%。但是现在假定，由于生产率的降低，例如为了生产同量的农产品需要用更多的劳动，于是一个工人每天平均所消费的生活资料量的价格就从 3 先令提高到 4 先令。在这种场合，劳动的价值就增加 $1/3$ ，或增加 $33\frac{1}{3}\%$ 。为要依照工人原来的生活水平生产出他一

天生活费用的等价，便需要用 8 小时的劳动；所以，剩余劳动就要由 6 小时减到 4 小时，利润率就由 100% 降到 50%。但是，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不过是要求把他的劳动的增长了的价值付给他，就好像其他所有的商品出卖人在其商品成本费增加时，力求使其商品已经提高的价值得到报酬一样。如果工资没有提高或提高得不够补偿生活资料已经增长的价值，那末劳动的价格就会降到劳动的价值以下，而工人的生活水平就会下降。

但变化也可能朝相反的方向发生。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个工人每天平均所消费的同一数量的生活资料，可能从 3 先令减到 2 先令，换句话说，为要再生产出每天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的等价，就不是需要工作日的 6 小时，而只是需要 4 小时了。现在工人用 2 先令就可以买到从前用 3 先令买到的生活资料了。劳动的价值确实会降低，但在劳动的价值这样减少的情况下，工人仍能买到和从前一样多的商品。在这种场合，利润就会从 3 先令提高到 4 先令，利润率也会从 100% 提高到 200%。虽然工人的生活的绝对水平依然照旧；但他的相对工资以及他的相对社会地位，即他与资本家相比较的地位，却会下降。工人反抗这种降低其相对工资的情形，不过是要求在他的已经增长的劳动生产力所生产出的总额中获得应有的一份，并且不过是力求保持他在社会阶梯上的以前的相对地位罢了。例如，英国的工厂主在谷物法废除后，卑鄙地背弃了他们在鼓动反对谷物法时所作的庄严诺言，把工资普遍降低了 10%。工人的反抗在起初一个时期遭受了失败，但是后来由于某些情况的影响，——这些情况我此

刻不能详细说明，——原来失去的 10% 又重新被夺回来了。

(2) 生活资料的价值，从而劳动的价值，可能仍旧不变，但是由于货币的价值已经发生变化，这些生活资料的货币价格也可能发生变化。

由于发现了更丰富的矿山以及类似的原因，生产例如 2 盎斯金，可能并不比从前生产 1 盎斯金所费的劳动多。在这种场合，金的价值就会降低一半或 50%。劳动的价值，也像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现在就要表现在比以前大一倍的货币价格上。从前表现为 6 先令的 12 小时劳动，现在就会表现为 12 先令了。如果工人的工资仍是 3 先令而没有提高到 6 先令，那末，他的劳动的货币价格现在就只等于他的劳动的价值的一半，他的生活水平也就大大降低。在工资虽有提高但却不完全相当于金价值下降程度的场合，这种情况也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发生。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个实例中，无论是劳动生产力，无论是供给和需求，也无论是商品的价值，都没有丝毫变化。除了这些价值的货币名称以外，什么也没有变。如果说，在这样的场合工人不应当争取工资的相应提高，那就等于说，当他得到的报酬不是实物而是名称时，他也应当心满意足。过去的整个历史证明，每当发生这样的货币贬值时，资本家总是急忙利用这种良机来欺骗工人。但是，许多派别的经济学家断定说，由于新发现一些产金地、改进银矿开采和水银供给较廉的结果，贵重金属的价值又重新降低了。这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大陆上普遍地同时产生了提高工资的要求。

(3) 我们以前都假定工作日有一定的界限。但是工作日

本身是没有固定界限的。资本的经常趋向是要极力把工作日延长到体力可能达到的极限，因为随着工作日长度的增加，剩余劳动，从而这劳动所创造的利润也同样增长起来。资本愈把工作日延长，它占有他人的劳动量也愈多。在十七世纪，甚至在十八世纪的前三分之二的时间里，全英国的正常工作日都是 10 小时。在反雅各宾战争¹⁴时期，——这一战争实际上是不列颠贵族反对不列颠劳动群众的战争，——资本常常庆祝自己的胜利，并把工作日从 10 小时延长到 12 小时，14 小时，18 小时。**马尔萨斯**决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但他在 1815 年左右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宣称，如果这种情形再继续下去，民族的生命就会被根本摧毁¹⁵。在普遍应用新发明的机器前几年即 1765 年左右，英国出了一本题为《论手工业》¹⁶的小册子。匿名的作者是工人阶级的死敌，他硬说必须扩大工作日的界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提议，除了采取其他手段之外，要建立一种习艺所¹⁷，这种习艺所按他的话说，应该是“恐怖所”。他给这种“恐怖所”规定的工作日是多长呢？12 小时，——这恰好是 1832 年资本家、经济学家和内阁大臣们所宣布的、对于 12 岁以下的儿童不仅是已经在实行，而且也是必要的工作时间¹⁸。

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在现代制度下他是不得不这样做的，——就是把这个劳动力让给资本家来消费，但是要在一定的合理的界限内消费。他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是为了保持这个劳动力，——这里我们且把它的自然损耗撇开不说，——而不是为了毁灭这个劳动力。工人在按劳动力每天或每周的价值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时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

劳动力在一天或一周内不应受到两天或两周内受到的那样大的损耗。现在举一例价值 1000 英镑的机器为例。如果这架机器能用 10 年，它在它所参与生产的商品的价值上每年将加 100 英镑。如果这架机器能用 5 年，它每年在这些商品的价值上将加 200 英镑。换句话说，它每年所损耗的价值和它所能使用的期限成反比。但这正好是一个工人和一架机器不同的地方。机器的损耗并不完全同它的使用期限相适应。而人的情况却相反，他的衰老程度要比单凭延长其工作的数字材料所能设想的程度大得多。

当工人为争取把工作日减到原先的合理界限而斗争时，或是当他们不能达到由法律规定出一种正常的工作日，而不得不力求用提高工资的办法，使工资提高得不仅和从他们身上榨取的剩余时间成比例，而且还要超过这一时间的办法，来防止过度劳动时，他们不过是在履行他们对自己和自己种族的一种义务罢了。他们不过是对资本的横暴掠夺加些限制罢了。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一个人如果没有一分钟自由的时间，他的一生如果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的需要所引起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末，他就连一个载重的牲口还不如。他身体疲惫，精神麻木，不过是一架为别人生产财富的机器。同时，现代工业的全部历史都表明，如果不对资本加以限制，它就会不顾一切和毫不留情地力求把整个工人阶级弄到这种极端退化的绝境。

资本家延长工作日，可能付出较高的工资，但同时仍会降低劳动的价值。如果工资的提高同加强榨取工人劳动量的程度，以及同因此而加速的劳动力的损耗程度不相适应，这

种情形是可能发生的。资本家也能用别种方法达到这点。例如英国资产阶级统计学家会告诉你们，在郎卡郡工厂里工作的工人家庭的平均工资增加了。他们却忘记补充说，现在投在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¹⁹下的，除了作为家长的成年男子，还有他的妻子，也许还有三四个小孩，而他们工资总额的增加同从工人家庭榨取出来的剩余劳动的总量的增加是不相称的。

甚至在工作日有一定界限的情况下，即在现今一切服从工厂立法的工业部门中存在这种界限的情况下，仅仅为了把劳动价值保持在原有水平上，提高工资也是必要的。劳动强度的提高可能迫使一个人在一小时内耗费他从前在两小时内耗费的生命力。在服从工厂立法的那些生产部门，由于机器动作速度的加强和每个人管理的工作机数量的加多，这种情形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如果劳动强度的提高或一小时内所费劳动量的增大与工作日的缩短保持应有的比例，那末这种缩短还能让工人得到好处。如果这个限度被破坏了，工人在一种形式下得到的好处就会在另一种形式下丧失掉，而 10 小时的劳动就可能造成像从前 12 小时那样大的破坏影响。工人通过争取把工资提高到相当于劳动强度提高的程度来制止资本的这种倾向，不过是反对使自己的劳动跌价和自己的种族退化罢了。

(4) 你们都知道，由于某些原因，——对于这些原因，现在没有说明的必要，——资本主义的生产要经过一定的周期性的循环。它要经过消沉、逐渐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和停滞等阶段。商品的市场价格和市场利润率，都随着这些阶段而变化，有时低于自己的平均水平，有时高于自己的

平均水平。你们考察一下这整个周期就会发现，市场价格的一种偏差是由别种偏差来补偿的，而在整个周期范围内，平均说来，商品的市场价格是由商品的价值来调节的。在市场价格下跌的阶段，以及在危机和停滞的阶段，工人即使不被从生产中完全抛出去，他的工资也一定会被降低。为了不致受骗起见，他甚至在市场价格这样下降的时候，也应当在工资究竟该降低多少的问题上同资本家进行斗争。如果工人在资本家获得特别高的利润的繁荣阶段不争取提高工资，那末他在整个工业周期内，平均说来甚至会得不到自己的平均工资或自己劳动的价值。工人的工资在周期中的不顺利阶段是必然要下降的，因此，如果要求工人在顺利的阶段拒绝争取补偿自己的损失，那就未免太愚蠢了。一般说来，一切商品的价值，只是由于不断变动的市场价格趋于平衡才能够实现，而这种趋于平衡又是供给和需求不断变动的结果。在现代制度的基础上，劳动不过是一种商品，是一种和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这就是说，劳动也必然要经历同样的变动，而且只是由于这些变动的结果，才能够获得与其价值相适应的平均价格。如果一方面把劳动看做一种商品，另一方面却把劳动放在那些调节商品价格的规律之外，那就很荒谬了。奴隶能得到经常的和定量的生活资料，雇佣工人却不是这样。雇佣工人应当争取自己工资的提高，即使只是为了补偿它在别种场合的降低。如果工人驯服地接受资本家的意志，接受资本家的命令，并把它当作最高的经济规律，他就一定要挨受奴隶所受的一切苦痛，而又得不到奴隶所享有的生存保障。

(5)在我所考察过的一切场合——它们是一百个中的九

十九个——我们已经看见，提高工资的斗争只不过是跟随先前的变化而来的，是由于生产的规模、劳动的生产力、劳动的价值、货币的价值、被榨取的劳动长度或强度、为供给和需求的升降所决定并与工业周期的各阶段相适应的市场价格涨落等方面发生变化所必然产生的结果；简言之，这一斗争就是劳动对资本先前行动所表示的一种反抗行动。如果撇开这些情况来考察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只看到工资的变动而忽视制约这些变动的其他一切变动，那你们就是根据一个错误的前提去得出错误的结论了。

14. 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及其结果

(1) 我已经指出，工人周期地反抗降低工资以及他们周期地力图提高工资，同雇佣劳动制度有密切的联系，并且也正是受下面这一事实所制约，即劳动既然等同于商品，因而也就受那些支配着一般价格变动的规律的支配。其次，我又已经指出，工资的普遍提高会引起一般利润率的降低，但却不会影响到商品的平均价格，也不会影响到商品的价值。现在终于发生了一个问题：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这场不断的斗争中，后者能取得多大的成功呢？

我可以概括地回答说，劳动的**市场价格**，如同其他一切商品的市场价格一样，在长时期里会与它的**价值**相适应，因此，不论怎样涨跌，也不论工人如何行动，他所得到的，平均起来只会是自己劳动的价值，亦即由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来决定的劳动力的价值，而这生

活资料的价值又是由生产这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劳动量来决定的。

但是，劳动力的价值或劳动的价值由于某些特点而与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不同。劳动力的价值由两种要素所构成：一种是纯生理的要素，另一种是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劳动力价值的最低界限由生理的要素来决定。这就是说，工人阶级为要保持和再生产自己，为要延续自己肉体的生存，就必须获得自己生活和繁殖所绝对必需的生活资料。所以这些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就构成劳动的价值的最低界限。另一方面，工作日的长度也有自己的极限，虽然伸缩性很大。它的最高限度决定于工人的体力。如果工人生命力每天的消耗超过一定限度，他就没有可能来每天重复这样紧张的工作。可是，我已经说过，这种界限的伸缩性是很大的。身体弱和寿命短的工人一代一代迅速地更替，也可以像身体强和寿命长的工人那样，使劳动市场得到保证。

除了这种纯粹生理的要素以外，劳动的价值还取决于每个国家的传统生活水平。这种生活水平不仅包括满足生理上的需要，而且包括满足由人们赖以生息教养的那些社会条件所产生的一定需要。英国人的生活水平可能降到爱尔兰人的生活水平；德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可能降到里窝尼亚农民的生活水平。关于历史传统和社会风俗在这方面起的巨大作用，你们可以从桑顿先生著的《人口过剩论》²⁰一书里看出，该书作者指出，英国各农业区的平均工资，至今还由于这些区域在脱离农奴状态时所处条件的好坏程度不同而多少有些不同。

包含于劳动价值中的这一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可能扩

大，也可能缩小，甚至可能完全消失，以至除了生理上的界限以外什么也不会剩下。在反雅各宾战争时期（正如那位不可救药的吞食赋税者兼尸位素餐的老乔治·罗斯经常说的那样，这个战争是为挽救我们神圣宗教的福利免遭渎神的法国人的侵犯而发动的），仁慈的英国农场主（我们在先前某次会议上曾好意地谈过他们），竟把农业工人的工资甚至降低到这种纯粹生理上的最低界限以下；而对于保持工人的肉体生存并延续其种族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方面的缺额，他们则根据济贫法²¹用救济金来填补。这是把雇佣工人变成奴隶，把莎士比亚的骄傲自由民变成贫民的一种高明手法。

如果你们把各个不同国家内或同一国家各个不同历史时代内的工资水平或劳动的价值水平比较一下，你们就会发现，劳动的价值本身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变数，它甚至在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仍旧不变的条件下也是一个变数。

这种比较也可以表明：不仅市场利润率是变动的，而且平均利润率也是变动的。

然而对于利润来说，并不存在任何一种可以决定其最低限度的规律。我们不能说，利润降低的极限是怎样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确定这个限度呢？因为我们虽能确定工资的最低限度，我们却不能够确定工资的最高限度。我们只能说，如果工作日的界限是一定的，利润的最高限度就与生理上所能容许的工资的最低限度相适应；如果工资是一定的，利润的最高限度就与工人体力所能容许的工作日延长程度相适应。所以利润的最高限度受生理上所能容许的工资的最低限度和生理上所能容许的工作日的最高限度的限制。显然，在最高

利润率的这两个界限之间可能有许多变化。利润率的实际水平只是通过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不断斗争来确定，资本家经常力图把工资降低到生理上所能容许的最低限度，把工作日延长到生理上所能容许的最高限度，而工人则经常在相反的方向上进行抵抗。

归根到底，这是斗争双方力量对比的问题。

(2) 至于谈到限制工作日，无论在英国或其他各国，这种限制从来都是依靠立法上的干涉，而这种干涉如果没有工人方面的经常压力，是永远也不会出现的。无论如何，工作日的限制决不可能通过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私人协商来达到。这种采取普遍政治行动的必要性本身就证明了，资本在其纯粹经济的行动上是比较强有力的一方。

至于谈到劳动价值的界限，那末，这种界限的实际确定总是依供给和需求为转移。我所说的是资本方面对劳动的需求和工人方面对劳动的供给。在殖民地国家里，供求规律有利于工人。因此，美国的工资水平是比较高的。在那里，资本用尽一切办法，也不能制止劳动市场往往因雇佣工人经常转化为独立自耕农而陷于空虚的情况。对于很大一部分美国人民说来，当雇佣工人仅仅是一种过渡状态，他们希望迟早总能脱离这种状态。为了纠正殖民地的这种情况，父母为怀的不列颠政府不久前就开始奉行一种所谓现代殖民学说，其内容是对殖民地的土地人为地规定一种高价，借以阻止雇佣工人过分迅速地转化为独立农民。

现在我们来谈谈资本支配全部生产过程的那些古老的文明国家。例如拿英国农业工人的工资在 1849 年至 1859 年时

期提高的情形来说吧。由于这种提高而产生的后果怎样呢？农场主没有能够——正如我们的朋友韦斯顿会劝告他们的那样——提高小麦的价值；他们甚至没有能够提高小麦的市场价格。相反，他们不得不听任这种市场价格下降。但在这十一年中，他们采用了各种机器，开始掌握各种更科学的方法，把一部分耕地变成了牧场，增大了农场的规模，同时也扩大了生产的规模，并且由于采取了这些以及其他各种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措施而减少了对劳动的需求后，又使得农村人口相对过剩起来了。资本在各个早已住有居民的古老国家内用来或快或慢地对付提高工资的方法，一般都是如此。李嘉图正确地说过，机器经常跟劳动相竞争，并且往往只有在劳动价格已达到某种高度的条件下才可能被采用²²；然而采用机器不过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许多方法之一罢了。同一发展过程，一方面使简单劳动成为相对过剩，另一方面又使熟练劳动简单化，因而也就使其价值降低。

这同一规律还以另一种形式来实现。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即使工资的水平相当高，资本的积累也是愈来愈快。由此可以作出结论，——正如**亚当·斯密**(在他生活的时代，近代工业还处于幼年时期)所作过的那样，——资本的这种加速积累，由于能保证对工人劳动的需求日益增长而必然会使情况对工人有利。现代许多著作家都同意这种观点，所以对于最近二十年来英国资本的增加比人口的增加迅速得多，而工资却没有相应地大量提高一事，感到诧异。但是随着积累的进展，资本的构成也发生愈来愈大的变化。资本中由不变资本即由机器、原料和各种生产资料等所构成的这一部分，比

耗费在支付工资或购买劳动上的那一部分日益增多起来。这一规律已由巴顿、李嘉图、西斯蒙第、理查·琼斯教授、拉姆赛教授、舍尔比利埃及其他等人多少确切地阐明过了。

如果资本中这两个构成部分原来的比例是一比一，那末它在工业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将成为五比一，等等。如果总资本为 600，其中 300 是用在工具和原料等上面，其余 300 是用在工资上面，那末要造成对 600 工人而不是对 300 工人的需求，就需要使总资本增加一倍。但是如果总资本 600 中有 500 是用在机器和原料等上面，只有 100 是用在工资上，那末要造成对 600 工人而不是对 300 工人的需求，这同一资本就要从 600 增至 3600。因此，在工业发展的进程中，对劳动的需求总是赶不上资本的积累。不错，这一需求是增加的，但它是在和总资本的增加比较起来日益递减的比例上增加的。

上面这些不多的解释足以表明，现代工业的发展本身定会愈来愈有利于资本家而有害于工人，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不是使平均工资水平提高，而是使它降低，也就是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使**劳动的价值**降低到它的**最低限度**。但是，既然现代制度下的**实际情况**有着这种趋势，那末，这是不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放弃对资本的掠夺行为进行斗争，并应当停止利用偶然的有利机会来暂时改善自己状况的尝试呢？如果工人这样做，他们就会沦为一群听天由命的、不可挽救的可怜虫。我想我已经说明：工人为工资水平进行的斗争，同整个雇佣劳动制度有密切的联系；工人为提高工资的努力，在一百回中有九十九回都只是力求维持劳动的现有价值；工人为劳动价格而与资本家斗争的必要性，是根源于工人所处的

被迫把自己当作商品出卖的地位。如果工人在和资本的日常冲突中表示畏缩让步，他们就决不能开展任何规模较大的运动。

同时，即使把工人所处的那种和雇佣劳动制度相连的一般奴役地位完全撇开不谈，工人阶级也不应夸大这一日常斗争的最终结果。它不应当忘记：它在这种日常斗争中只是在反对结果，而不是在反对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只是在阻挠这种下降的趋势，而不是改变这一趋势的方向；只是在用止痛剂，而不是在除病根。所以工人不应当只局限于这些由于资本的永不停止的进攻或市场的各种变动而必然经常出现的游击式的搏斗。他们应当懂得：现代制度除了带来一切贫困外，同时还造成对社会进行经济改造所必需的种种物质条件和社会形式。工人应当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为了阐明基本问题，我不得不作这样一个冗长的，恐怕是令人厌倦的说明，现在我提出下面的决议案来结束我的报告：

（1）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会引起一般利润率的降低，但整个说来并不影响到商品的价格。

（2）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不是引起工资平均水平的提高，而是引起这个水平的降低。

（3）工联作为抵抗资本进攻的中心，行动得颇有成效。它们遭到失败，部分是由于不正确地使用自己的力量。然而一般说来，它们遭到失败则是因为它们只限于进行游击式的斗

争以反对现存制度所产生的结果，而不同时力求改变这个制度，不运用自己有组织的力量作为杠杆来最终解放工人阶级，也就是最终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写于 1865 年 5 月底—5 月 27 日

原文是英文

1898 年第一次以单行本形式在
伦敦发表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6 卷第 111——169 页

注 释

- 1 这部著作是马克思于 1865 年 6 月 20 日和 27 日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会议上用英语作的报告。这篇报告是由总委员会委员约翰·韦斯顿 5 月 2 日和 23 日的发言引起的，韦斯顿在发言中企图证明，货币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对工人没有好处，并由此做出工会“有害”的结论。保存下来的报告稿是马克思的手稿。报告由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以《价值、价格和利润》(《Value, price and profit》)为题于 1898 年首次在伦敦发表，并附有爱德华·艾威林写的序。引言和前六节在手稿中是没有标题的，由艾威林加上了标题。在本书中，除了总标题以外，这些小标题都保留下来了。
- 2 指国民公会于 1793 年 5 月 4 日、9 月 11 日 29 日以及 1794 年 3 月 20 日通过的各项法令，这些法令规定了固定的最高工资，同时也规定了谷物、面粉和其他日用品的固定的最高价格。
- 3 1861 年 9 月，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在曼彻斯特举行第三十一届年会，当时正在恩格斯那里作客的马克思。参加了这次会议。协会经济部主席威·纽马奇(马克思把他的姓写错了)曾在会上发言，他还主持了部的会议，并作了题为《联合王国的立法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健全的征税原则》的报告。见《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第三十一届年会报告，1861 年 9 月于曼彻斯特》1862 年伦敦版第 230 页(《Report of the Thirty-first Meeting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held at Manchester in September 1861》.London, 1862, p. 230)。
- 4 指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图克关于工业、贸易和财政的历史的六卷本著作，这部著作曾以下列书名出过单行本：《价格史和货币流通状况，1793—1837 年》1838 年伦敦版第 1—2 卷(《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from 1793 to 1837》).

Vol. I-II, London, 1838)、《价格史和货币流通状况, 1838 年、1839 年》1840 年伦敦版(《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in 1838 and 1839》London, 1840)和《价格史和货币流通状况, 1839—1847 年》1848 年伦敦版(《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Circulation, from 1839 to 1847 inclusive》.London, 1848), 以及托·图克和威·纽马奇合著的《1848—1856 年九年中的价格史和货币流通状况》1857 年伦敦版第 5—6 卷(T. Tooke and W. Newmarch. 《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during the Nine Years 1848—1856》. Vol.V-VI , London, 1857)。

- 5 见罗·欧文《评工业体系的影响》1817 年伦敦版第 76 页(R. Owen. 《Observations on the Effect of the Manufacturing System 》.London, 1817, p. 76)。该书第一版于 1815 年出版。
- 6 十九世纪中叶, 在资本主义工业狂热发展和伴随着相对的农村人口过剩而按资本主义原则进行农业改组的情况下, 发生了大批拆毁英国农业工人的住宅的事件。当时土地所有者缴纳济贫税的数额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居住在他的土地上的贫民人数的多少, 这种情况在加剧大批拆毁农村住宅方面起了显著的作用。土地所有者自动拆毁那些他们自己用不着的然而却可以供“过剩的”农村居民居住的处所(关于这事, 见《资本论》第 1 卷第 23 章第 5 节 e)。
- 7 艺术和手工业协会是资产阶级教育性质和慈善性质的团体, 于 1754 年在伦敦成立。该会冠冕堂皇地宣布它的宗旨是:“鼓励艺术、手工业和商业”并奖励那些帮助“为贫民提供生计、扩大商业、使国家富足等等的人”。它企图充当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调停人。马克思把它称为“艺术和骗术协会”
- 8 文中提到的报告是 1864 年逝世的约翰·摩尔顿的儿子约翰·查默斯·摩尔顿做的。
- 9 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是在 1846 年 6 月通过的。英国的谷物法规定了

高额的谷物进口税，其目的在于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此项法律是为大地主的利益于 1815 年实行的。谷物法引起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结果在 1846 年通过了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这一措施以及由此引起的谷物价格的下跌，虽然使生活费用有所减低，但归根结底还是降低了工人的工资，增加了资产阶级的利润。谷物法的废除沉重地打击了土地贵族，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更迅速的发展。

- 10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 年伦敦版第 26 页 (D. Ricardo.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 London, 1821, p. 26)。该书第一版于 1817 年在伦敦出版。
- 11 B. Franklin. 《A Modest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Necessity of a Paper Currency 》. In; The Works , Vol. II, Boston, 1836. 这一著作于 1729 年首次出版。
- 12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14 年爱丁堡版第 1 卷第 93 页 (A.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 Vol. I, Edinburgh, 1814, p. 93)。
- 13 托·霍布斯《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载于他的《英文著作选》1839 年伦敦版第 3 卷第 76 页 (Th, Hobbes. 《Leviathan: or, the Matter, Form, and Power of a Commonwealth, Ecclesiastical and Civil》. In: The English Works . Vol. III, London, 1839, p. 76).
- 14 指 1793 年至 1815 年英国所进行的反对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法国的历次战争。在这几次战争期间，英国政府在国内建立了残酷的恐怖制度来对付劳动群众。尤其是在文中指出的那个时期，曾经镇压了许多起人民的风潮，并且通过了一些禁止工人结社的法律。
- 15 马克思指的是马尔萨斯的小册子《 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及其调整原则的研究》1815 年伦敦版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Progress of Rent, and the Principles by which it is regulated》. London,

1815)。

- 16 指 1770 年在伦敦出版的一本书:《论手工业和商业。兼评赋税》(《An Essay on Trade and Commerce: containing Observations on Taxes》)。这本匿名的书被认为是 J. 肯宁安的作品。
- 17 习艺所是英国于十八世纪开办的,根据 1834 年通过的新的“济贫法”习艺所就变成了济贫的唯一形式,习艺所的制度同从事苦役的牢狱中的制度不相上下,人民称之为“穷人的巴士底狱”。
- 18 指 1832 年 2-3 月英国议会对 1831 年中提出的关于把童工和少年工的工作日限制到十小时的法案所进行的讨论。
- 19 林加崇拜即对湿婆神的崇拜,盛行于南印度的林加崇拜者教派中(“林加”是湿婆的象征)。这一印度教派不承认种姓的划分,反对斋戒、祭祀和朝圣。
礼格纳特是印度教的大神之一毗湿奴的化身。崇拜礼格纳特的教派的特点是宗教仪式上的十分豪华和极端的宗教狂热,这种狂热表现为教徒的自我折磨和自我残害。在举行大祭的日子里,某些教徒往往投身于载着毗湿奴神像的车轮下让它轧死。
- 20 威·托·桑顿《人口过剩及其补救办法》1846 年伦敦版(W. Th. Thornton.《Over-population and its Remedy》. London, 1846)。
- 21 济贫法最初产生于十六世纪的英国,以后不断修改。表面上由教区征收济贫税“救济”贫民,实际上是剥削阶级“吸干了无产者最后的一滴血,然后再对他们施以小恩小惠,使自己自满的伪善的心灵感到快慰,并在世人面前摆出一付人类恩人的姿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566 页)。
- 22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 年伦敦版第 479 页。

恩 格 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一

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统治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

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

头立地的时代^①，最初，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的头脑以及通过它的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一切人类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后来这句话又有了更广泛的含义：和这些原理矛盾的现实，实际上被上下颠倒了。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做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理性的王国才开始出现。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¹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

① 关于法国革命黑格尔这样写道：“正义思想、正义概念立刻得到了公认，非正义的旧支柱不能对它作任何抵抗。因此，正义思想现在就成了宪法的基础，今后一切都必须以它为根据。自从太阳照耀在天空而行星围绕着太阳旋转的时候起，还从来没有看到人用头立地，即用思想立地并按照思想去构造现实。阿那克萨哥拉第一个说，Nûs 即理性支配着世界；可是直到现在人们才认识到思想应当支配精神的现实。这是一次壮丽的日出。一切能思维的生物都欢庆这个时代的来临。这时笼罩着一种高尚的热情，全世界都浸透了一种精神的热忱，仿佛第一次达到了神意和人世的和谐。”（黑格尔《历史哲学》1840 年版第 535 页）难道现在不应当用反社会党人法去反对已故的黑格尔教授的这种危险的颠覆学说吗？

国。十八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

但是，除了封建贵族和作为社会所有其余部分的代表出现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还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游手好闲的富人和从事劳动的穷人之间的一般的对立。正是由于这种情形，资产阶级的代表才能标榜自己不是其一特殊的阶级的代表，而是整个受苦人类的代表。不仅如此，资产阶级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背负着自己的对立物：资本家没有雇佣工人就不能生存，而且，随着中世纪的行会师傅发展成为现代的资产者，行会帮工和行会外的短工便相应地发展成为无产者。虽然总的说来，市民等级在和贵族斗争时有权认为自己同时代表当时的各个劳动阶级的利益，但是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多少发展了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例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再洗礼派和托马斯·闵采尔，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均派²，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伴随着一个还没有成熟的阶级的这些革命武装起义，产生了相应的理论表现；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³，而在十八世纪已经有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摩莱里和马布利）。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利方面，它也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了；必须加以消灭的不仅是阶级特权，而且是阶级差别本身。苦修苦炼的、禁绝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这个新学说的第一个表现形式。后来出现了三个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在圣西门那里，除无产阶级的倾向外，资产阶级的倾向还有一定的

影响。欧文在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国家里，在这种生产所造成的种种对立的影响下，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出发，系统地制定了他的消除阶级差别的方案。

所有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但是他们的王国和启蒙学者的王国是有天壤之别的。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乎理性的和不正义的，所以也应该像封建制度和以往的一切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到垃圾堆里去。真正的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出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只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人物在五百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五百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

我们已经看到，为革命作了准备的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如何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做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们要求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要求无情地铲除一切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正好在那时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悟性而已。因此，当法国革命把这个理性的社会和这个理性的国家实现了的时候，新制度就表明，不

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卢梭的社会契约在恐怖时代获得了实现，对自己的政治能力丧失了信心的资产阶级为了摆脱这种恐怖，起初求助于腐败的督政府，最后则托庇于拿破仑的专制统治。⁴早先许下的永久和平变成了一场无休止的掠夺战争。理性的社会的遭遇也并不更好一些。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在普遍的幸福中得到解决，反而由于缓和这种对立的行会特权和其他特权的废除，由于减弱这种对立的教会慈善设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锐化了；现在已经实现的脱离封建桎梏的“财产自由”，对小资产者和小农说来，就是把他们的被大资本和大地产的强大竞争所压垮的小财产出卖给这些大财主的自由，于是这种“自由”对小资产者和小农说来就变成了失去财产的自由；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现金交易，如卡莱尔所说的，日益成为社会的唯一纽带。犯罪的次数一年比一年增加。如果说，以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干出来的封建罪恶虽然没有消灭，但终究已经暂时被迫收敛了，那末，以前只是暗中偷着干的资产阶级罪恶却更加猖獗了。商业日益变成欺诈。革命的箴言“博爱”⁵在竞争的诡计和嫉妒中获得了实现。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了刀剑，成为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初夜权从封建领主手中转到了资产阶级工厂主的手中。卖淫增加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婚姻本身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法律承认的卖淫的形式，是卖淫的官方的外衣，并且还以不胜枚举的通奸作为补充。总之，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

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那时只是还缺少指明这种失望的人，而这种人随着世纪的转换出现了。1802年出版了圣西门的《日内瓦书信》；1808年出版了傅立叶的第一部著作，虽然他的理论基础在1799年就已经奠定了；1800年1月1日，欧文担负了新拉纳克的管理工作。⁶

但是，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立还很不发展。在英国刚刚产生的大工业，在法国还完全没有。但是，一方面，只有大工业才能发展那些使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消灭成为绝对必要的冲突——不仅是大工业所产生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而且是它所产生的生产力和交换形式本身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大工业又正是通过这些巨大的生产力来发展解决这些冲突所必需的手段。因此，如果说，在1800年左右，新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冲突还只是在开始形成，那末，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就更是这样了。虽然巴黎的无财产的群众在恐怖时期曾有一瞬间夺得了统治权，从而能够引导资产阶级革命（甚至是反对资产阶级的）达到胜利，但是他们只是以此证明了，他们的统治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持久的。在当时才刚刚作为新阶级的胚胎从这些无财产的群众中分离出来的无产阶级，还完全无力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表现为一个被压迫的受苦的等级，无力帮助自己，最多只能从外面、从上面取得帮助。

这种历史情况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

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缺点；消除这些缺点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既然这一点已经确定，我们就不再谈论现在已经完全属于过去的这一方面了。让著作界的小贩们去一本正经地挑剔这些现在只能使人发笑的幻想吧，让他们以自己的严谨的思维方式优越于这种“疯狂的念头”而自我陶醉吧。使我们感到高兴的，倒是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而这些却是那班庸人所看不见的。

圣西门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他在革命爆发时还不到三十岁。这次革命，是第三等级即从事生产和贸易的多数国民对以前享有特权的游手好闲的等级即贵族和僧侣的胜利。但是，很快就暴露出，第三等级的胜利只是这个等级中的一小部分人的胜利，是第三等级中享有社会特权的阶层即资产阶级夺得政治权力。而且这个资产阶级还在革命过程中就迅速地发展起来了，这是因为它通过没收后加以拍卖的贵族和教会的地产进行了投机，同时又以承办军用品欺骗了国家。正是这些骗子的统治在督政府时代使法国和革命濒于复灭，从而使拿破仑得到举行政变的借口。因此，在圣西门的头脑中，第三等级和特权等级之间的对立就采取了“劳动者”和“游手好闲者”之间的对立的形式。游手好闲者不仅是指旧时的特权分子，而且也包括一切不参加生产和贸易而靠租息为生

的人。而“劳动者”不仅是指雇佣工人，而且也包括厂主、商人和银行家。游手好闲者失去了精神领导和政治统治的能力，这已经是确定无疑的，而且由革命最终证实了。至于无财产者没有这种能力，在圣西门看来，这已由恐怖时期的经验所证明。那末，应当是谁来领导和统治呢？按照圣西门的意见，应当是科学和工业，它们两者由一种新的宗教纽带，即必然是神秘的和等级森严的“新基督教”结合起来，而这种纽带的使命就是恢复从宗教改革时起被破坏了的宗教观点的统一。可是，科学就是学者，而工业首先就是积极的资产者，厂主、商人、银行家。这些资产者固然应当成为一种公众的官吏、社会所信托的人，但是对工人还应当保持发号施令的和享有经济特权的地位。至于银行家，那末正是他们应当担负起通过调节信用来调节整个社会生产的使命。——这样的见解是完全适应于大工业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在法国还只是刚刚产生的那个时代的。但是，圣西门特别强调的是：他随时随地都首先关心“人数最多和最贫穷的阶级”（《la classe la plus nombreuse et la plu spauvre》）的命运。

圣西门在日内瓦书信中已经提出这样一个论点：

“一切人都应当劳动。”

在同一部著作中他已经指出，恐怖统治是无财产的群众的统治。

他向他们高声说道：“看吧，当你们的伙伴在统治法国的时候，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造成了饥荒！”⁷

但是，了解到法国革命是阶级斗争，并且不仅是贵族和

资产阶级之间的、而且是贵族、资产阶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 1802 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在 1816 年，圣西门宣布说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并且预言说政治将完全为经济所包容⁸。虽然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这样的认识在这里仅仅以萌芽状态表现出来，但是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这种思想，即最近纷纷议论的“废除国家”的思想，已经明白地表达出来了。同样比他的同时代人优越的是：在 1814 年联军刚刚开进巴黎以后，接着又在 1815 年百日战争时，他声明，法国和英国的同盟以及这两个国家和德国的同盟是欧洲的繁荣和和平的唯一保障⁹。在 1815 年向法国人宣传要和滑铁卢战役的胜利者建立同盟，这确实既要有勇气又要历史远见。¹⁰

如果说，我们在圣西门那里看到了天才的远大眼光，由于他有这种眼光，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几乎一切并非严格地是经济的思想都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他的思想中，那末，我们在傅立叶那里就看到了他对现存社会制度所作的具有真正法国人的风趣、但并不因此显得不深刻的批判。傅立叶就资产阶级所说的话，就他们在革命前的狂热的预言者和革命后的被收买的奉承者所说的话，抓住了他们。他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世界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贫困，他不仅拿这种贫困和以往的启蒙学者关于只为理性所统治的社会、关于能给一切人以幸福的文明、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诱人的约言作对比，而且也拿这种贫困和当时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华丽的辞句作对比；他指出，和最响亮的词句相适应的到处都是最可怜的现实，他辛辣地嘲讽这种词句的无可挽救的破产。傅

立叶不仅是批评家，他的永远开朗的性格还使他成为一个讽刺家，而且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讽刺家之一。他以巧妙而诙谐的笔调描述了随着革命的低落而盛行起来的投机取巧和当时法国商业中普遍的小商贩气息。他更巧妙地批判了两性关系的资产阶级形式和妇女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他第一个表明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¹¹。但是傅立叶最伟大的地方是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他把社会历史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野蛮、宗法和文明。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即从十六世纪发展起来的社会制度。他指出：

“这个文明制度使野蛮时期任何一种以简单的方式干出来的罪恶都采取了复杂的、暧昧的、两面的、虚伪的存在形式”；文明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因此，它所达到的结果总是和它希望达到或者佯言希望达到的相反¹²。所以，譬如说，“在文明阶段，贫困是由富裕本身所产生的”¹³。

我们看到，傅立叶是和他的同时代人黑格尔一样巧妙地掌握了辩证法的。他反对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空谈，而同样辩证地断言，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的上升时期，但是也有它的下降时期¹⁴，而且他还把这个看法用于整个人类的未来。正如康德在自然科学中提出了地球将来要归于灭亡的思想一样，傅立叶在历史研究中提出了人类将来要归于灭亡的思想。

当革命的风暴横扫整个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一种

比较平静的但是威力并不因此减弱的变革。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飚时期。社会愈来愈迅速地分化为大资本家和无产者，现在处于他们二者之间的，已经不是以前的稳定的中间等级，而是不稳定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群众，他们过着不安定的生活，他们是人口中最流动的部分。当时新的生产方式还处在上升时期的最初阶段；它还是正常的、适当的、在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能的生产方式。但是它在那时已经产生了惊人的社会恶果：无家可归的人聚居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一切传统习惯的约束、宗法制从属关系、家庭都解体了；劳动时间，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抛到一个全新的环境中（从乡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从稳定的生活条件转到天天都在变化的、毫无保障的生活条件）的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了。这时有一个二十九岁的厂主以改革家的身分出现了，这个人具有像孩子一样单纯的高尚的性格，同时又是一个少有的天生的领导者。罗伯特·欧文接受了唯物主义启蒙学者的学说，认为人的性格是先天组织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产物。社会地位和欧文相同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工业革命只是便于浑水摸鱼和大发横财的一片混乱。欧文则认为，工业革命是运用其心爱的理论并把混乱化为秩序的好机会。当他在曼彻斯特领导一个有五百多工人的工厂的时候，就试行了这个理论，并且获得了成效。从 1800 到 1829 年间，他以股东兼经理的身分领导了苏格兰的新拉纳

克大棉纺厂，他在这里按照同样的精神办事，但是在行动上有更大的自由，而且获得了使他名闻全欧的成效。新拉纳克的人口逐渐增加到两千五百人，这些人的成分原来是极其复杂的，而且多半是极其堕落的分子，可是欧文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完善的模范移民区，在这里，酗酒、警察、刑事法庭、诉讼、贫困救济和慈善事业都绝迹了。而他之所以做到这点，只是由于他使人生活在比较合乎人的尊严的环境中，特别是关心成长中的一代的教育。他发明了并且第一次在这里创办了幼儿园。孩子们从两岁起就进幼儿园；他们在那生活得非常愉快，父母简直很难把他们领回去。欧文的竞争者迫使工人每天劳动十三至十四小时，而在新拉纳克只劳动十小时半。当棉纺织业危机使工厂不得不停工四个月的时候，歇工的工人还继续领取全部工资。虽然如此，这个企业的价值还是增加了一倍多，而且直到最后都给企业主们带来大量的利润。

但是欧文并不对这一切感到满足。他给他的工人创造的生活条件，在他看来还远不是合乎人的尊严的；他说，

“这些人都是我的奴隶”；

他给他们安排的比较良好的环境，还远不足以使人的性格和智慧得到全面的合理的发展，更不用说自由发挥其才能了。

“可是，这两千五百人中从事劳动的那一部分人给社会生产出的实际财富，在不到半世纪前还需要六十万人才能生产出来。我问自己：这两千五百人所消费的财富和以前六十万人所应当消费的财富之间的差额到哪里去了呢？”

答案是明白的。这个差额是落到企业所有者的手里去了，

他们除了领取百分之五的股息以外，还得到三十万英镑（六百万马克）以上的利润，新拉纳克尚且如此，英国其他一切工厂就更不用说了。

“没有这些由机器创造的新财富，就不能进行推翻拿破仑和保持贵族的社会原则的战争。而这个新的力量是劳动阶级创造的。”^①

因此，果实也应当属于劳动阶级。在欧文看来，以前仅仅使少数人发财而使群众受奴役的新的强大的生产力，提供了改造社会的基础，它只应当作为大家的共同财产来为大家的共同福利服务。

欧文的共产主义就是通过这种纯粹营业的方式，作为所谓商业计算的果实产生出来的。它始终都保持着这种实践的性质。例如，在1823年，欧文提出了通过共产主义移民区消除爱尔兰贫困的办法，并附上了关于筹建费用、每年开支和预计收入的详细计算^⑯。而在他的关于未来的最终计划中，他从技术上规定了各种细节，附上了平面图、正面图和鸟瞰图，而这一切都做得非常内行，以致他的改造社会的方法一旦被采纳，则各种细节的安排甚至从专家的眼光看来也很少有什么可以反对的。

转向共产主义是欧文一生中的转折点。当他还只是一个慈善家的时候，他所获得的只是财富、赞扬、名望和荣誉。他是欧洲最有名望的人物。不仅社会地位和他相同的人，而且

① 摘自《头脑和实践中的革命》——给一切“欧洲红色共和党人、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1848年的法国临时政府，以及“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负责顾问”^⑮

连达官显贵、王公大人们都点头倾听他的讲话。可是当他提出他的共产主义理论时，情况就完全变了。在他看来，阻碍社会改造的首先有三大障碍：私有制、宗教和现在的婚姻形式。他知道，当他向这些障碍进攻的时候，他所面临的是什么：官场社会的普遍排斥，他的整个社会地位的丧失。但是，他并没有却步，他不顾一切地向这些障碍进攻，而他所预料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他被逐出了官场社会，受到了报刊的封锁，他由于以全部财产在美洲进行的共产主义试验的失败而变得一贫如洗，于是他就直接转向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中又进行了三十年的活动。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成就，都是和欧文的名字联在一起的。例如，由于他的五年的努力，在1819年通过了限制工厂中女工和童工劳动的第一个法律¹⁷。他主持了英国工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全国各工会联合成一个总工会¹⁸。同时，作为向完全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过渡的措施，一方面他组织了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这些合作社从这时起至少已经在实践上证明，无论商人或厂主都决不是不可缺少的人物；另一方面他组织了劳动市场¹⁹，在这里，劳动产品借助于以劳动小时为单位的劳动券进行交换；这种市场必然要遭到失败，但是充分预示了晚得多的蒲鲁东的交换银行²⁰，而它和后者不同的就是它并没有被描写为医治一切社会病害的万应药方，而只是激进得多的社会改造的第一步。

空想主义者的见解曾经长期地支配着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观点，而且现在还部分地支配着这种观点。法国和英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不久前都还信奉这种见解，包括魏特林在内

的先前的德国共产主义也是这样。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同时，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又是各不相同的；而因为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独特形式又是由他的主观理解、生活条件、知识水平和思维发展程度所决定的，所以，解决各种绝对真理的这种冲突的办法就只能是它们互相磨损。由此只能得出一种折衷的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直到今天还统治着法国和英国大多数社会主义工人的头脑，它是由比较温和的批评意见、经济理论和各学派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的观念组成的色调极为复杂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的各个组成部分在辩论的激流中愈是像石子在溪流中一样地磨光其锋利的棱角，这种混合物就愈加容易构成。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二

这时，和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一起并继它之后，现代德国哲学产生了，而且在黑格尔身上达到了顶峰。它的最大的功绩，就是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他们中最博学的人物亚里士多德就已经研究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的形式。而近代哲学

虽然也有辩证法的卓越代表（例如笛卡儿和斯宾诺莎），却日益陷入（特别是由于英国的影响）所谓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十八世纪的法国人也几乎全都为这种思维方式所支配，至少在他们的专门哲学的著作中是如此。可是，在本来意义的哲学之外，他们也能够写出辩证法的杰作；我们只要提一下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子》²¹ 和卢梭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就够了。——在这里，我们来简略地谈谈这两种思维方法的实质。

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所以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总的画面，其中各个细节还或多或少地隐在背景中，我们注意得更多的是运动、转变和联系，而不是什么在运动、转变和联系。这个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切都存在，同时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产生和消失。但是，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想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的画面。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逐个地加以研究。这首先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的任务；而这些科学部门，由于十分明显的原因，在古典时代的希腊人那里只占有从属的地位，因

为他们首先必须为这种研究搜集材料。只有当自然和历史的材料搜集到一定程度以后，才能进行批判的分析和比较，并相应地进行纲、目和种的划分。因此，精确的自然研究只是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²² 的希腊人那里才开始，而后来在中世纪由阿拉伯人继续发展下去；可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十五世纪后半期才开始，从这时起它就获得了日益迅速的进展。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种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四百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做活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²³。在他们看来，一个事物要么存在，要么就不存在；同样，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己又是别的东西。正和负是绝对互相排斥的；原因和结果也同样是处于固定的相互对立中。初看起来，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它是合乎所谓常识的。然而，常识在它自己的日常活动范

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伴侣，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遇到最惊人的变故。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都迟早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要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它们的静止，忘了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知道，并且可以肯定地说某种动物存在还是不存在；但是在进行较精确的研究时，我们就发现这有时是极其复杂的事情。这一点法学家们知道得很清楚，他们绞尽脑汁去发现一条判定在子宫内杀死胎儿是否算是谋杀的合理界限，结果总是徒劳。同样，要确定死的时刻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生理学证明，死并不是突然的、一瞬间的事情，而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同样，任何一个有机体，在每一瞬间都是它本身，又不是它本身；在每一瞬间，它同化着自外界供给的物质，并排泄出其他物质；在每一瞬间，它的机体中都有细胞在死亡，也有新的细胞在形成；经过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这个机体的物质便完全更新了，由其他物质的原子代替了，所以，每个有机体永远是它本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在进行较精确的考察时，我们也发现，某种对立的两极，例如正和负，是彼此不可分离的，正如它们是彼此对立的一样，而且不管它们如何对立，它们总是互相渗透的；同样，原因和结果这两个观念，只有在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有其本来的意义；可是只要我们把这种个别场合放在它和世界整体的

总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观念就汇合在一起，融化在普遍相互作用的观念中，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的，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

所有这些过程和思维方法都是形而上学思维的框子所容纳不下的。相反地，对辩证法来说，上述过程正好证明了它自己的方法是正确的，因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连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的。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自然界不是循着一个永远一样的不断重复的圆圈运动，而是经历着实的历史。这里首先就应当指出达尔文，他极其有力地打击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因为他证明了今天的整个有机界，植物和动物，因而也包括人类在内，都是延续了几百万年的发展过程的产物。可是，因为学会辩证地思维的自然科学家到现在还屈指可数，所以，现在统治于理论自然科学中并使教师和学生、作者和读者都同样感到绝望的那种无限混乱的状态，完全可以从已经达到的成果和传统的思维方式之间的这个冲突中得到说明。

因此，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经常注意产生和消失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现代德国哲学一开始就是以这种

精神进行活动的。康德一开始他的科学生涯，就把牛顿的稳定的和自从有名的第一次推动力作出以后就永远如此的太阳系变成了历史的过程，即太阳和一切行星由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过程。同时，他已经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太阳系的产生也预示着它将来的不可避免的灭亡。过了半个世纪，他的观点由拉普拉斯从数学上作出了证明；又过了半个世纪，分光镜证明了，在宇宙的空间存在着凝聚程度不同的炽热的气团。²⁴

这种现代德国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达到了顶峰，在这个体系中，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从这个观点看来，人类的历史已经不再是乱七八糟的一堆统统应当被这时已经成熟了的哲学理性的法庭所唾弃并最好尽快被人遗忘的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而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现在就在于通过一切迂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

至于黑格尔的体系没有解决它给自己提出的这个任务，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它的划时代的功绩是在于它提出了这个任务。这不是任何个别的人所能解决的任务。虽然黑格尔和圣西门一样是当时最博学的人，但是他毕竟受到了限制，首先是他的必然有限的知识的限制，其次是他那个时代的在广度在深度方面都同样有限的知识和见解的限制。但是除此以外还有第三种限制。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就是说，在

他看来，他头脑中的思想不是现实的事物和过程的多少抽象的反映，相反地，在他看来，事物及其发展只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以某种方式存在着的“观念”的现实化的反映。这样，一切都被弄得头足倒置了，世界的现实联系完全被颠倒了。所以，不论黑格尔如何正确地和天才地把握了一些个别的联系，但由于上述原因，就是在细节上也有许多东西不能不是牵强的、造作的、虚构的，一句话，被歪曲的。黑格尔的体系作为体系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流产，但也是这类流产中的最后一次。就是说，它还包含着不可救药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它以历史的观点作为基本前提，即把人类的历史看做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按其本性来说是不能通过发现所谓绝对真理来达到其智慧的顶峰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硬说自己是这个绝对真理的全部内容。包罗万象的、最终完成的关于自然和历史的认识的体系，是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但是这决不排斥，反而肯定，对于整个外部世界的有系统的认识是可以一代一代地得到巨大进展的。

了解了以往的德国唯心主义的完全荒谬，这就必然导致唯物主义，但是要注意，并不是导致十八世纪的纯形而上学的、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和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笼统地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的做法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无论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人那里，还是在黑格尔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自然观都是：自然界是一个在狭小的循环中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其中有牛顿所说的永恒的天体和林耐所说的不变的有机物种。和这个自然观相反，现代唯物主义

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从这些成就看来，自然界也有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天体和在适宜条件下存在于天体上的有机物种一样是有生有灭的；至于循环，即使它能够存在，也具有无限加大的规模。在这两种情况下，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

但是，当自然观的这种变革只能随着研究工作提供相应的实证的认识材料而实现的时候，一些在历史观上引起决定性转变的历史事实已经老早就发生了。1831年在里昂发生了第一次工人起义；在1838—1842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人运动，即英国的宪章派运动²⁵，达到了自己的最高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一方面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新近取得的政治统治的发展，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的历史中升到了首要地位。事实日益令人信服地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一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通协调和全民幸福的学说完全是撒谎。所有这些事实都再不能不加考虑了，正如作为这些事实的理论表现（虽然是极不完备的表现）的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不能不加考虑一样。但是，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

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做“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到过。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黑格尔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出来，使它成为辩证的，可是他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现在，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中，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

因此，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做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做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可是以往的社会主义同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不相容的，正如法国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同辩证法和现代自然科学不相容一样。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过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

西抛弃掉。它愈是义愤填膺地反对这种生产方式必然产生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愈是不能明白指出这种剥削在哪里和怎样发生。但是，问题是在于：一方面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对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揭露这种生产方式内部的一直还隐蔽着的性质。这已经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而完成了。已经证明，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对工人进行的剥削的基本形式；即使资本家按照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所具有的全部价值来购买他的工人的劳动力，他从这劳动力榨取的价值仍然比他为这劳动力付出的多；这种剩余价值归根到底构成了有产阶级手中日益增加的资本量所由积累而成的价值总量。这样就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生产的过程。

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

三

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未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

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相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²⁶ 的日益清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象，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静悄悄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同时这还说明，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多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

那末，现代社会主义的情况究竟怎样呢？

现在大家几乎都承认，现存的社会制度是由现在的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创立的。资产阶级所固有的生产方式（从马克思以来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同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权、等级特权以及相互的人身束缚不相容的；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制度，并且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建立了自由竞争、自由迁徙、商品所有者平等的王国，以及资产阶级的一切美妙东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在可以自由发展了。自从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了。但是，正如从前工场手工业以及在它影响下进一步发展了的手工业同封建的行会桎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时就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限制它的框框发生冲突了。新的生产力已经

超过了这种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这种冲突，并不是像人的原罪和神的正义的冲突那样产生于人的头脑中，而是实际地、客观地、在我们之外、甚至不依赖于引起这种冲突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动而存在着。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的反映。

那末这种冲突表现在哪里呢？

在资本主义生产出现以前，即在中世纪，普遍地存在着以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为基础的小生产：小农、自由农或依附农的农业和城市的手工业。劳动资料——土地、农具、作坊、手工业工具——都是个人的劳动资料，只供个人使用，因而必然是小的、简陋的、有限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它们也照例是属于生产者自己的。把这些分散的小的生产资料加以集中和扩大，把它们变成现代的强有力的生产杠杆，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体现者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关于资产阶级怎样从十五世纪起经过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这三个阶段历史地实现了这种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编中已经作了详尽的阐述。但是，正如马克思在那里所证明的，资产阶级要是不把这些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大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就不能把它们变成强大的生产力。纺纱机、机动织布机和蒸汽锤代替了纺车、手工织布机和手工锻锤；需要成百上千的人进行协作的工厂代替了小作坊。和生产资料一样，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

行动，而产品也从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社会的产品。现在工厂所出产的纱、布、金属制品，都是许多工人的共同产品，都必须顺次经过他们的手，然后才变为成品。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这是我做的，这是我的产品”。

但是，在以自发的、无计划地逐渐产生的社会内部分工作为生产的基本形式的地方，这种分工就使产品带有商品的形式，商品的相互交换，即买和卖，就使个体生产者有可能满足自己的各式各样的需要。中世纪的情况就是这样。例如，农民把农产品卖给手工业者，而从他们那里买得手工业品。在这个个体生产者即商品生产者的社会中，渗入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在支配全社会的自发的无计划的分工中间，它确立了在个别工厂里组织起来的有计划的分工；在个体生产旁边出现了社会化的生产。两者的产品在同一市场上出卖，因而价格至少大体相等。但是，有计划的组织要比自发的分工有力；实行社会化劳动的工厂里所制造的产品，要比分散的小生产者所制造的便宜。个体生产在一个又一个的部门中遭到失败，社会化的生产使全部旧的生产方式革命化了。但是它的这种革命性质并没有为人所认识，结果它反而被用来当做提高和促进商品生产的手段。它的产生，是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定的已经存在的杠杆即商业资本、手工业、雇佣劳动直接联系着的。由于它本身是作为商品生产的一种新形式出现的，所以商品生产的占有形式对它也保持着全部效力。

在中世纪得到发展的那种商品生产中，劳动产品应当属于谁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发生。当时个体生产者通常都用自己

所有的、往往是自己生产的原料，用自己的劳动资料，用自己成家属的手工劳动来制造产品。这样的产品根本用不着他去占有，它自然是属于他的。因此，产品的所有权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即使利用过别人的帮助，这种帮助通常也是次要的，而且往往除工资以外还得到别的报酬：行会的学徒和帮工与其说是为了吃饭和挣钱而劳动，不如说是为了自己学成手艺当师傅而劳动。后来生产资料开始集中于大的作坊和手工工场，开始变为真正社会化的生产资料。但是这些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和产品还像从前一样被当做个人的生产资料和产品来处理。从前，劳动资料的占有者占有产品，因为这些产品通常是他自己的产品，别人的辅助劳动是一种例外，而现在，劳动资料的占有者还继续占有产品，虽然这些产品已经不是他的产品，而完全是别人劳动的产品了。这样，现在由社会化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已经不是为那些真正使用生产资料和真正生产这些产品的人所占有，而是为资本家所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实质上已经变成社会化的了。但是，它们仍然服从于这样一种占有形式，这种占有形式是以个体的私人生产为前提，因而在这种形式下每个人都占有自己的产品并把这个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卖。生产方式虽然已经消灭了这一占有形式的前提，但是它仍然服从于这一占有形式^①。这个

① 这里无需解释，虽然占有形式还是原来那样，可是占有的性质由于上述过程而经历的革命，并不亚于生产所经历的革命。我占有我自己的产品或者占有别人的产品，这自然是两种很不相同的占有。顺便提一下：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的雇佣劳动是很古老的；它个别地和分散地同奴隶制度并存了几百年。但是只有在历史前提已经具备时，当一萌芽才能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使新的生产方式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新的生产方式愈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并从而把个体生产排挤到无足轻重的残余地位，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愈加鲜明地表现出来。

如上所述，最初的资本家就已经遇到了现成的雇佣劳动形式。但是，那时雇佣劳动是一种例外，一种副业，一种救急办法，一种暂时措施。不时出去打短工的农业劳动者都有自己的只能借以糊口的几亩土地。行会制度规定今天的帮工明天可以成为师傅。但是，生产资料一旦变为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并集中于资本家手中，情形就改变了。个体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变得愈来愈没有价值；他们除了受雇于资本家就没有别的出路。雇佣劳动以前是一种例外和救急办法，现在成了整个生产的通例和基本形式；以前是一种副业，现在成了工人的唯一职业。暂时的雇佣劳动者变成了终身的雇佣劳动者。此外，由于同时发生的封建制度的崩溃，由于封建主扈从人员被解散，农民被逐出自己的家园等等，终身的雇佣劳动者大量增加了。集中于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和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生产者彻底分裂了。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渗入了商品生产者即通过自己产品的交换来实现社会联系的个体生产者的社会。但是，每个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都有一个特点：这里的

生产者丧失了对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支配权。每个人都用自己偶然拥有的生产资料并为自己的特殊的交换需要而各自进行生产。谁也不知道，他的那种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的会有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谁也不知道，他的个人产品是否真正为人所需要，是否能收回它的生产费用，或者是否能卖出去。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占统治地位。但是，商品生产同任何其他生产形式一样，有其特殊的、固有的、和它分不开的规律；这些规律不顾无政府状态、在无政府状态中、通过无政府状态来为自己开辟道路。这些规律在唯一保留下来的社会联系形式即交换中表现出来，并且作为强制性的竞争规律作用于各个生产者。所以，这些规律起初连这些生产者也不知道，只是由于长期的经验才逐渐被他们揭示出来。所以，这些规律是在不经过生产者并且和生产者对立的情况下，作为他们的生产形式的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规律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产品支配着生产者。

在中世纪的社会里，特别是在最初几世纪，生产基本上是为了供自己消费。它主要只是满足生产者及其家属的需要。在那些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地方，例如在农村中，生产还满足封建主的需要。因此，在这里没有交换，产品也不具有商品的性质。农民家庭差不多生产了自己所需要的一切：食物、用具和衣服。只有当他们在满足自己的需要并向封建主缴纳实物租税以后还能生产更多的东西时，他们才开始生产商品；这种投入社会交换即拿去出卖的多余产品就成了商品。诚然，城市手工业者一开始就必然为交换而生产。但是他们也自己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大部分东西；他们有园圃和小块土地；他们

在公共森林中放牧牲畜，并且从这些森林中取得木材和燃料；妇女纺麻，纺羊毛等等。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还只是在形成中。因此，交换是有限的，市场是狭小的，生产方式是稳定的，地方和外界是隔绝的，地方内部是团结的；农村中有马尔克^①，城市中有行会。

但是，随着商品生产的扩展，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以前潜伏着的商品生产规律也就愈来愈公开、愈来愈有力地发挥作用了。旧日的束缚已经松弛，旧日的壁障已经突破，生产者日益变为独立的、分散的商品生产者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已经表现出来，并且愈来愈走向极端。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加剧社会生产中的这种无政府状态的主要工具正是无政府状态的直接对立物：每一个别生产企业中的社会化生产所具有的日益加强的组织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利用这一杠杆结束了旧日的和平的稳定状态。它在哪一个工业部门被采用，就不容许任何旧的生产方法在那里和它并存。它控制了手工业，就把旧的手工业消灭掉。劳动场地变成了战场。伟大的地理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地的开拓使销售市场扩大了许多倍，并且加速了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的转化。斗争不仅爆发于地方的各个生产者之间；地方性的斗争已经发展为全国性的，发展为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商业战争²⁷。最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个斗争成为普遍的，同时使它具有了空前的剧烈性。在资本家和

① 这里恩格斯指的是他的著作《马尔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51—369页。——编者注

资本家之间，在产业和产业之间以及国家和国家之间，生存问题都决定于天然的或人为的生产条件的优劣。失败者被无情地清除掉。这是从自然界加倍疯狂地搬到社会中的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动物的自然状态竟表现为人类发展的顶点。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它由于自己的起源而固有的矛盾的这两种表现形式中运动着，它毫无出路地进行着早已为傅立叶所发现的“恶性循环”。诚然，傅立叶在他那个时代还不能看到：这种循环在逐渐缩小；运动宁可说是在按螺旋形进行，并且必然像行星的运动一样，由于和中心相碰撞而告终。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推动力使大多数人日益变为无产者，而无产者群众又将最终结束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推动力，使大工业中的机器无限改进的可能性变成一种迫使每个工业资本家在遭受毁灭的威胁下不断改进自己的机器的强制性法令。但是，机器的改进就造成人的劳动的过剩。如果说，机器的采用和推广意味着成百万的手工劳动者为少数机器劳动者所排挤，那末，机器的改进就意味着愈来愈多的机器劳动者本身受到排挤，而归根到底就意味着形成一批超过资本在经营上的平均需要的、待雇的雇佣劳动者，一支真正的产业后备军（我早在 1845 年就这样称呼他们^①），这支后备军在工业开足马力工作的时期可以随意使

①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 109 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卷第 369 页。——编者注

用，而由于必然随着这个时期到来的崩溃又被抛到街头，这支后备军任何时候都是工人阶级在自己对资本进行生存斗争中的绊脚石，是把工资抑制在合乎资本家需要的低水平上的调节器。这样一来，机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成了资本用来对付工人阶级的最有力的武器，劳动资料不断地夺走工人手中的生活资料，工人自己的产品变成了奴役工人的工具^①。于是，劳动资料的节约，一开始就同时成为对劳动力的最严重的浪费和对劳动机能的正常前提的掠夺^②；机器这一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变成了使工人及其家属一生的时间转化为可以随意用来增殖资本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于是，一部分人的过度劳动造成了另一部分人的失业，而在全世界追逐新消费者的大工业，却在国内把群众的消费限制到需要忍饥挨饿这样一个最低水平，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国内市场。“使相对的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资本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更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马克思《资本论》第671页）^③。而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期待产品的另一种分配，那就等于希望电池的电极和电池相联时不使水分解，不在阳极放出氧和阴极

① 见《资本论》第1卷第13章第5节和第9节。——编者注

② 见《资本论》第1卷第13章第8节b。——编者注

③ 见《资本论》第1卷第23章第4节。——编者注

放出氢。

我们已经看到，现代机器的已经达到最高程度的改进的可能性，怎样由于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而变成一种迫使各个工业资本家不断改进自己的机器、不断提高机器的生产能力的强制性法令。对资本家来说，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的单纯的实际可能性也变成了同样的强制性法令。大工业的巨大的扩张力——气体的膨胀力和它相比简直是儿戏——现在在我们面前表现为不顾任何阻力的、在质量上和数量上进行扩张的需要。这种阻力是由大工业产品的消费、销路和市场形成的。但是，市场向广度和深度方面扩张的能力首先是受完全不同的、力量弱得多的规律支配的。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也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

事实也是这样，自从 1825 年第一次普遍危机爆发以来，整个工商业世界，一切文明民族及其多少尚未开化的附属地中的生产和交换，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出轨一次。商业停顿，市场盈溢，产品滞销，银根奇紧，信用停止，工厂关门，工人群众因为他们生产的生活资料过多而缺乏生活资料，破产相继发生，拍卖纷至沓来。停滞状态持续了几年，生产力和产品被大量浪费和破坏，直到最后，大批积压的商品以或多或少压低了的价格卖出去，生产和交换的运动逐渐恢复起来。运动逐渐加快，慢步转成快步，工业快步转成跑步，跑步又转成工业、商业、信用和投机事业的真正障碍赛马中的狂奔，

最后，经过几次拚命的跳跃重新陷入崩溃的深渊。如此反复不已。从 1825 年以来，这种情况我们已经历了整整五次，目前（1877 年）正经历着第六次。这些危机的性质表现得这样明显，以致傅立叶把第一次危机称为 *crise plethorique* 即由过剩引起的危机时，就中肯地说明了一切危机的实质²⁸。

在危机中，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达到剧烈爆发的地步。商品流通暂时停顿下来；流通手段即货币成为流通的障碍；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颠倒过来了。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 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

工厂内部的生产的社会化组织，已经发展到同存在于自己之旁并凌驾于自己之上的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不能相容的地步。甚至资本家也由于资本的猛烈聚集而感觉到这一事实，这种聚集是在危机期间通过许多大资本家和更多的小资本家的破产实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机构在它自己创造的生产力的压力下失灵了。它已经不能把这大批生产资料全部变成资本；生产资料闲置起来，因此，产业后备军也不得不闲置起来。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待雇的工人——生产和一般财富的一切因素，都显得过剩。但是，这种“过剩成了贫困和匮乏的源泉”（傅立叶），因为正是这种过剩阻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变为资本。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要不先变为资本，变为剥削人的劳动力的工具，就不能发挥作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具有资本属性的必然性，像幽灵一样站在这些资料和工人之间。唯独这个必然性阻碍着生产的物的杠杆和人的杠杆的结合；唯独它妨碍生产资料发

挥作用，妨碍工人劳动和生活。因此，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

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抗，要求承认它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必要性，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一切可能的限度内，愈来愈把生产力当做社会生产力看待。无论信用无限膨胀的工业高涨时期，还是由大资本主义企业的破产造成的崩溃本身，都把大量生产资料推向如像我们在各种股份公司中所遇见的那种社会化形式。某些生产资料和交通手段，例如铁路，一开始规模就很大，它们排斥任何其他的资本主义经营形式。在一定发展阶段上，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国内同一工业部门的大生产者联合为一个“托拉斯”，即一个以调节生产为目的的联盟；他们规定应该生产的总产量，在他们中间加以分配，并且强制实行预先规定的出售价格。但是，这种托拉斯一遇到不景气的时候大部分就陷于瓦解，正因为如此，它们就趋向于更加集中的社会化：整个工业部门变为一个唯一的庞大的股份公司，国内的竞争让位于这个公司在国内的垄断；例如还在1890年，英国的制碱业就发生了这种情形，现在，这一行业在所有四十八个大工厂合并以后就转到了一个唯一的、统一领导的、拥有一亿两千万马克资本的公司手中了。

在托拉斯中，自由竞争转为垄断，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产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当然，

这首先还是对资本家有利的。但是，在这里剥削变得这样明显，以致它必然要被消灭。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容忍由托拉斯领导的生产，不会容忍由一小撮专靠剪息票为生的人对全社会进行的如此露骨的剥削。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有或者没有托拉斯，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终究不得不^①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这种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然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

如果说，危机暴露出资产阶级无能继续驾驭现代生产力，那末，大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向股份公司、托拉斯和国家财产的转变就表明资产阶级在这方面不是不可缺少的。资本

① 我说“不得不”，因为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是由现代国家实行的——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在由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准备阶段。但是最近，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一种十足的奴才习气，直截了当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末拿破仑和梅特涅就应该算是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了。如果说，比利时政府出于纯粹日常的政治和财政方面的考虑而自己修建自己的主要铁路，如果说，俾斯麦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必要，只是为了使铁路能够在战时更好地适应和利用，为了把铁路职员训练成政府的投票家畜，主要是为了取得一种不依赖于议会决定的新的收入来源而把普鲁士的主要铁路收归国有，那末，这无论如何不是社会主义的步骤，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间接的，既不是自觉的，也不是不自觉的。否则，皇家海外贸易公司²⁹、皇家陶磁厂，甚至陆军被服厂，以致在三十年代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时期由一个聪明人十分严肃地建议过的……妓院国营，也都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

家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雇佣的职员来执行了。资本家拿红利、剪息票、在各种资本家相互争夺彼此的资本的交易所中进行投机，除此以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社会活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初排挤工人，现在却在排挤资本家了，完全像对待工人那样把他们赶到过剩人口中去，虽然暂时还没有把他们赶到产业后备军中去。

但是，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和托拉斯那里，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而现代国家却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共同的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的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

这种解决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社会管理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现在，生产资料和产品的社会性反过来反对生产者本身，周期性地突破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并且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性地和破坏性地为自己开辟道路，而随着社会

对生产力的占有，这种社会性就将为生产者完全自觉地运用，并且从造成混乱和周期性崩溃的原因变为生产本身的最有力的杠杆。

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影响，那末，要使它们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只要我们固执地拒绝理解这种生产力的本性和性质——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辩护士正是抗拒这种理解的，——它就总是像上面所详细叙述的那样起违反我们、反对我们的作用，把我们置于它的统治之下。但是它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会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从魔鬼似的统治者变成顺从的奴仆。这里的区别正像雷电中的电的破坏力同电报机和弧光灯的被驯服的电之间的区别一样，正像火灾同为人服务的火之间的区别一样。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那时，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即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同时就造成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变革的力量。

这种生产方式迫使人们日益把巨大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同时它本身就指明完成这个变革的道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到目前为止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都需要有国家，即需要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以便维持它的外部的生产条件，特别是用强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奴隶制、农奴制或依附农制、雇佣劳动制）。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应当以此来衡量“自由的人民国家”³⁰这个用语，这个用语在鼓

动的意义上暂时有存在的理由，但归根到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同时也应当以此来衡量所谓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的要求。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的派别的脑海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摆脱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加紧剥削。

但是，即使阶级的划分根据上面所说具有某种历史的理由，那也只是对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社会条件才是这样。这种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

发展所消灭。的确，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为前提，在这个阶段上，不仅某个特定的统治阶级而且任何统治阶级的存在，从而阶级差别本身的存在，都将成为时代的错误，成为过时的现象。所以，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的高度发展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精神发展的障碍。这个阶段现在已经达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精神的破产甚至对他们自己也未必是一种秘密了，而他们的经济破产则有规律地每十年重复一次。在每次危机中，社会在属于它自己而又不能为它自己所利用的生产力和产品的重压下奄奄一息，面对着生产者没有什么可以消费是因为缺乏消费者这种荒谬的矛盾而束手无策。生产资料的扩张力撑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加给它的桎梏。生产资料从这种桎梏下解放出来，是生产力不断地加速发展的唯一先决条件，因而也是生产本身实际上无限增长的唯一先决条件。但是还不止于此。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明显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不可分离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此外，这种占有还由于消除了现在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浪费而为全社会节省出大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可能性现在是第一次出现了，但是它（确实是出现

了^①。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人们自己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

① 几个数字可以大体表明现代生产资料即使在资本主义压制下也有巨大的扩张力。根据吉芬的计算³¹，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全部财富约计如下：

1814 年……22 亿英镑=440 亿马克

1865 年……61 亿英镑=1220 亿马克

1875 年……85 亿英镑=1700 亿马克

至于在危机中生产资料和产品被破坏的情况，根据 1878 年 2 月 21 日在柏林举行的德国工业家第二次代表大会³² 所作的计算，在最近一次崩溃中，单是德国铁工业所遭受的全部损失就达 45500 万马克。

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最后，我们把上述的发展进程简单地概述如下：

一、中世纪社会：个体的小生产。生产资料是供个人使用的，因而是原始的、笨拙的、小的、效能很低的。生产或者是为了生产者本身的直接消费，或者是为了他的封建领主的直接消费。只有在生产的东西除了满足这些消费以外还有剩余的时候，这种剩余才拿去出卖和进行交换：所以商品生产刚刚处于形成过程中；但是这时它本身已经包含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萌芽。

二、资本主义革命：起初是工业通过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实现的变革。先前分散的生产资料集中到大作坊中，因而它们就由个人的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化的生产资料，这种转变总的说来是没有触及交换形式的。旧的占有形式仍然起作用。资本家出现了：他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当然就占有产品并把它们变为商品。生产已经成为社会的活动，而交换以及和它相伴随的占有，仍旧是个体的活动，单个人的活动：社会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借以运动并在大工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

(a) 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工人注定要终身从事雇佣劳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相对立。**

(b) 支配商品生产的规律日益显露出来，它们的作用日益加强。竞争不可遏止。**个别工厂中的社会化组织和整个生产中的社会无政府状态相矛盾。**

(c) 一方面是机器的改进，这种改进由于竞争而变成每个厂主必须遵守的强制性法令，同时就使工人遭到不断的解雇：产生了产业后备军。另一方面是生产的无限扩张，这也成了每个厂主必须遵守的强制性的竞争规律。这两方面造成了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供过于求、生产过剩、市场盈溢、十年一次的危机、恶性循环：这里是生产资料和产品过剩，那里是没有工作和没有生活资料的工人过剩；但是，生产和福利社会的这两个杠杆不能结合起来，因为生产力和产品要不先转变为资本，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就不允许生产力发挥作用和产品进行流通，而阻碍这种转变的正是生产力和产品的过剩。这种矛盾发展到荒谬的程度：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形式。资产阶级已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管理自己的社会生产力。

(d) 资本家本身不得不部分地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性。大规模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起初由股份公司占有，后来由托拉斯占有，然后又由国家占有。资产阶级表明自己已成为多余的阶级；它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雇佣的职员来执行了。

三、无产阶级革命，矛盾的解决：无产阶级将取得社会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给它们的社会性以充分发展的自由。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

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由自的人。

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

写于 1880 年 1 月—3 月上半月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80 年 3 月 20 日，4 月 20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和 5 月 5 日《社会主义评论》杂志第

第 19 卷第 201—247 页

3、4 和 5 期，并于 1880 年在巴黎出

版法文单行本：弗·恩格斯《空想社

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注 释

- 1 按照卢梭的理论，人们最初生活在自然状态的条件下，在这种条件下人人都是平等的。私有制的产生和财产不平等的发展决定了人们从自然状态向市民状态的过渡，并导致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国家的形成。但是，后来由于政治不平等的发展，社会契约遭到破坏，产生了新的自然状态。消灭这种自然状态，是以新的社会契约为基础的理性国家的使命。

这个理论在卢梭的 1755 年阿姆斯特丹出版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s de l'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 Ams te rdam, 1755) 和 1762 年阿姆斯特丹出版的《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则》(《Du contrat social; ou, 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 Amsterdam, 1762) 这两部著作中得到了发挥。
- 2 恩格斯指“真正平均派”或“掘地派”，他们是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极左派的代表。“掘地派”代表城乡贫民阶层的利益，他们要求消灭土地私有制，宣传原始的平均共产主义思想，并企图用集体开垦公有土地的办法来实现这种思想。
- 3 恩格斯首先指空想共产主义者的著作——托·莫尔“乌托邦”(1516 年出版)和托·康帕内拉“太阳城”(1623 年出版)。
- 4 恐怖时代是雅各宾派的革命民主专政时期(1793 年 6 月—1794 年 7 月)，当时雅各宾派为了对付吉伦特派和保皇派的反革命恐怖采用了革命的恐怖。

督政府(由五个督政官组成，每年改选一人)是法国执行权的领导机关，它是根据雅各宾派革命专政于 1794 年失败后所通过的 1795 年宪法建立的；它存在到 1799 年波拿巴政变；它支持反对民主力量的恐怖制度，并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 5 指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
- 6 《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Let tres d'un habitant de Genève à ses contemporains》)是圣西门的第一部著作；1802年写于日内瓦，1803年匿名发表于巴黎，没有标明出版的地点和时间。恩格斯在写作《反杜林论》所用的版本是：古·雨巴《圣西门。他的生平和著述。附有圣西门名著的摘录》1857年巴黎版(G. Hubbard.《Saint-Simon. Sa vie et ses travaux. Suivi de fragments des plus célèbres écrits de Saint-Simon》. Paris, 1857)。在这个版本中圣西门的个别著作的日期有不确切的地方。
傅立叶的第一部巨著是《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Théorie des quatre mouvements et des destinées générales》)，写于十九世纪头几年，1808年在里昂匿名出版(可能考虑到书报检查，在扉页上注明的出版地点是莱比锡)。
新拉纳克(New Lanark)是苏格兰拉纳克城附近的一个棉纺厂，创办于1784年，在工厂周围形成一个小镇。
- 7 恩格斯引证的是圣西门的《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这部著作中的第二封信。这些话在雨巴版本的第143页和第135页上。
- 8 恩格斯指《昂·圣西门给一个美国人的信》(第八封信)中的一段话。这些信载于昂·圣西门的论文集《实业，或为贡献出有用和独立的劳动的一切人的利益所作的政治、道德和哲学的议论》1817年巴黎版第2卷(H. Saint-Simon.《L'industrie, ou Discussions politiques, morales et philosophiques, dans L'intérêt de tous les hommes livrés à des travaux utiles et indépendans》. T. II, Paris, 1817)。这些话在雨巴版本的第155—157页上。
- 9 恩格斯指的是圣西门同他的学生奥·梯叶里合著的两本书：《论欧洲社会的改组，或论欧洲各民族在保持各自的民族独立性的条件下联合为一个政治统一体的必要性和手段》(《De la réorganisation de la société européenne, ou De la nécessité et des moyens de rassembler les peuples de l'Europe en un seul

corps politique, en conservant à chacun son indépendance nationale》) 和《关于应当用来对付 1815 年同盟的措施的意见》(《Opinion sur les mesures à prendre contre la coalition de 1815》); 这两本小册子都在巴黎出版, 第一本在 1814 年 10 月, 第二本在 1815 年。在雨巴的版本中, 从第一本小册子作的摘录在第 149—154 页, 而这两本小册子的内容则刊在第 68—76 页。

第六次反法同盟的参加国(俄国、奥地利、英国、普鲁士等国)的同盟国军于 1814 年 3 月 31 日进入巴黎。拿破仑帝国垮台了, 而拿破仑本人在宣布退位以后被流放到埃尔巴岛。在法国发生了波旁王朝的第一次复辟。

百日是指拿破仑恢复帝制的短暂时期, 从 1815 年 3 月 20 日他从埃尔巴岛回到巴黎时起, 到同年 6 月 22 日他在滑铁卢失败后第二次退位时为止。

- 10 1815 年 6 月 18 日, 拿破仑的军队在滑铁卢(比利时)被威灵顿指挥的英荷联军和布吕歇尔指挥的普鲁士军击败。这次战役在 1815 年的战局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它预先决定了第七次反法同盟(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瑞典等国)的彻底胜利和拿破仑帝国的崩溃。
- 11 这个思想在傅立叶的第一本书《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中已经得到了发挥, 书中包含着这样一个总的论点: “某一时代的社会进步和变迁是同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相适应的, 而社会秩序的衰落是同妇女自由减少的程度相适应的。”傅立叶在下述公式中概括了这个论点: “妇女权利的扩大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则。”(见《傅立叶全集》1841 年巴黎版第一卷第 195—196 页)。
- 12 参看沙·傅立叶《关于普遍统一的理论》第 1 卷和第 4 卷; 《傅立叶全集》1843 年巴黎版第 2 卷第 78—79 页和 1841 年巴黎版第 5 卷第 213—214 页(Ch. Fourier. 《Théorie de l'unité universelle》, vol. I et IV; OEuvres complètes, t. II, Paris, 1843, p. 78—79 ett. V, Paris, 1841, p. 213—214)。

关于文明制度在其中运动的“恶性循环”，见沙·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会的新世界，或按情欲分类的引人入胜的和合乎自然的劳动方式的发现》；《傅立叶全集》1845年巴黎版第6卷第27—46、390页（Ch. Fourier. *Le Nouveau Monde industriel et sociétaire, Ou Invention du procédé d'industrie attrayante et naturelle distribuée en séries passionnées*; OEuvres complètes, t. VI, Paris, 1845, p. 27—46, 390）。该书第一版于1829年在巴黎出版。并参看《傅立叶全集》1845年巴黎版第1卷第202页。

- 13 《傅立叶全集》1845年巴黎版第6卷第35页。
- 14 《傅立叶全集》1845年巴黎版第1卷第50页及以下页。
- 15 罗·欧文《人类头脑和实践中的革命，或将来由非理性到理性的过渡》1849年伦敦版（R. Owen. *The Revolution in the Mind and Practice of the Human Race; or, the Coming Change from Irrationality to Rationality*. London, 1849）。上一页所引用的欧文传记材料，出处相同。
- 16 罗·欧文《关于在都柏林举行的几次公众集会的报告……3月18日、4月12日和19日、5月3日》1823年都柏林版（R. Owen. *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at the several public meetings, held in Dublin……on the 18th March, 12th April, 19th April and 3rd May*. Dublin, 1823）。
- 17 1815年1月，欧文在格拉斯哥的一次群众集会上提出了一系列改善工厂的童工和成年工人的状况的措施。根据1815年6月欧文的倡议提出的法案到1819年7月才被议会通过，成为法律，而且还大大地打了折扣。调整棉纺厂劳动的法律禁止9岁以下的儿童作工，限定18岁以下的工人的工作日为12小时，规定所有工人有两次工间休息作为早饭和午饭的时间，共一个半小时。
- 18 1833年10月，在欧文的主持下在伦敦举行了合作社和职工的代表大会，

会上正式成立了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全国产业部门大联盟；联盟的章程于 1834 年 2 月被通过。按照欧文的想法，这个联盟应当把生产管理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且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对社会的彻底改造。但是这个空想的计划遭到了失败。由于受到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的强烈反对，该联盟于 1834 年 8 月宣告解散。

- 19 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是英国各城市的工人合作社创办的。他一直存在到 1834 年年中。在这些交换市场上，劳动产品是用以一小时劳动时间为单位的劳动券来进行交换的。这些企图在商品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建立不用货币的交换的乌托邦做法，很快就失败了。
- 20 蒲鲁东在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做了组织交换银行的尝试。他的人民银行 (Banquedupeuple) 于 1849 年 1 月 31 日在巴黎成立。银行存在了两个月左右，而且只是在纸面上：它在开始正常业务活动以前就破产了，并于 4 月初宣告关闭。
- 21 德·狄德罗的对话《拉摩的侄子》(《Le neveu de Rameau》) 是 1762 年前后写成的，后来又经作者修改了两次。最初它是由歌德的德译本形式于 1805 年在莱比锡出版。真正的法文版发表在 1821 年巴黎版《狄德罗轶文集》(《Oeuvres inédites de Diderot》. Paris, 1821) 该书实际上是在 1823 年出版的。
- 22 科学发展的亚历山大里亚时期是指纪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七世纪的时期，这个时期是因埃及的一个城市、当时国际经济关系最大中心之一亚历山大里亚（位于地中海沿岸）而得名的。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许多科学，如数学和力学（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地理学、天文学、解剖学、生理学等等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 23 圣经《马太福音》第 5 章第 37 节。
- 24 根据康德的星云假说，太阳系是从原始星云（拉丁文：nebula——雾）发展而来的，他在 1755 年科尼斯堡和莱比锡出版的著作《自然通史和天体论，或根据牛顿原理论述宇宙的结构和机械起源的尝试》(《Allgemeine

Natur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Himmels, oder Versuch von der Verfassung und dem mechanischen Ursprunge des ganzen Weltgebäudes nach Newtonischen Grundsätzen abgehandelt». Königsberg und Leipzig, 1755) 中阐述了这一假说。这本书是匿名出版的。

拉普拉斯关于太阳系的构成的假说，最初是在他于法兰西共和国四年[1796年]在巴黎出版的《宇宙体系解说》第1—2卷(《Exposition du système du monde》. T. I-II, Paris, l'an IV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1796])中进行了阐述。在拉普拉斯生前编好而在死后出版的(1835年)该书的最后一版即第六版中，这个假说在最后一个注，即第七个注中又得到了阐述。

宇宙空间存在着类似康德—拉普拉斯星云假说所设想的原始星云炽热的云雾体，英国天文学家威，哈金斯于1864年用光谱学方法证明了这一点，他在天文学中广泛地运用了，基尔霍夫和罗，本生在1859年造的光谱分析法。恩格斯在这里参考了安·赛奇《太阳》1872年不伦瑞克版第787、789—790页(A. Secchi. *Die Sonne*) Braunschweig, 1872, S. 787, 789—790)。

- 25 指宪章运动。这是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行包括要求普选权和一系列为工人保证此项权利的许多条件的人民宪章。按照列宁的定义：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276页)。宪章运动的衰落，是由于英国工商业垄断的加强以及英国资产阶级用超额利润收买英国工人阶级上层(“工人贵族”)，这造成了英国工人阶级中机会主义倾向的增长，其表现就是工联领袖放弃对宪章运动的支持。
- 26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场(《浮士德的书斋》)。
- 27 指欧洲各大国之间为争夺同印度和美洲通商的霸权以及殖民地市场而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进行的一系列战争。最初主要的竞争国家是英国

和荷兰（1652—1654、1664—1667 和 1672—1674 年的英荷战争是典型的商业战争），后来决定性的斗争是在英国和法国之间展开的。所有这些战争的胜利者是英国，到十八世纪末，在它手中已经集中了几乎全部的世界贸易。

- 28 《傅立叶全集》1845 年巴黎版第 1 卷第 50 页及以下页。
- 29 海外贸易公司是 1772 年在普鲁士成立的贸易信用公司。该公司享有许多重要的国家特权，它给予政府巨额贷款，实际上起了政府的银行老板和财政方面的经纪人的作用。1904 年正式成为普鲁士国家银行。
- 30 “自由的人民国家”是七十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纲领性要求和流行口号。对这个口号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见本卷第 19—25、30 页，并见列宁的著作《国家与革命》第 1 章第 4 节和第 4 章第 3 节（《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5 卷第 382—388 页和第 426—429 页）。
- 31 这里关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全部财富的材料引自罗·吉芬的报告《近来联合王国的资本积累》。这个报告是 1878 年 1 月 15 日在统计学会宣读的，发表在 1878 年 3 月号伦敦《统计学会杂志》上。
- 32 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 1878 年 2 月 21—22 日在柏林举行。

恩 格 斯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 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¹

1888 年单行本序言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 年在柏林出版) 的序言中说，1845 年我们两人在布鲁塞尔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特别是由马克思所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同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八开本两厚册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里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耗子的牙齿去批判了”^①。

从那时起，已经过了四十多年，马克思也已逝世了。不论他或我，都再没有过机会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关于我们和黑格尔的关系，我们曾经在某些地方做了说明，但是无论哪个地方都说得不够全面系统。至于费尔巴哈，虽然他在某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我们却从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84 页。——编者注

来没有回顾过他。

这期间，马克思的世界观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文明世界的一切语言中都找到了代表。另一方面，德国的古典哲学在国外，特别是在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各国，好像有点要复活的样子。甚至在德国，各大学里借哲学名义来施舍的折衷主义残羹剩汁，看来已惹得人人都讨厌起来了。

因此，我越来越觉得把我们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即我们怎样从这一哲学出发并且怎样同它脱离，做一个简要而有系统的说明是很必要的了。同样地，我认为我们还欠着一笔信誉债，就是要完全承认，在我们那个狂风暴雨时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所以，当“新时代”杂志编辑部要我写一篇批评文章来评述施达克那本论费尔巴哈的书²时，我也就欣然同意了。我的这篇文章发表在该杂志1886年第4期和第5期上，现在这个版本是经过修订的单行本。

把这几页稿子送去付印以前，我又把1845—1846年的旧稿找出来，重读了一遍。其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已写好的一部分是解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个解释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在旧稿里面对于费尔巴哈的学说本身没有批判；所以，旧稿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一目的是不适用的。可是我在马克思的一本旧笔记中找到了十一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拿来作为本书的附录。^① 这是一份供进一步研究用的匆匆写成的笔记，根本没有打算付印。但是这些笔记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19页。——编者注

文件，是非常宝贵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8年2月21日于伦敦

载于1888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

原文是德文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
典哲学的终结》一书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1卷第411—412页

路德维希·弗尔巴哈和 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一

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①使我们返回到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就时间来说距离我们不过一代之久，但是它对德国现在的这一代人却如此陌生，似乎已经相隔整整一个世纪了。然而这终究是德国准备 1848 年革命的时期；那以后我国所发生的一切，仅仅是 1848 年的继续，仅仅是革命遗嘱的执行罢了。

正像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一样，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但是这两个哲学革命看起来是多么地不同呵！法国人同一切官方科学，同教会，常常也同国家进行公开的斗争；他们的著作要拿到国外，拿到荷兰或英国去印刷，而他们本人则随时准备着进巴士底狱³。反之，德国人是一些教授，是一些由国家任命的青年的导师；他们的著作是公认的教科书，而全部发展的最终体系，即黑格尔的体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在这些教授后面，在他们的迂腐晦涩的言词后面，在他们的笨拙枯燥的语句里面竟能隐藏着革命吗？不正是那时

^① 哲学博士卡·尼·施达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85 年斯图加特斐·恩克书店版。

被认为是革命代表者的人即自由派激烈反对这种使头脑混乱的哲学吗？但是不论政府或自由派都没有看到的东西，至少有一个人在 1833 年已经看到了，这个人就是亨利希·海涅。⁴

举个例子来说吧。不论哪一个哲学命题都没有像黑格尔的一个著名命题那样引起近视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样近视的自由派的愤怒，这个命题就是：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⁵

这显然是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替警察国家、替王室司法、替书报检查制度祝福。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是这样想的，他的臣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凡是现存的决非无条件地也是现实的。在他看来，现实的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

“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

所以他决不承认政府的任何一个措施——黑格尔本人举“某种税制”为例——都已经无条件地是现实的。⁶但是必然的东西归根到底会表明自己也是合理的。所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在应用于当时的普鲁士国家时，意思只是说：这个国家在它是必然的这个限度内是合理的，是合乎理性的。如果说，在我们看来，它终究是恶劣的，而且尽管恶劣，它仍旧继续存在，那末，政府的恶劣，就可以用臣民的相应的恶劣来辩护和说明。当时的普鲁士人有他们所应该有的政府。

但是，根据黑格尔的意见，现实性决不是某种社会制度或政治制度在一切环境和一切时代所固有的属性。恰恰相反，罗马共和国是现实的，但是把它排斥掉的罗马帝国也是现实的。法国的君主制在 1789 年已经变得如此不现实，即如此丧

失了任何必然性，如此不合理，以致必须由大革命（黑格尔谈论这次革命时总是兴高采烈的）来把它消灭掉。所以，在这里，君主制是不现实的，革命是现实的。同样，在发展的进程中，以前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起来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抵抗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这样一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的，因而按其本性来说已经是不合理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理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⁷

但是，黑格尔哲学（我们在这里只限于考察这种作为从康德以来的整个运动的顶峰的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永远结束了以为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哲学所应当认识的真理，在黑格尔看来，不再是一堆现成的、一经发现就只要熟读死记的教条了；现在，真理是包含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包含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上升到较高阶段，愈升愈高，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

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出神，就再也无事可做了。这不仅在哲学认识的领域中是如此，就是在任何其他的认识领域中以及在实践行动的领域中也是如此。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把人类的某种完美的理想状态看做尽善尽美的；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反之，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同样是要走向衰落和灭亡的。正如资产阶级依靠大工业、竞争和世界市场在实践中推翻了一切稳固的、历来受人尊崇的制度一样，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相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也不过是这一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而已。诚然，它也有保守的方面：它承认认识和社会的每一个阶段对自己的时间和条件来说都有存在的理由，但也不过如此而已。这种看法的保守性是相对的，它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这就是辩证哲学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

我们在这里没有必要去研究这种看法是否完全跟自然科学的现状相符合的问题，自然科学预言了地球本身的可能的末日和它的可居性的相当确实的末日，从而承认，人类历史

不仅有上升的过程，而且也有下降的过程。无论如何，我们现在距离社会历史开始下降的转折点还相当远，我们也不能要求黑格尔哲学去研究当时还根本没有被自然科学提到日程上来的问题。

但是这里必须指出一点：黑格尔并没有这样清楚他作出如上的阐述。这是他的方法必然要得出的结论，但是他本人从来没有这样明确地作出这个结论。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不得不去建立一个体系，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所以，黑格尔，特别是在《逻辑学》⁸中，虽然如此强调这种永恒真理不过是逻辑的或历史的过程本身，但是他还是发现他自己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在《逻辑学》中，他可以再把这个终点变为起点，因为在这里，终点，即绝对观念——其所以是绝对的，只是因为他关于这个观念绝对说不出什么来，——使自己“外化”（即转化）为自然界，然后在精神中，即在思维中和在历史中，再返回到自身。但是要在全部哲学的终点上这样返回到起点，只有一条路可走，即把历史的终点设想成这样：人类将达到正是对这个绝对观念的认识，并宣布对绝对观念的这种认识已经在黑格尔的哲学中达到了。但是这样一来，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是矛盾的；这样一来，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闷死。哲学的认识是这样，历史的实践也是这样。人类既然通过黑格尔想出了绝对观念，那末在实践中也一定达到了能够把这个绝对观念变成现实的地步。因此，绝对观念就

不必向自己的同时代人提出太高的实践的政治要求。因此，我们在《法哲学》的结尾发现，绝对观念应当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这么顽强而毫无结果地向他的臣民约许的那种等级制君主政体中得到实现，就是说，应当在有产阶级那种适应于当时德国小资产阶级关系的、有限的和温和的间接统治中得到实现；在这里还用思辨的方法给我们证明了贵族的必要性。

可见，单是体系的内部需要就足以说明，为什么彻底革命的思维方法竟产生了极其温和的政治结论。这个结论的特殊形式当然是由下列情况造成的：黑格尔是一个德国人而且和他的同时代人歌德一样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歌德和黑格尔各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脱去德国的庸人气味。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妨碍黑格尔的体系包括了以前的任何体系所不可比拟的巨大领域，而且没有妨碍它在这一领域中发展了现在还令人惊奇的丰富思想。精神现象学（也可以叫做同精神胚胎学和精神古生物学类似的学问，是对个人意识各个发展阶段的阐述，这些阶段可以看做人的意识在历史上所经过的各个阶段的缩影）、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而精神哲学又分成各个历史部门来研究，如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哲学史、美学等等，——在所有这些不同的历史领域中，黑格尔都力求找出并指出贯穿这些领域的发展线索；同时，因为他不仅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天才，而且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物，所以他在每一个领域中都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当然，由于“体系”的需要，他在这里常常不得不

求救于强制性的结构，这些结构直到现在还引起他的渺小的敌人如此可怕的喊叫。但是这些结构仅仅是他的建筑物的骨架和脚手架；人们只要不是无谓地停留在它们面前，而是深入到大厦里面去，那就会发现无数的珍宝，这些珍宝就是在今天也还具有充分的价值。在一切哲学家看来，正是“体系”是暂时性的东西，因为体系产生于人的精神的永恒的需要，即克服一切矛盾的需要。但是，假定一切矛盾都一下子永远消除了，那末我们就会达到所谓绝对真理，世界历史就会终结，而历史是一定要继续发展下去的，虽然它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新的、不可解决的矛盾。既然我们了解到（对获得这种了解来说，归根到底没有一个人比黑格尔本人对我们的帮助更大）：这样给哲学提出任务，无非就是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末全部以往所理解的哲学也就终结了。我们就把沿着这个途径达不到而且对每个个别人也是达不到的“绝对真理”撇在一边，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总之，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终结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个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

可以理解，黑格尔的体系在德国的富有哲学味道的气氛中曾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这是一次胜利进军，它延续了几十年，而且决没有随着黑格尔的逝世而停止。相反地，正是在 1830 到 1840 年这个时期，“黑格尔主义”的独占统治

达到了顶点，它甚至或多或少地感染了自己的敌人；正是在这个时期，黑格尔的观点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大量浸入了各种科学，甚至渗透了通俗读物和日报，而普通的“有教养的意识”就是从这些通俗读物和日报中汲取自己的思想材料的。但是这一全线胜利仅仅是一种内部斗争的序幕罢了。

黑格尔的整个学说，如我们所看到的，给各种极不相同的实践的党派观点都留下了广阔的活动场所；而在当时的理论的德国，有实践意义的首先是两种东西：宗教和政治。特别重视黑格尔的体系的人，在两个领域中都可以成为相当保守的，认为辩证方法是主要的东西的人，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可以属于最极端的反对派。黑格尔本人，虽然在他的著作中相当频繁地爆发出革命的怒火，但是总的说来似乎更倾向于保守的方面；他在体系上所花费的“艰苦的思想工作”的确比他在方法上所花费的要多得多。到三十年代末，他的学派内的分裂愈来愈明显了。左翼，即所谓青年黑格尔派，在反对正统的虔信派教徒和封建反动派的斗争中一点一点地放弃了在哲学上对当前的紧迫问题所采取的超然态度，由于这种态度，他们的学说在此之前曾经得到了政府的容忍、甚至保护；到了 1840 年，正统教派的伪善和封建专制的反动随着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登上了王座，这时人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公开站在这方面或那方面了。斗争依旧是用哲学的武器进行的，但已经不再是为了抽象的哲学目的；问题已经直接是要消灭传统的宗教和现存的国家了。如果说，在《德国年鉴》⁹ 中实践的终极目的主要还是穿着哲学的外衣出场，那末，在 1842 年的《莱茵报》¹⁰ 上青年黑格尔派已经直接作为

努力向上的激进资产阶级的哲学出现，只是为了迷惑书报检查机关才用哲学伪装起来。

但是，政治在当时是一个荆棘丛生的领域，所以主要的斗争就转为反宗教的斗争；这一斗争，特别是从1840年起，间接地也是政治斗争。1835年出版的施特劳斯的《耶稣传》¹¹成了头一个推动力。后来，布鲁诺·鲍威尔反对该书中所阐述的福音神话发生说，证明许多福音故事都是作者自己虚构的。两人之间的争论是在“自我意识”对“实体”的斗争这一哲学幌子下进行的。神奇的福音故事是如何发生的，是在宗教团体内部通过不自觉的、传统的神话发生的途径形成的呢，还是福音书作者自己虚构的，——这个问题竟扩展为这样一个问题：在世界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是“实体”呢，还是“自我意识”；最后，出现了施蒂纳，现代无政府主义的先知（巴枯宁从他那里抄袭了好多东西），他用他的至上的“唯一者”¹²压倒了至上的“自我意识”。

我们不打算更详细地考察黑格尔学派解体过程的这一方面。在我们看来，更重要的是：由于对现存宗教进行斗争的实际必要性，大批最坚决的青年黑格尔分子返回到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他们在这里跟自己的学派的体系发生了冲突。唯物主义把自然界看做唯一现实的东西，而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自然界只是绝对观念的“外化”，好像是这个观念的退化；无论如何，思维及其思想产物即观念在这里是本原的，而自然界是派生的，只是由于观念的下降才存在。他们就在这个矛盾中徘徊，尽管程度各不相同。

这时，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¹³出版了。它一下

子就消除了这个矛盾，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它是我们人类即自然界的产物本身赖以生长的基础；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所固有的本质的虚幻反映。魔法被解除了；“体系”被炸开了，而且被抛在一旁，矛盾既然仅仅是存在于想像之中，也就解决了。——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像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的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①中看出来。

甚至这部书的缺点也加强了它的一时的影响。美文学的、有时甚至是夸张的笔调赢得了广大的读者，无论如何，在抽象而费解的黑格尔主义的长期统治以后，使人们的耳目为之一新。对于爱的过度崇拜也是这样。这种崇拜，虽然不能加以辩护，但是情有可原，因为它是反对已经变得不能容忍的“纯粹思维”的专制的。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从1844年起在德国的“有教养的”人们中间像瘟疫一样传播开来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正是把费尔巴哈的这两个弱点当做自己的出发点的。它以美文学的词句代替了科学的认识，主张靠“爱”来实现人类的解放，而不主张用经济上改革生产的方法来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一句话，它沉溺在令人厌恶的美文学和泛爱的空谈中了。它的典型代表就是卡尔·格律恩先生。

还有一点不应当忘记，这就是：黑格尔学派虽然解体了，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268页。——编者注

但是黑格尔哲学并没有被批判地克服。施特劳斯和鲍威尔各自抓住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方面，在论战中互相攻击。费尔巴哈突破了黑格尔的体系，并且干脆把它抛在一旁。但是仅仅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加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任务是怎样实现的。

但是这时，1848年的革命毫不客气地把任何哲学都撇在一旁，正如费尔巴哈把他的黑格尔撇在一旁一样。这样一来，费尔巴哈本人也被挤到后台去了。

二

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①，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从这个时候起，人们不得不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既

① 蒙昧人和低级野蛮人中间，现在还流行着这样一种观念：梦中出现的人的形象是暂时离开肉体的灵魂；因而现实的人应当对自己出现于他人梦中时针对做梦者而采取的行为负责。例如伊姆·特恩于1884年在圭亚那的印第安人中就发现了这种情形。¹⁴

然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那末就没有任何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这种观念，在那个发展阶段上决不是一种安慰，而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并且往往是一种真正的不幸，例如在希腊人那里就是这样。到处引起这种个人不死的无聊臆想的，并不是宗教上的安慰的需要，而是由普遍的局限性所产生的困境：不知道已经被认为存在的灵魂在肉体死后究竟怎么样了。同样，由于自然力被人格化，最初的神产生了。随着宗教的向前发展，这些神愈来愈具有了超世界的形象，直到最后，由于智力发展中自然发生的抽象化过程——几乎可以说是蒸馏过程，在人们的头脑中，从或多或少有限的和互相限制的许多神中产生了一神教的唯一的神的观念。

因此，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像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但是，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这个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起过巨大作用的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个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

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创世说往往采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而荒唐的形式），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

义的各种学派。

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给它们加上别的意义，就会造成怎样的混乱。

但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对这个问题的肯定回答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所认识的，正是这个世界的思想内容，也就是那种使世界成为绝对观念的逐渐实现的东西，这个绝对观念是从来就存在的，是不依赖于世界并且先于世界而在某处存在的；但是思维能够认识那一开始就已经是思想内容的内容，这是十分明显的。同样明显的是，在这里，要证明的东西已经默默地包含在前提里面了。但是这决不妨碍黑格尔从他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论证中做出进一步的结论：因为对他的思维来说他的哲学是正确的，所以他的哲学也就是唯一正确的；只要人类马上把他的哲学从理论转移到实践中去，并按照黑格尔的原则来改造全世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会得到证实。这是他和几乎所有的哲学家所共有的幻想。

但是，另外还有许多哲学家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在近代哲学家中，休

谟和康德就属于这一类，而他们在哲学的发展上是起过很重要的作用的。对驳斥这一观点具有决定性的东西，已经由黑格尔说过了，凡是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所能说的，他都说了；费尔巴哈所附加的唯物主义的东西，与其说是深刻的，不如说是机智的。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末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动植物体内所产生的化学物质，在有机化学把它们一一制造出来以前，一直是这种“自在之物”；当有机化学开始把它们制造出来时，“自在之物”就变成为我之物了，例如茜草的色素——茜素，我们已经不再从田地里的茜草根中取得，而是用便宜得多、简单得多的方法从煤焦油里提炼出来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有三百年之久一直是一种假说，这个假说尽管有百分之九十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可靠性，但毕竟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后来加勒确实发现了这个行星的时候¹⁵，哥白尼的学说就被证实了。如果德国的新康德主义者企图复活康德的观点，而英国的不可知论者企图复活休谟的观点（在那里休谟的观点从来没有绝迹），那末，鉴于这两种观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早已被推翻，这种企图在科学上就是开倒车，而在实践上只是一种暗中接受唯物主义而当众又加以拒绝的羞羞答答的作法。

但是，在从笛卡儿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像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在唯物主义者那里，这已经是一目了然的了，而唯心主义体系也愈来愈加进了唯物主义的内容，力图用泛神论的观点来调和精神和物质的对立；因此，归根结底，黑格尔的体系只是一种就方法和内容来说唯心主义地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

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施达克在他对赞尔巴哈的评述中，首先研究赞尔巴哈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个基本问题的立场。在简短的导言里，作者对以前的、特别是从康德以来的哲学家的见解，都是用不必要的晦涩难解的哲学语言来阐述的，并且由于过分形式主义地死守黑格尔著作中的个别词句而大大贬低了黑格尔。在这个导言以后，他详细地叙述了费尔巴哈的有关著作中一贯表现出来的“形而上学”本身的发展进程。这一部分叙述得很用心，很明白，不过像整本书一样，决不是到处都不能避免的哲学用语堆砌得太多了。作者愈是不保持同一学派或者哪怕是费尔巴哈本人的用语，愈是把各种学派、特别是在今天像传染病一样流行的、自称为哲学派别的那些学派的用语混在一起，这种堆砌所造成的混乱就愈大。

费尔巴哈的发展进程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诚然，他从来不是完全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走向唯物主义的发展进程，这一发展使他在一定的阶段上同自己的这位先驱者的唯心主义体系完全决裂了。最后，他不可遏止地意识到，黑格尔的

“绝对观念”之先于世界的存在，在世界之前就有的“逻辑范畴的预先存在”，不外是对超世界造物主的信仰的虚幻残余；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却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这自然是纯粹的唯物主义。但是费尔巴哈到这里就突然停止不前了。他不能克服通常的哲学偏见，即不反对事情本质而反对唯物主义这个名词的偏见。他说：

“在我看来，唯物主义是人类本质和人类知识的大厦的基础；但是，我认为它不是像生理学家、狭义的自然科学家如摩莱肖特所认为的那样，不是像他们从他们的观点和专业出发所必然主张的那样，即不是大厦本身。向后退时，我同唯物主义者完全一致；但是往前进时就不一致了。”¹⁶

费尔巴哈在这里把唯物主义这种建立在对物质和精神关系的特定理解上的一般世界观同这一世界观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即十八世纪所表现的特殊形式混为一谈了。不仅如此，他还把唯物主义同它的一种肤浅的、庸俗的形式混为一谈，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现在就以这种形式继续存在于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的头脑中，并且被毕希纳、福格特和摩莱肖特在五十年代拿着到处叫卖。但是，像唯心主义一样，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自从历史也被唯物主义地解释的时候起，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

上一世纪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唯物主义，因为那时在所有自然科学中达到了某种完善地步的只有力学，而且只有刚体（天空的和地上的）力学，简言之，即重量的力学。化学刚刚处于幼稚的燃素说的形态中。生物学尚在襁褓中；对植物和动物的机体只作过极粗浅的研究，并用纯粹机械的原因来加以解释；正如在笛卡儿看来动物是机器一样，在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者看来，人是机器。仅仅运用力学的尺度来衡量化学过程和有机过程（在这些过程中，力学定律虽然也起作用，但是被其他较高的定律排挤到次要地位），这是法国古典唯物主义的一个特有的、但在当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这种唯物主义的第二个特有的局限性在于：它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这是同当时的自然科学状况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形而上学的即反辩证法的哲学思维方法相适应的。人们知道自然界是处在永恒的运动中。但是根据当时的想法，这种运动是永远绕着一个圆圈旋转，因而始终停留在同一地点；总是产生同一的结果。这种想法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康德的太阳系发生说刚刚提出，而且还只是被看做纯粹的奇谈。地球发展史，即地质学，还完全没有人知道，而关于现今的生物是由简单到复杂这样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结果的看法，当时还根本不可能科学地提出来。因此，对自然界的非历史的观点是不可避免的。根据这一点大可不必去责备十八世纪的哲学家，因为连黑格尔也有这种观点。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只是观念的“外化”，它在时间上不能发展，只是在空间中展示自己的多样性，因此，它把自己所包含的一切发展阶段同时地和

一个挨着一个地展示出来，并且注定永远重复总是同一的过程。黑格尔把发展是在空间以内、但在时间（这是一切发展的基本条件）以外发生的这种谬论强加于自然界，恰恰是在地质学、胚胎学、植物和动物生理学以及有机化学都已经建立起来，并且在这些新科学的基础上到处都产生了预示后来的进化论的天才猜测（例如歌德和拉马克）的时候。但是，体系要求这样，因此，方法为了要迎合体系就不得不背叛自己。

这种非历史的观点也表现在历史领域中。在这里，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被看做是由千年来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十四和十五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有被人看到。这样一来，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而历史至多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插图的汇集罢了。

五十年代在德国把唯物主义庸俗化的小贩们，丝毫没有越出他们的老师的这个范围。自然科学后来获得的一切进步，仅仅成了他们否认有世界创造主存在的新论据；而在进一步发展理论方面，他们实际上什么事也没有做。如果说，唯心主义当时已经智穷才竭，并且在 1848 年革命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那末，使它感到满足的是，唯物主义在这个时候更是江河日下。费尔巴哈拒绝为这种唯物主义负责是完全对的；只是他不应该把这些巡回传教士的学说同一般唯物主义混淆起来。

但是，这里应当注意两种情况。第一，当费尔巴哈在世

时，自然科学也还是处在剧烈的酝酿过程中，这一过程只是在最近十五年才达到了足以澄清问题的、相对完善的地步；新的认识材料以空前的规模被提供出来，但是，只是到最近才有可能在这种接连而来的发现的混乱状态中建立起联系，从而使它们条理化。虽然这三个决定性的发现——细胞、能量的转化和以达尔文命名的进化论，费尔巴哈全看到了，但是，这位在乡间过着孤寂生活的哲学家怎么能够充分研究科学，给这些发现以足够的评价呢？就是在自然科学家当中，当时有一部分人还对这些发现持有异议，有一部分人还不懂得充分利用这些发现。这里唯一可以非难的，是德国的可怜的状况，由于这种状况，当时哲学讲席全被那些故弄玄虚的、折衷主义的、打小算盘的人所占据，而比这些家伙高明百倍的费尔巴哈，却不得不在穷乡僻壤中过着农民式的孤陋寡闻的生活。因而，现在已经成为可能的、排除了法国唯物主义的一切片面性的、历史的自然观，始终没有为费尔巴哈所了解，这就不是他的过错。

第二，费尔巴哈说，纯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虽然“是人类知识的大厦的基础，但是，不是大厦本身”，这是完全正确的。

因为，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因此，任务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但是，这个任务费尔巴哈是完成不了的。他虽然有“基础”，但是在这里还没有摆脱传统的唯心主义束缚，这

一点他自己也是承认的，他说：

“向后退时，我同唯物主义者是一致的；但是往前进时就不一致了。”

但是在里，在社会领域内，正是费尔巴哈本人没有“前进”，没有超过自己在1840年或1844年的观点，这仍旧主要是由于他的孤寂生活，这种生活迫使这位比其他任何哲学家都更爱好社交的哲学家从他的孤寂的头脑中，而不是从和他才智相当的人们的友好或敌对的接触中得出自己的思想。费尔巴哈在这个领域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是唯心主义者，我们将在下面加以详细的考察。

这里还应当指出，施达克在找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时找错了地方。他说：

“费尔巴哈是唯心主义者，他相信人类的进步。”（第19页）“唯心主义仍旧是一切的基础，根基。在我们看来，实在论只是在我们追求自己的理想的意图时使我们不致误入迷途而已。难道同情、爱以及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不是理想的力量吗？”（第VIII页）

第一，在这里无非是把对理想目的的追求叫做唯心主义。但这些目的必然地至多是同康德的唯心主义及其“绝对命令”有联系；然而连康德都把自己的哲学叫做“先验的唯心主义”，这决不是因为那里面也讲到过道德的理想，而完全是由别的理由，这理由施达克是会记得的。有一种偏见，认为哲学唯心主义的中心就是对道德理想即对社会理想的信仰，这种偏见是在哲学之外产生的，是在那些把席勒诗歌中符合他们需要的少数哲学上的只言片语背得烂熟的德国庸人中产生的。没有一个人比恰恰是十足的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更

尖锐地批评了康德的软弱无力的“绝对命令”（它之所以软弱无力，是因为它要求不可能的东西，因而永远达不到任何现实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比他更辛辣地嘲笑了席勒所传播的那种沉湎于不能实现的理想的庸人倾向（参见“现象学”¹⁷）。

第二，决不能避免这种情况：推动人去从事活动的一切，都要通过人的头脑，甚至吃喝也是由于通过头脑感觉到的饥渴引起的，并且是由于同样通过头脑感觉到的饱足而停止。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通过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如果一个人只是由于他追求“理想的意图”并承认“理想的力量”对他的影响，就成了唯心主义者，那末任何一个发育稍稍正常的人都是天生的唯心主义者了，这样怎么还会有唯物主义者呢？

第三，认为人类（至少在现时）总的来说是沿着进步方向运动的这种信念，是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绝对不相干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同自然神论者¹⁸伏尔泰和卢梭一样，几乎狂热地抱有这种信念，并且往往为它付出最大的个人牺牲。如果说，有谁为了“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就这句话的正面的意思说）而献出了整个生命，那末，例如狄德罗就是这样的人。由此可见，施达克把这一切说成是唯心主义，这只是证明：“唯物主义”这个名词以及两个派别的全部对立，在这里对他来说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

事实上，施达克在这里向庸人的那种由于教士的多年诽谤而对“唯物主义”这个名称产生的偏见做了不可饶恕的让步，虽然这也许是不自觉的。庸人把唯物主义理解为贪吃、酗

酒、娱乐、肉欲、虚荣、爱财、吝啬、贪婪、牟利、投机，简言之，即他本人暗中迷恋着的一切龌龊行为；而把唯心主义理解为对美德、普遍的人类爱的信仰，总之，对“美好世界”的信仰，——他在别人面前夸耀这个“美好世界”，但是他自己至多只是在这样的时候才相信这个“美好世界”，这时，他由于自己平时的“唯物主义的”放纵而必然感到懊丧或遭到破产，并因此唱出了他心爱的歌：人是什么？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

在其他方面，施达克极力保护费尔巴哈，反对现今在德国以哲学家名又大吹大擂的大学讲师们的攻击和学说。对关心德国古典哲学的这些不肖子孙的人们来说，这的确是很重要的；对施达克本人来说，这也许是必要的。不过我们就此饶了读者吧。

三

我们一接触到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他的真正的唯心主义就显露出来了。费尔巴哈决不希望废除宗教，他是希望使宗教完善化。哲学本身应当溶化在宗教中。

“人类的各个时期彼此借以区别的，仅仅是宗教的变迁。其一历史运动，只有在它深入人心的时候，才是根深蒂固的。心不是宗教的形式，因而宗教也不应当存在于心中；心是宗教的本质。”¹⁹（引自施达克的书第168页）

按照费尔巴哈的看法，宗教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的关系、心灵的关系，过去这种关系是在现实的虚幻反映中（借助于

一个神或许多神这些人类特性的虚幻反映)寻找自己的真理,现在却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在我和你之间的爱中寻找自己的真理了。归根到底,在费尔巴哈那里,性爱即使不是他的新宗教借以实现的最高形式,也是最高形式之一。

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性爱特别是在最近八百年间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和地位,竟成了这个时期中一切诗歌必须环绕着旋转的轴心了。现存的实在的宗教只限于使国家对性爱的管理即婚姻立法高度神圣化;这种宗教也许明天就会完全消失,但是爱情和友谊的实践并不会发生丝毫变化。在法国,在1793到1798年这个期间,基督教的确曾经消失到这种程度,连拿破仑去恢复它也不能不遇到抵抗和困难,但是在这一期间,并没有感觉到需要用费尔巴哈的新宗教去代替它。

在这里,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就在于:他不是直截了当地按照本来面貌看待人们彼此间以相互倾慕为基础的关系,即性爱、友谊、同情、舍己精神等等,而是把这些关系和某种特殊的、在他看来也属于过去的宗教联系起来,断定这些关系只有在人们用宗教一词使之高度神圣化以后才会获得自己的完整的意义。在他看来,主要的并不是存在着这种纯粹人的关系,而是要把这些关系看做新的、真正的宗教。这些关系只是在盖上了宗教的印记以后才被认为是完满的。宗教一词是从 *religare* 一词来的,本来是联系的意思。因此,两个人之间的任何联系都是宗教。这种语源学上的把戏是唯心主义哲学的最后一着。加在这个词上的意义,并不是通过它的实际使用的历史发展得到的,而是按照语源所应该具有的。

因此，为了宗教这个对唯心主义回忆很宝贵的名词不致从语言中消失，性爱和性关系竟被尊崇为“宗教”。在四十年代，巴黎的路易·勃朗派改良主义者正是这样说的，他们也认为不信宗教的人只是一种怪物，并且对我们说：因此，无神论就是你们的宗教！费尔巴哈想根据一种本质上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建立真正的宗教，这等于把现代化学当做真正的炼金术。如果无神的宗教可以存在，那末没有哲人之石的炼金术也是可以存在的了。况且，炼金术和宗教之间是有很紧密的联系的。哲人之石有许多类似神的特性，公元头两世纪埃及和希腊的炼金术士在基督教学说的形成上也出了一分力量。柯普和拜特洛所提供的材料就证明了这一点。

费尔巴哈的下面这个论断是绝对错误的：

“人类的各个时期彼此借以区别的，仅仅是宗教的变迁。”

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有宗教变迁相伴随，只是就迄今存在的三种世界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言。旧的自发产生的部落宗教和民族宗教不进行宣传，一旦部落或民族的独立遭到破坏，它们便失掉任何抵抗力；在日耳曼人那里，甚至只要他们一接触正在崩溃的罗马世界帝国，一接触它刚刚采用的、适应于它的经济、政治、精神状态的世界基督教，这种情形就发生了。仅仅在研究这些多少是人工造成的世界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一般的历史运动带有宗教的色彩，而且，甚至在基督教的领域中，这种宗教色彩，对具有真正普遍意义的革命来说，也只表现在资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最初阶段，即从十三世纪起到十七世纪止；同时，这种色彩不能像费尔巴哈所想的那样，用

人的心灵和人的宗教需要来解释，而要用整个中世纪的历史来解释，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但是到了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已经强大得足以建立他们自己的、同他们的阶级地位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了，这时他们才进行了他们的伟大而彻底的革命——法国革命，而且仅仅诉诸法律的和政治的观念，只是在宗教堵住他们的道路时，他们才理会宗教；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要用某种新的宗教来代替旧的宗教；大家知道，罗伯斯比尔在这方面曾遭受了怎样的失败。

在我们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以阶级对立和阶级统治为基础的社会里，同他人交往时表现纯粹人类感情的可能性，今天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我们没有理由去把这种感情尊崇为宗教，从而更多地破坏这种可能性。同样，对历史上的伟大的阶级斗争的理解，特别是在德国，也已经被流行的历史编纂学弄得够模糊了，我们没有必要去把这一斗争的历史变为教会史的单纯附属品，使这种理解成为完全不可能。由此可见，现在我们已经超过费尔巴哈多么远了。现在连他那赞美新的爱的宗教的“最美丽的篇章”都不堪卒读了。

费尔巴哈认真地研究过的唯一的宗教，是基督教这个以一神教为基础的西方的世界宗教。他指出，基督教的神只是人的虚幻的反映，人的映像。但是，这个神本身是长期的抽象过程的产物，是以前的许多部落神和民族神集中起来的精华。与此相应，这个神所反映的人也不是一个现实的人，而同样是许多现实的人的精华，是抽象的人，因而本身又是一个想像的形象。费尔巴哈在每一页上都宣传感性，宣传专心研究具体的东西，研究现实，可是这同一个费尔巴哈，一谈

到某种比人们之间的纯粹性关系更进一步的关系，就变成完全抽象的了。

他在这种关系中仅仅看到一个方面——道德。在这里，和黑格尔比较起来，费尔巴哈的惊人的贫乏又使我们诧异。黑格尔的伦理学或关于伦理的学说就是法哲学，其中包括：(1) 抽象的法，(2) 道德，(3) 伦理，其中又包括家庭、市民社会、国家。在这里，形式是唯心的，内容是现实的。法律、经济、政治的全部领域连同道德都包括在这里。在费尔巴哈那里情况恰恰相反。就形式讲，他是现实的，他把人作为出发点；但是，关于这个人生活其中的世界却根本没有讲到，因而这个人始终是宗教哲学中所说的那种抽象的人。这个人不是从娘胎里生出来的，他是从一神教的神羽化而来的，所以他也不是生活在现实的、历史地发生和历史地确定了的世界里面；虽然他同其他的人来往，但是任何一个其他的人也和他本人一样是抽象的。在宗教哲学里，我们终究还可以看到男人和女人，但是在伦理学里，连这最后一点差别也消失了。的确，在费尔巴哈那里间或也有这样的命题：

“皇宫中的人所想的，和茅屋中的人所想的是不同的。”²⁰——“如果你因为饥饿、贫困而身体内没有营养物，那末你的头脑中、你的感觉中，以及你的心中便没有供道德用的食物了。”²¹——“政治应当成为我们的宗教。”²³等等。

但是，费尔巴哈完全不知道利用这些命题，这些命题仍旧是纯粹的空话，甚至施达克也不得不承认，政治对费尔巴哈是一个不可通过的区域，而

“关于社会的科学，即社会学，对他来说，是一个未知的地带”²³。

在善恶对立的研究上，他同黑格尔比起来也是很肤浅的。黑格尔指出：

“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²⁴

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拜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但是，费尔巴哈就没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历史对他来说是一个令人感到不愉快的可怕的领域。甚至他的名言：

“当人刚刚脱离自然界的时候，他也只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物，而不是人。人是人、文化、历史的产物。”²⁵
甚至这句名言在他那里也仍然是毫无结果的。

从上述一切可以明白，关于道德，费尔巴哈所告诉我们的东西是极其贫乏的。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人生下来就有的，因而应当成为一切道德的基础。但是追求幸福的欲望受到双重的矫正。第一，受到我们的行为的自然后果的矫正：酒醉之后，必定头痛；放荡成习，必生疾病。第二，受到我们的行为的社会后果的矫正：要是我们不尊重他人追求幸福的同样的欲望，那末他们就会反抗，妨碍我们自己追求幸福的欲望。由此可见：我们要满足我们的这种欲望，就必须能够正确地

估量我们的行为的后果，同时还必须承认他人的相应的欲望的平等权利。因此，对己以合理的自我节制，对人以爱（永远是爱！），这就是费尔巴哈的道德的基本准则，其余的一切都是从这个准则推出来的。无论费尔巴哈的妙语横生的议论或施达克的热烈无比的赞美，都不能掩盖这几个命题的贫瘠和空泛。

当一个人专为自己打算的时候，他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满足，而且决不是对己对人都有利。他需要和外部世界来往，需要满足这种欲望的手段：食物、异性、书籍、谈话、辩论、活动、消费品和操作对象。二者必居其一：或者费尔巴哈的道德是以每一个人无疑地都有这些满足欲望的手段和对象为前提，或者它只向每一个人提供无法应用的忠告，因而它对于没有这些手段的人是一文不值的。这一点，费尔巴哈自己也是说得很直截了当的：

“皇宫中的人所想的，和茅屋中的人所想的是不同的。”“如果你因为饥饿、贫困而身体内没有营养物，那末你的头脑中、你的感觉中，以及你的心中便没有供道德用的食物了。”

关于他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情况是否好一些呢？费尔巴哈无条件地提出这种要求，认为这种要求是适合于任何时代和任何情况的。但是这种要求从什么时候起被认为是适合的呢？在古代的奴隶和奴隶主之间，在中世纪的农奴和领主之间，难道谈得上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吗？被压迫阶级追求幸福的欲望不是被冷酷无情地和“由于正当理由”变成了统治阶级的这种欲望的牺牲品吗？——是的，这也是不道德的，但是现在平等权利被承认了。自从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

制度的斗争中并在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中不得不废除一切等级的即个人的特权，而且起初在私法方面、后来逐渐在公法方面实施了个人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以来，平等权利在口头上是被承认了。但是，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极微小的一部分可以靠理想的权利来满足，绝大部分却要靠物质的手段来实现，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所关心的，是使绝大多数权利平等的人仅有最必需的东西来勉强维持生活，所以资本主义对多数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所给予的尊重，即使一般说来多些，也未必比奴隶制或农奴制所给予的多。关于幸福的精神手段、教育手段，情况是否好一些呢？就连“萨多瓦的小学教师”²⁶ 不也是一个神话人物吗？

不仅如此。根据费尔巴哈的道德论，证券交易所就是最高的道德殿堂，只要人们的投机始终都是得当的。如果我追求幸福的欲望把我引进了交易所，而且我在那里又善于正确地估量我的行为的后果，因而这些后果只使我感到愉快而不引起任何损失，就是说，如果我经常赚钱的话，那末费尔巴哈的指示就算执行了。我也并没有因此就妨碍另一个人追求幸福的同样的欲望，因为另一个人和我一样地是自愿到交易所里去的，他和我成立投机交易时是按照他追求幸福的欲望行事，正如我是按照我追求幸福的欲望行事一样。如果他赔了钱，那末这就证明他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因为他盘算错了，而且，在我对他执行应得的惩罚时，我甚至可以摆出现代拉达曼的架子来。在交易所里，只要爱不纯粹是一个温情的字眼，也是由爱统治一切的，因为每个人都靠别人来满足自己追求幸福的欲望，而这就是爱应当完成和实际从事的事情。同

时，如果我在那里正确地预见到我的行动的后果，因而赌赢了，那末我就执行了费尔巴哈道德的一切最严格的要求，而且我还会成为富翁。换句话说，费尔巴哈的道德是完全适合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不管他自己多么不愿意或想不到是这样。

可是爱呵！——真的，在费尔巴哈那里，爱随时随地都是一个创造奇迹的神，可以帮助他克服实际生活中的一切困难，——而且这是在一个分成利益直接对立的阶级的社会里。这样一来，他的哲学中的最后一点革命性也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一个老调子：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拥抱吧，——大家一团和气地痛饮吧！

简单扼要地说，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是和它的一切前驱者一样的。它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而在现实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的。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而且也破坏这种道德，如果它们能这样做而不受惩罚的话。至于那要把一切人都联合起来的爱，则表现在战争、争吵、诉讼、家庭纠纷、离婚以及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最高限度的剥削中。

但是，费尔巴哈所提供的强大推动力怎么能对他本人也毫无结果呢？理由很简单，因为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他紧紧地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但是，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

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需把这些人当作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研究。而费尔巴哈反对这样做，因此，他所不了解的 1848 年对他来说只意味着和现实世界的最后分离，意味着退入孤寂的生活。在这方面，主要又要归咎于德国的状况，这种状况使他落得这种可怜的结局。

但是费尔巴哈所没有走的一步，终究是有人要走的。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须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 1845 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

四

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费尔巴哈，就他们没有离开哲学的立足地这一点来说，都是黑格尔哲学的支脉。施特劳斯写了《耶稣传》和《教义学》²⁷ 以后，就只从事于写作勒南式的哲学和教会史的美文学作品；鲍威尔只是在基督教起源史方面做了一些事情，虽然他在那里所做的也是一些重要的事情；施蒂纳甚至在巴枯宁把他同蒲鲁东混合起来并且把这个混合物命名为“无政府主义”以后，依然是一个宝贝；唯有费尔巴哈是个杰出的哲学家。但是，哲学，这一似乎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包括一切专门科学的科学的科学，对他来说不仅仍然是不可逾越的屏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而且，他作为一个哲学家，也停留在半路上，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他没有批判地克服黑

格尔，而是简单地把黑格尔当做无用的东西抛在一边，同时，他本人除了矫揉造作的爱的宗教和贫乏无力的道德，拿不出什么积极的东西来和黑格尔体系的百科全书式的丰富内容相抗衡。

但是，从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过程中还产生了另一个派别，唯一的产生真实结果的派别。这个派别主要是同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①

同黑格尔哲学的分离，在这里也是由于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而产生的结果。这就是说，人们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决意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人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意毫不怜惜地牺牲一切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除此以外，唯物主义根本没有更多的意义，只是在这里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

① 请允许我在这里作一点个人的说明。近来人们不止一次地提到我参加了制定这一理论的工作，因此，我在这里不得不说几句话，把这个问题澄清。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四十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至多除几个专门的领域外，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很容易地做到。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公正的。

黑格尔不是简单地被放在一边，恰恰相反，上面所说的他的革命方面，即辩证方法，是被当做出发点的。但是这个方法在黑格尔的形式中是无用的。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概念的自我发展。绝对概念不仅是从来就存在的（不知在哪里？），而且是全部现存世界的真正的活的灵魂。它通过在“逻辑学”中详细探讨过并且完全包含在它自身中的一切预备阶段而向自身发展；然后它使自己“外化”，转化为自然界，它在自然界中并没有意识到它自己，而是采取自然必然性的形式，经过新的发展，最后在人身上重新达到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意识，在历史中又从粗糙的形式中挣脱出来，直到绝对概念终于在黑格尔哲学中又完全地达到自身为止。因此，在自然界中和历史上所显露出来的辩证的发展，即经过一切迂回曲折和暂时退步而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运动的因果联系，在黑格尔那里，只是概念的自己运动的翻版，而这种概念的自己运动是从来就有的、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发生的，但无论如何是同任何能思维的人脑无关的。这种意识形态的颠倒是应该消除的。我们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做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做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大部分也是如此。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

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我们发现了这个多年来已成为我们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而且德国工人约瑟夫·狄慈根不依靠我们，甚至不依靠黑格尔也发现了它。^①

而这样一来，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方面就恢复了，同时也摆脱了那些曾经在黑格尔那里阻碍它贯彻到底的唯心主义装饰。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前进的发展，不管一切表面的偶然性，也不管一切暂时的倒退，终究会给自己开辟出道路，——这个伟大的基本思想，特别是从黑格尔回来，已经如此深入一般人的意识，以致它在这种一般形式中未必会遭到反对了。但是，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是一回事，把这个思想具体地实际运用于每一个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如果人们在研究工作中始终从这个观点出发，那末关于最终解决和永恒真理的要求就永远不会提出了；人们就始终会意识到他们所获得的一切知识必然具有的局限性，意识到他们在获得知识时所处的环境对这些知识的制约性；人们也不再敬重还在不断流行的旧形而上学所不能克服的对立，即真理和谬误、善和恶、同一和差别、必然和偶然之间的对立了；人们知道：这些对立只有相对的意义；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

① 见《人脑活动的实质。一个手艺人的描述》汉堡迈斯纳出版社版。²⁸

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如此等等。

旧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黑格尔称之为“形而上学的”方法，主要是把**事物**当作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它的残余还牢牢地盘据在人们的头脑中，这种方法在当时是有重大的历史根据的。必须先研究事物，而后才能研究过程。必须先知道一个事物是什么，而后才能觉察这个事物中所发生的变化。自然科学中的情形正是这样。认为事物是既成的东西的旧形而上学，是从那种把非生物和生物当作既成事物来研究的自然科学中产生的。而当这种研究已经进展到可以向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即可以过渡到系统地研究这些事物在自然界本身中所发生的变化的时候，在哲学领域内也就响起了旧形而上学的丧钟。事实上，直到上一世纪末，自然科学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但是在本世纪，自然科学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伟大整体的联系的科学。研究植物机体和动物机体中的过程的生理学，研究单个机体从胚胎到成熟的发育过程的胚胎学，研究地壳逐渐形成过程的地质学，——所有这些科学都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产儿。

但是，首先是三大发现使我们对自然过程的相互联系的认识大踏步地前进了：第一是发现了细胞，发现细胞是这样一种单位，整个植物体和动物体都是从它的繁殖和分化中发

育起来的。由于这一发现，我们不仅知道一切高等有机体都是按照一个共同规律发育和生长的，而且通过细胞的变异能力指出了使有机体能改变自己的物种并从而能实现一个比个体发育更高的发育的道路。——第二是能的转化，它向我们表明了一切首先在无机自然界中起作用的所谓力，即机械力及其补充，所谓位能、热、放射（光或辐射热）、电、磁、化学能，都是普遍运动的各种表现形式，这些运动形式按照一定的度量关系由一种转变为另一种，因此，当一种形式的量消失时，就有另一种形式的一定的量代之出现，因此，自然界中的一切运动都可以归结为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不断转化的过程。——最后，达尔文第一次从联系中证明了，今天存在于我们周围的有机自然物，包括人在内，都是少数原始单细胞胚胎的长期发育过程的产物，而这些胚胎又是由那些通过化学途径产生的原生质或蛋白质形成的。

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描绘这样一幅总的图画，在以前是所谓自然哲学的任务。而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像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它在这样做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说出了十分荒唐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今天，当人们对自然研究的结果只是辩证地即从它

们自身的联系进行考察，就可以制成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令人满意的“自然体系”的时候，当这种联系的辩证性质，甚至迫使自然哲学家的受过形而上学训练的头脑违背他们的意志而不得不接受的时候，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清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

现在也被我们理解为历史发展过程的自然界的情况是这样，社会历史的一切部门和研究人类的（和神的）事物的一切科学的情况也是这样。在这里，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等也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指出的现实的联系，把历史（其全部和各个部分）看做观念的逐渐实现，而且当然始终只是哲学家本人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渐实现。这样看来，历史是不自觉地、但必然是为了实现某种预定的理想目的而努力，例如在黑格尔那里，是为了实现他的绝对观念而努力，而达到这个绝对观念的坚定不移的意向就构成了历史事变中的内在联系。这样，人们就用一种新的——不自觉的或逐渐自觉的——神秘的天意来代替现实的、尚未知道的联系。因此，在这里也完全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应该发现现实的联系，从而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

但是，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无论在外表上看得出的无数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

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的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个别时代和个别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即使在这一领域内，尽管每个人都有自觉期望的目的，在表面上，总的说来好像也是偶然性在支配着。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彼此冲突，互相矛盾，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这样，无数的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来说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因此，问题也在于，这许多个别的人所期望的是什么。愿望是由激情或思虑来决定的。而直接决定激

情或思虑的杠杆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可能是外界的事物，有的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动机，如功名心、“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个人的憎恶，或者甚至是各种纯粹个人的怪癖。但是，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个别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因而它们的动机对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只有从属的意义。另一方面，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在这些动机背后隐藏着的又是什么样的动力？在行动者的头脑中以这些动机的形式出现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

旧唯物主义从来没有给自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因此，它的历史观——如果它有某种历史观的话，——本质上也是实用主义的，它按照行动的动机来判断一切，把历史人物分为君子和小人，并且照例认为君子是受骗者，而小人是得胜者。旧唯物主义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历史的研究中不能得到很多有教益的东西；而我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因为它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反之，历史哲学，特别是黑格尔所代表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和真实动机都决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认为这些动机后面还有应当加以探究的别的动力；但是它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反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例如黑格尔，他不从古希腊历史本身的内在联系去说明古希腊的历史，而只是简单地断

定，古希腊的历史无非是“美好的个性形式”的制定，是真正的“艺术作品”的实现²⁹。在这里，黑格尔关于古希腊人作了许多精彩而深刻的评论，但是这种只是一些空谈的说明现在已经不能使我们满足了。

因此，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末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思想的形式、甚至以幻想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使人们行动起来的一切，都必然要经过他们的头脑；但是这一切在人们的头脑中采取什么形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种情况决定的。自从工人不再像 1848 年在莱茵河流域那样简单地捣毁机器以来，工人已经丝毫不能容忍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应用机器了。

但是，在以前的各个时期，对历史的这些动因的探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和自己的结果的联系是混乱而隐蔽的，在我们今天这个时期，这种联系已经非常简单化了，因而人们有可能揭开这个谜了。从采用大工业以来，就是说，至少从 1815 年签订欧洲和约以来，在英国，谁都知道，土地贵

族(landed aristocracy)和资产阶级(middle class)这两个阶级争夺统治的要求，是英国全部政治斗争的中心。在法国，随着波旁王室的返国，同样的事实也被人们意识到了；复辟时期的历史家，从梯叶里到基佐、米涅和梯也尔，总是指出这一事实是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而从1830年起，在这两个国家里，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已被承认是为争夺统治而斗争的第三个战士。当时关系已经非常简单化，只有故意闭起眼睛的人才看不见，这三大阶级的斗争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是现代历史的动力，至少是这两个最先进国家的现代历史的动力。

但是这些阶级是怎样产生的呢？初看起来，从前大规模的封建土地占有制的起源，还可以（至少首先是）归于政治原因，归于暴力掠夺，但是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来说就不行了。在这里，显而易见，这两个大阶级的起源和发展是由于纯粹经济的原因。而同样明显的是，土地占有制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正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一样，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由于经济关系发生变化，确切些说，是由于生产方式发生变化而产生的两个阶级。最初是从行会手工业到工场手工业的过渡，随后又是从工场手工业到使用蒸汽和机器的大工业的过渡，使这两个阶级发展起来了。在一定阶段上，资产阶级使用的新的生产力——首先是分工和许多局部工人在一个综合性手工工场里的联合——以及通过生产力发展起来的交换条件和交换需要，同现存的、历史上继承下来的而且被法律神圣化的生产

秩序不相容了，就是说，同封建社会制度的行会特权以及许多其他的个人特权和地方特权（这些特权对于非特权等级来说都是桎梏）不相容了。资产阶级所代表的生产力，起来反抗封建土地占有者和行会师傅所代表的生产秩序；结局是大家都知道的：封建桎梏被打碎了，在英国是逐渐被打碎的，在法国是一下子被打碎的，在德国还没有被打碎。但是，正像工场手工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曾经和封建的生产秩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现在已经同代替封建生产秩序的资产阶级生产秩序相冲突了。被这种秩序、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狭隘范围所束缚的大工业，一方面使全体广大人民群众愈来愈无产阶级化，另一方面生产出愈来愈多的没有销路的产品。生产过剩和大众的贫困，两者互为因果，这就是大工业所陷入的荒谬的矛盾，这个矛盾必然地要求通过改变生产方式来使生产力摆脱桎梏。

因此，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任何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因此，至少在这里，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从传统的观点看来（这种观点也是黑格尔所尊崇的），国家是决定性的因素，市民社会是被国家决定的因素。表面现象是和这种看法符合的。就个别人说，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愿望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同样，市民社会的一切要求（不管当时是哪一个阶级统治着），也一定要通过国家的愿望，才能以法

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这是问题的形式方面，这方面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要问一下，这个仅仅是形式上的愿望（不论是个别人的或国家的）有什么内容呢？这一内容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人们所期望的正是这个而不是别的呢？在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时，我们就发现，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愿望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

但是，既然甚至在拥有巨量生产资料和交通工具的现代，国家都不是一个具有独立发展的独立领域，而它的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都应该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那末，以前的一切时期就必然更是这样了，那时人们物质生活的生产还没有使用这样丰富的辅助手段来进行，因而这种生产的必要性必不可免地在更大程度上支配着人们。既然在今天这个大工业和铁路的时代，国家总的说来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那末，在以前的时代，国家就必然更加是这样了，那时每一代人都要比我们今天更多得多地耗费一生中的时间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因而要比我们今天更多地依赖于这种物质需要。对从前各个时代的历史的研究，只要在这方面是认真进行的，都会最充分地证实这一点；但是，不用说，在这里不能进行这种研究了。

如果说国家和公法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那末不言而喻，私法也是这样，因为私法本质上只是确认单个人之间的现存的、在一定情况下是正常的经济关系。但是，这种确认所采取的形式可以是很不相同的。人们可以把旧的封建法权形式

的很大一部分保存下来，并且赋予这种形式以资产阶级的内容，甚至直接给封建的名称加上资产阶级的含意，就像在英国与民族的全部发展相一致而发生的那样；但是人们也可以像在西欧大陆上那样，把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即罗马法以及它对简单商品所有者的一切本质的法律关系（如买主和卖主、债权人和债务人、契约、债务等等）所作的无比明确的规定作为基础。这样做时，为了仍然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半封建的社会的利益，人们可以或者是简单地通过审判的实践贬低这个法律，使它适合于这个社会的状况（普通法），或者是依靠所谓开明的满口道德说教的法学家的帮助把它改造为一种适应于这种社会状况的特殊法典；这个法典，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从法学观点看来也是不好的（普鲁士国家法）；但是这样做时，人们也可以在资产阶级大革命以后，以同一个罗马法为基础，创造像法兰西民法典这样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因此，如果说民法准则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那末这种准则就可以依情况的不同而把这些条件有时表现得好，有时表现得坏。

国家作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社会创立一个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这种机关就是国家政权。它刚一产生，对社会来说就是独立的，而且它愈是成为某个阶级的机关，愈是直接地实现这一阶级的统治，它就愈加独立。被压迫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必然要变成政治的斗争，变成首先是反对这一阶级的政治统治的斗争；对这一政治斗争同它的经济基础的联系的认识，就日益模糊起来，并且会完全消失。即使在

斗争参加者那里情况不完全是这样，但是在历史家那里差不多总是这样的。在关于罗马共和国内部斗争的古代史料中，只有阿庇安一人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这一斗争归根到底是为什么进行的，即为土地所有权进行的。

但是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的独立力量，马上就产生了新的意识形态。这就是说，在职业政治家那里，在公法理论家和私法法学家那里，同经济事实的联系就完全消失了。因为经济事实要取得法律上的承认，必须在每一个别场合下采取法律动机的形式，而且，因为在这里，不言而喻地要考虑到现行的整个法律体系，所以，现在法律形式就是一切，而经济内容则什么也不是。公法和私法被看做两个独立的领域，两者各有自己的独立的历史发展，本身都可以系统地加以描述，并要求彻底根除一切内部矛盾，以便作出这种描述。

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愈来愈混乱，愈来愈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但是这一联系是存在着的。从十五世纪中叶起的整个文艺复兴时代，在本质上是城市的从而是市民阶级的产物，同样，从那时起重新觉醒的哲学也是如此。哲学的内容本质上仅仅是那些和中小市民阶级发展为大资产阶级的过程相适应的思想的哲学表现。在前一世纪的那些往往既是哲学家又是政治经济学家的英国人和法国人那里，这种情形是表现得很明显的，而在黑格尔学派那里，这一情况我们在上面已经说明过了。

现在我们再简略地谈谈宗教，因为宗教离开物质生活最远，而且好像是同物质生活最不相干。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

代从人们关于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但是，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就是说，它就不是把思想当作独立地发展的、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本质来处理了。头脑中发生这一思想过程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归根到底决定着这一思想过程的进行，这一事实，对这些人来说必然是没有意识到的，否则，全部意识形态就完结了。因此，大部分是每个有血统关系的民族集团所共有的这些最初的宗教观念，在这些集团分裂以后，便在每个民族那里依各自遇到的生活条件而独特地发展起来，而这一过程对一系列民族集团来说，特别是对雅利安人（所谓印欧人）来说，已由比较神话学详细地证实了。这样在每一个民族中形成的神，都是民族的神，这些神的王国不越出它们所守护的民族领域，在这个界线以外，就由别的神无可争辩地统治了。只要这些民族存在，这些神也就继续活在人们的观念中；这些民族没落了，这些神也就随着灭亡。罗马世界帝国使得旧有的民族没落了（关于罗马世界帝国产生的经济条件，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加以研究），旧有的民族的神就灭亡了，甚至罗马的那些仅仅适合于罗马城的狭小圈子的神也灭亡了；罗马曾企图除本地的神以外还承认和供奉一切多少受崇敬异族的神，这种企图清楚地表现了拿一种世界宗教来充实世界帝国的需要。但是一种新的世界宗教是不能这样用皇帝的敕令创造出来的。新的世界宗教，即基督教，已经从普遍化了的东方神学、特别是犹太神学和庸俗化了的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葛

派哲学的混合中悄悄地产生了。我们必须重新进行艰苦的研究，才可以知道基督教最初是什么样子，因为它那流传到我们今天的官方形式仅仅是尼西亚宗教会议为了使它成为国教并使它适合于成为国教这个目的而赋予它的那种形式。³⁰ 它在二百五十年后已经变成国教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它是适应时势的宗教。在中世纪，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基督教形成了一种同它相适应的、具有相应的封建教阶制的宗教。当市民阶级兴起的时候，新教异端首先在法国南部的阿尔比派中间、在那里的城市最繁荣的时代同封建的天主教相对抗而发展起来。³¹ 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因此，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市民阶级从最初起就给自己制造了一种由无财产的、不属于任何公认的等级的城市平民、零工和各种仆役所组成的附属品，即后来无产阶级的前身，同样，宗教异端也早就分成了两派：市民温和派和甚至也为市民异教徒所憎恶的平民革命派。

新教异端的不可根绝是同正在兴起的市民阶级的不可战胜相适应的；当这个市民阶级已经充分强大的时候，他们从前的主要是同封建贵族进行的地方性斗争便开始采取民族的规模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行动发生在德国，这就是所谓的宗教改革³²。那时市民阶级既不够强大又不够发展，不足以把其他的叛乱等级——城市平民、下级贵族和乡村农民——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之下。贵族首先被击溃；农民举行了起义，

形成了这次整个革命运动的顶点；城市背弃了农民，革命被各邦君主的军队镇压下去了，这些君主囊括了革命的全部果实。从那时起，德国有整整三个世纪从那些能独立地干预历史的国家的行列中消失了。但是除德国人路德外，还出现了法国人加尔文，他以真正法国式的尖锐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使教会共和化和民主化。当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国已经蜕化并把德国引向灭亡的时候，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却成了日内瓦、荷兰和苏格兰共和党人的旗帜，使荷兰摆脱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并为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二幕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在这里，加尔文教是当时资产阶级利益的真正的宗教外衣，因此，在 1689 年革命由于一部分贵族同资产阶级间的妥协而结束以后，它也没有得到完全的承认。³³ 英国的国家教会恢复了，但不是恢复到它以前的形式，即由国王充任教皇的天主教，而是强烈地加尔文教化了。旧的国家教会庆祝欢乐的天主教礼拜日，反对枯燥的加尔文派礼拜日。新的资产阶级化的国家教会，则采用后一种礼拜日，这种礼拜日至今还在装饰着英国。

在法国，1685 年加尔文教的少数派曾遭到镇压，被迫归依天主教或者被驱逐出境。³⁴ 但是这有什么用处呢？那时自由思想家比埃尔·培尔已经在进行活动，1694 年伏尔泰诞生了。路易十四的暴力措施只是方便了法国的市民阶级，使他们可以赋予自己的革命以唯一同已经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相适应的、非宗教的、纯粹政治的形式。出席国民会议的不是新教派，而是自由思想家了。由此可见，基督教已经踏进了最后阶段。此后，它已不能成为任何进步阶级的意向的意识

形态外衣了；它愈来愈变成统治阶级专有的东西，统治阶级只把它当作使下层阶级就范的统治手段。同时，每个不同的阶级都利用它自己认为适合的宗教：占有土地的容克利用天主教的耶稣会派或新教的正统派，自由的和激进的资产者则利用唯理派，至于这些老爷们自己相信还是不相信他们各自的宗教，这是完全无关紧要的。

这样，我们看到，宗教一旦形成，总要包含某些传统的材料，因为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但是，这些材料所发生的变化是由造成这种变化的人们的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引起的。在这里只说这一点就够了。

上面的叙述只能是对马克思的历史观的一个概述，至多也只能是一些说明。证据只能由历史本身中提供；而在这里我敢肯定地说，在其他著作中这种证据已经提供得很充分了。但是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再是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种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

* * *

随着 1848 年革命的爆发，“有教养的”德国抛弃了理论，转入了实践的领域。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小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已经为真正的大工业所代替；德国重新出现在世界市场上；新的小德意志帝国³⁵ 至少排除了由于小邦割据、封建残

余和官僚制度在这一发展道路上造成的最显著的弊病。但是随着思辨^① 离开哲学家的书房而在证券交易所里筑起自己的殿堂，有教养的德国也就失去了在德国的最深沉的政治屈辱时代曾经是德国的光荣的伟大理论兴趣，失去了那种不管所得成果在实践上是否能实现，不管它是否违警都同样地热衷于纯粹科学的研究的兴趣。诚然，德国的官方自然科学，特别是在专门研究的领域中仍然保持着时代的高度，但是，正如美国“科学”杂志已经公正地指出的，在研究个别事实之间的巨大联系方面，在把这些联系概括为规律方面所获得的决定性的成就，现在更多地是出在英国，而不像从前那样出在德国。而在包括哲学在内的历史科学的领域内，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已随着古典哲学完全消失了；起而代之的是不动脑筋的折衷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这种科学的官方代表都变成资产阶级和现存国家的毫无掩饰的思想家，但这已经是在资产阶级和现存国家同工人阶级处于公开敌对地位的时代。

德国人的理论兴趣，现在只是在工人阶级中还没有衰退，继续存在着。在这里，它是根除不了的。在这里，没有对地位、利益的任何顾虑，没有乞求上司庇护的念头。反之，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得到了工人阶级的同情，这种同情，它在官方科学那里是既寻找不到也期望

① 双关语：“思辨”的原文是《Spekulation》，也有“投机”的意思。——编者注

不到的。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

写于 1886 年初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86 年《新时代》杂志第 4 期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和第 5 期，并于 1888 年以单行本

第 21 卷第 301——353 页

形式在斯图加特出版

注 释

- 1 恩格斯的著作《落德维希·费尔巴哈 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书中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对其哲学先驱——德国古典哲学的最杰出代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关系，并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作了系统的叙述。这部著作最初刊登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新时代》上，后来出了单行本，恩格斯专门为单行本写了序言。1894年，巴黎的杂志《新纪元》第4期和第5期上登载了劳拉·拉法格翻译并经恩格斯审阅过的译文。
- 2 《新纪元》(《L'Ere nouvelle》)是法国的社会主义月刊，1893—1894年在巴黎出版；茹·盖得，让·饶勒斯，保·拉法格和格·瓦普列汉诺夫等人都曾为该杂志撰稿。
- 3 卡·尼·施达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85年斯图加特版(C.N. Slarcke.《Ludwig Feuerbach》. Stuttgart, 1885)。
- 4 巴士底狱是十四至十八世纪巴黎的城堡和国家监狱。十六世纪起，主要用来囚禁政治犯。
- 5 恩格斯指海涅关于德国哲学革命的言论，这些言论包含在海涅的著作《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这部著作发表于1834年，它是对德国精神生活中所发生的事件进行评论（一部分发表于1833年）的继续。海涅的这些言论贯彻了这样的思想：当时由黑格尔哲学总其成的德国哲学革命，是德国即将到来的民主革命的序幕。
- 6 恩格斯在这里套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言中的话。这部著作的第一版于1821年在柏林出版。
- 7 见乔·威·弗·黑格尔《哲学全书缩写本。第一部。逻辑》第147节；第142节附释(G.W.F. Hegel.《Encyclopa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Erster Teil. Die Logik》，§1471；

- § 142, Zusatz)。该书第一版于 1817 年在海得尔堡出版。—第 211 页。
- 7 这里套用了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场(《浮士德的书斋》里的菲斯特斐勒司的话。
- 8 乔·威·弗·黑格尔《逻辑学》1812—1816 年纽伦堡版 (G. W. F. 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 Nurnberg, 1812—1816)。这部著作共分三册:(1)客观逻辑, 存在论(1812 年出版);(2)客观逻辑, 本质论(1813 年出版);(3)主观逻辑或概念论(1811 年出版)。
- 9 《德国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文学哲学杂志《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的简称, 该杂志以日报形式在莱比锡出版。从 1841 年 7 月到 1843 年 1 月, 杂志用上述名称出版, 以前(1838—1841 年)曾以《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Hallische Jahrbücher für deutsche Wissenschaft und Kunst》)的名称出版;1841 年 6 月以前杂志由阿·卢格和泰·艾希特迈耶尔在哈雷负责编辑, 而从 1841 年 7 月起则由阿·卢格在德勒斯顿负责编辑。由于《哈雷年鉴》在普鲁士境内遭到停刊的威胁, 编辑部从普鲁士的哈雷城迁往萨克森, 并更改了杂志的名称。但是, 即使用了新的名称, 杂志也没有出版多久。1843 年 1 月该杂志被萨克森政府查封, 并经联邦议会决定在全国查禁
- 10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是 1842 年 1 月 1 日至 1843 年 3 月 31 日在科伦出版的日报。该报是莱茵省一些反对普鲁士专制政体的资产阶级人士创办的。该报曾吸收几个青年黑格尔分子撰稿。1842 年 4 月起马克思为该报撰稿, 同年 10 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莱茵报》也发表了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 该报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政府对《莱茵报》进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 后来把它封闭
- 11 大·弗·施特劳斯《耶稣传》1835—1836 年杜宾根版第 1—2 卷 (D. F. Strauß, *Das Leben Jesu*, Bd. 1—2, Tübingen, 1835—1836)。

- 12 指麦·施蒂纳的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 年比版(M. SHner, *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hum*). Leipzig, 1845)。
- 13 L. 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莱比锡, 1841。L. Feuerbach. *Das Wesen des Christenthums*. Leipzig, 1841
- 14 恩格斯大概指的是埃·斐·伊姆·特恩的著作《在走亚那的印第安人中间》1883 年伦敦版第 344—346 页(E. F. im Thurn, *Among the Indians of Guiana*). London, 1883, p. 344—346)。
- 15 指 1846 年德国天文学家约翰·加勒发现的海王星。
- 16 恩格斯在这里引证了费尔巴哈的箴言。这段引文在施达克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85 年斯图加特版第 166 页上引用过。引文摘自卡·格律恩《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书简、稿及其哲学特征的阐述》1874 年莱比锡和海得尔堡版第 2 卷第 308 页(KGriin. *Ludwig Feuerbach in seinem Briefwechsel und Nachlass sowier in seine Philosophischen Charakterentwicklung*). Bd. II, Leipzig und Heidelberg, 1874, S: 308)。
- 17 乔·威·弗·黑格尔《精神现象学》(G.W.F. Hegel. *Phanomenologie des Geistes*)。该著作第一版于 1807 年在班堡和维尔堡出版。
- 18 自然神论者 是一种宗教哲学学说的拥护者。这种学说认为神是非人格的、有理性的世界始因，但是神不干预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在封建教会世界观统治的条件下，自然神论往往站在唯理论的立场上批判中世纪的神学世界观，揭露僧侣们的寄生生活和招摇撞骗的行为。
- 19 这段引文摘自费尔巴哈的著作《哲学原理。变化的必然性》(《Grundsätze der Philosophie. Notwendigkeit einer Veränderung》),载于卡·格律恩《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74 年莱比锡和海得尔堡第 1 卷第 407 页。
- 20 这段引文摘自费尔巴哈的著作《驳躯体和灵魂、肉体和精神的二元论》(《Wider den Dualismus von Leib und Seele, Fleisch und Geist》),

- 见《费尔巴哈全集》1846 年莱比锡版第 2 卷第 363 页 (《Ludwig Feuerbach' si sammliche Werke》, Bd. II, Leipzig, 1846, S: 363)
- 21 这段引文在施达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85 年斯图加特版第 254 页上引用过。引文摘自费尔巴哈的著作《贫穷操纵并取消所有法律》(Noth meistert alle Gesetze und hebt sie auf), 载于卡·格律恩《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74 年莱比锡和海得尔第 2 第 285–286 页。
- 22 这段引文在施达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85 年斯图加特版第 280 页上引用过。引文摘自费尔巴哈的著作《哲学原理。变化的必然性》, 载于卡·格律恩《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74 年莱比锡和海得尔堡版第 1 卷第 409 页。
- 23 卡·尼·施达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85 年斯图加特版第 280 页。
- 24 恩格斯在这里概述了黑格尔主要发表在下述著作中的思想:《法哲学原理》第 18、139 节以及《宗教学讲演录》第 3 部第 2 篇第 3 章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Religion). Dritter Theil, II. 3)。后面这本著作的第一版于 1832 年在柏林出版。
- 25 见路·费尔巴哈的著作《我的哲学经历的特征描述片断》(Fragmente zur Charakteristik meines Philosophischen Curriculum vitae), 载于《费尔巴哈全集》1846 年莱比锡版第 2 第 411 页。
- 26 普军在萨多瓦一役获胜(在 1866 年普战争中)后德国资产阶级政论中的流行用语,意思是说普鲁士的胜利似乎是由于普鲁士国民教育制度的优越。这一用语源出《外国》杂志的编辑奥·佩舍耳,他在该杂志 1866 年 7 月 17 日第 29 期上的一篇文章《最近的战争历的教训》(Die Lehren der jüngsten Kriegsgeschichte)中用了这个用语。
- 27 指大·弗·施特劳斯《基督教教理的历史发展及其和现代科学的斗争》1840–1841 年杜宾根和斯图加特版第 1–2 卷 (《Die christliche Glaubenslehre in ihre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 und im Kampfe

- mit der modernen Wissenschaft). Bd. I-II, Tübingen — Stuttgart, 1840—1841); 这部著作的第二部, 根据它的主要内容, 名为《基督教教理的物质内容(教义学)》(《Der materiale Inbegriff der christlichen Glaubenslehre (Dogmatik)》)。
- 28 恩格斯指的是约·狄慈根的著作《人脑活动的实质。一个手艺人的描述纯粹的和实践的理性的再批判》1869年汉堡版(《Das Wesen der menschlichen Kopfarbeit. Dargestellt von einem Handarbeiter? Eincabermalige Kritik der reinen und praktischen Vernunft》. Hamburg, 1869)。
- 29 见乔·威·弗·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第2部第2篇(G.W.F.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Zweiter Theil, zweiter Abschnitt)。这本书的第一版于1837年在柏林出版。
- 30 尼西亚宗教会议是第一次所谓罗马帝国基督教会世界主教会议。这次会议是325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在小亚细亚的尼西亚城召开的。会议通过了一切基督徒必须遵守的信条(正统基督教会教义的基本原则), 不承认信条以叛国罪论。
- 31 阿尔比派是一个教派, 十二至十三世纪广泛流行于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城市中。它的主要发源地是法国南部阿尔比城。阿尔比派反对天主教的豪华仪式和教阶制度, 它以宗教的形式反映了城市商业和手工业居民对封建制度的抗议。法国南部的部分贵族也加入了阿尔比派, 他们企图剥夺教会的土地。1209年教皇英诺森三世曾组织十字军征伐阿尔比派。经过二十年战争和残酷的镇压, 阿尔比派运动终于失败。
- 32 指十六世纪德国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参看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99—419页)。
- 33 指1688年英国政变。由于这次政变, 在英国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 确立了建立在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妥协基础上的、以奥伦治的威廉(从1689年起)为首的君主立宪制。

- 34 鉴于从十七世纪二十年代起对胡格诺教徒（加尔文派新教徒）所施加的政治迫害和宗教迫害加剧了，路易十四于 1685 年取消 1598 年颁布的南特敕令。这个敕令曾给予胡格诺教徒以信教和敬神的自由，由于南特敕令的取消，数十万胡格诺教徒从法国流亡他方。
- 35 指 1871 年 1 月在普鲁领导下建立的不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德意志帝国。

列 宁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 三个组成部分

马克思的学说在整个文明世界中引起全部资产阶级的科学（官方科学和自由派科学）极大的仇视和憎恨，这种科学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有害的宗派”之类的东西。也不能期望资产阶级的科学会报别的态度，因为建筑在阶级斗争上的社会里是不会有“公正的”社会科学的。全部官方的和自由派的科学都这样或那样地为雇佣奴隶制辩护，而马克思主义则对这种奴隶制宣布了无情的战争。期望在雇佣奴隶制的社会里有公正的科学，正象期望在应不应该用减少资本利润来增加加工人工资的问题上有公正的工厂主一样愚蠢可笑。

而且，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续。

马克思的学说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十分完备而严密，它给予人们一个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

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世界观。马克思学说是人类在十九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

现在我们就来简短地说明一下马克思主义的这三个来源以及它的三个组成部分。

—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唯物主义。在欧洲全部近代史中特别是十八世纪末叶，在进行了反对一切中世纪废物、反对农奴制和农奴制思想的决战的法国，唯物主义成为唯一彻底的哲学，它忠于一切自然科学学说，仇视迷信、伪善行为及其他等等。因此，民主的敌人便竭尽一切力量来“驳倒”破坏和诋毁唯物主义，维护那些不管怎样总是维护或支持宗教的各种哲学唯心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坚决地捍卫了哲学唯物主义，并且多次说明，一切离开这个基础的倾向都是极端错误的。在恩格斯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反杜林论》里十分明确和详尽地叙述了他们的观点，这两部著作也同《共产党宣言》一样，都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停止在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上，而是把哲学向前推进了。他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成果，特别是用使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能以产生的黑格尔体系的成果丰富了哲学。这些成果中最重要的就是辩证法，即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这种学说认为反映永恒

发展的物质的人类认识是相对的。自然科学方面的最新发现如镭、电子、元素转化等，不管资产阶级哲学家们那些“重新”回到陈旧腐烂的唯心主义去的学说怎样说，却灿烂地证实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

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使它成为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这种科学理论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从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会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例如从农奴制度中生长出资本主义。

人的认识反映不依赖于它而存在的自然界，也就是反映发展着的物质；同样，人的社会认识（就是哲学、宗教、政治等各种不同的观点和学说）也反映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知道，例如现代欧洲各国的各种政治形式，都是为巩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而服务的。

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

二

马克思认为经济制度是政治上层建筑借以树立起来的基础，所以他特别注意研究这个经济制度。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就是专门研究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

制度的。

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马克思以前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形成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研究经济制度的时候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马克思继续了他们的事业。他严密地论证了并且透彻地发展了这个理论。他证明，任何一个商品的价值，都是由生产这个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数量决定的。

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地方（商品交换商品），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商品的交换表示通过市场来实现的各个生产者之间的联系。货币表明这一联系更加密切，已经把各个生产者的全部经济生活不可分割地联结成一个整体了。资本表明这一联系的继续发展：人的劳动力变成了商品。雇佣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占有土地、工厂和劳动工具的人。工人用一部分工作时间作为维持他自己和他的家庭生活的开支（工资），而另一部分工作时间工人是无报酬地劳动的，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这也就是利润的来源，资本家阶级财富的来源。

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

由工人的劳动所创造的资本反转来压迫工人，使小业主破产，造成失业大军。大生产在工业中能够取得胜利是十分明显的，在农业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大规模资本主义农业日益占优势，使用机器的范围日益扩大，农民经济日益陷入货币资本的绞索，由于技术落后而日益衰败和破产。在农业方面，小生产的衰败的形式虽然不同，但是它的衰败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资本打击着小生产，同时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造成了大资本家同盟的垄断地位。生产本身日益社会化，使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工人联结成一个有条不紊的经济机体，而共同劳动的产物却归一小撮资本家所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愈来愈严重，危机日益加深，争夺市场的斗争愈来愈疯狂，人民群众的生活愈来愈没有保障。

资本主义制度在使工人愈来愈依赖资本的同时，也造成联合劳动的伟大力量。

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从商品经济的萌芽，从简单的交换一直到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到大生产。

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无论老的或新的)发展过程，都一年比一年明显地向愈来愈多的工人群众证明，马克思的这学说是完全正确的。

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获得了胜利，但是这一胜利不过是劳动对资本的胜利的前阶。

三

当农奴制度被推翻而“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时候，立刻就暴露出一件事实，即这种自由意味着压迫和剥削劳动者的一种新制度。于是反映这种压迫并且表示反对这种压迫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就立刻产生了。但是初期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批评资本主义社会，指斥它，咒骂它，幻想消灭它，幻想有比较好的制度出现，劝导富人，说剥削是不道德的。

但是空想社会主义不能指出真正的出路。它既不会阐明新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奴隶制的本质，又不会发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也不会找到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的社会力量。

然而，在欧洲各国，特别是在法国，在封建制度即农奴制度崩溃时随之而来的汹涌澎湃的革命，日益明显地表明了阶级斗争是全部发展进程的基础和动力。

没有一次向农奴主阶级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不是打退了拚命的反抗才获得胜利的。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是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才在比较自由和民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提示的结论，并且一贯地推行了这个结论。这一结论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

当人们还不会从任何一种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和诺言中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时，他们无论是过去或将来总是在政治上作受人欺骗和自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的。当那些主张改良和改善的人还不懂得任何一个旧制度，不管它怎样荒谬和腐败，都是由某些统治阶级的势力所支持的时候，他们总是会受拥护旧制度的人们愚弄的。要打破这些阶级的反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必须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中找出一种力量，教育它和组织它去进行斗争，这种力量能够（而且按它的社会地位应当）成为扫除旧制度和创立新制度的力量。

只有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摆脱精神奴役的出路，一切被压迫阶级一直受着这种精神奴役的

痛苦。只有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才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

在全世界，从美洲到日本，从瑞典到南非洲，无产阶级的独立组织正在不断地增加。无产阶级一面进行阶级斗争，一面受到教育和训练，他们摆脱资产阶级社会的偏见，日益紧密地团结起来，并且学习怎样估计自己的成绩，锻炼自己的力量和不可遏止地成长起来。

载于 1913 年 3 月《启蒙》

杂志第 3 期

署名： 弗·伊·

按《启蒙》杂志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 19 卷

第 1-8 页

列 宁

谈 谈 辩 证 法 问 题

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参看拉萨尔所著《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第三篇(《论认识》)开头所引用的斐洛关于赫拉克利特的一段话^①，是辩证法的实质(是辩证法的“本质”之一，是它的基本的特点或特征之一，甚至可说是它的基本的特点或特征)。黑格尔也正是这样提问题的(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形而上学》中经常在这周围兜圈子，并跟赫拉克利特即跟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作斗争)。

辩证法内容的这一方面的正确性必须由科学史来检验。对于辩证法的这一方面，通常(例如在普列汉诺夫)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对立面的同一被当作实例的总和[“例如种子”；“例如原始共产主义”。恩格斯也这样做过。但这是“为了通俗化”……]，而不是当作认识的规律(以及客观世界的规律)。

在数学中，正和负，微分和积分。

在力学中，作用和反作用。

① 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396页。——编者注

在物理学中，阳电和阴电。

在化学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

在社会科学中，阶级斗争。

对立面的同一（它们的“统一”，也许这样说更正确些吧？虽然同一和统一这两个名词在这里并没有特别重大的差别。在一定的意义上两个名词都是正确的），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要认识世界上一切过程的“自己运动”、自生的发展和蓬勃的生活，就要把这些过程当做对立面的统一来认识。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有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联）。

根据第一种运动观点，自己运动，它的动力、泉源、动因都被忽视了（或者这个泉源被移到外部——移到神、主体等等那里去了）；根据第二种观点，主要的注意力正是放在认识“自己”运动的泉源上。

第一种观点是死板的、贫乏的、枯竭的。第二种观点是活生生的。只有第二种观点才提供理解一切现存事物的“自己运动”的钥匙，才提供理解“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

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

注意:顺便说一下,主观主义(怀疑论和诡辩等等)和辩证法的区别在于:在(客观的)辩证法中,相对和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对于客观的辩证法说来,相对中有绝对。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说来,相对只是相对的,是排斥绝对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向我们表明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的发展,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总和中的、从这个社会的开始到终结的发展(**既是生长又是运动**)。

一般辩证法的叙述(以及研究)方法也应当如此(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辩证法在马克思看来只是辩证法的局部情况)。从最简单、最普通、最常见的等等东西开始;从任何一个命题开始,如树叶是绿的,伊万是人,哈巴狗是狗等等。在这里(正如黑格尔天才地指出过的)就已经有辩证法;**个别就是一般**(参看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施维格勒译,第2卷第40页第3篇第4章第8—9节:“因为当然不能设想:在个别的房屋之外还存在着一般的房屋”^①)。这就是说,对

① 施维格勒的译文是:“denn natürlich kann man nicht der Meinung sein, da β es ein Haus gebe auBer den sichtbaren Häusern”。原文是:ον γὰρ ἀν Εἴη μεν εἰναί τικ αον παρα τὰ ε τινὰ ε οἴκι ε ——编者注

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任何个别经过千万次的转化而与另一类的个别（事物、现象过程）相联系，如此等等。在这里已经有自然界的必然性、客观联系等等的因素、萌芽、概念了。这里已经有偶然和必然、现象和本质，因为当我们说伊万是人，哈巴狗是狗，这是树叶等等时，我们就把许多特征作为偶然的东西抛掉，把本质和现象分开，并把二者对立起来。

可见，在任何一个命题中，好象在一个“单位”（“细胞”）中一样，都可以（而且应当）发现辩证法一切要素的萌芽，这就表明辩证法是人类的全部认识所固有的。而自然科学则向我们揭明（这又是要用任何极简单的实例来揭明）客观自然界也具有同样的性质，揭明个别向一般的转变，偶然向必然的转变，对立面的转化、转换、相互联系。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本质**）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至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

*

*

*

不论是黑格尔（见《逻辑学》，不论是自然科学中现代的“认识论者”折衷主义者、黑格尔主义的敌人（他不懂黑格尔主义！）保尔·福尔克曼（参看他的 *Erkenntnistheorie etische*）

Grundzige^①, S.)都把认识看做一串圆圈。

哲学上的“圆圈”:[是否一定要以人物的年代先后为顺序呢?不!]

古代：从德漠克利特到柏拉图以及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

文艺复兴时代：笛卡儿对伽桑狄(斯宾诺莎?)。

近代：霍尔巴赫—黑格尔(经过贝克莱、休谟、康德)。

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

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其中包含着无数的各式各样观察现实、接近现实的成分(包含着从每个成分发展成的整个哲学体系)，——这就是它比起“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来所具有的无比丰富的内容，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就是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

从粗陋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胡说。相反地，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iberschwengliches(狄慈根)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唯心

① 福尔克曼《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原理》(Erkenntnistheoretische Grundzuge der Naturwissenschaften)1910年莱比锡—柏林版第35页。见1911年圣彼得堡版第40页。——编者注

主义就是僧侣主义。这是对的。但（“更确切些”和“除此而外”）哲学唯心主义是经过人的无限复杂的（辩证的认识的一个成分而通向僧侣主义的道路。

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而僧侣主义（=哲学唯心主义）当然有认识论的根源，它不是没有根基的，它无疑地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然而却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生生的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

写于 1915 年

1925 年第一次载于《布尔什维克》

杂志第 5 — 6 期合刊

按手稿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 38 卷

第 403—412 页

注意
这个警句

列 宁

国 家 与 革 命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
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¹ (节录)

第 一 章

阶 级 社 会 和 国 家

1.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各被压迫阶级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修琢”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精神，把资产阶

级可以接受或者似乎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现在，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可别小看他们！）那些德国的资产阶级学者，昨天还是摧残马克思主义的专家，现在却愈来愈频繁地谈论起“德意志民族的”马克思来了，仿佛马克思培育出极有组织的工人联合会是为了进行掠夺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在歪曲马克思主义的风气空前流行的时候，我们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恢复真正的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为此，必须大段大段地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当然，大段的引证会使文章冗长，不通俗，但是没有这样的引证是绝对不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有论到国家问题的地方，至少一切有决定意义的地方，一定要尽可能完整地加以引证，方面使读者对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全部观点以及这些观点的发展有一个独立的概念，同时也可确凿地证实并清楚地指明现在占统治地位的“考茨基主义”对这些观点的歪曲。

我们现在先从传播最广的弗·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讲起，这本书于1894年在斯图加特印行了第六版。我们必须根据德文原著来译出引文，因为俄文译本虽然很多，但多半译得不完全，或者译得很糟。

恩格斯在总结他所做的历史的分析时说：“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象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

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德文第6版第177—178页）²

这一段话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及其意义的基本思想。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达到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

正是在这个最重要的和根本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开始受到了来自两个主要方面的歪曲。

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迫于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而不得不承认，只有在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地方才有国家，但他们又来“改正”马克思，说国家是阶级调和的机关。在马克思看来，如果阶级调和是可能的话，国家就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在市侩的庸俗的教授和政论家们看来（而且往往善意地引用马克思的话作根据！），国家正是用来调和阶级的。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在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看来，秩序正是阶级调和，而不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缓和冲突就是调和，而不是剥夺被压迫阶级用来推翻压迫者的一定的斗争手段和斗争方式。

例如，当 1917 年革命中国家的意义和作用问题正好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成为有实际意义的问题，即立刻行动而且是大规模行动的问题的时候，全体社会革命党人³ 和孟什维克一下子就完全滚到“国家”“调和”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理论方面去了。这两个政党的无数决议和他们的政治家的许多论文，都浸透了这种市侩的庸俗的“调和”论。至于国家是一定阶级的统治机关，这个阶级决不能与同它对立的一方（同它对抗的阶级）调和，这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始终不能了解的。在对待国家的态度上，再明显不过地表明我国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我们布尔什维克向来就这样说），而是唱着貌似社会主义高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

另一方面，“考茨基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巧妙得多了。“在理论上”，它不否认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也不否认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但是，它忽视或抹杀了以下一点：既然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既然它是驾于社会之上并“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那末很明显，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不仅非进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的、体现这种“脱离”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这个结论在理论上是不言而喻的，下面我们会看到，这是马克思对革命的任务做了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后得出的绝对肯定的结论。正是这个结论被考茨基（我们在下面还要详细证明）……“忘记”和歪曲了。

2. 特殊的武装队伍，监狱等等

恩格斯继续说……“国家和旧的氏族〈或克兰〉组

织⁴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

我们现在看来，这种划分是“很自然”的，但这是同宗族或氏族的旧组织进行长期斗争才获得的。

……“第二个不同点，是社会权力的设立，这种权力已不再同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直接符合了。这个特殊的社会权力之所以需要，是因为自从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已经成为不可能了……这种社会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存在。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克兰）社会制度所没有的”⁵……

恩格斯在这里阐明了被称为国家的那个“力量”的概念，即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的概念。这种力量主要是指什么呢？主要是指拥有监狱等等的特殊的武装队伍。

应该说这是特殊的武装队伍，因为任何国家所具有的社会权力已经“不再直接符合”武装的居民，即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了。

同一切伟大的革命思想家一样，恩格斯竭力促使觉悟工人注意的东西，正是盛行的庸俗观念认为最不值得注意，最习以为常，而被根深蒂固的、可说是顽固不化的偏见奉为神圣的那些东西。常备军和警察是国家权力的主要强力工具，但是一一难道可能不是这样吗？

十九世纪末叶，绝大多数欧洲人认为，这是不能不这样

的。恩格斯的话正是对这些人的。他们没有经历过，也没有亲眼看到过一次伟大的革命。他们完全不了解，什么是“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对于为什么要有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使自己同社会脱离的特殊武装队伍（警察、常备军）这个问题，西欧和俄国的庸人总是喜欢借用斯宾塞或米海洛夫斯基的几句话来答复，说这是因为社会生活复杂化、职能分化等等。

这种说法似乎是“科学的”，而且最能迷惑庸人，掩盖社会分裂为不可调和的敌对阶级这个主要的基本的事实。

如果没有这种分裂，“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同使用棍棒的猿猴群、或原始人、或组成克兰社会的人们的原始组织比较起来，只是在复杂的程度上、技术的高明上有所不同，但这样的组织是可能有的。

这样的组织所以成为不可能，是因为文明社会已分裂为敌对的而且是不可调和地敌对的阶级，如果这些阶级都有“自动的”武装，那在它们之间就一定会展开武装斗争。于是国家形成了，特殊的力量、特殊的武装队伍建立起来了。每当革命破坏国家机构的时候，我们都清楚地看到，统治阶级是如何力图恢复替它服务的特殊武装队伍，被压迫阶级又是如何力图建立一种不替剥削者服务，而替被剥削者服务的新型的同类组织。

上面恩格斯从理论上提出的问题，正是每次大革命在实践中明显地而且是以大规模行动提到我们面前的问题，即“特殊”武装队伍同“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我们在下面会看到，欧洲和俄国历次革命的经验

是怎样具体地说明这个问题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恩格斯的论述

他指出，有的时候，如在北美某些地方，这种社会权力是薄弱的（这里指的只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罕见的例外，以及在帝国主义以前时期北美那些自由垦殖者占多数的地方），但一般说来，它是在加强：

……“随着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化，随着彼此相邻的各国的扩大和它们人口的增加，社会权力就日益加强。就拿我们今天的欧洲来看吧，在这里，阶级斗争和侵略竞争已经把社会权力猛增到势将吞食整个社会甚至吞食国家的高度”⁶……

这段话至迟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写的。恩格斯最后的序言⁷写于1891年6月16日。当时向帝国主义的转变，无论就托拉斯的完全统治或大银行的无限权力或大规模的殖民政策等等来说，在法国还是刚刚开始，在北美和德国更要差一些。此后，“侵略竞争”前进了一大步，尤其因为到了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初期，世界已被这些“互相竞争的侵略者”，即巨大的强盗国家瓜分完了。从此海陆军备无限增长，1914年至1917年由于英德两国争夺世界霸权和由于瓜分赃物而进行的强盗战争，使强盗国家政权对社会一切力量的“吞食”，接近于彻底崩溃的地步。

恩格斯在1891年就已指出，“侵略竞争”是各大强国对外政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但是社会沙文主义的恶棍们在1914年至1917年，即正是这个竞争加剧了许多倍而引起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时候，却用“保卫祖国”、“保卫共和国和革

命”等等词句来掩盖他们维护“自己”资产阶级强盗利益的行为!

3. 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

为了维持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社会权力，就需要捐税和国债。

恩格斯说：“官吏既然掌握着社会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驾于社会之上。从前人们对于氏族(克兰)社会机关的那种自由的、自愿的尊敬，即使他们能够获得，也不能使他们满足了。”……于是制定了官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特别法律。“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却有大于克兰代表的“权威”，然而，即使是文明国家掌握军权的首脑，也会对“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社会“尊敬”的克兰首领表示羡慕。⁸

这里提出了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官吏的特权地位问题。指出了这样一个基本问题：究竟什么东西使他们居于社会之上？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这个理论问题在1871年如何被巴黎公社实际地解决了，而在1912年又如何被考茨基反动地抹杀了。

……“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 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

不仅古代国家和封建国家是剥削奴隶和农奴的机关， “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也“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但也例外地有这样的时期，那时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⁹……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专制君主制，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的波拿巴主义，德国俾斯麦时代，都是如此。

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共和制俄国的克伦斯基政府，在开始压迫革命无产阶级以后，在苏维埃由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导而已经软弱无力，资产阶级又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直接解散它的时候，也是如此。

恩格斯继续说，在民主共和国内，下“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它所采用的第一个方法是“直接收买官吏”（美国），第二个方法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法国和美国）。¹⁰

目前，任何最民主的共和国中的帝国主义和银行统治，都把这两种维护和实现财富的无限权力的方法“发展”到了非常巧妙的地步。例如，在俄国实行民主共和的头几个月里，也可以说是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这两种“社会主义者”同资产阶级联姻的蜜月期间，帕尔钦斯基先生在联合政府¹¹中实行怠工，不愿意实施遏止资本家、制止他们进行掠夺和借军事订货盗窃国库的种种措施，在帕尔钦斯基先生退出内阁以后（接替他的自然是同他一模一样的人），资本家“奖赏”给他年薪十二万卢布的肥缺，试问这究竟是怎么

一回事呢？是直接的收买，还是间接的收买？是政府同辛迪加勾结，还是“仅仅”是一种友谊关系？切尔诺夫、策烈铁里、阿夫克森齐也夫、斯柯别列夫之流究竟起着什么作用？他们是盗窃国库的百万富翁的“直接”同盟者，还是仅仅是间接的同盟者？

“财富”的无限权力在民主共和制下之所以更可靠，是因为它不依赖资本主义的不好的政治外壳。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家掌握（通过帕尔钦斯基、切尔诺夫、策烈铁里之流）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

还应该指出，恩格斯十分肯定地认为，普选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他显然是估计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长期经验，他说普选制是

“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
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¹⁰。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如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及其同胞兄弟西欧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却正是期待从普选制中得到“更多的东西”。他们自己相信而且要人民也相信这种荒谬想法，似乎普选制“在现今的国家里”真正能够体现大多数劳动者的意志，并保证实现这种意志。

我们在这里只是指出这种荒谬的想法，只是指出，恩格斯这个十分明确而具体的说明，经常在“正式的”（即机会主

义的)社会党的宣传鼓动中遭到歪曲。至于恩格斯在这里所唾弃的这种想法的全部虚伪性,我们在下面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现今的”国家的看法时,还会详细地加以阐明。

恩格斯在他那部最通俗的著作中,把自己的看法总结如下:

“所以,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现在我们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直接障碍。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无可避免地要消失。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¹²

这一段引文在现代社会民主党的宣传鼓动书刊中很少看到,即使引用也多半是为了崇拜偶像,也就是说,为了正式表示对恩格斯的尊敬,而丝毫不想考虑一下,先要经过怎样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才能“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古物陈列馆去”。甚至他们往往不懂恩格斯说的国家机器究竟是什么。

4. 国家“自行消亡”和暴力革命

恩格斯关于国家“自行消亡”的话是非常著名的,经常

有人引证，它清楚地表明了目前流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把戏的本质，因此我们必须详细地加以说明。现在我们把这句话的出处的那一整段论述转录如下：

“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迄今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需要有国家，即需要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以便维持它的外部的生产条件，特别是用暴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奴隶制、农奴制、雇佣劳动制）。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任何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现代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以及由此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都消失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

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应当以此来衡量‘自由的人民国家’这个用语，这个用语在鼓动的意义上暂时有存在的理由，但归根到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同时也应当以此来衡量所谓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的要求。¹³[《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德文第3版第301—303页]

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在恩格斯这一段思想极其丰富的论述中，只有马克思提出的与无政府主义关于“废除”国家的学说不同的一点，即国家是“自行消亡”的这一点，被现代社会党当做社会主义思想真正接受下来了。这样来割裂马克思主义，无异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机会主义，因为这样来“解释”，就只会留下一个模糊的观念，似乎只有缓慢的、平静的、逐渐的变化，而没有飞跃和风暴，没有革命。对国家“自行消亡”最普遍、最流行、最大众化的（如果能这样说的话）理解，无疑是抹杀革命，甚至是否认革命。

但是，这样的“解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粗暴的歪曲，仅仅有利于资产阶级。从理论上说，产生这种歪曲的根源就是忘记了我们上面全部摘引的恩格斯的“总结性”论述中也指出的极重要的情况和观点。

第一、恩格斯在这段论述中一开始就说，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这样一来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这是什么意思，人们是“照例不”思索的，他们不是完全忽略这一点，就是认为这是恩格斯的“黑格尔主义的毛病”。其实这句话扼要地表明了最伟大的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即

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还要详细地加以论述。实际上恩格斯在这里所讲的是以无产阶级革命来“消灭”资产阶级的国家，而他讲的消亡是指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无产阶级国家制度的残余。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国家是不会“自行消亡”的，而要由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来“消灭”它。在这个革命以后，自行消亡的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或半国家。

第二、国家是“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恩格斯这个出色的极其深刻的定义在这里是说得十分清楚的。从这个定义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即一小撮富豪对千百万劳动者“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应该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无产阶级专政）来代替。这就是“消灭作为国家的国家”。这就是以社会名义占有生产资料的“行动”。显然，以无产阶级的“特殊力量”来代替资产阶级的“特殊力量”，这样一种更替是决不能靠“自行消亡”来实现的。

第三、恩格斯所说的“自行消亡”，甚至更明显更鲜明地说的“自行停止”，是十分明确而肯定地指“国家以整个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以后的事，即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事。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时“国家”的政治形式是最完全的民主。但是那些无耻地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者，却没有一个人想到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就是民主的“自行停止”和“自行消亡”。乍看起来，这似乎是奇怪的。但是，只有那些没有想到民主也是国家、在国家消失时民主也会消失的人，才会觉得这是“不可理解”的。资产阶级的国

家只有革命才能“消灭”。国家，指最完全的 民主，只能“自行消亡”

第四、恩格斯在提出“国家自行消亡”这个著名的原理以后，立刻就具体地说明这一点是既反对机会主义者又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但恩格斯放在首位的，是从这个原理中得出的反对机会主义者的结论。

可以担保，在一万个读过或听过国家“自行消亡”的论述的人中，有九千九百九十人完全不知道或不记得恩格斯从这个原理中得出的结论不仅是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其余的十个人中可能有九个人不懂得什么是“自由的人民国家”，不懂得为什么反对这个口号就是反对机会主义者。历史就是这样记载的！伟大的革命学说就是这样被人偷偷地改成了流行的庸人主义！人们千百次地重复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结论，把它庸俗化并且极其简单地装到头脑中去，形成了固执的偏见。而反对机会主义者的结论，却被抹杀和“忘记”了！

“自由的人民国家”是七十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纲领性要求和流行口号。这个口号只是市偿式地夸大了民主的概念，没有丝毫政治内容。既然人们当时可以合法地利用这个口号来暗示民主共和国，恩格斯也就从鼓动的观点同意“暂时”替这个口号“辩护”。但这是一个机会主义的口号，它不仅起了粉饰资产阶级民主的作用，而且表现出不懂得社会主义对任何国家的批评。我们赞成民主共和制，因为这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无产阶级最有利的国家形式，但是，我们决不应该忘记，即使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里，人民仍然摆脱不了当雇佣奴隶的命运。其次，任何国家

都是对被压迫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因此任何国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在七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向他们党内的同志解释这一点。

第五、在恩格斯这本著作中，除了大家记得的关于国家自行消亡的论述以外，还谈到了暴力革命的意义。恩格斯对于暴力革命的作用的有历史意义的评价成了对暴力革命的真正颂扬。但是，“谁都不记得”这一点，这个思想的意义在现代社会党内是照例不谈、甚至照例不想的，这些思想在群众中进行的日常宣传鼓动中也不占任何地位。其实，这些思想同国家“自行消亡”的理论是密切联系的，是一个严密的整体。

请看恩格斯的论述：

……“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除作恶以外）即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死硬化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关于这些，杜林先生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他只是带着叹息和呻吟的口吻承认这样一种可能性：为了推翻进行剥削的经济，也许需要暴力——你们看，真遗憾！——因为暴力的任何应用，据说都会使应用暴力的人道德堕落。尽管在每次革命胜利以后，道德和思想都有显著的提高，他还要这么说！而且这话是在德国说的，在那里，人民可能被迫进行的暴力冲突，至少有一个好处，即扫除三十年战争的屈辱在民族意识中造成的奴才气。而这种没有生气、萎靡不振、软弱无力的僧侣思想，竟要历史上最

革命的政党来接受！”¹⁴（《反杜林论》德文第3版第193页，第2编第4章末）

怎样才能把恩格斯从1878年起至1894年即快到他逝世的时候为止，一再向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颂扬暴力革命的论点，同国家“自行消亡”的理论结合在一个学说里呢？

人们往往用折衷主义，用无原则地或诡辩式地任意（或者为了讨好当权者）强调前者或后者的办法把它们结合起来，而且在一百次中有九十九次（如果不是更多的话）正是把“自行消亡”论摆在首位。用折衷主义代替辩证法，这就是目前在正式的社会民主党书刊中对马克思主义采取的最常见最普遍的现象。这种做法，自然并不新奇，甚至在希腊古典哲学史上也是常见的。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这样能使人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似乎考虑到了过程的一切方面，发展的一切趋势，一切相互矛盾的影响等等，但实际上并没有对社会发展过程做出任何完整的革命的解释。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学说是针对资产阶级国家说的，在下面我们还要更详尽地说明这一点。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恩格斯对暴力革命的颂扬同马克思的屡次声明完全符合（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这两部著作的结尾部分¹⁵，曾自豪地公开声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我们还可以回忆一下，约在三十年以后，

马克思在 1875 年批判哥达纲领¹⁶的时候，曾无情抨击了这个纲领表现的机会主义），这种颂扬决不是“迷恋”，决不是夸张，也决不是论战伎俩。必须不断地教育群众这样来认识而且正是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沙文主义和考茨基主义流派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背叛，最突出地表现在这两个流派都把这方面的宣传和鼓动忘记了。

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无产阶级国家的消灭，即任何国家的消灭，只能通过“自行消亡”。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每一个革命形势，分析每一个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总是详细而具体地发挥了他们的这些见解。我们现在就来谈谈他们学说中这个最重要的部分。

第二章

国家与革命 1848—1851 年的经验

3. 1852 年马克思对问题的提法^①

1907 年，梅林把 1852 年 3 月 5 日马克思给魏德迈的信摘要登在《新时代》¹⁷（第 25 年卷第 2 分卷第 164 页）上。在这封信里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论述：

① 第二版增加的一节。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的存在或发现这些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这种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各个阶级作过经济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¹⁸定历史阶段(historische Entwicklungsphasen der Produktion)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¹⁸……

在这一段话里，马克思极其鲜明地表达了两点：第一、他的学说同资产阶级最渊博的先进思想家的学说之间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第二、他的国家学说的实质。

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之点是阶级斗争。人们时常这样说，这样写。但这是不正确的。根据这个不正确的看法，往往会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机会主义的歪曲，把马克思主义改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因为阶级斗争学说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以前创立的，而且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可能还没有走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圈子。用阶级斗争学说来限制马克思主义，就是割裂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难怪乎当欧洲的历史在实

实际上向工人阶级提出这个问题时，不仅一切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而且所有“考茨基主义者”（动摇于改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人），都成了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可怜的庸人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考茨基写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是在 1918 年 8 月，即在本书第一版刊行以后很久才出版的，这本小册子是用市侩的观点歪曲马克思主义、口头上假意承认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卑鄙地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见我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徒考茨基》1918 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版）。

以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为主要代表的现代机会主义，完全陷入了马克思在上面所评述的资产阶级立场，因为这种机会主义把承认阶级斗争的范围局限于资产阶级关系的领域以内。在这个领域、这个范围内，任何一个有教养的自由主义者都不会拒绝在“原则上”承认阶级斗争！）机会主义恰巧在最主要之点不承认有阶级斗争，即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实际上，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因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就不可避免地应当是新型民主的（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国家和新型专政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

其次，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

国家学说的实质。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极其繁杂，但本质是一个：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是资产阶级专政。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繁杂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第五章

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

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即1875年5月5日给白拉克的信，这封信直到1891年才在《新时代》第九年卷第一分卷上发表，有俄文单行本）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最详尽的说明。在这篇出色的著作中，批判拉萨尔主义的论战部分可以说是遮盖了正面论述的部分，即遮盖了对共产主义发展和国家消亡之间的联系的分析。

1. 马克思如何提出问题

如果把马克思在1875年5月5给白拉克的信同上述恩格斯在1875年3月28日给倍倍尔的信从表面上比较一下，也许会觉得马克思比恩格斯带有浓厚得多的“国家派”色彩，也许会觉得这两位著作家对国家的看法有很大差别。

恩格斯建议倍倍尔根本抛弃关于国家的废话，把“国家”一词从党纲中完全去掉而用“公团”来代替；恩格斯甚至宣

布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而马克思却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这就是说，似乎他认为就是在共产主义下也需要国家。

但这种看法是根本不对的。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家和国家消亡问题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上面所引的马克思的话也就是指正在消亡的国家制度。

很清楚，确定未来的“消亡”的日期，这是无从谈起的，尤其因为它显然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有表面上的差别，是因为他们研究的问题和研究的目的不同。恩格斯的目的是要清楚地、尖锐地、扼要地向倍倍尔指明，当时流行的（也是拉萨尔颇为赞同的）关于国家问题的偏见是完全荒谬的。而马克思只是在论述另一个问题即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时候，顺便提到了这个问题。

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问题，去考察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

究竟有什么根据可以提出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呢？

这里的根据就是，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的，它在历史上是从资本主义中发展起来的，它是资本主义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正象自然科学家提出某一新的生物变种的发展问题一样，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这一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

个方向演变的。

马克思首先扫除了哥达纲领对国家同社会的相互关系问题的糊涂观念。

他写道，……“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历史发展的特点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发展了。‘现代国家’却各不相同。它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同在瑞士完全不同，它在英国同在美国完全不同。所以，‘现代国家’是一种虚构。

但是，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的国家，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筑在资本主义多少已经发展了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具有某些极重要的共同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谈‘现代国家制度’，而未来就不同了，到那时‘现代国家制度’现在的根基即资产阶级社会已经消亡了。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代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否则，即使你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名词联接一千次，也丝毫不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¹⁹……

马克思这样讥笑了关于“人民国家”的一切空话，提出了问题，并且好象是警告说：要对这个问题作出科学的解答，有依靠确切证明了的科学材料。

十分确切地由整个发展论和全部科学证明了的首要的一

点，也是从前被空想主义者所忘记、现在又害怕社会主义革命的机会主义者所忘记的那一点，就是在历史上必然会有—个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特别时期或特别阶段。

2. 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马克思继续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²⁰……

这个结论是马克思根据他对无产阶级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的分析，根据这个社会发展情况的实际材料以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对立并且不可调和的实际材料所得出的。

从前，问题的提法是这样的：无产阶级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应当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革命专政。

现在，问题的提法已有些不同了：从向着共产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非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不可，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这个专政和民主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知道，《共产党宣言》是干脆把“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和“争得民主”这两个概念并列在一起的。根据上述一切，可以更准确地断定民主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中是怎样变更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它最顺利的发展条件下，比较完

全的民主制度就是民主共和制。但是这种民主制度始终受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狭窄框子的限制，因此它实质上始终只是供少数人、供有产阶级、供富人享受的民主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始终与古希腊共和国只供奴隶主享受的自由大致相同。由于资本主义剥削的条件，现代的雇佣奴隶被贫困压得“无暇过问民主”，“无暇过问政治”大多数居民在通常的和平局面下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

德国可以说是证实这一论断的最明显的例子，因为在这个国家里，宪法规定的合法性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有半世纪之久（1871—1914年），在这个时期内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利用合法性”方面做的工作要比其他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多得多，特别是使工人参加党的比例达到了举世未有的高度。

那末这种有政治觉悟的积极的雇佣奴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所占的最大的百分比究竟是多少呢？一千五百万雇佣工人中只有一百万是社会民主党党员！一千五百万雇佣工人中只有三百万是工会会员！

极少数人享受民主，富人享受民主，——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如果仔细地考察一下资本主义民主的结构，那末无论在选举法的“细微的”（似乎是细微的）条文上（居住年限、妇女被排斥等等），或是在代议机构的办事手续上，或是在行使集会权的实际障碍上（公共的集会场所不准“叫化子”使用！），或是在纯粹按资本主义原则办报等等事实上，到处都可以看到对民主的重重限制。对穷人的这种种限制、禁止、排斥、阻碍看起来似乎是很细微的，特别是在那些从来没有亲身体验过贫困、从来没有接近过被压迫阶级群

众的生活的人（这种人在资产阶级的政论家和政治家中，如果不占百分之九十九，也得占十分之九）看来是很细微的，但是这些限制加在一起，却把穷人排斥和推出政治生活之外，使他们不能积极参加民主生活。

马克思正好抓住了资本主义民主的这一实质，他在分析公社的经验时说：这就是容许被压迫者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压迫阶级中的哪些代表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他们！²¹

但是从这种必然是狭隘的、暗中排斥穷人的、因而也是完全虚伪和骗人的资本主义民主向前发展，决不象自由派教授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是简单地、直接地、平稳地走向“日益彻底的民主”。不是的。向前发展，即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走别的道路，因为再没有其他人也没有其他道路能够粉碎剥削者资本家的反抗。

而无产阶级专政，即被压迫者先锋队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来镇压压迫者，不能简单地只是扩大民主。除了把民主大规模地扩大，使民主第一次成为供穷人享受、供人民享受而不是供富人享受的民主之外，无产阶级专政还要对压迫者、剥削者、资本家采取一系列剥夺自由的措施。为了使人类从雇佣奴隶制下面解放出来，我们必须镇压这些人，必须用强力粉碎他们的反抗，一一显然，凡是实行镇压和使用暴力的地方，也就没有自由，没有民主。

读者总还记得，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已经很好地阐明了这一点，他说：“无产阶级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

国家就不存在了。”²²

绝大多数人享受民主，对那些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分子实行强力镇压，即把他们排斥于民主之外，一一这就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下形态改变了的民主。

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当资本家的反抗已经彻底粉碎，当资本家已经消失，当阶级已经不存在（即社会各个成员在对社会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已经没有什么差别）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国家才会消失，才有可能谈自由”。只有在那个时候，真正完全的、真正没有任何禁止的民主才有可能，才会实现。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民主才开始消亡，道理很简单：人们既然摆脱了资本主义奴隶制，摆脱了资本主义剥削制所造成的无数残暴、野蛮、荒谬和卑鄙的现象，也就会逐渐习惯于遵守数百年来人们就知道的、数千年来在一切处世格言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自动地遵守这些规则，而不需要暴力，不需要强制，不需要服从，不需要所谓国家这种实行强制的特殊机构。

“国家消亡”这句话说得非常恰当，它既表明了过程的渐进性，又表明了过程的自发性。只有习惯才能够而且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作用，因为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如果没有剥削，如果没有某种令人气愤、引起抗议和起义并使镇压成为必要的现象，那末人们是多么容易习惯于遵守他们所必需的公共生活规则。

总之，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即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将第一次提供人民

享受的、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同时对少数人即剥削者实行必要的镇压。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提供真正完全的民主，而民主愈完全，它也就愈迅速地成为不需要的东西，愈迅速地自行消亡。

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下存在的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即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少数人镇压多数人的特殊机器。很明显，为了达到剥削者少数有系统地镇压被剥削者多数的目的，就必须采取极凶恶极残酷的镇压手段，就必须造成无数流血事件，而这样的流血事件是人类在奴隶制、农奴制和雇佣劳动制下都经历过的。

其次，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镇压还是必要的，但这已经是被剥削者多数对剥削者少数的镇压。实行镇压的特殊机构，特殊机器，即“国家”，还是必要的，但这已经是过渡性质的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因为由昨天还是雇佣奴隶的多数人去镇压剥削者少数人是一件比较容易、比较简单和比较自然的事情，所流的血会比从前在镇压奴隶、农奴和雇佣工人起义时流的少得多，人类为此而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而且在实行镇压的同时，还把民主扩展到绝大多数居民身上，以致对实行镇压的**特殊机器**的需要就开始消失。自然，如果没有极复杂的实行镇压的机器，剥削者就镇压不住人民，但是人民镇压剥削者，却只要有很简单的“机器”即几乎可以不要“机器”不要特殊的机构，而只要有武装群众的组织（如工兵代表苏维埃，——我们先在这里提一下）。

最后，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够完全不需要国家，因为那时已经没有人须要加以镇压，——这里所谓“没有人”是指阶

级而言，是指对某一部分居民进行有系统的斗争而言。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丝毫不否认个别人捣乱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同样也不否认有镇压这种捣乱的必要性。但是，第一、做这件事情用不着什么实行镇压的特殊机器，特殊机构，武装的人民自己会来做这项工作，而且做起来非常简单容易，就象现代社会中任何一群文明人劝解打架的人或制止虐待妇女一样。第二、我们知道，产生违反公共生活规则的捣乱行为的社会根源是群众受剥削和群众贫困。这个主要原因一消除，捣乱行为就必然开始“消亡”。虽然我们不知道消亡的速度和进度怎样，但是，我们知道这种行为一定会消亡而这种行为一消亡，国家也就随之消亡。

马克思并没有陷入空想，关于这个未来，他只是较详细地确定了现在所能确定的东西，即共产主义社会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之间的差别。

3. 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详细地驳斥了拉萨尔关于劳动者在社会主义下将领取“不折不扣的”或“全部的劳动产品”的思想。马克思指出，在整个社会的全部社会劳动中，必须拿出一部分作后备基金、作扩大生产的基金和补偿“磨损了的”机器的费用等等，然后在消费品中还要拿出一部分作为管理费以及学校、医院、养老院等等的基金。

马克思不象拉萨尔那样说些含糊不清的笼统的话（“全部劳动产品归劳动者”），而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怎样管理的问题作了冷静的考察。马克思在具体分析这种没有资本主义

存在的社会的生活条件时说道：

“我们这里所说的（在分析工人党的纲领时）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²³

这个刚刚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在各方面还带着旧社会痕迹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

生产资料已经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它已归整个社会所有。社会的每个成员都完成社会所必需的某一部分劳动，并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完成了多少劳动量。根据这张证书，他从消费品的社会储存中领取相当数量的产品。这样，除去作为社会基金的一部分劳动之外，每个劳动者从社会方面领取的，也就相当于他对社会所贡献的。

这样，似乎“平等”就实现了。

但是，当拉萨尔把这样的社会制度（通常叫做社会主义，而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说成是“公平的分配”，说成是“每人有获得同等劳动产品的平等权利”的时候，他是错误的，于是马克思就对他的错误进行了分析。

马克思说：这里确实有“平等权利”但这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它同任何权利一样，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任何权利都是把同一标准应用在不同的人身上，应用在事实上各不相同、各不同等的人身上，因而“平等权利”就是不平等，就是不公平。的确，每个人付出与别人同等的一份社会劳动，

就能领取一份同等的社会产品（除了上述扣除的以外）。

然而各个人是不同等的：有的强些，有的弱些；有的结了婚，有的没有结婚，有的子女多些，有的子女少些，以及其他等等。

马克思总结说，……“在同等的劳动下，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同等份额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这一切，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²⁴……

所以，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富裕的程度还会不同，而不同就是不公平。但是人剥削人已经不可能了，因为那时已经不能把工厂、机器、土地等生产资料攫为私有了。马克思驳倒了拉萨尔关于一般“平等”和“公平”的含糊不清的小资产阶级说法，指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说明这个社会最初只能消灭私人占有生产资料这“不公平”现象，却不能立即消灭“按劳动”（不是按需要）分配消费品这一仍然存在的不公平现象。

庸俗的经济学家（包括资产阶级的教授和“我们的”杜冈在内）经常谴责社会主义者，说他们忘记了人与人的不平等，说他们“幻想”消灭这种不平等。我们看到，这种谴责只能证明资产阶级思想家先生们的极端无知。

马克思不仅极其准确地估计到人们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而且还估计到，仅仅把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公有（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还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点和“资产阶级法权”的不平等，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

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

马克思继续说道，……“但是这些缺点，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²⁵……

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法权”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范围内，也就是在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资产阶级法权”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在这个范围内，也只有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才不存在了。

但是它在另一方面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按不等量的（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法权”。

马克思说，这是一个“缺点”，但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愿陷入空想主义，那就不能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人们立即就能学会不需要任何法权规范而为社会劳动，况且资本主义的废除不能立即为这种变更创造经济前提。

可是，除了“资产阶级法权”以外，没有其他规范。所以在这个范围内，还需要有国家来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来

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

国家正在消亡，因为资本家已经没有了，阶级已经没有可使了，因而也就没有什么阶级可以镇压了。

但是，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因为还要保卫容许在事实上存在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要使国家完全消亡，就必须有完全的共产主义。

4. 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

马克思接着说：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之后，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的时候，当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的时候，当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²⁶

现在我们才认识到，恩格斯无情地讥笑那种把“自由”和“国家”这两个名词连在一起的荒谬见解，是多么正确。还有国家的时候就不会有自由，有了自由就不会有国家。

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那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消失，因而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也就消失，而这个根源光靠生产资料转为公有财产，光靠剥夺资本家，是决不能立刻消除的。

这种剥夺会使生产力有蓬勃发展的可能。既然我们看到

资本主义现在已经怎样难以想象地阻碍着这种发展，而在已经达到的现代技术基础上又可以大大推进生产力，我们就可以有十二分把握地说，剥夺资本家一定会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蓬勃发展。但是，生产力将怎样迅速向前发展，将怎样迅速发展到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把劳动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

因此，我们只能谈国家消亡的必然性，同时着重指出这个过程是长期的，它的长短将取决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发展速度。至于消亡的日期或消亡的具体形式问题，只能作为悬案，因为现在还没有可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材料。

当社会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时，也就是说，在人们已经十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已经大大提高，因此他们能够自愿地尽其所能来工作的时候，国家才会完全消亡。那时，就会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超出这种使人象夏洛克²⁷那样冷酷地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狭隘眼界。那时，社会就不必在分配产品的时候规定每人应当领取的产品数量；每人将“按需”自由地取用。

从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很容易把这样的社会制度说成是“纯粹的乌托邦”并冷嘲热讽地说社会主义者许下诺言，答应每个人都有权利向社会领取任何数量的香菌、汽车、钢琴等等，而对每个公民的劳动则可以不加任何监督。就是在今天，大多数资产阶级“学者”也还是用这种讽刺的话来搪塞，但他们这样做只是暴露他们愚昧无知和替资本主义进行

自私的辩护。

说他们愚昧无知，是因为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想到过要“许诺”共产主义高级发展阶段的到来，而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在预见这个阶段将会到来时所设想的前提，既不是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是现在的庸人，因为这种庸人正如波米亚洛夫斯基小说²⁸中的神学校学生一样，惯于“白白地”糟蹋社会财富的储存和提出不能实现的要求。

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到来以前，社会主义者要求社会和国家对劳动标准和消费标准实行极严格的监督，不过这种监督应当从剥夺资本家和由工人监督资本家开始，并且不是由官吏的国家而是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来实行。

说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他们的走卒如策烈铁里先生、切尔诺夫先生之流）替资本主义进行自私的辩护，是因为他们一味争论和空谈遥远的未来，而不谈目前政治上的迫切问题：剥夺资本家，把全体公民变为一个大“辛迪加”即整个国家的工作人员和职员，并使整个辛迪加的全部工作完全服从真正民主的国家，即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国家。

其实，当博学的教授以及附和他的庸人们和策烈铁里先生、切尔诺夫先生之流谈到荒诞的乌托邦，谈到布尔什维克的蛊惑人心的诺言，谈到不可能“实施”社会主义的时候，他们指的正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但是，不仅谁也没有许过“实施”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诺言，而且连想也没有想到“实施”，因为这根本是不可以“实施”的。

这里我们也要讲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问题，这个问题在上面引用的恩格斯说“社会民主主义

者”这个名称不恰当的一段话里已经谈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之间的差别，在政治上说，将来也许很大，但现在在资本主义下着重来谈它就很可笑了，至于把这个差别提到首要地位的也许只有少数无政府主义者（如果在格拉弗、柯尔涅利逊这些克鲁泡特金之流的人物以及其他无政府主义“大师”们“象普列汉诺夫那样”变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或象一个没有丧失廉耻和良心的无政府主义者格耶所说的那样变成了无政府主义卫国战士以后，无政府主义者当中还有人丝毫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但是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是很明显的。马克思把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末“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马克思的这些解释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他在这里也始终应用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即发展学说，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马克思没有经院式地臆造和“虚构”种种定义，没有从事毫无意义的字面上的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而是分析了可以表现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成熟程度的两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由此就产生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法权，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的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法权也就等于零。

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

这好象是奇谈怪论，或只是一种玩弄聪明的辩证把戏，那些没有花过一点功夫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极其深刻的内容的人，就常常这样来谴责马克思主义。

其实，无论在自然界或在社会中，实际生活随时随地都使我们看到新事物中有旧的残余。马克思并不是随便把一小块“资产阶级”法权塞到共产主义中去，而是抓住了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社会里那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的东西。

在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民主具有巨大的意义。但是民主决不是一种不可逾越的极限，它只是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和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的一个阶段。

民主意味着平等。很明显，如果把平等正确地了解为消灭阶级，那末无产阶级争取平等的斗争以及平等的口号就具有伟大的意义。但是，民主仅仅意味着形式上的平等。一旦社会全体成员在占有生产资料方面的平等实现以后，也就是说，一旦劳动平等和工资平等实现以后，在人类面前就必然会产生一个问题：要更进一步，从形式上的平等转到事实上的平等，即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至于人类会经过哪些阶段，通过哪些实际办法达到这个最高目的，那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可是，必须认识到，资产阶级总是非常虚伪地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实际上，只有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社会生

活和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才会开始真正地迅速地向前推进，形成一个有大多数居民然后是全体居民参加的真正群众性的运动。

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而这一点又是和下面一点联系着的：民主在其发展的某个阶段首先把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使他们有可能去打碎、彻底摧毁、连根铲除资产阶级的（哪怕是共和派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即常备军、警察和官吏，而代之以更民主的、但仍然是国家的机器，即由武装工人群众（以后要过渡到全民民兵制）构成的国家机器。

在这里，“量转化为质”因为这样高度的民主，是同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的框子、开始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相联系的。如果真是所有的人都参加国家的管理，那末资本主义就不能支持下去。而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却又为真是“所有的人”能够参加国家管理创造了前提。这种前提就是：在许多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已经达到了人人都识字，其次是千百万工人已经在邮局、铁路、大工厂、大商业企业、银行等等社会化的巨大复杂的机构里“受了训练而养成了遵守纪律的习惯”。

在这种经济前提下，完全有可能在推翻了资本家和官吏之后，在一天之内立刻着手由武装工人、普遍武装的人民代替他们去监督生产和分配，计算劳动和产品。（不要把监督和计

算的问题同具有科学知识的工程师和农艺师等等的问题混为一谈，这些先生今天在资本家的支配下工作，明天他们就会在武装工人的支配下更好地工作。）

计算和监督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确地进行工作所必需的主要条件。在这里，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的雇员。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全部问题在于要他们在正确遵守工作标准的条件下同等地工作，并同等地领取报酬。对这些事情的计算和监督已被资本主义简化到了极点，而成为一种非常简单、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监督和登记的手续，只是算算加减乘除和发发有关字据的手续^①。

当大多数人民到处开始自己来进行这种计算，对资本家（这时已成为职员）和保留着资本主义恶习的知识分子先生们实行这种监督的时候，这种监督就成为真正包罗万象的、普遍的和全民的监督，那时他们就绝对无法逃避这种监督，就会“无处躲藏”了。

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报酬平等的工厂。

但是，无产阶级在战胜资本家和推翻剥削者以后在全社会推行的这种“工厂”纪律，决不是我们的理想，也决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而只是为了彻底肃清社会上资本主义剥削制

① 当国家的最主要职能简化为由工人自己担当的这样一种计算和监督的时候，国家就不再成为“政治国家”，那时“社会职能就由政治职能变为简单的管理职能”（参看第四章第二节恩格斯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造成的丑恶现象，并且为了继续前进所必需的一个阶段。

当社会全体成员或至少绝大多数成员自己学会了管理国家，自己掌握了这个事业，并对极少数资本家、想保留资本主义恶习的先生们和深深受到资本主义腐蚀的工人们“调整好”监督的时候，对任何管理的需要都开始消失了。民主愈完全，它成为多余的东西的时候就愈接近。由武装工人组成的、“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国家”愈民主，则任何国家开始消亡也就愈迅速。

因为当所有的人都学会了管理，实际上都自己来管理社会生产，自己来进行计算并对寄生虫、老爷、骗子手等等“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护者”实行监督的时候，企图逃避这种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就必然很难达到目的，必然只会是极罕见的例外，并且还可能受到极迅速极严厉的惩罚（因为武装工人是实事求是的，不象知识分子那样抹不开情面；他们未必会让人随便跟自己开玩笑），于是，人们对于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简单的基本规则就会很快从必须遵守变成习惯于遵守了。

到那时候，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过渡到它的高级阶段的大门就会敞开，国家也就会完全消亡了。

写于 1917 年 8—9 月

1918 年“生活和知识”

出版社用单行本刊印

按 1919 年“共产党人”出

版社出版的小册子原文刊

印并根据手稿和 1918 年的

版本作过校订

选自《列宁全集》第 25 卷

第 371—479 页

注 释

- 1 《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是系统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著作，它透彻地回答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俄国革命所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科学地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时期中的历史作用，粉碎了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歪曲和进攻，同时也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者在国家问题上的荒谬观点。

《国家与革命》一书是列宁 1917 年 8—9 月在秘密状态中写成的。列宁在 1916 年下半年就认为有必要从理论上探讨国家问题。当时他写了一篇短评《青年国际》(见《列宁全集》第 23 第 163—167 页)，在这篇短评里他批评了布哈林在国家问题上的反马克思主义立场，并表示要写一篇文章详细地论述马克思主义对国家问题的观点。列宁在 1917 年 2 月 17 日给亚·米·柯伦泰的信中谈到，他差不多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材料准备好了。这些材料是用很小的字体写在以《马克思主义论国家》为标题的蓝皮笔记本里的。收集在笔记本里的材料有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摘要，有考茨基、潘涅库克和伯恩施坦著作的摘录并附有列宁的评语和结论。

《国家与革命》一书按原定计划有七章，最后一章，即第七章《1905 年和 1917 年俄国革命的经验》列宁没有写，保存下来的只有这一章的详细提纲(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 21 卷第 25—26 页)。关于出版这本书的问题，列宁在给出版者的信中写道，如果他“实在来不及写完第七章，或者这本书太厚，那末可以把前六章单独出版，作为第一册……”

在手稿的第一页上，作者用的笔名是：弗·弗·伊万诺夫斯基。列宁预计用这个笔名可以出版这本书，不然就会被临时政府没收。但是这本书到 1918 年才出版，因此也就不再需要再用笔名了。第二版是在 1919 年出的，列宁在第二章中加了《1852 年马克思对问题的提法》一节。

2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页。

3 社会革命党 是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政党，1902年初由几个不同的民粹派团3体和小组合并而成。它代表富农阶级的利益。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折衷混合物。列宁指出，社会革命党人“竭力用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时“批评的补钉来修补民粹主义的破洞”（见《列宁全集》第9卷第295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

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同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充当了反革命临时政府的主要支柱。社会革命党人不支持农民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要求，主张保留地主土地私有权。

1917年12月，社会革命党人左翼组成了独立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表面上承认苏维埃政权，并同布尔什维克达成协议，但很快又开始反对苏维埃政权。

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内战时期，社会革命党人曾多次策划反革命阴谋，策动富农叛乱，暗害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继续进行反苏维埃国家的活动，后被苏维埃政权粉碎。

4 氏族组织 是人类历史上最初的社会经济形态，即原始公社制度。氏族组织产生的时期同现代人的类型的最后形成的时期相同。氏族组织的发展经过两个时期：母权制和父权制。父权制解体的时期就是原始社会变成阶级社会和国家产生的时期。“在原始公社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在基本上适合当时的生产力性质。石器以及后来出现的弓箭，使人无法单身去同自然力量和猛兽作斗争……公共的劳动导致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公有制。这里还不知道什么是生产资料私有制……这里没有剥削，也没有阶级。”（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1971年人民出版社版第649—650页）。

关于原始公社制度，参看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1965年人民出版社版）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克兰 是爱尔兰和苏格兰的氏族公社。

5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167页。

- 6 参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卷第 167 页。
- 7 指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德文 第四版序 目（见《马
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16 页。
- 8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67-168 页。
- 9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68 页。
- 10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69 页。
- 11 第一届联合临时政府 是在临时政府四月危机以后于 1917 年 5 月 5 日(公
历 18 日成立的，内阁名单于 5 月 6 日(公历 19 日公布。参加联合
政府的除了资产阶级的代表外，还有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和切尔诺夫，
靠近社会革命党的彼得维尔节夫，孟什维克斯柯别列夫和策烈铁里，人民
社会党人彼舍霍诺夫。关于第一届联合政府的成立，参看《苏 联共产
党(布)历史简明教程》1954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247-248 页。
- 12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70 页。
- 13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20-321 页。
- 14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23-224 页。
- 15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60-161、285-286 页。
- 16 哥达纲领 是 1875 年在哥达举行的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合并代表大
会上通过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这个纲领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机 会
主义纲领，它根本不提无产阶级专政，否认农民参加革命的可能 性，
要求把国家资助工人生产合作社作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法。并要 求
用一切合法手段建立所谓自由的人民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 对
两派在机会主义纲领基础上的合并，并对哥达纲领做了毁灭性的 判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1-33 页。

- 17 《新时代》(《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1883年至1923年秋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以后改为周刊。杂志的编辑从1883年至1917年10月是卡·考茨基，从1917年10月至1923年秋是亨·库诺夫。1885—1894年恩格斯在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经常提出忠告来帮助杂志编辑部，并且不时地批评编辑部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九十年代后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之后，杂志开始系统地登载修正主义者的文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杂志采取中派立场，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
- 18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333页。
- 19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21页。
- 20 同上，第21页。
- 21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6页。
- 22 见恩格斯1875年3月18日—28日给奥·倍倍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页)。
- 23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页
- 24 同上，第12页。
- 25 同上，第12页。
- 26 同上，第12页。
- 27 夏洛克是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残酷的高利贷者。他根据契约，要求不如期还债的安东尼奥割下一磅肉。
- 28 指十九世纪俄国民主主义作家尼·格·波米亚洛夫斯基在1862—1863年写的一部小说《神学校随笔》。

列 宁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¹

通俗的论述（节录）

序 言

现在献给读者的这本小册子，是 1916 年春天我在苏黎世写成的。在那里的工作条件下，我当然深感法文和英文参考书的缺乏，尤其是俄文参考书的缺乏。但是，论帝国主义的一本主要英文著作，即约·阿·霍布森的那本著作，我还是利用了的，并且我认为已经给了它应有的注意。

我写这本小册子的时候，是考虑到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的。因此，我不但要极严格地限制自己只作纯理论性的、特别是经济上的分析，而且我在表述关于政治方面的几点必要的意见时，也不得不极其谨慎，不得不用暗示的方法，用沙皇政府迫使一切革命者提笔写“合法”作品时不得不的那种伊索寓言式的一一可恶的伊索寓言式的一一语言。

在目前这种自由的日子里，再读到小册子里那些因顾虑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而说得走了样的、吞吞吐吐的、好象被铁钳子钳住了似的地方，真是感到十分难受。关于帝国主义

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关于社会沙文主义（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沙文主义）是彻底地背叛社会主义、完全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关于工人运动的这种分裂是同帝国主义的客观条件相联系的等等，当我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都不得不不用一种“奴隶的”语言，现在只好请关心这类问题的读者去看我那部即将再版的 1914—1917 年的国外论文集。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第 119—120 页^①上的一段文字：为了用书报检查通得过的形式向读者说明，资本家以及转到资本家方面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考茨基同他们进行的斗争是很不彻底的）怎样无耻地在兼并问题上撒谎，怎样无耻地掩饰本国资本家的兼并政策，我不得不拿……日本做例子！细心的读者不难用俄国来代替日本，用芬兰、波兰、库尔兰、乌克兰、希瓦、布哈拉、爱斯兰和其他非大俄罗斯人居住的地区来代替朝鲜。

我希望我这本小册子，能够帮助读者去理解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这个基本的经济问题。不研究这个问题，就根本不会懂得如何去估计现在的战争和现在的政治。

作 者

1917 年 4 月 26 日彼得格勒

① 见《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839—840 页。——编者注

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²

(一)

我在俄文版序言里说过，本书在1916年写的时候，是考虑到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的。现在我不可能把全文改写一遍，而且改写也许是不适当的，因为本书的主要任务，无论过去或现在，都是根据各国不容争辩的资产阶级统计的综合材料和资产阶级学者的自白，来说明二十世纪初期，即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前夜，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其国际相互关系上的总的情况。

不改写对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共产党人来说，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不无益处：他们看了这本被沙皇政府书报检查机关认为合法的书，就会相信，象在现今的美国或在法国虽然不久以前几乎全体共产党人都被逮捕，但他们还是可能并且必须利用共产党人还有的那一点点合法机会，来揭露社会和平主义观点和“世界民主”幻想的全部虚伪性。至于对这本经过检查的书的一些最必要的补充，我将在这篇序言中写出来。

(二)

本书已经证明，1914—1918年的战争，从双方来说，都

是帝国主义的（即侵略的、掠夺的、强盗的）战争，都是为了瓜分世界，为了分割和重新分割殖民地、金融资本的“势力范围”等等而进行的战争。

要知道，能够证明战争的真实社会性质，确切些说，证明战争的真实阶级性质的，自然不是战争的外交史，而是对各交战国统治阶级的客观情况的分析。为了说明这种客观情况，不应当引用一些例子和个别的材料（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而一定要引用关于各交战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基础的材料的总和。

我在说明 1876 年和 1914 年世界分割的情形（第六章）以及说明 1890 年和 1913 年世界铁路分割的情形（第七章）时所引用的，正是这样一种驳不倒的综合材料。铁路是资本主义工业的最主要的部门即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的总结，是世界贸易和资产阶级民主文明发展的总结和最显著的标志。本书前几章说明了铁路是怎样同大生产，同垄断组织，同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银行，同金融寡头联系在一起的。铁路网的分布，这种分布的不平衡，铁路网发展的不平衡，就是全世界现代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的总结。这种总结表明，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的这种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

建筑铁路似乎是一种简单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传播文明的事业。在那些由于粉饰资本主义奴隶制而得到报酬的资产阶级教授看来，在小资产阶级庸人看来，建筑铁路就是这么一回事。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线索象千丝万缕的密

网，把这种事业同整个生产资料私有制联系在一起，把这种建筑事业变成对十亿人民（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附属国人民，以及对“文明”国家资本的雇佣奴隶进行压迫的工具。

以小业主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自由竞争，民主，——所有这些被资本家及其报刊用来欺骗工农的口号，都早已成为过去的东西。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大多数居民施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制的世界体系。瓜分这种“赃物”的是两三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全身武装的强盗（美、英、日），他们把全世界卷入他们为瓜分自己的赃物而进行的战争。

（三）

君主制的德国强迫签订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以及美、法“民主”共和国和“自由的”英国强迫签订的更残暴得多、卑鄙得多的凡尔赛和约，给人类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它们把帝国主义雇用的文丐，把那些虽然自称为和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但是歌颂“威尔逊主义”硬说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可能达到和平和改良的反动市侩，完全揭穿了。

英德两个金融强盗集团争夺赃物的战争留下的几千万尸体和残废者，以及后来的这两个“和约”，空前迅速地唤醒了千百万受资产阶级压抑、踩、欺骗、愚弄的民众。于是，在战争造成的全世界的经济破坏的基础上，世界革命危机日益成熟，这个危机不管会经过多么长久而艰苦的周折，其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爆发并且获得胜利。

第二国际的巴塞尔宣言³，在1912年所估计的战争，正是1914年爆发的战争，而不是一般战争（有各种各样的战争，也有革命的战争），——这个宣言已经成了揭露第二国际英雄们的全部可耻的破产和一切叛变行为的纪念碑。

因此，我现在把这篇宣言转载在本版的附录里，并且再三请读者注意：宣言里有许多地方，确切、明白、直接地谈到即将到来的这次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联系，第二国际的英雄们总是想方设法地避开这些地方，就象小偷避开他偷过东西的地方一样。

(四)

本书特别注意批判“考茨基主义”这一国际上的思潮，在世界各国代表这一思潮的是第二国际的“最著名的理论家和领袖（在奥地利是奥托·鲍威尔之流，在英国是拉姆赛·麦克唐纳等人，在法国是阿尔伯·托马等等，等等），以及一大批社会党人、改良主义者、和平主义者、资产阶级民主派和教士。

这个思潮，一方面是第二国际解体、腐烂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整个生活环境而被资产阶级偏见和民主偏见所俘虏的小资产者的意识形态的必然产物。

考茨基及其同伙的这种观点，正好完全背弃了这位作家几十年来，特别是在他和社会党人机会主义者（伯恩施坦、米勒兰、海德门、龚帕斯等等）作斗争时所捍卫的那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因此，现在“考茨基主义者”在全世界都同极端的机会主义者，（通过第二国际即黄色国际）和资产阶

级政府（通过有社会党人参加的资产阶级联合政府）在政治实践上联合起来，这并不是偶然的。

在全世界日益发展的一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特别是共产主义运动，决不能不分析和揭露“考茨基主义”的理论错误。必须这样做，尤其是因为和平主义和一般“民主主义”在世界上还十分流行，这些思潮虽然丝毫不想冒充马克思主义，但是完全同考茨基之流一样，也在掩饰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性和帝国主义产生革命危机的必然性。所以，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同这些思潮作斗争，把受资产阶级愚弄的小业主和程度不同地处在小资产阶级生活条件下的千百万劳动者，从资产阶级那里争夺过来。

（五）

关于第八章《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有必要说几句话。在本书正文中已经指出：过去是“马克思主义者”、而现在是考茨基的战友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⁴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策主要代表人之一的希法亭，在这个问题上，比公开的和平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英国人霍布森还后退了一步。现在，整个工人运动的国际性的分裂已经完全暴露出来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这两派之间的武装斗争和国内战争的事实也同样暴露出来了：在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⁵支持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反对布尔什维克，在德国，谢德曼和诺斯克之流同资产阶级一起反对斯巴达克派⁶；在芬兰、波兰以及匈牙利等国也是如此。这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现象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呢？

就是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而这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历史阶段即帝国主义所特有的。正如本书所证明的，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划分出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其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一，即使按最“慷慨”和最夸大的计算，也不到五分之一），它们专靠“剪息票”来掠夺全世界。根据战前的价格和战前资产阶级的统计，资本输出的收入每年有八十至一百亿法郎。现在当然更多得多了。

很明显，从这样巨量的超额利润（因为这种利润超出了资本家从“自己”国家的工人身上取的利润）中，可以拿出一部分来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这个上层。而各“先进”国家的资本家也正是在收买他们，用千百种方法，用直接的和间接的、公开的和隐蔽的方法在收买他们。

这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即“工人贵族”阶层，这个按生活方式、工资数额和整个世界观说来已经完全市侩化的工人阶层，是第二国际的主要支柱，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不是军事支柱）。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代理人，是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labor lieutenants of the capitalist class），是改良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真正传播者。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中，他们有不少人必然会站在资产阶级方面，站在“凡尔赛派”方面来反对“巴黎公社活动家”。

如果不懂得这个现象的经济根源，如果不估计到这个现象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那末，在解决共产主义运动和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实践任务方面，就会一步也不能前进。

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从 1917 年起，

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证实。

尼·列宁

1920 年 7 月 6 日

在最近十五年到二十年里，特别是美西战争（1898年）和英布战争（1899—1902年）之后，新旧两大陆出版的经济和政治著作，愈来愈多地用“帝国主义”这个概念来说明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了。1902年，在伦敦和纽约出版了英国经济学家约·阿·霍布森的《帝国主义》一书。这位作者所持的观点是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的观点，这同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卡·考苏基今天所站的立场实质上是一样的，但是，霍布森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点和政治特点，作了一个很好很详尽的说明。1910年，在维也纳出版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鲁道夫·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有俄译本，1912年莫斯科版）。虽然作者在货币论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并且有某种把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调和起来的倾向，但是这本书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希法亭这本书的副标题）作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理论分析。实际上，近年来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论述，特别是报刊上有关这个问题的大量文章中所谈的，以及各种决议，如1912年秋的开姆尼斯⁷和巴塞尔两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所谈的，恐怕都没有超出这两位作者所叙述的，确切些说，所总结的那些思想的范围……

下面，我们就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点的联系和相互关系，作一个简要的、尽量通俗的叙述。至于非经济方面的问题，尽管是值得一谈的，我们也不谈了。参考书目及其他注释，并不是所有的读者都感到兴趣的，所以放在书的最后面。

一 生产集中和垄断

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点之一，就是工业蓬勃发展，生产集中于愈来愈大的企业的过程进行得非常迅速。现代工业调查提供了说明这一过程的最完备最确切的材料。

例如德国，每一千个工业企业中，雇用工人五十人以上的大企业在 1882 年有三个，1895 年有六个，1907 年有九个。每一百个工人中，这些企业的工人占二十二个、三十个、三十七个。但是生产集中的程度要比工人集中的程度大得多，因为大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要高得多。关于蒸汽机和电动机的材料，说明了这一点。拿德国所谓广义的工业（包括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在内）来说，情况如下：在三百二十六万五千六百二十三个企业中，大企业有三万零五百八十八个，只占百分之零点九。在一千四百四十万工人中，它们的工人占五百七十万，即占百分之三十九点四；在八百八十万蒸汽马力中，它们占有六百六十万马力，即占百分之七十五点三；在一百五十万庭电力中，它们占有一百二十万，即占百分之七十七点二。

不到百分之一的企业，竟占有总数四分之三以上的汽力和电力！而二百九十七万个小企业（雇用工人五人以下的），即占总数百分之九十一的企业，却只占有百分之七的汽力和电力！几万个最大的企业拥有一切，数百万个小企业无足轻重。

德国在 1907 年雇用工人一千人以上的企业，有五百八十六个。它们的工人几乎占总数的十分之一（一百三十八万），它们的汽力和电力几乎占总数的三分之一（百分之三十二）^①。下面我们可以看到，货币资本和银行使极少数最大企业的这种优势，变成更加强大的而且是名副其实的压倒优势，就是说，几百万中小“业主”，甚至一部分大“业主”，实际上完全受几百个金融富豪的奴役。

在另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北美合众国，生产集中发展得更加猛烈。美国统计把狭义的工业划分出来，并且按全年产值的多少把这种企业分成几类。在 1904 年，产值在一百万美元以上的最大的企业有一千九百个（占企业总数二十一万六千一百八十个的百分之零点九），它们有一百四十万工人（占工人总数五百五十万的百分之二十五点六）；它们的产值有五十六亿美元（占总产值一百四十八亿美元的百分之三十八）。五年之后，在 1909 年，相应的数字如下：三千零六十个企业（占企业总数二十六万八千四百九十九个的百分之一点一），有二百万工人（占工人总数六百六十万的百分之三十点五），它们的产值有九十亿美元（占总产值二百零七亿美元的百分之四十三点八）^②。

美国所有企业的全部产值，差不多有一半掌握在仅占企业总数百分之一的企业手里！而这三千个大型企业，包括了

① 数字是根据《德意志帝国年鉴》(《Annalen des deutschen Reichs》)1911 年察恩版综合的。

② 《美国 1912 年统计汇编》(《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2》) 第 202 页。

二百五十八个工业部门。由此可见，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说，就自然而然地走到垄断。因为几十个大型企业彼此之间容易成立协定，另一方面，正是企业的规模巨大，造成了竞争的困难，产生了垄断的趋势。这种从竞争到垄断的转变，是最新资本主义经济的最重要的现象之一，甚至是唯一的最重要的现象，所以我们必须比较详细地谈一下。但是，我们首先应当消除一个可能产生的误会。

美国统计上写着：在二百五十个工业部门中有三千个大型企业。似乎每个部门都有十二个规模最大的企业。

事实上并非如此。并不是每个工业部门都有大企业，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最高阶段，有一个极重要的特点，就是所谓联合制，即把不同的工业部门联合在一个企业中，这些部门或者是依次对原料进行加工（如把矿石炼成生铁，把生铁炼成钢，可能还用钢制造各种成品），或者是对另一些部门起辅助作用（如加工下脚料或副产品；生产包装用品等等）。

希法亭写道：“第一、联合制把各种行情拉平，从而保证联合企业有更稳定的利润率。第二、联合制导致贸易的消除。第三、联合制使技术改进有可能实现，因而能获得比‘单纯’企业（即没有联合的企业）更多的利润。第四联合制使联合企业的地位比‘单纯’企业巩固，使它在严重萧条（营业呆滞，危机）时期，即原料跌价赶不上成品跌价时期的竞争中得到加强。”^①

① 《金融资本》俄译本第286—287页。

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海曼写了一部描述德国钢铁工业中“混合”（即联合）企业的专著，他说：“单纯企业由于原料价格高、成品价格低而纷纷倒闭”。结果是：“一方面只剩下几个大煤业公司，采煤量达几百万吨，它们紧密地组成一个煤业辛迪加；其次，是同它们有密切联系的大铸钢厂及其钢业辛迪加。这些大型企业每年生产四十万吨（一吨等于六十普特）钢，采掘大量的矿石和煤炭，生产钢制品，雇有一万个分住在工厂区各宿舍的工人，有的还有自己的铁路和港口。这种大型企业是德国钢铁工业的典型代表。而且集中还在不断地发展。个别企业愈来愈大，同一工业部门或不同工业部门的企业结合为大型企业的愈来愈多，而且有柏林的五六家大银行作它们的靠山和指挥者。德国采矿工业确切地证实了卡尔·马克思关于集中的学说是正确的，诚然，这里指的是用保护关税和运费来保护工业的国家。德国采矿工业已经成熟到可以被剥夺的地步了”^①

这就是一个诚实的（这是一个例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势必得出的结论。必须指出，他把德国似乎看得很特殊，因为德国工业受到高额保护关税的保护。但是这种情况只能加速集中，加速企业家的垄断同盟，如卡特尔、辛迪加等等的形成。特别重要的是，在自由贸易的国家英国，集中同样引起垄断，不过时间稍晚，形式也许有所不同。请看海尔曼·列维教授根据大不列颠经济发展材料写的一本专论“垄断组

① 汉斯·吉德翁·海曼《德国大钢铁工业中的混合企业》（Hans Gideon Heymann ; 《 Die gemischten Werke im deutschen CroBeisengewerbe》) 1904 年斯图加特版第 256、278 页。

织——卡特尔和托拉斯”的著作中的一段话：

“在大不列颠，正是企业的巨大规模和高度技术水平，带来了垄断的趋势。一方面，集中的结果，必须在企业上耗费大量的资本；因此，在必要资本数量方面对新企业的要求愈来愈高，这就使新企业难以出现。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这一点更重要），每个新企业要想同集中所造成的那些大型企业并驾齐驱，就必须生产大量的过剩产品，而这些产品只有在需求大大增加的时候才能有利地销售出去，否则这种产品过剩就会使价格跌到无论对新工厂或各垄断同盟都不利的程度。”英国和那些用保护关税促进卡特尔化的国家不同，在这里，企业家的垄断同盟，如卡特尔、托拉斯，多半是在百相竞争的主要企业的数目缩减到“一两打”的时候才产生的。“集中对产生大工业垄断组织的影响，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明显。”^①

在五十年前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自由竞争是一种“自然规律”。官方学者曾经企图用缄默这种阴谋手段来埋葬马克思的著作，因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作了理论上和历史上的分析，证明自由竞争引起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引起垄断。现在，垄断已经成了事实。经济学家们正在写大堆大堆的著作，叙述垄断的个别表现，同时却继续齐声宣告：“马克思主义被推翻了。”但是，英国俗话说得好，“事实是顽强的

① 海尔曼·列维《垄断组织——卡特尔和托拉斯》（Hermann Levy:《Monopole, Kartelle und Trusts》）1909年耶拿版第286、290、298页。

东西”，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得重视事实。事实证明：个别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别，例如实行保护关税政策还是自由贸易，只能在垄断组织的形式上或产生的时期上引起一些非本质的差别，而生产集中引起垄断，则是资本主义发展现阶段一般的和基本的规律。

对于欧洲，可以相当精确地确定新资本主义最终代替旧资本主义的时间，那是在二十世纪初。在最近出版的一本关于“垄断组织的形成”史的综合性著作中，我们看到有下面几段话：

“我们可以从 1860 年以前的时代里举出个别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例子；在这些例子里，可以发现现在极常见的那些形式的萌芽，但是这一切无疑还是卡特尔的史前时期。现代垄断组织的真正开始，最早也不过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事。垄断组织发展的第一个重要的时期，是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各国工业衰落的时候开始，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如果从欧洲范围来看，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是自由竞争发展的顶点。当时，英国已经建成了它的那种旧式资本主义组织。在德国，这种组织同手工业和家庭工业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开始建立自己生存的形式。”

“大转变开始于 1873 年的崩溃时期，确切些说，开始于崩溃后的萧条时期，这次萧条经历了欧洲经济史中的二十二年，只有在八十年代初稍有间断，在 1889 年左右发生过异常蓬勃然而为时甚短的高涨。”“在 1889 — 1890 年短促的高涨期间，人们大力组织卡特尔来利用行情。轻率的政策不断提高价格，比没有卡特尔时提高得更快更厉害，结果所有这些卡

特尔差不多全都不光荣地埋葬在‘破产的坟墓’里了。后来又过了五年业务不振和价格低落的时期，但是这时笼罩在工业界的已经不是从前那种情绪了。人们已经不把萧条看成是一件当然的事情，而认为它不过是有利的新行情到来之前的一种间歇。”

“于是卡特尔运动进到了第二个时期。卡特尔已经不是暂时的现象，而成了全部经济生活的一种基础。它占领了一个又一个的工业部门，而首先是占领原料加工部门。早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在组织焦炭辛迪加（后来的煤业辛迪加就是仿照它建立的）时，卡特尔就创造了以后再没有重大发展的组织卡特尔的技术。十九世纪末的蓬勃高涨和1900—1903年的危机，至少在采矿工业和炼铁工业方面，都是第一次完全在卡特尔的标志下发生的。当时人们还觉得这是一种新现象，而现在社会上则普遍认为，经济生活的重大方面通常不受自由竞争的支配，是一种不言而喻的事情了。”^①

总之，垄断组织的发展史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基本时期：(1)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是自由竞争发展达到顶点的最高阶段。垄断组织还只是一点不甚明显的萌芽。(2)1873年危机之后，卡特尔有过广泛的发展，但是卡特尔在当

① 泰·弗格尔施坦《资本主义工业的金融组织和垄断组织的形成》(Th. Vogelstein: 《Die finanzielle Organisation der kapitalistischen Industrie unl die Monopolbildungen》)，见《社会经济概论》(《Grundriß der Sozialökonomik》)1914年杜宾根版第6篇。参看同一作者所著《英美钢铁工业和纺织工业的组织形式》(《Organisationsformen der Eisenindustrie und Textilindustrie in England und Amerika》)1910年来比锡版第1卷。

时还是一种例外，还不稳固，还是一种暂时的现象。（3）十九世纪末的高涨和1900—1903年的危机，这时卡特尔成了全部经济生活的一种基础。资本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

卡特尔彼此商定销售条件和支付期限等等。它们彼此划分销售地区，规定产品数量，确定价格，在各个企业之间分配利润，等等。

德国的卡特尔，在1896年约有二百五十个，在1905年约有三百八十五个，参与的企业约有一万二千个^①。但是，大家都承认，这是缩小了的数字。从上面引用的1907年的德国工业统计材料可以看出：单是这一万二千个最大的企业，大概就集中了占总数一半以上的汽力和电力。北美合众国的托拉斯在1900年是一百八十五个，，在1907年是二百五十个。美国的统计把所有的工业企业分为三类：属于个人的，属于商号的，属于公司的。最后这一类，在1904年占企业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三点六，在1909年占百分之二十五点九，即四分之一以上。这些企业的工人，在1904年占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七十点六，在1909年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五点六，即占总数的四分之三，产值分别是一百零九亿美元和一百六十三亿美元，即占总产值的百分之七十三点七和百分之七十九。

一个工业部门的生产总量，往往有十分之七八集中在卡

① 里谢尔博士《德国大银行及其随德国整个经济发展而来的集中》
(Dr. Riesser; 《Die deutschen Großbanken und ihre Konzentration im Zusammenhang mit der Entwicklung der Gesamtwirtschaft in Deutschland》) 1912年第4版第149页
罗·利夫曼《卡特尔与托斯以及国民经济组织今后的发展》(R. Lief-mann; 《Kartelle und Trusts und die Weiterbildung der volkswirtschaftlichen Organisation》) 1910年第2版第25页。

特尔和托拉斯手中。莱茵一威斯特伐里亚煤业辛迪加在 1893 年成立时，已经集中了该区总采煤量的百分之八十六点七，而在 1910 年，则已经达到百分之九十五点四^①。这样造成的垄断，保证获得巨额的收入，并且形成规模极大的技术生产单位。美国著名的煤油托拉斯（美孚油公司），是 1900 年成立的。“它的资本是一亿五千万美元。当时发行了一亿美元的普通股票和一亿零六百万美元的优先股票。自 1900 年起至 1907 年止，优先股票每年获得的股息分别为：百分之四十八、百分之四十八、百分之四十五、百分之四十四、百分之三十六、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四十，共计三亿六千七百万美元。1882 年到 1907 年的纯利为八亿八千九百万美元，其中六亿零六百万付股息，其余的作为后备资本”^②

“钢业托拉斯（美国钢铁公司）所有企业的职工，在 1907 年不下二十一万零一百八十人。德国采矿工业中最大的企业，即格耳晋基尔恒矿业公司（Gelsenkirchener Bergwerks-gesellschaft）在 1908 年有四万六千零四十八个职工”^③。钢业托拉斯在 1902 年就生产了九百万吨钢^④。它的 钢产量在

① 弗里茨·克斯特涅尔博士《强迫加入组织。卡特尔与局外企业斗争形的研究》(Dr. Friz Kestner; 《Der Organisationszwang. Eine Untersuchung aber die Kampfe zwischen Kartellen und Aussenseitern》)1912 年柏林版第 11 页。

② 罗·利夫曼《参与和投资公司。对现代资本主义和有价证券业的研究》(R. Liefmann; 《Beteiligungs- und Finanzierungsgesellschaften. Eine Studie aber den modernen Kapitalismus und das ffektenwesen》)1909 年耶拿第 1 版第 212 页。

③ 同上，第 218 页。

④ 齐·契尔施基博士《卡特尔与托拉斯》(Dr. S. Tschierschky 《Kartell und Trust》)1903 年哥丁根版第 13 页。

1901 年占美国全部钢产量的百分之六十六点三，在 1908 年占百分之五十六点一^①。它的矿石开采量，在 1901 年占百分之四十三点九，在 1908 年占百分之四十六点三。

美国政府委员会关于托拉斯的报告中说：“它们比竞争者优越，是因为它们的企业规模大、技术装备优良。烟草托拉斯从创办的时候起，就竭力在各方面大量地采用机器来代替手工劳动。为此目的，它收买了与烟草加工多少有关的一切发明专利权，耗费了巨额的款项。有许多发明起初是不适用的，必须经过在托拉斯供职的工程师的改进。在 1906 年年底设立了两个分公司，专门收买发明专利权。为了同一目的，托拉斯又设立了自己的铸造厂、机器厂和修理厂。在勃鲁克林，每个这样的工厂平均有三百个工人，专门根据发明试制纸烟、小雪茄、鼻烟、包装用的锡纸和烟盒等等，并且就地改进各种发明。”^②“其他托拉斯也雇有所谓 developing engineers（改进技术的工程师），他们的任务就是发明新的生产方法，进行技术改良的试验。钢业托拉斯给那些在提高技术或减低费用方面有发明创造的工程师和工人以高额奖金。”^③

① 泰·非格尔施坦《组织形式》(Th. Vogelstein: «Organisationsformen»)第 275 页。

② 烟草工业联合委员会委员的报告(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 of Corporations on the Tobacco Industry)1909 年华盛顿版第 266 页——引自保尔·塔弗尔博士《北美托拉斯及其对技术进步的影响》(Dr. Paul Tafel; «Die nordamerikanischen Trusts und ihre Wirkungen auf den Fortschritt der Technik») 1913 年斯图加特版第 48 页。

③ 同上，第 49 页。

德国的大工业，例如近几十年来蓬勃发展的化学工业，也是这样组织技术改良工作的。到 1908 年，生产集中的过程已经在这个工业中造成了两个主要“集团”，它们按自己的方式同样走到垄断。起初，这两个集团是由两对各有资本二千至二千一百万马克的大工厂组成的“双边联盟”：一方面是美因河畔赫希斯特的前迈斯迪拿工厂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卡塞拉公司；另一方面是路易港的苯胺制碱厂和爱北斐特的前拜耳公司。后来，一个集团在 1905 年，另一个集团在 1908 年又各同另一个大工厂成立了协定。结果构成了两个“三边联盟”，各有资本四五千万马克，而且这两个“联盟”已经开始“接近”，订立价格“条约”等等^①。

竞争变为垄断。结果，生产的社会化有了巨大的进展特别是技术发明和改良的过程，也社会化了。

从前是各个业主自由竞争，他们是分散的，彼此毫不了解，他们进行生产都是为了在情况不明的市场上去销售，现在就完全不同了。集中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可以对本国的，甚至象下面所说的，对许多国家以至全世界所有的原料来源（例如铁矿产地）作出大致的估计。现在不但进行这样的估计，而且这些来源完全操纵在一些大垄断同盟的手里。这些同盟对市场的容量也进行大致的估计，并且根据协定来“瓜分”这些市场。垄断熟练的劳动力；雇用最好的工程师；霸占交通的路线和工具，如美国的铁路，欧美的轮船公

① 里谢尔所著前卡 3 版第 547 页及往下各页。据报纸报道（1916 年 6 月），不久前又成立了一个把德国整个化学工业联合起来的大型托拉斯。

司。资本主义进到帝国主义阶段，就使生产走到最全而的社会化，它不顾资本家的愿望与意识，可以说是把他们拖进一种从完全自由竞争过渡到完全社会化的新的社会制度。

生产社会化了，但是占有仍然是私人的。社会化了的生产资料仍旧是少数人的私有财产。表面上大家公认的自由竞争的一般架子依然存在，但是少数垄断者对其余居民的压迫更加百倍地沉重、显著和令人难以忍受了。

德国经济学家克斯特涅尔写了一本专论“卡特尔与局外企业的斗争”的著作，所谓“局外企业”，就是未加入卡特尔的企业。他这本著作叫做《强迫加入组织》，其实，如果不粉饰资本主义，就应当叫做强迫服从垄断者同盟。只要看看垄断者同盟在为了这种“组织”而进行现代的、最新的、文明的斗争时所采取的那些手段，也是有益处的。这些手段就是：(1) 剥夺原料(……“强迫加入卡特尔的最重要手段之一”); (2) 用“联盟”方法(即资本家和工会订立合同，使工会只接受卡特尔化企业的工作)剥夺劳动力；(3) 剥夺运输工具，(4) 剥夺销路，(5) 同买主订立合同，使他们只同卡特尔发生买卖关系；(6) 有计划地降低价格(为了使“局外企业”，即不服从垄断者的企业破产，耗费几百万金钱，以便在某一时期按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商品。在汽油工业中就有过这样的例子：价格从四十马克跌到二十二马克，差不多跌了一半！)，(7) 剥夺信贷，(8) 宣布抵制。

现在已经不是小企业同大企业、技术落后的企业同技术先进的企业进行竞争了。现在已经是垄断者扼杀那些不屈服于垄断组织、不屈服于垄断组织的压迫和摆布的企业了。下

面就是这种过程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意识中的反映。

克斯特涅尔写道：“甚至在纯粹经济的活动方面，也在发生某种转变，从先前那种商人活动转变为组织者、投机者的活动。能够获得最大成就的，不是最会根据自己技术和商业经验来判断购买者需要，寻找并且‘发现’潜在需求的商人，而是那些能够预先估计到，哪怕只是嗅到组织上的发展，嗅到某些企业与银行可能发生某种联系的投机天才？！』……”

译成普通人的语言，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即商品生产虽然依旧“占统治地位”，依旧被看做全部经济的基础，但是它实际上已经被破坏了，大部分利润都被那些干金融勾当的“天才”拿去了。这种金融勾当和欺骗行为的基础就是生产社会化，但是人类所达到的这种社会化的巨大进步，却造福于……投机者。下面我们会看到，那些对资本帝国主义作市侩式的反动批评的人，怎样“根据这一点”而梦想开倒车，恢复“自由的”、“和平的”、“诚实的”竞争。

克斯特涅尔说：“由于卡特尔的组成而使价格长期上涨的现象，至今还只出现在最重要的生产资料部门，特别是煤铁和钾等部门，而在成品方面则从来没有过。随之而来的收益的增加，同样也只限于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部门。对此还要作一点补充：原料加工（而不是半成品加工）工业，不仅因组成卡特尔而获得高额利润的好处，使那些进一步加工半成品的工业受到损失，而且它对这一工业还保持一定的统治关

系这是自由竞争时代所没有的。”^①

我们加上着重号的那几个字，说明了问题的实质，这个实质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很不愿意而且很少承认的，也是以卡·考茨基为首的现代的机会主义辩护者所竭力支吾搪塞、回避不谈的。统治关系和同它相联系的暴力，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的典型现象，正是万能的经济垄断组织的形成必然引起而且已经引起的结果。

我们再举一个说明卡特尔支配一切的例子。凡是可以把全部或主要的原料来源抓在手里的地方，卡特尔就特别容易产生，垄断组织就特别容易形成。但是，如果以为在无法霸占原料来源的其他工业部门中不会产生垄断组织，那就错了。水泥工业的原料是到处都有的。但是在德国，就连这个工业也高度卡特尔化了。水泥厂都按区域联合成辛迪加：如南德辛迪加，莱茵一威斯特伐里亚辛迪加等等。规定了垄断的价格：每一车厢水泥的售价是二百三十至二百八十马克，而成本却只有一百八十马克！企业付出百分之十二至百分之十六的股息，而且不要忘记，现代的投机“天才”除分得股息之外，还能使大量的利润滚进自己的腰包。为了消除如此盈利的工业部门中的竞争，垄断者甚至使用各种诡计：散布谣言，说工业的情形很坏，在报上登匿名广告说，“资本家们，小心点！别在水泥业上投资！”；最后就收买“局外企业”，（即没有参加辛迪加的企业），付给他们六万、八万以至十五万马克的“出让费”^②。垄断组织用尽一切办法，从偿

① 克斯特涅尔所著前书第 254 页。

② 路·厄什韦葛《水泥》（《Zement》 von L. Eschwege），见《银行》杂志⁸

81909 年第 1 期第 115 页及往下各页。

付一点“微的”出让费起，直到按美国方式“使用”炸药对付竞争者为止，在一切地方为自己开辟道路。

所谓用卡特尔消除危机，这是拚命替资本主义粉饰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谎话。相反，在几个工业部门中形成的垄断，使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所特有的混乱现象更加厉害，更加剧烈。作为一般资本主义特点的农业和工业的发展不相适应的现象，变得更加严重了。卡特尔化程度最高的所谓重工业，尤其是煤铁工业的特权地位，使其余工业部门“更加严重地缺乏计划性”，正如《德国大银行与工业的关系》这本好书的作者厄伊得尔斯所承认的那样^①。

资本主义的无耻的辩护者利夫曼说：“国民经济越发展，就越是求助于更带冒险性的企业或国外的企业，求助于需要长时间才能发展的企业，或者求助于那些只有地方意义的企业。”^② 冒险性的增大，归根到底是同资本的大量增加有关的，资本可以说是漫溢出来而流向国外，如此等等。同时，技术的加速发展，又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不相适应的因素、混乱和危机的因素日益增加。同一个利夫曼又不得不承认说：“大概在不久的将来，人类又会碰到技术方面的一些也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组织的大变革”……如电力、航空……“在发生这种根本性的经济变动的时候，通常而且照例会有

① 厄伊得尔斯《德国大银行与工业的关系，特别是与冶金工业的关系》(Jeidels; «Das Verhältnis der deutschen Großbanken zur Industrie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Eisenindustrie») 1905 年莱比锡版第 271 页。

② 利夫曼《参与和投资公司》第 434 页。

很厉害的投机事业发展起来……”^①

危机——有各种各样的危机，最常见的是经济危机，但不是只有经济危机——又大大加强了集中和垄断的趋势。我们知道，1900年的危机，是现代垄断组织史上的转折点。关于这次危机的意义，厄伊得尔斯有一段非常值得注意的论断：

“遭到1900年危机的，除了各主要工业部门的大型企业以外，还有许多在今天说来结构上已经过时了的所谓‘单纯’企业（即没有联合起来的企业），它们是在工业高涨时浮到浪头上来。价格的低落，需求的减少，使这些‘单纯’企业处于十分悲惨的境地，这是大的联合企业根本没有遇到过的，或者仅仅在极短的时期内碰到过。结果，1900年的危机所引起的工业集中，其度是1873年的危机远远比不上的。1873年的危机虽然也选留了一些较好的企业，但是这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并没有使胜利地渡过危机的企业获得垄断地位。长期地占据这种垄断地位的，是现在的钢铁工业和电力工业中的大型企业（因为它们的技术很复杂，组织分布很广，资本雄厚），而且垄断程度很高，其次是机器制造业、冶金工业的某些部门和交通等方面的企业，不过垄断程度较低。”^②

垄断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的最新成就。但是，如果我们不注意到银行的作用，那我们对于现代垄断的实际的力量和意义的认识，就会是极不完备，极不充分，和极其不足的。

① 利夫曼《参与和投资公司》第465—466页。

② 厄伊得尔斯所著前书第108页。

七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

现在我们应当作出一定的总结，把以上关于帝国主义所谈的话归纳起来。帝国主义是作为一般资本主义基本特性的发展和直接继续而成长起来的。但是，资本主义只有发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阶段，才变成了资本帝国主义，这时候，资本主义的某些基本特性开始变成自己的对立物，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那个过渡时期的特点，已经全面形成和暴露出来了。在经济方面，这一过程中的基本现象，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为资本主义的垄断所代替。自由竞争是资本主义和一般商品生产的基本特性；垄断是自由竞争的直接对立物，但是我们看到，自由竞争开始变成垄断，造成大生产，排挤小生产，又用最大的生产来代替大生产，使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以致产生了并且还在产生着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垄断组织，以及同这些垄断组织溶合起来的十来家支配着几十亿资金的银行的资本。同时，从自由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除竞争，而是凌驾于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垄断是从资本主义向更高级的制度的过渡。

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这样的定义包括了最

主要的内容，因为一方面，金融资本是与工业家垄断同盟的资本溶合起来的少数垄断性的最大银行的银行资本，另一方面，世界的分割，就是由无阻碍地向未被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强国占据的地区扩张的殖民政策，过渡到垄断地占有已经瓜分完了的世界领土的殖民政策。

过于简短的定义虽然很方便，因为它概括了主要的内容，但是要从定义中特别引伸出应该规定的那个现象的极重要的特点，那毕竟是不够的。因此，一方面不要忘记，所有的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的各方面联系，同时也应该给帝国主义下这样一个定义，其中要包括帝国主义的如下五个基本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溶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分割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

下面我们还会看到，如果不仅注意到基本的、纯粹经济的概念（上述定义就只包括这些概念），而且注意到现阶段的资本主义在一般资本主义中所占的历史地位，或者注意到帝国主义同工人运动中两个主要派别的关系，那就可以而且应当给帝国主义另外下一个定义。现在必须指出，帝国主义，

按上述意义来了解，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为了使读者对于帝国主义有一个尽量确切的概念，我们故意尽量多地引用了一些不得不承认最新资本主义经济中万分确凿的事实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发表的意见。为了同一目的，我们又引用了一些详细的统计材料，来说明银行资本等究竟发展到了怎样的程度，量转化为质，发达的资本主义转化为帝国主义，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不用说，自然界和社会里的一切界限当然都是有条件的、变动的，如果去争论帝国主义究竟在哪一年或哪一个十年“最终”确立，那是荒唐的。

但是，在帝国主义的定义问题上必须进行争论，首先是同所谓第二国际时代，即1889—1914年这二十五年间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卡·考茨基进行争论。在1915年，甚至早在1914年11月，考茨基就十分坚决地反对我们给帝国主义下的那个定义中的基本思想，他说不应当把帝国主义了解为一个经济“阶段”，而应当了解为一种政策，即金融资本“情愿采取”的一种政策；不应当把帝国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看做一个东西”，如果把帝国主义了解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现象”（卡特尔、保护关税政策、金融家的统治、殖民政策），那末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所必需的这个问题就成了“最平板无味的同义反复”，因为这样一来，“帝国主义就自然是资本主义的迫切需要”等等。为了最确切地表述考茨基的思想，我们引用他给帝国主义所下的定义，这个定义是直接反对我们所阐述的那些思想的实质的（因为考茨基早已知道多年来贯彻这些思想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阵营中所提出的反驳，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派别所提出的反驳）。

考茨基的定义说：

“帝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吞并或征服愈来愈多的农业（着重号是考茨基加的）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①

这个定义是根本要不得的，因为它片面地，也就是任意地单单强调了一个民族问题（虽然这个问题就其本身以及它对帝国主义的关系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任意地和错误地把这个问题单单同兼并其他民族的那些国家的工业资本联系起来，又同样任意地和错误地提出了对农业区域的兼并。

帝国主义就是力图兼并，——考茨基的定义的政治方面归结起来就是这样。这是对的，但是极不充分，因为在政治方面，帝国主义总是力图施用暴力和实行反动的。不过在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考茨基本人纳入他的定义中的经济方面。考茨基定义的错误是十分明显的。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在法国，恰好是金融资本特别迅速的发展（在工业资本削弱的情况下），从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使兼并政策（殖民政策）特别加紧地推行起来，这并不是偶然的。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只是力图兼并农业区域，甚至还力图兼并工业极发达的区域（德国对比利时的野心，法国对洛林的野心，因为第一、世界已经分割完了，在重新分割的时候，就不得不把手伸向任何一块土地；第

① 《新时代》杂志 1914 年（第 32 年卷）第 2 分卷（1914 年 9 月 11 日出版）第 909 页；参看同一杂志 1915 年第 2 分卷第 17 页及往下各页。

二，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即争夺领土，其目的不完全是直接为了自己，主要还是为了削弱敌方，摧毁敌方的霸权（对德国来说，比利时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反英据点；对英国来说，巴格达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反德据点，等等）。

考茨基特别引用、并且屡次引用英国人的言论，认为英国人所确定的帝国主义这个名词的纯粹政治上的意义，是同他考茨基的意思相同的。我们现在举出英国人霍布森来，看看他在 1902 年出版的《帝国主义》一书中是怎样写的：

“新帝国主义和老帝国主义不同的地方在于：第一、一个日益强盛的帝国的野心，已经为几个互相竞争的帝国的理论和实践所代替，其中每个帝国都同样渴望扩大政治势力和获得商业利益； 第二、金融利益或投资利益统治着商业利益。”^①

我们看到，考茨基说他引用一般英国人的言论，实际上是绝对错误的（除非他引用的是那些庸俗的英国帝国主义者或帝国主义公开辩护士的言论）。我们看到，考茨基自以为在继续维护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比社会自由主义者霍布森还退后了一步，因为霍布森还比较正确地估计到现代帝国主义的两个“具体历史”（考茨基的定义恰好是对具体历史的弄！）特点：（1）几个帝国主义的竞争；（2）金融家控制着商人。如果主要是说工业国兼并农业国，那就把商人抬上首要地位了。

考茨基的定义不仅是错误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而且还

① 霍布森《帝国主义》1902 年伦敦版第 324 页。

成了全面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实践的那一整套观点的基础；这一点以后还要讲到。考茨基挑起的那种字面上的争论，即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应该叫作帝国主义还是叫作金融资本的阶段，是毫无意义的争论。随便你怎样叫都是一样。关键在于考茨基把帝国主义的政策同它的经济割裂开了，把兼并解释为金融资本“情愿采取”的政策，并且拿同一金融资本基础上的另一种似乎可能有的资产阶级政策和它对立。照这样说来，经济上的垄断是可以同政治上的非垄断、非暴力、非掠夺的行动方式相容的。照这样说来，世界领土的分割（这种分割恰巧在金融资本时代进行完毕并成了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在互相竞争的特殊形式的基础）也是可以同非帝国主义的政策相容的。这样一来，就不是暴露资本主义最新阶段最根本的矛盾的深刻性，而是掩饰、缓和这些矛盾；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考茨基同德国的一个帝国主义和兼并政策的辩护士库诺夫争论过。库诺夫又笨拙又无耻地推论说：帝国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和进步的，所以帝国主义也是进步的，所以必须跪在帝国主义面前歌功颂德！这种话就象民粹派在 1894 — 1895 年挪威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所说的那些话，说什么如果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不可避免的和进步的，那末他们就应该开起酒店来培植资本主义。考茨基反驳库诺夫说：不对，帝国主义并不是现代资本主义，而只是现代资本主义政策的形式之一，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同这种政策作斗争，同帝国主义，同兼并等等作斗争。

这种反驳好象很有道理，实际上却等于更巧妙更隐蔽地（因此是更危险地）宣传同帝国主义调和，因为同托拉斯和银行的政策“作斗争”而不触动托拉斯和银行的经济基础，那就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不过是一种善良而天真的愿望而已。不是暴露极深刻的矛盾，而是回避现有的矛盾，忘掉其中最重要的矛盾，一一这就是考茨基的理论，它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显然，这种“理论”只能用来替那种主张同库诺夫保持统一的思想进行辩护！

考茨基写道：“从纯粹经济的观点看来，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再经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把卡特尔政策应用到对外政策上的超帝国主义的阶段”^①，全世界各帝国主义彼此联合而不是互相斗争的阶段，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停止战争的阶段，“由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的阶段^②。

关于这个“超帝国主义论”我们以后还要谈到，以便详细地说明这个理论背离马克思主义究竟到了怎样彻底而无可挽回的地步。现在我们要按照本书的总的计划来看一看有关这个问题的确切的经济材料。“从纯粹经济的观点看来”，这个“超帝国主义”究竟是可能实现的呢，还是超等废话？

如果把纯粹经济的观点看作“纯粹的”抽象概念，那末唯一可能得出的结论是：发展的趋势是走向垄断组织，因而也就是走向一个全世界的垄断组织，走向一个全世界的托拉

① 《新时代》杂志 1914 年(第 32 年卷)第 2 分卷(1914 年 9 月 11 日出版)
第 921 页；参看同一杂志 1915 年第 2 分第 107 页及往下各页。

② 《新时代》杂志 1915 年第 2 分卷(1915 年 4 月 30 日出版)第 144 页。

斯。这是不容争辩的，不过也是毫无内容的，就好象说：“发展的趋势”是走向在实验室里生产食物。在这一点上说来，超帝国主义“论”和“超农业论”同样都是胡说。

如果谈金融资本时代的“纯粹经济”条件，是指二十世纪初的具体历史时代，那末对于“超帝国主义”这种僵死的抽象概念（这种概念只有一个最反动的目的，就是使人不去注意现有矛盾的深刻性的最好回答，就是拿现代世界经济的具体经济现实同它加以对比。考茨基关于超帝国主义的毫无内容的议论还鼓舞了那种十分错误的、助长帝国主义辩护士声势的思想，似乎金融资本的统治是在削弱世界经济内部的不平衡和矛盾，其实金融资本的统治是在加剧这种不平衡和矛盾。

理·卡尔韦尔在他写的《世界经济入门》^①这本小册子里，曾经把可以具体说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世界经济内部相互关系的最重要的纯粹经济的材料作了综合。他把整个世界分为五个“主要经济区域”：（1）中欧区（俄国和英国以外的整个欧洲）；（2）不列颠区；（3）俄国区；（4）东亚区；（5）美洲区。同时他把殖民地列入所属国的“区域”内，而把少数没有按上述区域划分的国家，例如亚洲的波斯、阿富汗和阿拉伯，非洲的摩洛哥和阿比西尼亚等等，“搁在一边”。

现在把他所列出的这些区域的经济材料摘录如下：

① 理·卡尔韦尔《世界经济入门》(R. Caiwer: 《Einführung in die Weltwirtschaft》)1906 年柏林版。

世界主要 经济区域	面 积	人 口	交通 通 业		贸 易		工 业	
			铁 路	商 船	(进 出 口 共 计)	产 量		
	(单位百 万平方公 里)	(单位百 万 人)	(单位千 公 里)	(单位百 万 吨)	(单位十 亿 马 克)	(单位百 万 吨)	(单位百 万)	
煤 炭 生 铁								
(1) 中欧区	27.6 (23.6)①	388 (146)	204	8	41	251	15	26
(2) 不列 颠区	28.9 (28.6)②	398 (355)	140	11	25	249	9	51
(3) 俄 国 区	22	131	63	1	3	16	3	7
(4) 东 亚 区	12	389	8	1	2	8	0.22	2
(5) 美 洲 区	30	148	379	6	14	245	14	19

我们看到有三个区域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交通运输业、贸易和工业都十分发达)的区域，即中欧区、不列颠区和美洲区。其中德、英、美三国是统治着世界的国家。它们相互间的帝国主义竞争和斗争是非常尖锐的，因为德国的地区很小，殖民地又少，而“中欧区”的形成还有待于将来，现时它正在殊死的斗争中逐渐产生。目前整个欧洲的特征是政治上四分五裂。相反，在不列颠区和美洲区，政治上却高度集中，但是它们又有极大的差别：前者有广大的殖民地，后者的殖民地却十分少。在殖民地，资本主义刚刚开始发展。争夺南美的斗争愈来愈尖锐。

有两个区域是资本主义不够发达的区域，即俄 国 区 和 东 亚 区。前者人口密度极小，后者极大；前者政治上很集中，后者不集中。瓜分中国才刚刚开始，日美等国争夺中国的斗争

①② 括弧里是殖民地的面积和人口。

愈来愈激烈。

请把考茨基关于“和平的”超帝国主义那种愚蠢可笑的胡说，拿来同经济政治条件极不相同、各国发展速度等等极不一致、各帝国主义国家间存在着疯狂斗争的实际情形比较一下吧。难道这不是吓坏了的市侩想逃避可怕的现实的反动企图吗？难道被考茨基当做“超帝国主义”的胚胎的国际卡特尔（正象“可以”把实验室里的药片生产说成是超农业的胚胎一样），不就是向我们表明分割世界和重新分割世界、由和平分割转为非和平分割、再由非和平分割转为和平分割的一个例子吗？难道从前同德国一起（例如在国际钢轨辛迪加或国际商轮航运业托拉斯里）和平地分割过整个世界的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金融资本，现在不是在改变着的（通过完全非和平方式改变着的）新的实力对比的基础上，重新分割世界吗？

金融资本和托拉斯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世界经济各个部分在发展速度上的差异。既然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那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用实力来解决矛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在铁路的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到说明整个世界经济中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发展速度不同的非常准确的材料^①。在帝国主义发展的最近几十年中，铁路长度变更的情形如下：

① 1915 年《德意志帝国统计年鉴》(《Stat. Jahrbuch für das deutsche Reich》)；1892 年《铁路业文汇》(《Archiv für Eisenbahn-wesen》)；至于 1890 年各国殖民地间铁路分布方面的某些详细情形只能作一个大致的估计。

铁路长度(单位千公里)			
	1890 年	1913 年	增加数
欧洲.....	224	346	+122
美国.....	268	411	+143
所有殖民地.....	82	210	+128
亚美两洲的独立国 和半独立国.....	43	125 } 137 } 347	+94 } +222
共 计.....	617	1104	

可见，铁路发展得最快的是亚洲和美洲的殖民地和独立国（以及半独立国）。大家知道，这里是由四五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资本统治着一切，支配着一切。在亚洲和美洲殖民地及其他国家建筑二十万公里的新铁路，就等于在特别有利的条件下，在收入有特别的保证、铸钢厂可以获得厚利定货等等的条件下，新投入四百多亿马克的资本。

资本主义在殖民地和海外国家发展得最快。在这些国家中出现了新起的帝国主义强国（如日本）。全世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尖锐起来了。金融资本从特别盈利的殖民地企业和海外企业得到的贡款日益增加。在瓜分这种“赃物”的时候，有极大一部分落到了那些在生产力发展的速度上并不是常常占第一位的国家手里。各大强国及其殖民地的铁路总长度如下：

(单位千公里)

	1890 年	1913 年	增加数
美国.....	268	413	+145
不列颠帝国.....	107	208	+101
俄国.....	32	78	+46
德国.....	43	68	+25
法国.....	41	63	+22
五个强国共计.....	491	830	+339

可见，将近百分之八十的铁路集中在五个最大的强国手中。但是这些铁路的所有权的集中程度，金融资本的集中程度，要大得不可比拟，因为有这样的情形，例如美、俄及其他国家铁路的大量股票和债券都属于英法两国的百万富翁。英国靠自己的殖民地，把“自己的”铁路网增加了十万公里，比德国增加的多三倍。但是，谁都知道，这一时期德国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煤炭和钢铁生产的发展，比英国快得无比，更不必说比法国和俄国了。1892年，德国的生铁产量为四百九十万吨，英国为六百八十万吨，但是到1912年，已经是一千七百六十万吨比九百万吨，也就是说，德国远远地超过英国了^①！试问，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分割这两者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呢？

八 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

现在我们还要来研究一下帝国主义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大多数关于帝国主义的言论，对这个方面多半都是估计不足的。马克思主义者希法亭的缺点之一，就是他在这一

① 再参看埃德加·克勒芒德《不列颠帝国同德意志帝国的经济关系》(Edgar Crammond.《The Economic Relations of the British and German Empires》)，该文载于《皇家统计学会杂志》1914年7月，第777页及往下各页。

点上比非马克思主义者霍布森还倒退了一步。我们说的就是帝国主义所特有的寄生性。

我们已经看到，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这是资本主义的垄断，也就是说，这种垄断是从资本主义成长起来并且处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竞争的一般环境里，同时又经常同这种一般环境发生无法解决的矛盾。但是，这种垄断也同任何垄断一样，必然要引起停滞和腐朽的趋向。既然规定了（虽然是暂时地）垄断价格，那末技术进步、因而也是其他一切进步的动因，前进的动因，也就在相当程度上消失了，其次在经济上也就有可能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例如美国有个欧文斯，发明了一种能引起制瓶业革命的制瓶机。德国制瓶工厂主的卡特尔收买了欧文斯的发明专利权，可是却把这个发明搁起来迟迟不用。当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垄断决不能全面地、长久地排除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这也是超帝国主义论荒谬的原因之一）。当然，用改良技术的办法可能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利润，这种可能性是促进着各种变更的。但是垄断所特有的停滞和腐朽的趋势还继续在发生作用，而且在一定的时期还会在个别工业部门、个别国家占上风。

垄断地占有特别广大、特别富饶或地理位置方便的殖民地的事实，也在发生同样的作用。义

其次，帝国主义就是货币资本大量积聚于少数国家；我们看到，这种资本是数目达到一千亿至一千五百亿法郎的有价证券。于是，以“剪息票”为生、根本不做任何事情、终日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级，确切些说，食利者阶层，就大大地增长起来。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之一——资本输出，

更加使食利者阶层完完全全脱离了生产，给那种靠剥削几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的国家打上了寄生的烙印。

霍布森写道：“在 1893 年，不列颠在国外的投资，约占联合王国财富总数的百分之十五。”^① 我们要指出，到 1915 年，这种资本大约又增加了一倍半。霍布森又说：“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对于纳税人来说是沉重的负担，对于工商业者来说意义很小……然而对于寻找投资场所的资本家（在英语里，这个概念是用《investor》一词来表示的，意即“投资者”，食利者），却是大量利润的来源。”“据统计学家吉芬计算，1899 年大不列颠从全部对外贸易和殖民地贸易（包括输入和输出）所得到的全部年收入是一千八百万英镑（约合一亿七千万卢布），这是按贸易总额八亿英镑的百分之二点五计算出来的。”不管这个数目多么大，它仍然不能说明侵略性的大不列颠帝国主义。能够说明的是九千万至一亿英镑的“投”资的收入，也就是食利者阶层的收入。

在世界上“商业”最发达的国家，食利者的收入竟比对外贸易的收入高四倍！这就是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寄生性的实质。

因此，“食利国”（Rentnerstaat）或高利贷国这一概念，就成了论述帝国主义的经济著作中通用的概念。世界分为极少数高利贷国和绝大多数债务国。舒尔采-格弗尼茨写道：“在国外投资中占第一位的，是对政治上依赖的国家或结盟国家的投资：英国贷款给埃及、日本、中国和南美。在必要时，英国的海军就充当法警。英国的政治力量保护着英国，

① 霍布森所著前书第 59 页和第 60 页。

防止债务人造反。”^①萨尔托里乌斯·冯·瓦耳特斯豪森在他所著的《国外投资的国民经济制度》一书中，把荷兰当做“食利国”的标本，并且说现在的英国和法国也成了这样的国家^②。施尔德尔认为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和瑞士这五个工业国家，是“名副其实的债权国”。他没有把荷兰算进去，只是因为荷兰“工业不大发达”^③。而美国仅仅是美洲的债权人。

舒尔采-格弗尼茨写道：“英国逐渐由工业国变成债权国。虽然工业生产和工业品出口有了绝对的增加，但是，利息、股息和发行证券、担任中介、进行投机等方面的收入，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相对意义愈来愈大了。依我看来，这个事实正是帝国主义高涨的经济基础。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关系，要比卖主和买主之间的关系更巩固些。”^④关于德国的情形，柏林的《银行》杂志出版人阿·兰斯堡 1911 年在他的《德国是食利国》一文中写了如下一段话：“德国人喜欢讥笑法国显露出来的那种变为食利者的倾向。但是他们忘记了，既然说到资产阶级，那末德国的情形同法国是愈来愈相象了。”^⑤

食利国是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情况不能不影响到这种国家的一切社会政治条件，尤其是影响到工人运

① 舒尔采-格弗尼茨《不列颠帝国主义》第 320 等页。

② 萨·冯·瓦耳特斯豪森 《国外投资的国民经济制度》1907 年柏林版第 4 册。

③ 施尔德尔所著前书第 393 页。

④ 舒尔采-格弗尼茨《不列颠帝国主义》第 122 页。

⑤ 《银行》杂志 1911 年第 1 期第 10-11 页。

动中的两个基本派别。为了尽量把这一点说清楚，我们且引用霍布森的话。他是一个最“可靠的”证人，因为谁也不会疑心他偏袒“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思想”，同时他又是个英国人，很了解这个殖民地最广大、金融资本最雄厚、帝国主义经验最丰富的国家的情况。

霍布森在英布战争记忆犹新的时候，描述了帝国主义同“金融家”利益的联系，以及“金融家”从承包业务和供应商品等获得的利润增加的情形，他说：“指挥这一明显的寄生性政策的是资本家；但是同一动机也影响到了工人中间的特殊阶层。在很多城市中，最重要的工业部门都要依靠政府的定货，冶金工业和造船工业中心的帝国主义，在不小的程度上依赖于这种情况。”这位作者认为，有两种情况削弱了老牌帝国的力量：（1）“经济寄生性”；（2）用附属国的人民编成军队。“第一种情况是经济寄生习气，这种习气使得统治国利用占领地、殖民地和附属国来达到本国统治阶级发财致富的目的，来收买本国下层阶级，使他们安分守己。”我们要补充一句：为了在经济上有可能进行这样的收买，不管收买的形式如何，都必须有垄断高额利润。

人关于第二种情况，霍布森写道：“帝国主义盲目症的最奇怪的症候之一，就是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走上这条道路时所抱的那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在这方面最严重的是英国。我们征服印度帝国的大部分战役都是我们用土著人编成的军队进行的；在印度和近来在埃及的大量常备军都是由英国人担任指挥的；我们征服非洲的各次战争，除了征服南非的以外，几乎都是由土著人替我们进行的。”

分割中国的前景，使霍布森作出了这样一种经济上的估计：“到那时，西欧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和性质，都会象现在有些国家的部分地区，如英国南部、里符耶腊以及意大利和瑞士那些游人最盛、富人最多的地方一样，产生出极少数从远东取得股息和年金的富豪贵族，连同一批人数稍多的职员和商人，为数更多的家仆以及在运输业和成品精制工业中工作的工人。主要的工业部门就会消失，而大批的食品和半成品会象贡品那样由亚非两洲源源而来。”“西方国家更广泛的同盟，即欧洲大国联邦所能开辟的前途就是，这个联邦不仅不会推进全世界的文明事业，反而有造成西方寄生性的巨大危险：产生出一批先进的工业国家，这些国家的上层阶级从亚非两洲获得巨额的贡款，并且利用这种贡款来豢养大批驯服的职员和仆役，这些职员和仆役不再从事大宗的农产品和工业品的生产，而是替个人服务，或者在新的金融贵族监督下从事次要的工业劳动。让那些漠视这种理论（应该说：前途）、认为这个理论不值得研究的人，去思考一下已经处于这种状态的现代英国南部各区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吧。让他们想一想，一旦中国屈服于这种金融家、‘投资者’及其政治方面和工商业方面的职员的经济控制，使他们能从这个世界上所仅有的最大的富源汲取利润，并且用之于欧洲，这种制度将会扩展到怎样巨大的程度。当然，情况是极为复杂的，世界上各种力量的变动也很难预料，所以不能预先肯定只有这一种前途或其他任何一种前途。但是，现在支配着西欧帝国主义的那些势力，确实是向着这一个方向发展的。如果这些势力不会遇到什么抵抗，不会被引上另一个方向，那末这些

势力就会正是朝着完成这一过程的方向努力。”^①

作者说得完全对：如果帝国主义的力量不会遇到抵抗，它就正会走向这种结局。这里对于“欧洲联邦”在现代帝国主义情况下的意义，作了正确的估计。要补充的只有一点，就是在工人运动内部，目前在大多数国家暂时获得胜利的机会主义者，也是经常地一贯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帝国主义意味着分割世界而不只是剥削中国一个国家，意味着极少数最富的国家享有垄断高额利润，所以，它们在经济上就有可能去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从而培植、形成和巩固机会主义。不过不要把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机会主义的那些力量忘掉，这些力量，社会自由主义者霍布森自然是看不到的。

德国机会主义者格尔哈特·希尔德布兰德过去因为拥护帝国主义而被开除出党，现在满可以充当德国所谓“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他给霍布森作了一个很好的补充，宣传组织“西欧联邦”（俄国除外），以便“共同”行动……反对非洲黑人、反对“大伊斯兰教运动”，以便维持“强大的陆海军”对付“中日联盟”^②等等。

舒尔采-格弗尼茨对“不列颠帝国主义”的描绘，向我们表明了同样的寄生性的特征。从1865—1898年英国的国民收入大约增加了一倍，而这一时期“来自国外”的收入却增加

① 霍布森所著前书第103、205、144、335、386等页。

② 格尔哈特·希尔德布兰德《工业统治地位和工业社会主义的动摇》(Gerhard Hildebrand; 《Die Erschütterung der Industrieherrschaft und des Industriesozialismus》) 1910年版第229页及往下各页。

了八倍。如果说帝国主义的“功劳”是“教育黑人去劳动”(不用强制手段是不行的……)，那末帝国主义的“危险”就在于，“欧洲将把体力劳动，起初把农业劳动和矿业劳动，然后把比较重的工业劳动，推给黑人去干，自己则安心地过食利者的生活，也许这样就为红种人和黑人的经济解放以及后来的政治解放做好了准备”。

在英国，愈来愈多的土地不再用于农业生产，而成了专供富人运动作乐的场所。人们谈到苏格兰这个最贵族化的、专门用来打猎和作其他运动的地方时，都说“它是专靠遗产和卡内基先生《美国亿万富翁》生活的”英国每年单是花在赛马和猎狐上面的费用，就有一千四百万英镑（约合一亿三千万卢布）。英国食利者的人数约有一百万。从事生产的人口的百分比日益下降：

英国人口 的工人人数 (单位百万)	主要工业部门 中所占的百分比
1851 年……… 17.9	4.1 23%
1901 年……… 32.5	4.9 15%

研究“二十世纪初的不列颠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学者谈到英国工人阶级的时候，不得不经常把工人“上层”和“真正的无产阶级下层”加以区别。上层中间有大批人参加合作社、工会、体育团体和许多教派。选举法是同这个阶层的地位相适应的，而这种选举法在英国“还有相当多的限制，以排除真正的无产阶级下层”!!为了粉饰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人们通常只讲到在无产阶级中占少数的这个上层，例如说：

“失业问题主要是伦敦的问题和无产阶级下层的问题，这个下层是政治家们很少重视的”……^①应该说是资产阶级政客和“社会党人”机会主义者们很少重视的。

从帝国主义国家移往国外的人口逐渐减少，从比较落后的、工资比较低的国家移入帝国主义国家的人口（流入的工人和移民）却逐渐增加，这也是与上述种种现象有关的帝国主义特点之一。据霍布森说，英国移往国外的人口从 1884 年起开始减少：1884 年有二十四万二千人，而 1900 年只有十六万九千人。德国移往国外的人口，在 1881—1890 年的十年中达到了最高峰，有一百四十五万三千人，但是在后来的两个十年里，又减少到五十四万四千人和三十四万一千人。同时，从奥、意、俄等国移入德国的工人却增加了。根据 1907 年的人口调查，德国有一百三十四万二千二百九十四个外国人，其中产业工人有四十四万零八百人，农业工人有二十五万七千三百二十九人^②。法国的采矿工业工人“很大一部分”是外国人：波兰人、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③。在美国，从东欧和南欧移入的侨民做工资最低的工作，在升为监工和做工资最高的工作的工人中，美国工人所占的百分比最大^④。帝

① 舒尔采-格弗尼茨《不列颠帝国主义》第 301 页。

② 《德意志帝国统计》(《Statistik des Deutschen Reichs》) 第 211 卷。

③ 亨盖尔《法国的投资》Henger:《Die Kapitalsanlage der Franzosen》) 1913 年斯图加特版。

④ 古尔维奇《移民与劳动》(Hourvich;《Immigration and Labour》) 1913 年纽约版。

国主义有一种趋势，就是在工人中间也造成一些特权阶层，并且使他们脱离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

必须指出：在英国，帝国主义分裂工人、加强工人中间的机会主义、使工人运动暂时腐朽的这种趋势，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以前很久，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因为英国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就具备了帝国主义的两大特点：拥有大量的殖民地领土；在世界市场上占垄断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在几十年中不断地注意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和英国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特点之间的联系。例如，恩格斯在 1858 年 10 月 7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⁹将近二十五年以后，恩格斯又在 1881 年 8 月 11 日写的信里说到了“被资产阶级收买了的，或至少是领取资产阶级报酬的人所领导的最坏的英国工联”¹⁰。恩格斯在 1882 年 9 月 12 日给考茨基的信中又说：“您问我：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这和他们对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样。这里没有工人政党，有的只是保守党人和自由激进党人，而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们共享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¹¹ ①(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Briefwechsel von Marx und Engels》)第 2 卷第 290 页；第 4 卷第 453 页。考基《社会主义与殖民政策》(K. Kautsky:《Sozialismus und Kolonialpolitik》)1907 年柏林版第 79 页；这本小册子是考茨基在很早很早以前，当他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写的。

格斯在 1892 年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第二版所写的序言中，也叙述了同样的看法。）

这里已经把原因和后果明白地指出来了。原因是：（1）这个国家剥削全世界，（2）它在世界市场上占有垄断地位；（3）它拥有殖民地垄断权。后果是：（1）英国一部分无产阶级已经资产阶级化了；（2）英国一部分无产阶级甘愿受那些被资产阶级收买或至少是领取资产阶级报酬的人领导。在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已经结束了极少数国家对世界的分割，其中每个国家现在都剥削着（指吸取超额利润“全世界”的一部分，而所剥削的每一部分都要比英国在 1858 年剥削的小一点；每一个国家都由于托拉斯、卡特尔、金融资本以及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关系等等而在世界市场上占有垄断地位；每个国家都在相当程度上拥有殖民地垄断权（我们已经看到，世界上七千五百万平方公里的全部殖民地中，有六千五百万平方公里，即百分之八十六集中在六个强国手里，有六千一百万平方公里，即百分之八十一，集中在三个强国手里）。

现在局势的特点就在于以下这些经济政治条件：帝国主义已经从萌芽状态成长为统治的体系，资本家的垄断组织在国民经济和政治中居于首要地位，世界已经分割完毕；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现在已经不是英国独占垄断权，而是少数帝国主义强国在争夺垄断权，这是整个二十世纪初期的特点。所有这些经济政治条件，不能不使机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的共同的、根本的利益更加不可调和起来。现在，机会主义已经不能象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英国那样，在某一国家的工人运动里，在几十年的长时期内取得完全的胜利了，但是它在许多

国家里已经完全成熟，已经成熟过度，已经腐烂，并且作为社会沙文主义而同资产阶级的政策完全溶合起来了。^①

九 对帝国主义的批评

这里所说的对帝国主义的批评是指广义的批评，是指社会各阶级根据自己的一般意识形态对帝国主义政策所采取的态度。

一方面，巨量的金融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造成非常广泛而稠密的关系和联系网，这个密网不仅控制了大批中小资本家和业主，而且控制了最小的资本家和业主；另一方面，一个国家的金融家集团同其他国家的金融家集团，为分割世界和统治其他国家而进行着尖锐的斗争，一结果，就使所有的有产阶级全都转到帝国主义方面去了。“普遍”迷恋于帝国主义的前途，疯狂地捍卫帝国主义，尽量地美化帝国主义，一这就是当代的标志。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渗透到工人阶级里面去了。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如果说现在德国所谓“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被人们公正地称为“社会帝国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帝国主义者，那末霍布森早在 1902 年，就已经指出英国存在着属于机会主义“费边社”¹³ 的“费边帝国主义者”了。

① 波特列索夫先生之流、契恒凯里先生之流、马斯洛夫先生之流等等所代表的俄国社会沙文主义，无论是它的公开形式，或是它的隐蔽形式（如齐赫泽、斯柯别列夫、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等先生），都是从机会主义的俄国变种即从取消主义¹² 生长起来的。

资产阶级的学者和政论家，通常都是用比较隐蔽的方式替帝国主义辩护，掩盖帝国主义的完全统治和帝国主义的深厚根源，竭力把局部的东西和次要的细节放在主要的地位，拚命用一些毫无意义的“改良”计划，例如由警察监督托拉斯或银行等等，来转移人们对重要问题的注意。至于那些无耻的、露骨的帝国主义者，即敢于承认改良帝国主义的基本特性是一种荒谬想法的帝国主义者，是很少发表意见的。

举个例子来说吧。德国帝国主义者在《世界经济文汇》这一出版物中，力图考察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当然特别是那些非德属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们指出印度的风潮和抗议运动，纳塔尔（南非）的运动，荷属印度的运动等等。其中有一个人在评论用英文出版的、有关亚、非、欧三洲受外国统治的各民族代表于1910年6月28—30日举行的从属民族和种族代表会议的报告时，对会议上的演说作了这样的评价，他说：“据称，必须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统治国应当承认从属民族的独立权，国际法庭应当监督强国同弱小民族订立的条约的履行。除了表示这些天真的愿望以外，代表会议并没有继续前进。我看不出他们对下面这个真理有丝毫的了解：帝国主义同目前形式的资本主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同帝国主义作直接的斗争是没有希望的，除非仅限于反对个别特别可恶的过火现象。”^①因为用改良主义的方法修改帝国主义的基础不过是一种欺骗，是一种“天真的愿望”因为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代表没有“继续”前进，所以压

① 《世界经济文汇》第2卷第193页。

迫民族的资产阶级代表就“继续”后退了，后退到在所谓“科学性”的掩盖下向帝国主义卑躬屈膝的地步。这也是一种“逻辑”！

能不能用改良主义的方法来改变帝国主义的基础呢？是前进，使帝国主义所产生的种种矛盾更加尖锐、更加剧烈呢，还是后退，去缓和这些矛盾呢，一一这些问题是对帝国主义的批评中的根本问题。由于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特点是全面的反动，是金融寡头的压迫和自由竞争的消除而引起的民族压迫的加强，所以在二十世纪初期，几乎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中都出现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反对派。考茨基以及考茨基主义这一广泛的国际思潮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就在于考茨基不仅没有设法、没有能够使自己同这个经济上根本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对派对立起来，反而在实践上和它同流合污。

1898年对西班牙的帝国主义战争，在美国引起了“反帝国主义者”，即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最后一批莫希干人¹⁴的反对。他们把这次战争叫做“罪恶的”战争，认为兼并别国土地是违背宪法的，认为对菲律宾土著人领袖阿吉纳尔多的行为是“沙文主义者的欺骗”（先答应阿吉纳尔多给菲律宾以自由，后来又派美国军队登陆，兼并了菲律宾），并且引用了林肯的话：“白人自己管理自己是自治，白人自己管理自己同时又管理别人，就不是自治而是专制。”^①但是，既然这全部批评都不敢承认帝国主义同托拉斯、也就是同资本主义的基础，

① 约·帕士叶《美国帝国主义》（ J.Patouillet; 《L'impérialisme américain》）1904年第戎版第 272 页。

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不敢表示赞同大资本主义及其发展所造成的力量，那末这种批评就仍然是一种“天真的愿望”。

霍布森批评帝国主义的时候所采取的基本立场，也是如此。霍布森否认“帝国主义的不可避免性”和主张必须“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比考茨基还要早。用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批评帝国主义，批评银行支配一切，批评金融寡头等等的，还有我们屡次引用过的阿加德、阿·兰斯堡、路·厄什韦葛，也有法国作家维克多·别拉尔，他是1900年出版的那本肤浅的《英国与帝国主义》一书的作者。所有这些人丝毫没有冒充马克思主义的企图，他们用自由竞争和民主同帝国主义相对立，谴责势必引起冲突和战争的关于巴格达铁路的计谋，表示了维护和平的“天真的愿望”等等。最后还有研究国际证券发行情况的统计学家阿·奈马尔克，他在1912年计算到“国际”有价证券达几千亿法郎时，甚至叫了起来“难道可以设想和平会受到破坏吗？……有了这样大的数字，还会去冒险挑起战争吗？”^①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这样天真，倒没有什么奇怪，而且他们做出这样一副天真的样子，“煞有介事地”谈论帝国主义制度下的和平，对他们反而是有利的。可是考茨基在1914年、1915年、1916年也采取了这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硬说在和平问题上，“大家（帝国主义者、假社会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意见都是一致的”，试问他还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吗？这不是分析和揭露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性，而是

① 《国际统计研究所公报》第19卷第2册第225页。

用改良主义的“天真的愿望”来推开这些矛盾，回避这些矛盾。

下面是考茨基从经济上对帝国主义进行批评的典型例子。他举出 1872 年和 1912 年英国对埃及进出口的统计材料，发现这方面进出口的数量比英国进出口总额增加得慢。于是考茨基得出结论说：“我们没有任何根据认为，不用武力占领埃及而依靠单纯的经济因素的作用，英埃贸易就会增长得慢些。”“资本扩张的愿望”，“最好能不通过帝国主义的暴力方法，而通过和平的民主来实现”。

考茨基的这个论断，被他的俄国跟班（也是社会沙文主义者的俄国掩护人）斯彼克塔托尔¹⁵先生用各种各样的调子重弹过。这个论断是考茨基主义对帝国主义的批评的基础，所以我们必须较详细地谈一谈。我们从引证希法亭的言论开始。因为考茨基曾经多次（包括 1915 年 4 月那次在内）认为，希法亭的结论是“所有社会党理论家一致同意的”。

希法亭写道：“无产阶级要做的事情，不是用已经成为过去的、自由贸易时代的政策和仇视国家的政策同更进步的资本主义政策相对立。无产阶级对金融资本的经济政策的答复、对帝国主义的答复，不可能是贸易自由，而只能是社会主义。现在无产阶级政策的目的不可能是象恢复自由竞争这样的理想（这种理想现在已经变成反动的理想了），而只能是通过消

① 考茨基《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Kautsky:《Nationalstaat, imperialistischer Staat und Staatenbund》) 1915 年纽伦堡版第 72 页和第 70 页。

除资本主义来彻底消灭竞争。”^①

考茨基在金融资本时代维护“反动的理想”维护“和平的民主”和“单纯的经济因素的作用”，从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因为这个理想在客观上是开倒车，是从垄断资本主义倒退到非垄断资本主义，是一种改良主义的骗局。

如果不用武力占领，如果没有帝国主义，没有金融资本那末英国同埃及（或者同其他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贸易就会“增长得”快些。这是什么意思？这岂不是说，如果自由竞争没有受到一般垄断的限制，没有受到金融资本的“联系”或压迫（这也是垄断）的限制，没有受到个别国家垄断地占有殖民地的限制，那末资本主义就会发展得快些么？

考茨基的论断不可能有别的意思，而这个“意思”却是毫无意思的。就假定会这样，如果没有任何垄断，自由竞争会使资本主义和商业发展得更快些。但是，要知道商业和资本主义发展得愈快，产生垄断的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的程度也就愈高。而且垄断已经产生了，恰好是从自由竞争中产生的！即使现在垄断开始延缓发展，这也不能成为维护自由竞争的理由，因为自由竞争在产生垄断以后，就不可能存在了。

不管你怎样把考茨基的论断翻来复去地看，这里面除了反动性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

即使把这种论断修改一下，象斯彼克塔托尔说的那样，现在英属殖民地同英国的贸易，比英属殖民地同其他各国的贸

① 《金融资本》第 567 页。

易发展得慢些，——这也挽救不了考茨基。因为打击英国的也是垄断，也是帝国主义，不过是其他国家的（美国的、德国的）垄断和帝国主义。大家知道，卡特尔引起了一种新的独特的保护关税，它所保护的（这一点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上就已经指出来了¹⁶）恰好是那些能够出口的产品。其次，大家知道，卡特尔和金融资本有一种“按倾销价格输出”的做法，也就是英国人所说的“抛售”的做法：卡特尔在国内按垄断的高价出卖产品，而在国外却按贱几倍的价格倾销，以便打倒自己的竞争者，把自己的生产扩大到最大限度等等如果说德国同英属殖民地的贸易比英国同英属殖民地的贸易发展得快些，那也只能证明德国帝国主义要比英国帝国主义更新、更强大、更有组织、更高明，而决不能证明自由贸易的“优越”，因为这里并不是自由贸易同保护关税政策或殖民地附属关系作斗争，而是一个帝国主义同另一个帝国主义、一个垄断组织同另一个垄断组织、一个金融资本同另一个金融资本作斗争。德国帝国主义对英国帝国主义的优势，比殖民地疆界或保护关税的城墙更厉害。如果由此得出主张自由贸易与“和平的民主”的“理由”，那是庸俗的，是忘掉帝国主义的基本特点和特性，是用市侩的改良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

有趣的是，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阿·兰斯堡，虽然也同考茨基一样对帝国主义作了市侩式的批评，但是他对贸易统计材料毕竟作了比较科学的整理。他并不是随便拿一个国家，也不是单拿一个殖民地来同其余国家比较，而是拿帝国主义国家的两种输出作比较：第一种是对财政上依赖于帝国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国家借钱的国家的输出，第二种是对

财政上独立的国家的输出。结果如下：

德国的输出（单位百万马克）

		1889年	1908年	增加的百分数
对财政上依赖于德国的国家的输出	罗马尼亞……	48.2	70.8	+ 47%
	葡 萄 牙……	19.0	32.8	+ 73%
	阿 根 廷……	60.7	147.0	+ 143%
	巴 西……	48.7	84.5	+ 73%
	智 利……	28.3	52.4	+ 85%
	土 耳 其……	29.9	64.0	+114%
<hr/>				
对财政上不依赖于德国的国家的输出	总 计……	234.8	451.5	+ 92%
	大不列颠……	651.8	997.4	+ 53%
	法 国……	210.2	437.9	+108%
	比 利 时……	137.2	322.8	+135%
	瑞 士……	177.4	401.1	+127%
	澳大利亚……	21.2	64.5	+205%
	荷属印度……	8.8	40.7	+363%
<hr/>				
总 计…… 1206.6 2264.4 +87%				

兰斯堡没有做总计，所以很奇怪，他没有看到：如果这些数字能够证明什么的话，那只能证明他自己不对，因为对财政上不独立的国家的输出，毕竟要比对财政上独立的国家的输出增加得快些，虽然快得并不多（我们把“如果”两字加上着重号，是因为兰斯堡的统计还是很不完全的）。

兰斯堡在考察输出和贷款的关系时写道：

“1890/91 年罗马尼亚通过几家德国银行缔结了一项贷款条约。其实在前几年，这些德国银行就已经发放这笔贷款了。这笔贷款主要是用来向德国购买铁路材料的。1891 年德国对罗马尼亚的输出是五千五百万马克。下一年就降到三千九百四十万马克，以后断断续续地下降，到 1900 年一直降到二千五百四十万马克。直到最近几年，因为有了两笔新的贷款，才又达到了 1891 年的水平。

德国对葡萄牙的输出，由于 1888/89 年的贷款而增加到二千一百一十万马克（1890 年），在以后两年内，又降到一千六百二十万马克和七百四十万马克，直到 1903 年才达到原先的水平。

德国同阿根廷贸易的材料更为明显。由于 1888 年和 1890 年的两次贷款德国对阿根廷的输出在 1889 年达到了六千零七十万马克。两年后，输出只有一千八百六十万马克，还不到过去的三分之一。直到 1901 年，才达到并超过 1889 年的水平，这是同承办新的国家公债和市政公债，同拨款兴建电力厂以及其他信贷业务有关的。

德国对智利的输出，由于 1889 年的贷款增加到四千五百二十万马克（1892 年），一年后降到了二千二百五十万马克。1906 年通过德国几家大银行缔结了一项新的贷款条约以后输出又增加到八千四百七十万马克（1907 年）而到 1908 年又降到了五千二百四十万马克。”^①

兰斯堡从这些事实中得出了一种滑稽的市侩说教：同贷

① 《银行》杂志 1909 年第 2 期第 819 页及往下各页。

款相联系的输出是多么不稳固、不平衡，把资本输出国外而不用来“自然地”“和谐地”发展祖国工业，是多么不好；办理外国贷款时，克虏伯要付出几百万的附加费，代价是多么“大”，等等。但是事实清楚地说明：输出的增加，恰好是同金融资本的骗人勾当相联系的，金融资本并不关心什么资产阶级的说教，它要从一条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第一张皮是从贷款取得的利润，第二张皮是在同一笔贷款用来购买克虏伯的产品或钢业辛迪加的铁路材料等等时取得的利润。

再说一遍，我们决不认为兰斯堡的统计是完备的，但是必须加以引用，因为它比考茨基和斯彼克塔托尔的统计要更科学些，因为兰斯堡指出了对待问题的正确方法。要议论金融资本在输出等方面的作用，就要善于专门地、单独地说明输出同金融家骗人勾当的联系，专门地、单独地说明输出同卡特尔产品的销售等等的联系。随便地拿一般殖民地同非殖民地比较，拿一个帝国主义同另一个帝国主义比较，拿一个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如埃及）同其余一切国家比较，那就正是回避和掩饰问题的实质。

考茨基在理论上对帝国主义进行的批评，其所以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其所以只能用来宣传同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保持和平和统一，就是因为这种批评恰恰回避和掩饰了帝国主义最深刻、最根本的矛盾：垄断同与之并存的自由竞争的矛盾，金融资本的庞大“业务”（以及巨额利润）同自由市场上“诚实的”买卖的矛盾，卡特尔、托拉斯同没有卡特尔化的工业的矛盾等等。

考茨基胡诌出来的那个臭名昭彰的“超帝国主义”论，

也具有完全相同的反动性质。请把考茨基在 1915 年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断同霍布森在 1902 年的论断比较一下。

考茨基说：“……现在的帝国主义的政策难道不会被一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所排除吗？这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将以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相互斗争。不管怎样，资本主义的这一新阶段是可以设想的。至于能不能实现，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前提来解决这一问题。”^①

霍布森说：“基督教在各自占有若干未开化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少数大联邦帝国里已经根深蒂固了，很多人觉得基督教正是现代趋势的最自然的发展，并且是这样一种发展，它最有希望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巩固的基础上达到永久的和平。”

被考茨基叫作超帝国主义的东西，也就是霍布森比他早十三年叫作国际帝国主义的那个东西。除了用一个拉丁语字头代替另一个字头^②，编造出一个深奥的新词以外，考茨基的“科学”见解的进步的地方，不过是妄想把霍布森所描写的东西，其实是英国牧师的谎话，冒充为马克思主义。在英布战争以后，英国牧师这一高贵等级把主要力量用来安慰那些在南非战役中丧失了不少生命，并且为保证英国金融家有更高的利润而缴纳了更高捐税的英国小市民和工人，这本来是很自然的。除了说帝国主义并不那么坏，说它很快就要变

① 1915 年 4 月 30 日《新时代》杂志第 144 页。

② 原文《у л ь тра-и м пе риа и з м》（“超帝国主义”）和《и н т е р-и м пе ри-а ли з м》（“国际帝国主义”）这两个词的差别只是两个拉丁语字头（у л ь тра 和 и н т е р）的差别。一编者注

成能够保障永久和平的国际（或超）帝国主义，——哪里还有什么更好的安慰呢？不管英国的牧师或甜蜜蜜的考茨基的意图如何善良，但是他那个“理论”的客观的即真正的社会意义只有一个：就是拿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达到永久和平的希望，对群众进行最反动的安慰，其方法就是使人们不去注意现代的尖锐矛盾和尖锐问题，而去注意某种所谓新的将来的“超帝国主义”的虚假前途。在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里，除了欺骗群众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

其实只要同那些人人皆知的不容争辩的事实好好对比一下，就会清楚地知道，考茨基硬要德国工人（和各国工人）相信的那种前途是多么虚假了。拿印度、印度支那和中国来说吧。谁都知道，这三个共有六七亿人口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是受英、法、日、美等几个帝国主义强国的金融资本剥削的。假定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组成了几个彼此敌对的联盟，以保持或扩张它们在上述亚洲国家中的领地、利益和“势力范围”这将会是一些“国际帝国主义的”或“超帝国主义的”联盟。又假定所有帝国主义强国组成一个联盟来“和平”分割上述亚洲国家，这将会是一种“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上就有这种联盟的实际例子，例如，列强共同对付中国就是这样。试问，在保存着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考茨基正是以这样的条件为前提的“可以设想”这种联盟不是暂时的联盟吗？“可以设想”这种联盟会消除各种各样的摩擦、冲突和斗争吗？

只要清楚地提出这个问题，就不能不给以否定的回答。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分割势力范围、分享利益和分割殖

民地等等，除了以分割者的实力，也就是以一般经济、金融、军事等等的实力为根据外，不可能设想以其他的东西为根据而这些分割者的实力的变化又各不相同，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企业、各个托拉斯、各个工业部门、各个国家的发展不可能是平衡的。如果拿半世纪以前德国的资本主义实力同当时英国的实力相比，那时德国还小得可怜，日本同俄国相比，也是如此。能不能“设想”一二十年之后，帝国主义列强的实力对比依然没有变化呢？绝对不能。

所以，资本主义现实中的（而不是英国牧师或德国“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的庸俗的市侩幻想中的）“国际帝国主义的”或“超帝国主义的”联盟，不管形式如何，不管是一个帝国主义联盟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盟，还是一切帝国主义强国结成一个总联盟，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前后两次战争之间的“暂时休战”。和平的联盟准备着战争，同时它又是从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两者互相制约，在同一个基础上，即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帝国主义联系和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着和平斗争形式与非和平斗争形式彼此交替的情形。聪明绝顶的考茨基为了安慰工人，使他们同投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调和，就把一条链子上的这一环节同另一环节割开，把今天一切强国为了“安慰”中国（请回忆一下对义和团起义的镇压）而结成的和平的（和超帝国主义的，——甚至是超而又超的帝国主义的）联盟，同明天的、非和平的冲突割开，而这种非和平的冲突，又准备在后天结成“和平的”总联盟来分割——如说——土耳其等等。考茨基不提帝国主义和平时期同帝国主义战争时期之间的活生生

的联系，而把僵死的抽象概念献给工人，是为了使工人同他们那些僵死的领袖调和。

美国人希尔在他的《欧洲国际关系发展中的外交史》一书序言中，把现代外交史分为以下三个时期：（1）革命时代；（2）立宪运动；（3）现代“商业帝国主义”时代^①。另一个作家则把 1870 年以来的大不列颠“世界政策”史分为四个时期：（1）第一个亚洲时期（反对俄国在中亚细亚一带向印度扩张）；（2）非洲时期（大约在 1885—1902 年），为了分割非洲而同法国斗争（1898 年的“法索达”事件，一差一点同法国作战）；（3）第二个亚洲时期（与日本缔约反对俄国）；（4）“欧洲”时期，主要是反对德国^②。早在 1905 年，银行“活动家”里谢尔就指出，在意大利进行活动的法国金融资本，为法意两国的政治联盟作了准备；德英两国为了争夺波斯以及所有欧洲各国的资本为了贷款给中国而进行斗争等等，于是他写道：“政治前哨战是在金融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这就是“超帝国主义的”和平联盟与普通帝国主义的冲突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活生生的现实。

考茨基抹杀帝国主义的最深刻的矛盾，也就必然要粉饰帝国主义，这种情形在他批评帝国主义的政治特性时也表现出来了。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和垄断的时代，金融资本和垄断到处都带有统治的趋向而不是自由的趋向。这种统治趋势

① 戴维·杰恩·希尔《欧洲国际关系发展中的外交史》(David JayneHill: 《A History of the Diplomacy in the InternationalDevelopment of Europe》) 第 1 卷第 10 页。

② 施尔德尔所著前书第 178 页。

的结果，就是在一切政治制度下都发生全面的反动，这方面的矛盾也极端尖锐化。民族压迫、兼并的趋向即破坏民族独立的趋向（因为兼并就是破坏民族自决）也变本加厉了。希法亭很正确地指出了帝国主义与民族压迫加剧之间的联系，他写道：“在新发现的国家里，输入的资本加深了各种矛盾，不断地引起那些有了民族自觉的人民对外来者的愈来愈强烈的反抗，这种反抗很容易发展成为一种反对外国资本的危险行动。旧的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的革命性的变化，各‘史外民族’千年来的农村闭塞性日益被破坏，他们正被卷到资本主义的漩涡中去。资本主义本身在慢慢地为被征服者提供解放的工具和手段。于是他们也就提出了欧洲民族曾经认为是至高无上的目标：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作为争取经济自由和文化自由的工具。这种独立运动，使欧洲资本在被它剥削的那些最宝贵的、最有光辉前途的区域中受到威胁，因此，欧洲资本只有不断地增加自己的兵力，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①

这里还要补充一点。帝国主义不仅在新发现的国家，而且在老牌国家也在实行兼并，加紧民族压迫，因而也使反抗加剧起来。考茨基表示反对帝国主义加紧进行的政治反动，然而他没有说明在帝国主义时代决不能同机会主义者统一这个十分迫切的问题。他反对兼并，然而采取的却是最无伤于机会主义者、最容易为机会主义者接受的方式。他是直接对德国听众说话的，然而他恰恰把最重要、最有现实意义的事

① 《金融资本》第 487 页。

实，例如德国兼并阿尔萨斯—洛林的事实掩盖起来。为了评价考茨基的这种“思想倾向”，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假定日本人指责美国人兼并菲律宾，试问会不会有很多人相信这是因为他根本反对兼并，而不是因为他自己想要兼并菲律宾呢？是不是应该承认，只有日本人起来反对日本兼并朝鲜，要求朝鲜有从日本分离的自由，才能认为这种反对兼并的“斗争”是真挚的，政治上是诚实的呢？

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理论分析，以及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帝国主义的批评，都浸透了一种同马克思主义绝不相容的、掩饰和缓和最根本矛盾的精神，都贯串着一种尽力保持欧洲工人运动中正在陷于破裂的同机会主义统一的意图。

十 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

我们已经看到，帝国主义就其经济实质来说，是垄断资本主义。这就决定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因为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而且正是从自由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是从资本主义结构向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必须特别指出能够说明我们研究的这个时代的四种主要的垄断形式，或垄断资本主义的四种主要表现。

第一、垄断是从发展到极高阶段的生产集中成长起来的。这就是资本家的垄断同盟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我们看到，这些垄断同盟在现代经济生活中起着多么大的作用。到二十世纪初，它们已经在各先进国家取得了完全的优势。如果说，最先走上卡特尔化道路的，是那些实行高额保护关税

制的国家《德国和美国），袖霸躲驳末实行自由贸易制的英国也表明了垄断是由生产集中产生的这个基本事实，不过稍微迟一点罢了。

第二、垄断加紧了对最重要的原料来源的掠夺，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的、卡特尔化程度最高的工业部门，如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所需要的原料来源的掠夺。垄断地占有最重要的原料来源，大大加强了大资本的权力，加剧了卡特尔化的工业和没有卡特尔化的工业之间的矛盾。

第三、垄断是从银行成长起来的。银行已经由普通的中介企业变成了金融资本的垄断者。在任何一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为数不过三五家的最大银行实行工业资本同银行资本的“个人联合”，把持着占全国资本和货币收入很大一部分的几十亿几十亿资金。金融寡头给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所有一切经济机构和政治机构罩上了一层依赖关系的密网，——这就是这种垄断的最明显的表现。

第四、垄断是从殖民政策成长起来的。在殖民政策的无数“旧的”动机以外，金融资本又增加了争原料来源、争夺资本输出、争夺“势力范围”（即进行有利的交易、取得租让、取得垄断利润等等的范围）以及争夺一般经济领土等等的动机。例如，当欧洲列强在非洲的殖民地占非洲面积十分之一的时候（那是远在 1876 年的情形）殖民政策可以用非垄断的方式，用所谓“自由占领”土地的方式发展。但是，当非洲十分之九的面积已经被占领（到 1900 年时）全世界已经分割完毕的时候，一个垄断地占有殖民地、因而使分割世界和重新分割世界的斗争特别尖锐起来的时代就不可避免地到

来了。

垄断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尖锐到什么程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只要指出物价高涨和卡特尔的压迫就够了。这种矛盾的尖锐化，是从世界金融资本取得最终胜利开始的这一过渡历史时期的最强大的动力。

垄断制，寡头制，代替了自由趋向的统治趋向，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愈来愈多的弱小国家，——这一切便产生了帝国主义的一些特点，使人必须说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趋势之一，即形成为“食利国”高利贷国的趋势愈来愈明显了，这种国家的资产阶级愈来愈依靠输出资本和“剪息票”为生了。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工业部门，个别资产阶级阶层，个别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但是这种发展不仅一般地更不平衡了，而且这种不平衡还特别表现在资本最雄厚的国家（英国）的腐朽上面。

研究德国大银行的作家里谢尔谈到德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时说：“德国前一个时代（1848—1870年）的进步并不太慢，但是同德国现时代（1870—1905年）整个经济特别是银行发展的速度比起来，就好象拿旧时的邮车同现代的汽车相比一样，现代汽车行驶之快，对于不小心的行人和坐汽车的人都是很危险的。”这个异常迅速地成长起来的金融资本，正因为成长得这样迅速，所以它也不反对更“心安理得地”去占有殖民地，而这些殖民地是要从更富足的国家手里，用不单是

和平的手段加以夺取的。美国近几十年来经济的发展比德国还要快，正因为如此，美国最新资本主义的寄生性的特征就表现得特别明显。另一方面，拿共和派的美国资产阶级同君主派的日本或德国的资产阶级来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在帝国主义时代，它们之间的极大的政治上的差别也大大缩小了，这倒不是因为这种差别根本不重要，而是因为所有这些资产阶级都带有明显的寄生性的特征。

许多工业部门中的某一部门、许多国家中的某一国家的资本家获得了垄断高额利润，在经济上就有可能去收买个别的工人阶层，而且还可能暂时收买相当数量的少数工人，把他们拉到该部门或该国家的资产阶级方面来反对其他一切的部门或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因分割世界而加剧的对抗，更加强了这种趋向。于是形成了帝国主义同机会主义的联系，这种联系在英国表现得最早而且最鲜明，因为某些帝国主义发展特点的出现，在英国比在其他国家早得多。有些作家，例如尔·马尔托夫，爱用一种“官场的乐观主义的”（同考茨基、胡斯曼一样）论断，来回避帝国主义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相联系这个现在特别明显的事，说什么假如正是先进的资本主义会加强机会主义，或者，假如正是待遇最好的工人倾向于机会主义，等等，那末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的事业就会是没有希望的。不要看错了这种“乐观主义”的意义：这是对机会主义的乐观主义，这是用来掩护机会主义的乐观主义。其实，机会主义特别迅速和特别可恶的发展，并不能保证机会主义取得巩固的胜利，正象健康的身体上的恶性脓疮的迅速发展，只能加速脓疮破口而使身体恢复健康一样。在

这方面最危险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不愿意了解，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就是一句骗人的空话。

根据以上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的全部论述，必须说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在这一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叙述最新资本主义时常用的一些字眼，什么“交错”呀、“没有孤立性”呀，等等；什么银行“就其任务和发展而言，不是带有单纯私有经济性质的企业，而是日益超出单纯私有经济调节范围的企业”。而讲了这种话的同一个里谢尔，却非常郑重地宣称，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化”的“预言”并“没有实现”！

“交错”这个字眼说明了什么呢？它只抓住了我们眼前发生的一个过程的最明显的一点。它表明观察者只看到一棵棵的树木而看不到森林。它盲目地复写外表的、偶然的、紊乱的现象。它暴露出观察者被原始材料压倒了，完全不能了解其中的内容和意义。股票的占有，私有者的关系，都是“偶然交错在一起的”。但是隐藏在这种交错现象底下的，构成这种交错现象的基础的，是正在变化的社会生产关系。既然大企业变得十分庞大，并且根据对大量材料的精确估计，有计划地取得数千万居民所必需的全部原料的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既然运送这些原料到最便利的生产地点（有时彼此相距数百里数千里）是有步骤地进行的，既然从原料的依次加工一直到制成许多种成品的各个工序是由一个中心指挥的；既然这些产品分配给数千万数万万的消费者是按照一个计划

进行的(在美、德两国，煤油都是由美国“煤油托拉斯”销售的)；——那末很明显，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生产的社会化，而决不是简单的“交错”；很明显，私有经济关系和私有制关系已经变成与内容不相适应的外壳了；如果人为地拖延消灭这个外壳的日子，那它就必然要腐烂，——它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万一机会主义的脓疮迟迟不能治好的话），但还是必然要被消灭的。

德国帝国主义的狂热崇拜者舒尔采-格弗尼茨惊叹道：

“如果领导德国银行的责任归根到底 是落在十来个人身上，那末现在他们的活动对于人民福利说来，就比大多数国务大臣的活动还要重要（在这里，把银行家、大臣、工业家和食利者“交错”的情形忘掉，是更有利的……），……如果把我们所看到的那些趋势的发展情况彻底想一番，那末结果就会是：一国的货币资本统一在银行手里；银行又互相联合为卡特尔；一国寻找投资场所的资本都化为有价证券。到那时就会实现圣西门的天才预言：“现在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同经济关系的发展缺乏统一的调节这个事实相适应的，这种状态应当被有组织的生产所代替。指挥生产的将不是那些彼此隔离、互不依赖、不知道人们经济要求的企业家；这种事情将由某种社会机构来管理。有可能从更高的角度去观察广阔的社会经济领域的中央管理委员会，将把这种社会经济调节得有利于全社会，把生产资料交给适当的人运用，尤其是将设法使生产和消费经常处于协调的状态。现在有一种机构已经把某种组织经济劳动的工作包括在自己的任务以内了，这种机构就是银行。我们现在还远远没有实现圣西门的这些预

言：但是我们已经走在实现这一预言的道路上：这是和马克思本人所设想的马克思主义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不过也只是形式上不同而已。”^①

不用说，这是对马克思的很好的“反驳”，这样就从马克思的精确科学分析倒退到圣西门的猜测上去了，圣西门的猜测虽然是天才的猜测，但终究只是猜测。

写于 1919 年 1-6 月

按手稿刊印并根据单行本

1917 年 4 月第一次在

原文作过校订

彼得格勒用单行本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 22 卷

① 《社会经济概论》第 146 页。

注 释

1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是马克思《资本论》的直接继续，它总结了《资本论》出版以后资本主义在半个世纪中的发展，对帝国主义做了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指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列宁根据他所揭示的帝国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得出了社会主义首先在一个或几个资本主义国家胜利而不可能同时在所有国家胜利的结论。列宁的这一新的、完备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坚定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信念。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是 1916 年写成的。早在 1915 年，列宁就在伯尔尼开始研究各国关于帝国主义的著作，从 1916 年 1 月起开始写这本书。这年 1 月底，列宁移居苏黎世，在苏黎世州立图书馆里继续写这本书。列宁从几百本外文书籍、杂志、报纸和统计汇编中做的摘录、纲要、札记和表格等共有四十多印张。1939 年，这些资料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的书名印成单行本出版。

1916 年 7 月 2 日，列宁写成本书，并且把手稿寄交孤帆出版社。出版社里的孟什维克分子删去了书中对考茨基和俄国孟什维克（马尔托夫等）的机会主义理论的尖锐批评，把列宁原用的词“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发展成为资本帝国主义）改为“变成”，把“反动性”（“超帝国主义”论的反动性）改为“落后性”等等。1917 年初，孤帆出版社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的书名在彼得格勒刊印了这本书。

列宁回到俄国以后，给这本书写了序言。1917 年 9 月这本书问世。

2 这篇序言第一次发表在 1921 年 10 月《共产国际》杂志第 18 期上，标题是《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

3 第二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于 1912 年 11 月 24—25 日举行。这是由于欧洲面临战争的威胁而召开的一次非常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宣

言，宣言着重指出了未来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并号召各国社会党人积极参加反战斗争。

- 4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是中派政党，成立于 1917 年 4 月，首领是考茨基考茨基主义的组织“劳动友谊社”是该党的主要部分。“独立党人”宣传同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团结”，替他们辩解，庇护他们，主张放弃阶级斗争。

1920 年 10 月在哈雷举行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党内很大一部分人于 1920 年 12 月同德国共产党合并。右派分子单独成立了一个党，仍称独立社会民主党，一直存在到 1922 年

- 5 社会革命党是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政党，1902 年初由几个不同的民粹派团体和小组合并而成。它代表富农阶级的利益。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折衷混合物。列宁指出，社会革命党人“竭力用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时笔‘批评’的补钉来修补民粹主义的破洞”（见《列宁全集》第 9 卷第 295 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 1917 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同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充当了反革命临时政府的主要支柱。社会革命党人不支持农民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要求，主张保留地主土地私有权。

1917 年 12 月，社会革命党人左翼组成了独立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表面上承认苏维埃政权，并同布尔什维克达成协议，但很快又开始反对苏维埃政权。

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内战时期，社会革命党人曾多次策划反革命阴谋策动富农叛乱、暗害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继续进行反苏维埃国家的活动，后被苏维埃政权粉碎。

- 6 斯巴达克派（国际派）是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组织，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立。斯巴达克派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是卡·李卜克内西罗·卢森堡、弗·梅林、克·蔡特金等人。1915 年 4 月卢森和梅林创办了《国际》杂志，把大部分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团结在它的周围形成国际派。从 1916 年起，国际派开始出版了署名斯巴达克的《政治书信》因此又称斯巴达克派。1917 年 4 月，它加入德国中派独立社会民主党，但保持

组织上的独立。1918 年 11 月，在德国革命过程中斯巴达克派形成了斯巴达克联盟。十一月革命后，斯巴达克派同“独立党人”决裂，于同年 12 月建立德国共产党。

斯巴达克派在群众中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宣传，揭露了德国帝国主义的掠夺政策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袖的叛卖行为。但是斯巴达克派—德国左派，在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上没有摆脱半孟什维主义的错误，他们发挥了半孟什维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自决的原则（即直到实行分离，成立独立国家），否认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解放战争的可能性，低估革命政党的作用而崇拜运动的自发性。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和《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见本卷第 846—860 页和《列宁全集》第 23 卷第 18—72 页）等著作，以及斯大林的信《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见《斯大林全集》第 13 卷第 76—91 页）都对德国左派的错误做了批评。

- 7 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姆尼斯代表大会于 1912 年 9 月 15—21 日举行。大会通过了关于帝国主义的决议。决议说明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是“卑鄙的掠夺和侵略政策”，并号召全党“加倍努力来反对帝国主义”。
- 8 《银行》（《Die Bank》）是德国金融家的杂志，1908 年至 1934 年在柏林出版。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准备工作中多次分析了这家杂志所刊载的文章和材料（见《列宁全集》第 39 卷第 60—78、172—195、544—545 页）。
- 9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9 卷第 255 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38 页。
- 1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第 18 页。
- 11 同上，第 353 页。
- 12 取消派出现在俄国 1905 年至 1907 年革命失败后的斯托雷平反动时期
10 当时孟什维克背弃了党纲上的革命要求和党的革命口号，企图取消无

产阶级革命秘密党，主张成立一个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公开的工人党”因而被称为取消派。1912 年布拉格代表会议把取消派清除出党。参看列宁《几个争论问题》《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457—480 页)。

- 13 费边社分子是一批英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于 1884 年成立的改良主义的
11 机会主义的费边社的成员。它的主要首领是悉·维伯和比·维伯。费
边社以古罗马统帅费边·马克西姆的名字命名。费边曾在同汉尼拔的战
争中采取逃避决战的待机策略，因而得到“孔克达特”(缓进者)的绰号。
费边社分子反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鼓
吹通过细微的改良来逐渐地改造社会，宣扬用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办法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费边社在工人阶级中传播资产阶级影响，是英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的发源地之一列宁说费边社“最完整地体现了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工人政策”《见《列宁全集》第 21 卷第 237 页)。1900 年，费边社并入工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费边社分子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
- 14 莫希干人是美洲一个已经绝种的民族。“最后一批莫希干人”一语，来源于美国作家库伯的小说《最后一个莫希干人》。后来，此语就成了最后的代表者的同义语。
- 15 斯彼克塔托尔，即俄国经济学家、崩得分子米·伊·纳希姆桑
- 16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第 6 章第 2 节。

内 部 发 行

每 册：0.74 元